

2019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7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7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集刊，迄今已出版六辑。本辑内容包括考古新发现、研究与探索、北域撷英、碑铭考释、书评五个栏目，收录论文24篇，以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探索为重心，也包括一些重要的境外考古发现的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方面的前沿动向和重要成果。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七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7-03-062081-1

Ⅰ. ①北… Ⅱ. ①中… 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1420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张 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字数：500 000

定价：1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目　　录

考古新发现

研究与探索

北域撷英

碑铭考释

书评

天津蓟县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调查简报

王家琪[1，2]　盛立双[3]　魏天旭[1，2]　甘才超[3]　李万博[1，2]　王春雪[1，2]

（1. 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130012；
2.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长春，130012　3.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300051）

内容摘要：2015 年 4 月 26 日 ~ 5 月 4 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旧石器考古队，对天津蓟县进行旧石器田野调查。考古队于小穿芳峪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制品 15 件。石制品原料种类较多，类型包括石片、工具和断块。遗物总体特征属小石器工业类型。大部分石制品制作粗糙，推测该地点为临时加工工具场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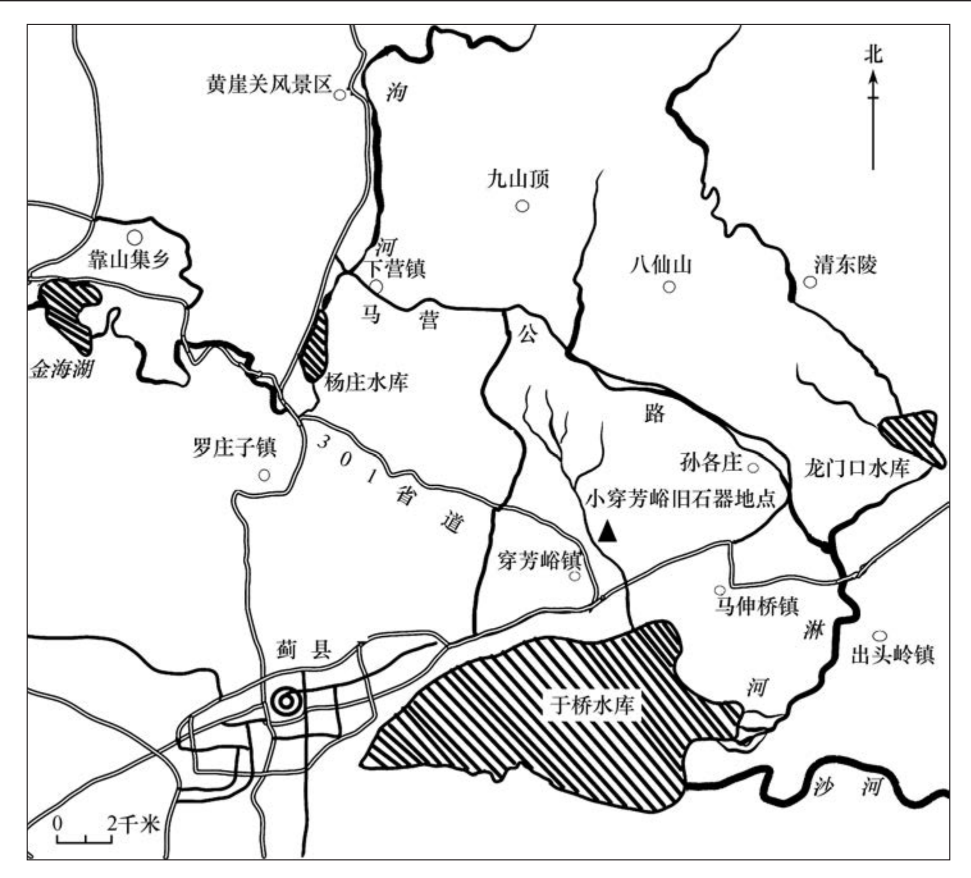
关键词：蓟县；小穿芳峪；旧石器时代晚期

2005 年 3 ~ 5 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首次在天津蓟县地区发现旧石器地点，后经整理共 13 处，采集石制品千余件[1]。2007 年 5 ~ 7 月，由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其中东营坊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2]。上述工作填补了天津地区的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丰富了研究环渤海地区古人类与古环境的资料。

为进一步对天津地区旧石器进行研究，2015 年 4 月 26 日 ~ 5 月 4 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旧石器考古队，在蓟县文物保管所的配合下，再次对蓟县地区进行旧石器田野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 13 处，采集石制品数百件，收获颇丰。5 月 3 日，在小穿芳峪发现了一处旧石器地点，地表采集石制品 15 件。本文即是对此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一、地理位置与地貌

蓟县位于天津市区北部，属于天山—阴山—燕山纬向构造带，经历了长期的海陆变迁过程。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3]。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位于天津市蓟县东北部。该地点东邻伯王庄，西靠穿芳峪，南抵于桥水库，西南距蓟县约 13 千米，南距天津市区约 110 千米；西距北京市区约 100 千米。该地区位于低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地上，海拔为 65 米。地理坐标为 40°06′15.42″N；117°32′25.58″E（图一）。



图一 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地理位置图

二、石制品分类与描述

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制品15件，原料以硅质泥岩和角岩为主。器物类型为石片、工具和断块。下面进行分类与描述。

（一）石 片

共6件，均为锤击石片。根据石片的完整程度分为完整石片和断片。

1. 完整石片

共2件。原料均为砂岩。长15.58～38.3、平均长26.94毫米；宽16.33～38.92、平均宽27.63毫米；厚4.32～8.39、平均厚6.36毫米。重1.03～10.81克，平均重5.92克。台面为自然台面和线状台面。

15TJXC：1，原料为砂岩。长38.3、宽38.92、厚8.39毫米。石片角77°。重10.81

克。台面为自然台面，台面长 22.02、宽 8.21 毫米。劈裂面上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凸，同心波不明显，放射线不清晰（图二，1）。

2. 断片

共 4 件。根据断裂方式的不同分为左裂片、右裂片和远端断片。

（1）左裂片。

共 1 件。15TJXC：2，原料为石英岩。长 48.65、宽 49.04、厚 12.15 毫米。重 28.73 克。打击点集中，半锥体略平，同心波不明显，放射线清晰（图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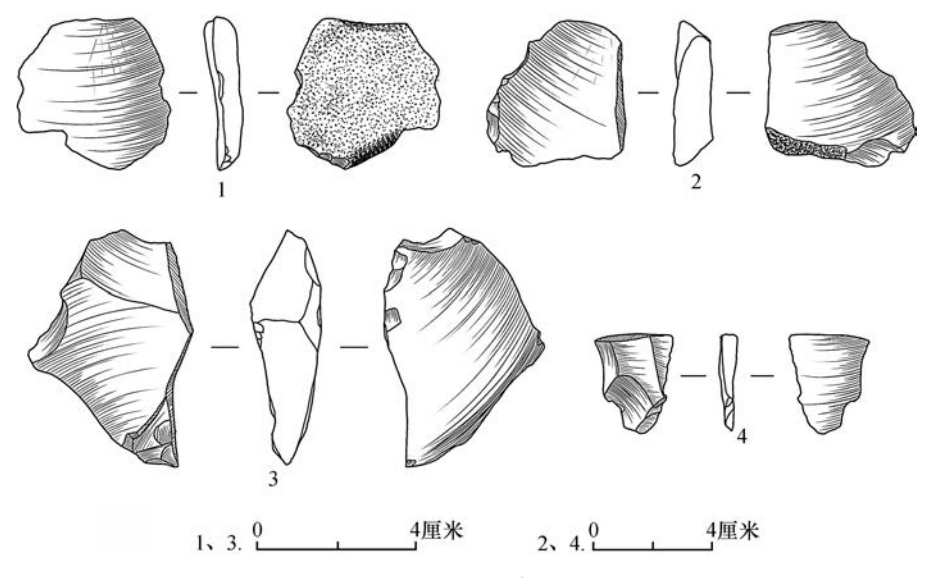
（2）右裂片。

共 2 件。原料均为角岩。长 44.38 ~ 60.44、平均长 52.41 毫米；宽 41.44 ~ 75.12、平均宽 58.28 毫米；厚 15.75 ~ 22.87、平均厚 19.31 毫米。重 25.83 ~ 80.89 克，平均重 53.36 克。

15TJXC：8，长 60.44、宽 41.25、厚 22.87 毫米。重 80.89 克。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平，同心波明显，放射线清晰（图二，3）。

（3）远端断片。

共 1 件。15TJXC：10，长 33.72、宽 27.51、厚 5.9 毫米。重 2.85 克。同心波明显（图二，4）。



图二　石片和断片

1. 完整石片（15TJXC：1） 2. 左裂片（15TJXC：2） 3. 右裂片（15TJXC：8） 4. 远端断片（15TJXC：10）

（二）工　　具

共 8 件，可分为二、三类工具[4]。

1. 二类工具

共3件，均为单刃刮削器。根据刃缘形态分为单直刃和单凹刃。毛坯均为片状，原料包括燧石和硅质泥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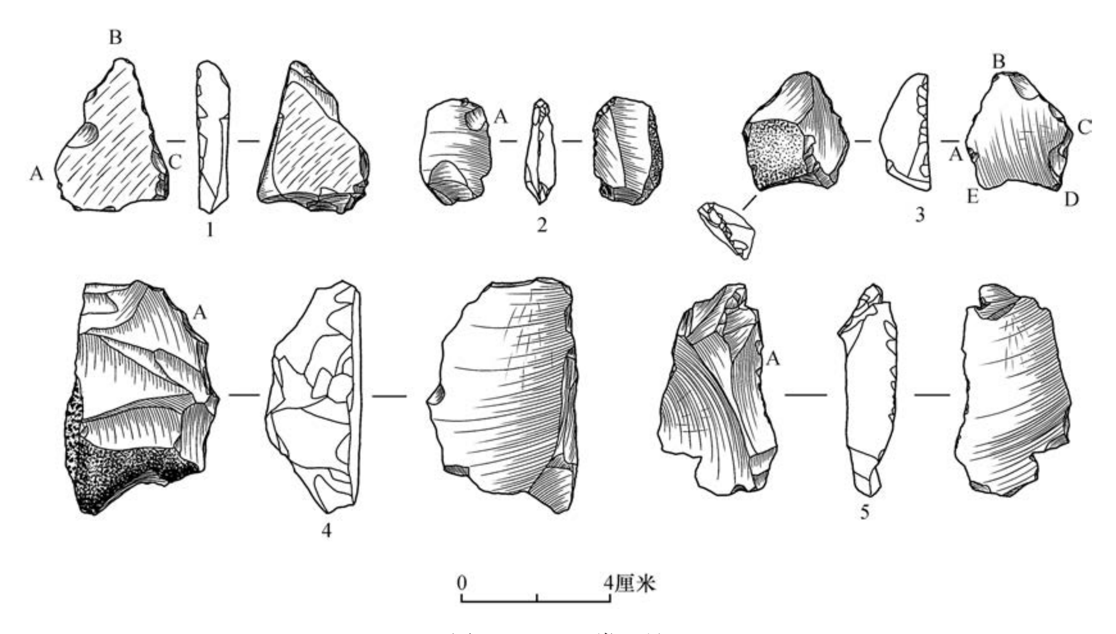
（1）单直刃刮削器。

共1件。15TJXC：15，原料为燧石。长27.37、宽17.13、厚6.4毫米。重3.54克。形状不规则。刃长19.6毫米。刃角45°。器物大小适中，A处以自然边为直刃，刃部薄锐，无须加工，方便直接使用（图三，2）。

（2）单凹刃刮削器。

共2件。长44.09～52.57、平均长48.33毫米；宽24.67～30.04、平均宽27.36毫米；厚9.93～14.59、平均厚12.26毫米。重8.81～16.27克，平均重12.54克。刃长22.42～34.66、平均长28.54毫米。刃角30°～60°，平均45°。

15TJXC：6，原料为硅质泥岩。长52.57、宽30.04、厚14.59毫米。重16.27克。刃长34.66毫米。刃角60°。器物大小适中，A处以自然边为凹刃，刃部薄锐，无须加工，方便直接使用（图三，5）。



图三　二、三类工具

1. 三类单尖刃（15TJXC：4）2. 二类单直刃（15TJXC：15）3. 三类双尖刃（15TJXC：5）
4. 三类单凸刃（15TJXC：11）5. 二类单凹刃（15TJXC：6）

2. 三类工具

共5件，均为刮削器，根据刃的数量可分为单刃和双刃。单刃根据刃的形态可分为

凸刃和尖刃。双刃为双尖刃。毛坯均为片状。原料包括硅质泥岩和角岩。

（1）凸刃刮削器。

共3件。长34.39 ~ 56.04、平均长47.5毫米；宽33.76 ~ 57.02、平均宽41.85毫米；厚9.56 ~ 18.33、平均厚14.85毫米。重21.14 ~ 29.91克，平均重25.12克。加工方向包括正向和反向。刃长45.3 ~ 58.99、平均长51.83毫米。刃角25° ~ 35°，平均30°。3件均为修理刃缘。

15TJXC：11，形状不规则，原料为角岩。长56.04、宽40.75、厚18.33毫米。重29.91克。刃长58.99毫米。刃角35°。A侧经正向修理，形成凸刃，刃缘较钝（图三，4）。

（2）尖刃刮削器。

单尖刃　1件。15TJXC：4，形状似三角形，原料为硅质泥岩。长41.7、宽30.71、厚8.17毫米。重10.41克。AB以自然边作刃缘，有细小的使用疤，刃长28.77毫米；BC经正向修理，刃长28.58毫米。所夹刃角57°（图三，1）。

双尖刃　1件。15TJXC：5，形状不规则，原料为硅质泥岩。长33.27、宽29.96、厚14.28毫米。重12.21克。AB、BC采用正向修理，刃缘较薄锐，刃长分别为20.09、19.12毫米。所夹刃角为73°。CD、DE采用错向修理方法，刃缘较钝，刃长分别为16.02、20.49毫米。所夹刃角为81°。器体轻巧，方便使用（图三，3）。

（三）断　块

1件。长37.32、宽22.3、厚13.65毫米。重12.24克。形状不规整。

三、结　论

（一）工业特征

（1）石制品原料包括角岩、硅质泥岩、砂岩、石英岩及燧石等。虽然数量少，但种类较多，材料大部分较为优质，适合作为加工原料，从周边环境观察来看应为就地取材。

（2）该地点石制品共15件。总体上看，包括石片6件，其中完整石片2件、断片4件；工具8件，其中二类工具3件、三类工具5件，不见一类工具。断块1件。

（3）根据石制品的最大长度（L），可分为微型（L＜20毫米）、小型（20毫米≤L＜50毫米）、中型（50毫米≤L＜100毫米）、大型（100毫米≤L＜200毫米）、巨型（L≥200毫米）五种类型[5]。经统计，该地点的石制品，微型1件，小型10件，中型4件，不见大型和巨型。

（4）石片6件，均为锤击石片，大部分打击点集中，有清晰的放射线，同心波不太明显。

（5）二类工具 3 件，均为刮削器，以石片锋利的边缘作刃，无须修理，直接使用。三类工具 5 件，修理方法以硬锤直接打击技术为主，加工方向包括正向、反向和错向加工，其中一件双尖刃刮削器较为精美。毛坯选择均为片状，修理的部位以修刃为主。这说明古人是在有意地选择合适的坯材和部位进行修理，以便于制造出适合人类使用的工具，进行生产生活。

（二）讨　论

1. 工业类型

据前文所述，天津蓟县地区在 2005 年和 2007 年曾进行了旧石器的调查和发掘工作。研究表明，该地区存在两个石器工业类型，即以石片石器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和以细石叶加工的各类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叶工业类型。而 2015 年的调查结果初步显示，该地区也存在大石器工业类型[6]。从蓟县周边的地区如泥河湾盆地及东北地区等地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来看，大石器工业类型和小石器工业类型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应该是同时存在、并行发展的。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细石叶工业开始出现。但并没有取代原有的传统，而是与之共同发展[7]。本文认为，同一地区大小石器传统是并行的，随着时间推移，新的工业类型并不会完全取代原有的工业类型。从天津蓟县地区大石器工业、小石器工业，包括细石器工业均存在且互相融合的现象，可以印证这一观点。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的石制品以中小型石片为主，不存在大型和巨型工具，这符合小石器工业类型的特点。

2. 地点性质和年代分析

通过上述石制品的研究，该地点没有发现石核类的石制品，且石制品数量很少。因此，本文推测，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可能为古人类临时活动的场所。

虽然该地点未发现可供测年的动物化石，且没有发现原生层位，石制品均为地表采集，但由于没有陶片或磨制石器等遗物的发现，根据天津地区区域地层的堆积年代[8]及该地点的河流阶地性质分析，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三）学术意义

综上，小穿芳峪旧石器地点的发现，是十余年来在蓟县地区再次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之一。新地点、新材料的发现，不仅是研究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资料，而且为恢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探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人类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特点和适应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9]，更对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的相关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　　释

［1］ 盛立双．初耕集——天津蓟县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3～12.

［2］ 盛立双，王春雪．天津蓟县东营坊旧石器遗址发掘［A］．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5.

［3］ 蓟县志编修委员会．蓟县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22～133.

［4］ 陈全家．吉林镇赉丹岱大坎子发现的旧石器［J］．北方文物，2001（2）：1～7．本文选用陈全家先生的分类观点，将工具分为三类：一类，制作石器的工具（石锤、石砧）；二类，石片未经加工直接使用者（使用石片）；三类，直接将片状或块状毛坯经过加工修理者（修刃、修形和修理把手）。

［5］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A］．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209～218.

［6］ 王春雪，李万博，陈全家等．天津蓟县杨庄西山旧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A］．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12.

［7］ 陈全家，王春雪．东北地区近几年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A］．考古学研究（七）［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83～204.

［8］ 天津市地质矿产局．天津市区域地质志［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116～142.

［9］ 同［1］：153.

Research on Paleolithic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Xiaochuanfangyu Site in the Jixian Area of Tianjin

Wang Jiaqi　Sheng Lishuang　Wei Tianxu　Gan Caichao　Li Wanbo　Wang Chunxue

Abstract: The Xiaochuanfangyu site, located in Jixian area of Tianjin City, was found during survey by the Production Center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ianjin and the School of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on May 3rd, 2015. The number of the stone artifacts is 15, of the flakes, tools and blocky fragments types. According to the artifacts' characteristics, the site belongs to a small-stone-artifacts industry. It probably dates back to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Keywords: Jixian; Xiaochuanfangyu; Upper Paleolithic

山西大同杜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李树云[1]　石晓润[2]

（1.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037000；2. 山西大学，太原，030006）

内容摘要：杜庄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端，遗物发现于灰绿色粉砂质黏土层。2016 年，在杜庄遗址发掘中，探明文化层厚 0.7 米，共出土遗物 848 件，包括石制品 244 件，动物化石 604 件。石制品类型包含：石锤、石核、石片、断片、断块、刮削器、尖状器。根据石制品工业的特征，该遗址应属于华北地区典型的小石器文化。根据石制品类型以及所出地层，可推测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晚期，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晚期早段。

关键词：杜庄遗址；晚更新世；石制品；环境；遗址性质

杜庄遗址首次发现于 2008 年 11 月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是山西大同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2016 年 6 月 14 日，由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泥河湾旧石器考古队，对山西大同杜庄遗址进行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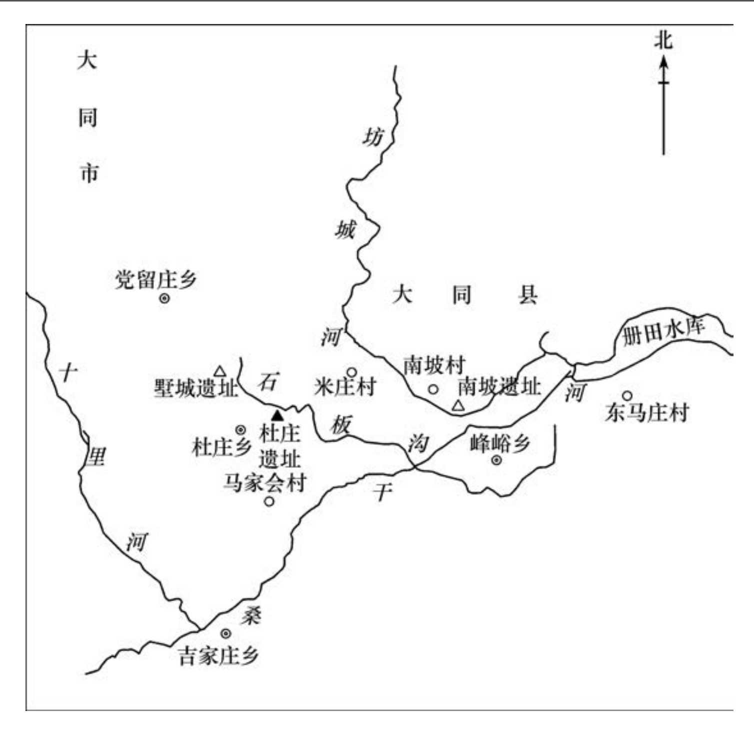
一、地理位置、地层

（一）地理位置

杜庄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西端，山西大同县杜庄乡杜庄村东约 1100 米处（图一）。遗址东南远眺麻乃头山，北部为采梁山山脉，东北临近大同西坪火山群。地理坐标为 39°56′26.3″N，113°28′55.1″E，海拔 993 米。杜庄村东为一条由南向北冲沟，俗称石板沟，向北约 500 米是杜庄水库，水源以地下泉水为主，河流在李家堡村汇入桑干河。遗址位置处在石板沟右岸的河流阶地中。

（二）地　　层

该遗址位于桑干河Ⅱ级阶地前缘。遗址所在的Ⅱ级阶地为基座阶地，根据遗址及探沟地



图一　杜庄遗址地理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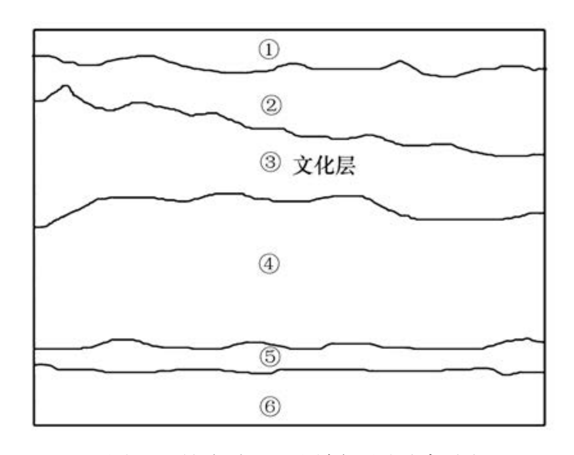
层剖面观察由上而下可分为 6 层（图二）。

第 1 层：耕土层。土质疏松。厚 0.25 米。包含植物根系，汉代陶片，辽、金瓷片，钙板，螺壳以及动物化石残片。

第 2 层：黄灰色粉砂质黏土层。厚 0.2 ~ 0.9 米。

第 3 层：灰绿色粉砂质黏土层。厚 0.7 米。其上部有 0.02 ~ 0.03 米厚的间断钙质层，为文化层，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第 4 层：黄褐色细砂层。土质较纯。厚 1.2 米。无包含物。



图二　杜庄遗址地层剖面图（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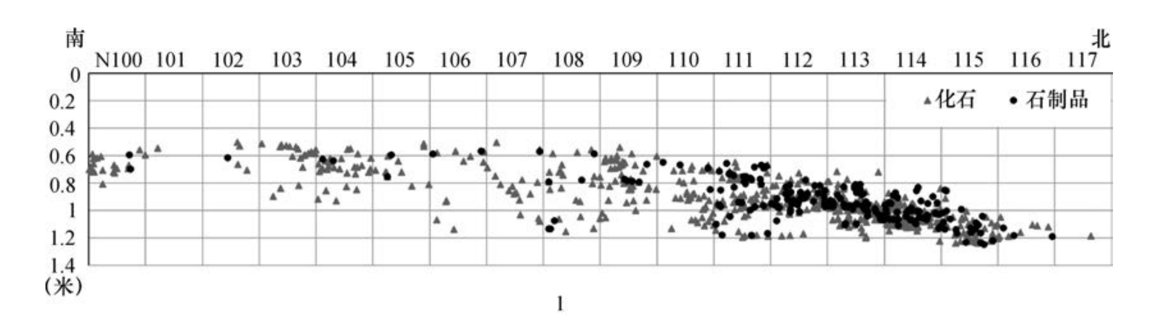
第 5 层：棕红色淤泥层。致密。厚 0.19 米。无包含物。顶部有 0.03 米厚的钙板层。

第 6 层：灰绿色粉砂质黏土层。质地致密。厚 0.6 米，不见底。无包含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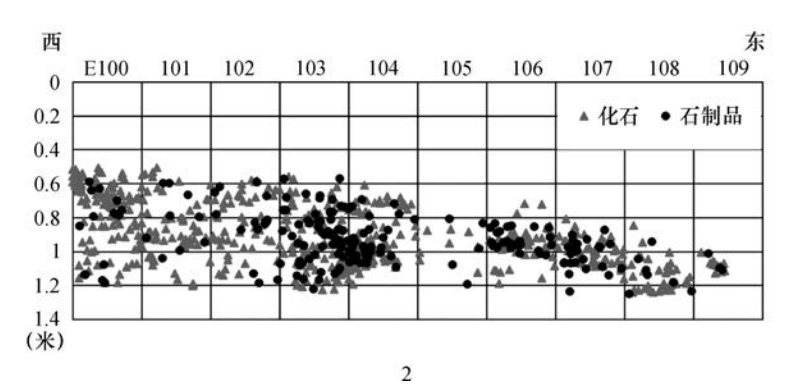
二、发 掘 概 况

本次发掘分为主区和东区两个发掘区域，第 1 层为文化层。按照水平层理发掘，以 5 ~ 10 厘米为单位，总共发掘 12 个水平层。从遗物的平面分布上看，遗物集中发现于

发掘区域北部，石制品和化石分布集中、混杂，没有明显的分界。从遗物的东剖面看，遗物的纵向观察可看出由南向北逐渐加深的趋势，可推测当时地形为斜坡状。从遗物的南剖面看，文化层东部较西部厚（图三）。



1



2

图三　杜庄遗址遗物剖面分布图

1. 东壁　2. 北壁

三、石　制　品

石制品共计244件（表一）。本文从原料、大小与重量和类型三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表一　石制品类型和原料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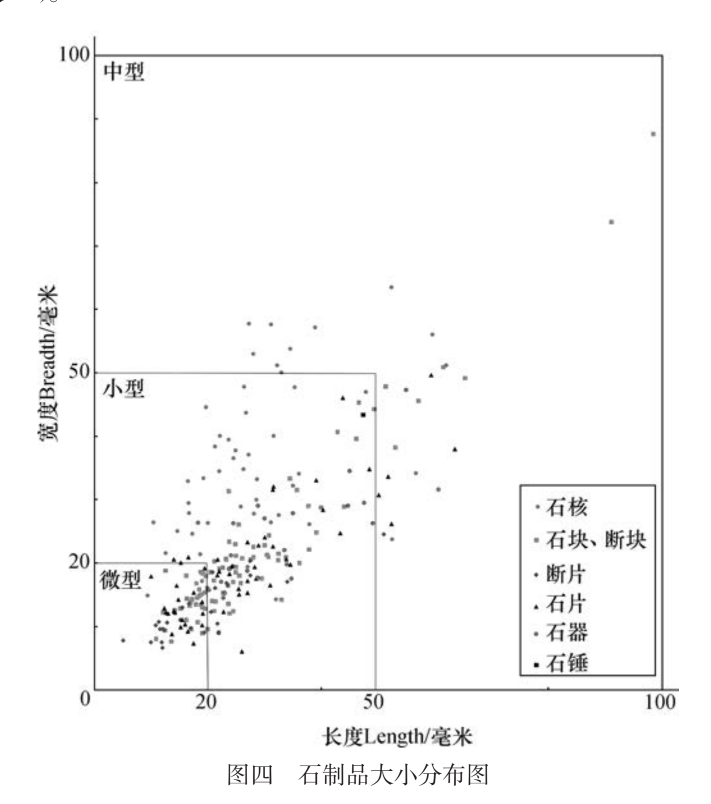
岩性 / 类型	石锤	石核	石片	断片、块	刮削器	尖状器	总计	百分比
石英		27	29	67	13	2	138	56.6%
石英岩		7	9	6	1	1	24	9.8%
燧石		4	12	24	1		41	16.8%
石英砂岩	1	4	4	7	1		17	7.0%
砂岩		2	1	11			14	5.7%
其他		4	2	4			10	4.1%
总计	1	48	57	119	16	3	244	100.0%
百分比	0.4%	19.7%	23.4%	48.8%	6.6%	1.2%	100.0%	

（一）原　　料

石料种类较多，有八种。其中石英占绝对优势，燧石次之；此外，还有少量的石英砂岩、砂岩、角砾岩、灰岩、玛瑙（表一）。大同境内的桑干河及其小支流的附近蕴含丰富的脉石英砾石块和断块，较易获取。石制品大部分棱角清晰，少数表面磨圆。

（二）大小与重量

按照最大长度（L）可将石制品分为微型（$L<20$ 毫米）、小型（20 毫米$\leqslant L<50$ 毫米）、中型（50 毫米$\leqslant L<100$ 毫米）、大型（100 毫米$\leqslant L<200$ 毫米）、巨型（$L\geqslant200$ 毫米）5 种类型[1]。杜庄遗址的石制品尺寸从总体上看，小型的占有绝对优势，微型次之（图四）。石制品的重量统计表明其重量以 1 ~ 5 克为主，其次是 10 ~ 50 克，大于 50 克者较少（表二）。



图四　石制品大小分布图

表二　石制品重量统计表

分类	石锤	石核	石片	断片、块	工具	总计	百分比
＜1 克			12	16		28	11.5%
≥1 克，＜5 克		1	23	51	5	80	32.8%

续表

分类	石锤	石核	石片	断片、块	工具	总计	百分比
≥5 克，＜10 克		10	5	24	8	47	19.3%
≥10 克，＜50 克		23	16	20	6	65	26.6%
≥50 克，＜100 克	1	11	1	4		17	7.0%
≥100 克		3		4		7	2.9%
总计	1	48	57	119	19	244	100.0%

（三）类　型

1. 石锤

1 件，⑤ -56，石锤（残部），黄褐色夹黑色颗粒石英砂岩质，残留的石锤最大长、宽、厚为 47.34 毫米 ×43.34 毫米 ×25 毫米。重 55 克。石锤的一端可见少量的麻点状砸痕，上附少量的钙质结核（图五，1）。

2. 石核

共计 48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19.7%，其中锤击石核 45、砸击石核 3 件。锤击石核中单台面石核 17、双台面石核 8、多台面石核 20 件。石核的原料以石英为主，毛坯中块状毛坯占绝对优势。石核的长为 9.38 ~ 62、平均长 28.8 毫米；宽为 14.22 ~ 63.44、平均宽 36.5 毫米；厚为 11 ~ 50、平均厚 26.3 毫米。重为 2 ~ 183.2 克，平均重 39.9 克。

⑥ -23，浅灰色石英岩质，以断块为毛坯，片疤面为台面剥片。台面角 72°，至少打片 2 片。石核台面左边与后端有打片痕迹，底端为小平面与上台面大致平行。石核长、宽、厚为 24.52 毫米 ×36.48 毫米 ×50 毫米。重 51.8 克（图五，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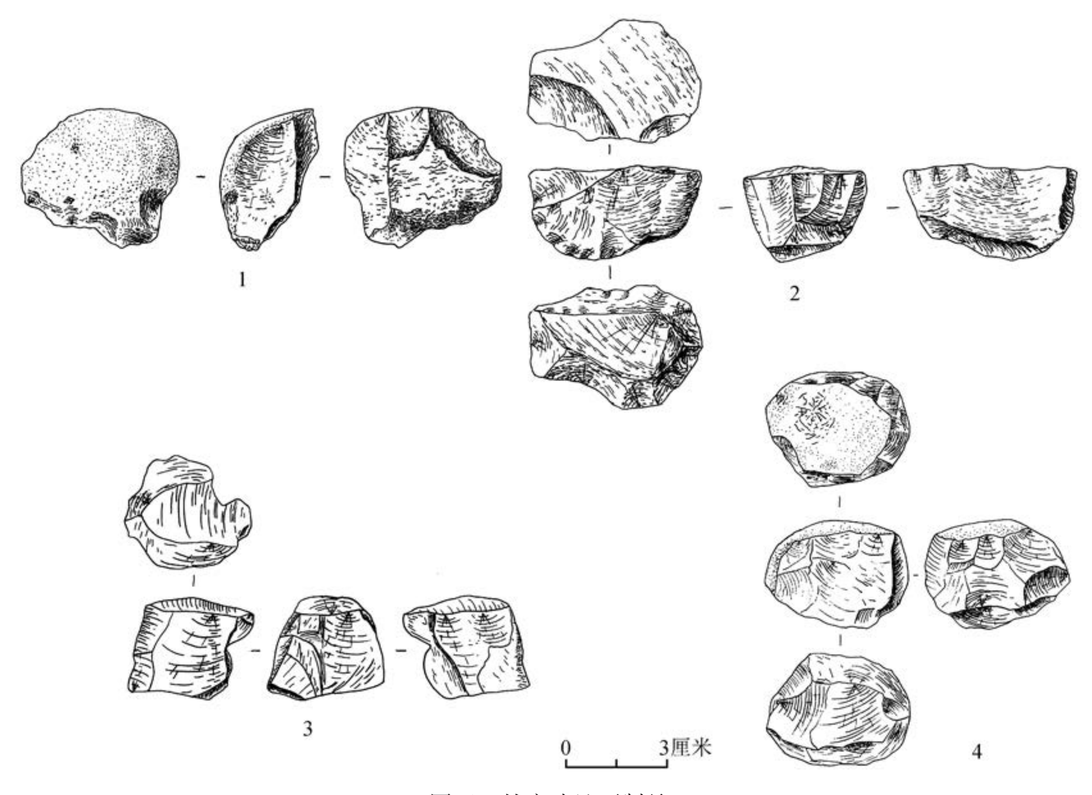
⑥ -36，浅灰褐色燧石质，以断块为毛坯，片疤面为台面剥片。台面角 67°，至少打片 1 片。石核台面上大底小，大致平行。石核长、宽、厚为 28.66 毫米 ×33.18 毫米 ×26.78 毫米。重 35.4 克（图五，3）。

D ④ -46，灰色石英岩质，以砾石块为毛坯，砾石面、片疤面为台面剥片，台面角 101°，至少剥片数为 11 片。石核长、宽、厚为 31.58 毫米 ×40 毫米 ×34.66 毫米。重 59.3 克（图五，4）。

③ -50，浅灰色石英岩质，以砾石块为毛坯，砾石面、片疤面及节理面为台面剥片，有 3 个台面；台面角 61° ~ 71°，至少剥片数为 5 片。石核保留有 15% 的砾石面。石核长 35、宽 32.16、厚 22.44 毫米。重 26.3 克（图六，1）。

3. 石片

共计 57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23.4%。石片的原料包括石英 29 件，燧石 12 件，石



图五 杜庄遗址石制品

1. 石锤（⑤ -56） 2 ~ 4. 石核（⑥ -23、⑥ -36、D ④ -46）

英岩、石英砂岩、角砾岩、砂岩共 15 件。石片长为 10 ~ 63.54、平均长 27.06 毫米；宽为 6 ~ 49.58、平均宽 20.31 毫米；厚为 1.94 ~ 20.48、平均厚 9.22 毫米。重为 0.3 ~ 58.9 克，平均重 9.12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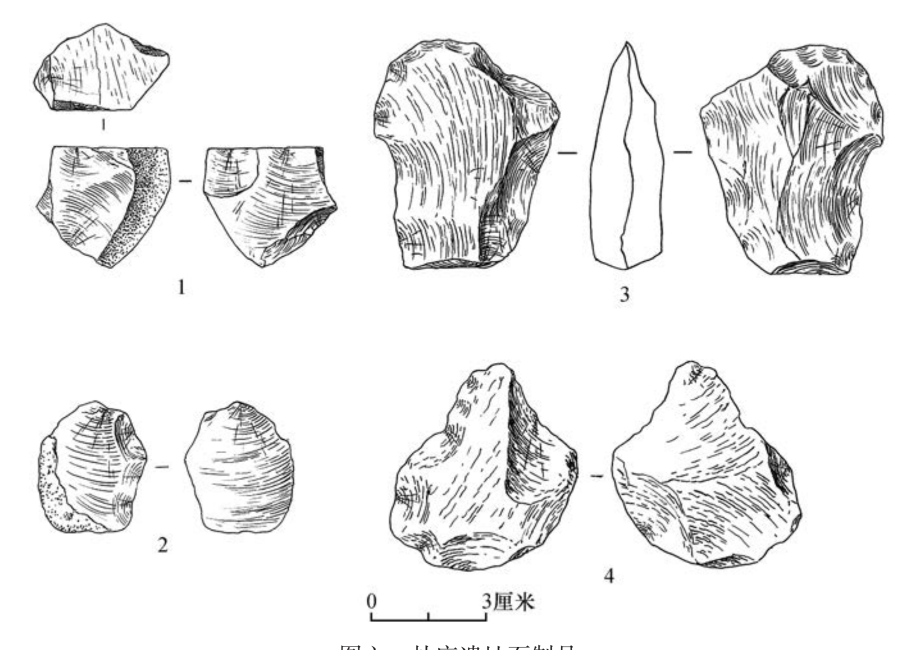
② -65，灰褐色燧石质。石片背部有多次剥片痕迹，致使台面破碎呈刃状，石片角 121°；石片背面片疤方向为Ⅰ3（从上到下）型，背脊为砾石面和片疤面形成的天然脊；远端形态为内弯。石片长、宽、厚为 35 毫米 ×27.82 毫米 ×9.22 毫米。重 11.2 克（图六，2）。

⑥ -28，深红色石英砂岩质。石片台面类型为素台面，形状为倒弓形，石片角 112°；石片背面片疤方向为Ⅳ3（从右往左）型，背脊类型为双纵；远端为刃状。石片长、宽、厚为 59.36 毫米 ×49.58 毫米 ×16.52 毫米。重 48.4 克（图六，3）。

D ⑦ -27，Ⅱ1-1 型，深褐色石英砂岩质。石片台面类型为素台面，残留形状为四边形，石片角为 102°；远端为刃状。石片保留有 45% 的砾石面。石片长 63.54、宽 37.92、厚 20.48 毫米。重 58.9 克（图六，4）。

4. 断片、块

共计 119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48.8%。断片长为 5.08 ~ 98.46、平均长 26.06 毫米；宽为 6.58 ~ 87.64、平均宽 19.68 毫米；厚为 1.82 ~ 51、平均厚 12.51 毫米。重为 0.1 ~



图六　杜庄遗址石制品

1. 石核（③ -50）　2 ~ 4. 石片（② -65、⑥ -28、D ⑦ -27）

451.7 克，平均重 18.31 克。

5. 工具

共计 19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7.8%，其中刮削器 16 件，尖状器 3 件。石料以石英为主，占到 78.9%，仅有少量的燧石、石英岩和石英砂岩。毛坯以片状为主，占到 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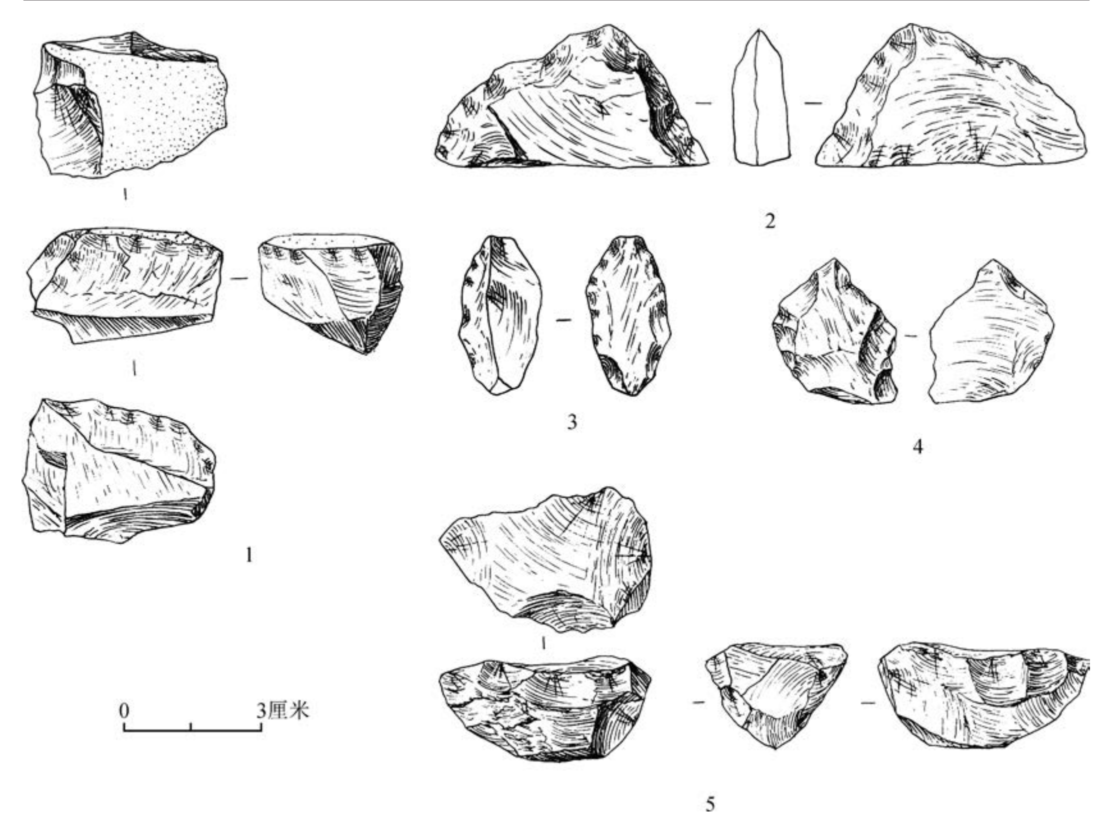
（1）刮削器。

共计 16 件，其中单边刃刮削器 11 件，相邻两边刃刮削器 2 件，不相邻两边刮削器 2 件，三边刃刮削器 1 件[2]。片状毛坯 13 件，块状毛坯 3 件。加工方向以单向正向为主，错向和两面加工者较少；刃长为 12 ~ 49.42、平均长 25.84 毫米。刃角为 35° ~ 76°，平均角 53°。

⑤ -64，黄色石英岩质，以砾石块为毛坯，石块的一侧边单向加工，刃角 49°；边刃形状为凸刃，截面形状为多边形，片疤形态结构为普通状。刮削器最大长、宽、厚为 44.98 毫米 ×34.47 毫米 ×24.74 毫米，重 34.2 克。刮削器有作为石核剥片的痕迹；保留 30% 的砾石面（图七，1）。

① -11，灰色石英质，石料较差，颗粒较大，以断块为毛坯，断块相邻两边单向加工，刃角 55° ~ 57°；边刃形状为直刃，截面形状为四边形，片疤形态结构为普通状。刮削器长、宽、厚为 60.64 毫米 ×31.55 毫米 ×13.12 毫米，重 31.5 克（图七，2）。

⑪-20，黄褐色夹红色斑块石英质，以砸击石片为毛坯，石片左右两边反向加工，刃



图七　杜庄遗址石制品

1～3. 刮削器（⑤-64、①-11、⑪-20）　4、5. 尖状器（⑦-46、⑦-50）

角 52°～66°；边刃形状为凸刃，截面形状为三角形，片疤形态结构为阶梯状。刮削器长、宽、厚为 34.72 毫米 ×17.5 毫米 ×8 毫米，重 5.8 克（图七，3）。

（2）尖状器。

共计 3 件，2 件为石片毛坯，1 件为断块毛坯。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两面加工的有 1 件。

⑦-46，黄褐色石英岩质，以石片为毛坯，左右两边正向加工，形成一个正尖的尖刃。边缘轮廓为凸刃，截面形状为梯形，片疤形态结构为叠鳞状。尖刃角 59°，尖面角 99°，边刃角 52°～70°。尖状器长、宽、厚为 30 毫米 ×27 毫米 ×12.2 毫米，重 12.3 克（图七，4）。

⑦-50，灰黑色夹深红色颗粒石英质，以石片为毛坯，左右两边正向加工，形成一个正尖的尖刃。边缘轮廓直－凸刃，截面形状为三角形，片疤形态结构为普通状。尖刃角 75°，尖面角 80°，边刃角 52°～74°。尖状器长、宽、厚为 47.52 毫米 ×29.46 毫米 ×21.66 毫米，重 34.1 克（图七，5）。

四、动物化石

动物化石共发现 604 件，破碎成 3837 块，石化程度中等者占据绝对优势。骨骼的

保存部位以肢骨为主（65.9%），其中包括肩胛骨、肋骨、盆骨、趾骨、腕骨、椎骨、跖骨等；骨骼中除肢骨外还有少量的牙、头骨和鸵鸟蛋皮。

动物骨骼可鉴定种属有：马（*Equus sp.*）、犀牛（*Rhinocerotinae*）、鸵鸟（*Ostrich*），此外还有未确定属的啮齿目（*Rodentia*）、奇蹄目（*Perissodactyla*）、中小型食肉目（*Carnivora*）。通过对动物化石的分析显示，当时的遗址附近生存的动物以中小型为主。根据遗址中可鉴定的动物化石种类[3]，可推测当时杜庄遗址附近应分布草原、森林，此外还有小型的河湖和沼泽，但以草原为主。当时的环境以干旱的草原环境为主，气候偏干旱。

骨骼表面大都附着较密集的黑色斑点，其直径在 1 毫米左右，造成这种埋藏偏移现象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铁锰污染[4]，但也不排除是碳元素和腐殖质污染。由于遗址内未发现用火遗迹，且根据骨骼的颜色和特征，故而排除骨骼火烧的可能性。鉴于考古学上的“等效现象（equifinality）”[5]，对于骨骼表面附着的黑色斑点来源应做进一步的理化分析和地球化学分析。

五、结　　论

（一）石制品特征

根据对遗址内石制品的分析，石制品属于小石片石器，未发现细石器，可将杜庄遗址的石器工业特征简单归纳如下。

（1）石制品原料以石英为主，就地取材，体现出高消耗率的特点。遗址中燧石和石英岩是仅次于石英的石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优质石料来剥片。

（2）剥片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偶见砸击法。石核以简单剥片概念为指导，基本不预制和维护石核，利用率不高，次品率较高。

（3）工具以小型为主，中型次之。毛坯以片状为主，块状毛坯较少，工具类型简单，仅发现刮削器和尖状器。工具组合以小型刮削器为主体，精致加工的较少。加工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反向次之，两面和错向较少。

（二）遗址性质与形成过程

遗物的分布范围和产状测量数据，显示部分遗物分布具有集中性，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不同位置的范围内。遗物的风化和磨圆以无和轻度为多，表明遗物基本没有经过搬动和野外的风吹日晒，而是被迅速覆盖掩埋。所以杜庄遗址是典型的原生堆积、旷野型遗址。

根据地层和遗址周围的环境，简单分析遗址的形成过程：中更新世晚期，泥河湾古湖发生了大规模的收缩，此湖泊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当时的湖泊已收缩到盆地中心的位置，在距今 13 万 ~ 7 万年，泥河湾古湖经过扩张后迅速消亡。杜庄遗址的地层显示

其处于古湖的消逝阶段。当时的湖水消退，古人类在灰绿色的湖积平原上活动，并留下文化遗物，之后湖水有了小的扩张将人类的活动面淹没，这里又形成灰绿色的湖相沉积，湖相沉积顶部有一层 2 ~ 3 厘米厚的钙质层，湖水咸化并缩小，大规模黄土降尘逐渐填埋湖泊，黄土层与湖相沉积层整合接触，形成湖积平原。大约在距今 2.8 万年桑干河形成[6]，河水切割平原，使得人类活动的剖面显露出来。此外，通过地层，我们发现有一处黑褐色淤泥层在第二层黄土层一直延续至文化层，这应是古湖消逝时逐渐沼泽化的体现。

（三）年代分析

遗址的石制品工业属于“小石器文化”，根据文化层的深度以及地层堆积情况，推测遗址年代应处于古湖消逝，桑干河的形成时期，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绝对年代应不晚于距今 2.8 万年。

附记：本项目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KG001）、山西省文物局的资助。参加本次野外工作主要有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李树云、靖晓亭，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部分研究生，阳原县文管所成胜泉，以及大同大学的本科生等，大同县文化局也对本次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特别感谢于洋春子、丁志姣、尤昱丹为本报告绘制石制品线图。

注　　释

［1］ a. 卫奇.《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J］. 人类学学报，2000，19（2）： 86 ~ 96.

b. 卫奇. 旧石器分类探讨［A］. 考古学研究（七）［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31 ~ 43.

c. 卫奇，裴树文. 石片研究［J］. 人类学学报，2013，32（4）：454 ~ 469.

d. Toth N. *The Stone Technologies of Early Hominids at Koobi Fora, Kenya: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R].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 1982.

［2］ 李炎贤. 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6.

［3］ a. 李炎贤，计宏祥. 从哺乳动物化石来探讨北京猿人生活环境的变迁［J］. 科学通报，1980，25（27）：1087，1088.

b. 程捷. 哺乳动物群指示的气候旋回——以周口店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为例［J］. 地学前缘，1997，4（1 ~ 2）： 275 ~ 279.

［4］ Marı’n Arroyo A.B., Landete Ruiz M.D..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human-derived manganese coatings: a study of blackened bones in El Miro’n Cave, Cantabrian Spain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8, 35 (3): 801-813.

［5］ 张双权，Christopher J Norton，张乐. 考古动物群中的偏移现象——埋藏学的视角［J］. 人类学学报，2007，26（4）：379 ~ 388.

［6］ a. 袁宝印，夏正楷，牛平山．泥河湾裂谷与古人类［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
b. 年小美，周立平．泥河湾古湖泊的消亡与古人类的演化［R］．纪念北京猿人第 1 头盖骨发现 80 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究会暨第一届亚洲第四纪研究学术大会（会议指南），2009.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Duzhuang Site in Datong, Shanxi

Li Shuyun　Shi Xiaorun

Abstract: The Duzhuang site is located at the western end of the Nihewan basin, where artifacts were found in the gray-green sandy clay layer. In 2016, during the Duzhuang site excavation, in a 0.7m thick cultural layer, unearthed artifacts amounted to 816, including 212 lithics, and 604 animal fossils. The types of lithics include: hammer, core, flake, fragment (block), scraper, poi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cs, the site should belong to the typical “core-flake tradition” in North China.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lithics and the strata, it is presumed that the geological age is late Pleistocene, and the cultural age should be the early stage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Keywords: Duzhuang site; Late Pleistocene; Lithics; Environment; Site Nature

朝阳地区辽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李道新

（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朝阳，122006）

内容摘要： 朝阳地区是辽代主要活动地区之一，在朝阳地区发现了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出土了数十方辽代墓志和数以千计的辽代精品文物。本文对朝阳地区辽代遗存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梳理，为辽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关键词： 辽代；城址；辽塔；墓志；文物

朝阳市是位于辽宁省西部的一个地级市，南邻河北省，北接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京、津、唐和东北城市群中间，是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朝阳地区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区，它所在的辽西丘陵山地以西南至东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和松岭山脉为屏障，有大凌河和老哈河及其支流贯穿其间，由此东隔医巫闾山与松辽平原相毗邻，西越燕山山脉可直达华北平原，北经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西辽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至欧亚大陆，南以渤海为出海口与东北亚广大地区相联系。独特的地理形势，稳定的文化环境使朝阳地区的历史文化浓烈而厚重。朝阳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遗存的发现，证明中华先民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战国时朝阳地区属燕国，置塞上五郡，柳城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现朝阳地区的北票市、朝阳县、朝阳市区属辽西郡，喀左县、凌源市、建平县属右北平郡。东晋咸康七年（341 年）前燕王慕容皝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城，改柳城为龙山县并迁都于此。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立国 85 年，龙城为三燕故都达 52 年之久。436 年北魏灭北燕，在龙城置龙城镇。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改置营州，447 年又置昌黎郡，治龙城。隋唐时期改龙城为柳城，设营州总管府。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族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公元 5 世纪初即见诸史籍，元代还可以看到契丹族的名字，到了明代以后，几经融合衍变，契丹之名才不复见。一般地说，以契丹族为主，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过两个朝代，一为辽朝，一为西辽。辽朝是以契丹族为首包括汉、奚、渤海等上层人物联合起来建立的政权。907 年契丹族贵族耶律阿保机代遥辇氏为大人，号曰天皇帝。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 年）耶律阿保

机称帝，国号大契丹，建元神册，到公元1125年金灭辽止，辽朝立国219年。辽金王朝和中原赵宋王朝（北宋、南宋）相对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938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983年）又把国号改为契丹，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1066年）复称大辽，直到1125年被金所灭。金灭辽以后，辽朝皇族耶律大石为了恢复辽朝，率众两万多人、十八个部族，经过新疆而至中亚，建立了西辽国，传三世，共86年。从公元5世纪初到15世纪初，契丹族在我国历史上曾活动了近一千年。其中朝阳地区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契丹族在朝阳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一、朝阳地区的辽代城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是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辽朝建国以后，仿照唐朝的典章制度，为了安置汉族和渤海族，奖励农耕，在我国兴建了大量城池，使北方草原大漠第一次出现了繁荣的都市和经济发达的城邑。今朝阳地区在辽代属辽朝五京的中京大定府、兴中府。府、州、县的分布在朝阳地区比较密集。它的建制沿革对金代以后的建制沿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辽史·地理志》载：中京道共辖府州二十三、县四十二。其所统治区域包括今辽宁锦州、辽宁朝阳、内蒙古赤峰市和河北承德地区。在朝阳地区设置属中京大定府的州县有利州统阜俗县，潭州统龙山县，榆州统和众、永和二县，富庶县，惠州统惠和县。属中京兴中府的州县有兴中县、安德州，中京直属的刺史州川州（白川州）统咸康、宜民、弘理三县，中京直属的建州统永霸、永康二县。辽朝初期在营州设霸州彰武军，重熙十年（1041年）升霸州彰武军为兴中府，兴中府是除“五京”而外仅有的一个府级建置，为辽代“六大潘府”之一。所以营州又有霸州、兴中府之称。

“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唐末，契丹渐炽，役使奚人，迁居琵琶川。统和四年置县。初隶彰愍宫，更隶中京。后置州，仍属中京。”[1]利州位于今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城址，1961年大城子镇西15千米坤都营子乡双尖山南麓出土了辽王悦墓志[2]，王悦“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焉”。证明大城子镇东城址即利州古城址。

“潭州，广润军，下，刺史。本中京之龙山县，开泰中置州，仍属中京。统县一：龙山县，本汉交黎县地，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3]位于今喀左县白塔子村南城址。凌源市天盛号金代石拱桥志：“唯大定十年岁次庚寅五月辛亥为朔乙卯日龙山县西五十里地名狗河川孙家庄刘白通亲笔记。”[4]知白塔子村南城址即为潭州及其倚郭龙山县。

“榆州，高平军，下，刺史。本汉临渝县地。后隶右北平骊城县。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

开泰中没入。属中京。统县二：和众县，本新黎县地。永和县，本汉昌城县地。统和二十二年置。”[5]位于今凌源市十八里堡城址。凌源市孙家杖子出土的辽中京提辖使宋匡世墓志：“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归空于榆州南和乡余庆里鹿鸣先茔之左。”[6]知该城为榆州及其倚郭和众县。

“富庶县，本汉新安平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7]，属大定府辖县。今喀左县北公营子古城即为其故城。

“建州，保静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昌乐县。太祖完葺固垒，置州。……州在灵河之南，屡遭水害，圣宗迁于河北唐崇州故城。初名武宁军，隶永兴宫，后属敦睦宫。统县二：永霸县。永康县，在唐昌黎县地”[8]。建州所辖的二县中的永康县就是唐昌黎县的旧治（田立坤《三燕与唐昌黎考》[9]考证“昌乐”为“昌黎”之误），而永霸县为建州北迁后的新治，即唐崇州故城。辽太祖时期的建州在朝阳县的木头城子镇，赵匡禹墓志称赵匡禹“薨于建州之私弟，葬于州之南白杨口，从先茔，礼也”[10]，说明此地即为太祖时期的建州及倚郭永霸县。《元一统志》谓：“建州东至兴中府……今土默特右旗西一百七十里，地名黄河滩，有废城址。东西二百七十丈，南北三百六十丈，周十里有奇，四门，蒙古名‘喀喇城’，城北有浮图十七级，周十二丈……当为故建州城。”此建州城位于今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村，现建州城址和黄花滩塔尚存。

“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11]即今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城址。《灵岩寺碑记》云：“安德州灵岩寺者，北连龙岫，前俯郡城。”[12]知此即安德州及其倚郭安德县。

“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古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寻落制置，隶积庆宫。后属兴圣宫。重熙十年升兴中府，……统州二，县四。兴中县。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州，更名……”[13]刘承嗣的墓志：“保宁二年岁次庚午十月己巳朔七日乙亥于霸州西原十五里杨氏夫人合葬焉。”[14]知现在朝阳市老城区即霸州故址。刘承嗣之孙刘日泳墓志记“重熙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薨葬于府西南坟岳”。印证了朝阳市辽时先称霸州后又升为兴中府的史实。

“惠州，惠和军，中，刺史。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兔麛山下，创城居之，置州。属中京，统县一，惠和县。圣宗迁上京惠州民，括诸宫院落帐户置。”[15]今建平县惠州乡八家古城即为惠州及其倚郭惠和县故城。

“川州，长宁军，中，节度。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瑞置。会同三年，诏为白川州。安瑞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省曰川州。初隶崇宁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统县三：弘理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咸康县。宜民县。统和中置。”今北票市八家子乡四角板村遗址即为白川州故址。辽开泰二年（1013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记》的幢文中有“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白川州诸军事白川州刺史”及“白川州

咸康县令”等结衔，可知四角板村城址为辽代白川州及倚郭咸康县。

除上述的重要城址外，在朝阳地区还有一千余处辽代的古文化遗址。

二、辽代在朝阳地区修建的佛塔

塔这种佛教建筑传入契丹统治的辽朝后，很快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辽塔大多数与辽代的州县古城相随，或置于城内，或屹立于城外山丘，作为古城整体建筑的组成部分，成为古城的显著标志。朝阳地区是契丹族聚居和活动的主要地区。辽塔分布密集，是朝阳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象征。现在朝阳地区仍有 13 座辽塔巍然屹立，围绕霸州修建的辽塔有朝阳北塔、朝阳南塔、凤凰山摩云塔、大宝塔、青峰塔、槐树洞石塔，围绕建州的有东平房塔、八棱观塔、黄花滩塔、双塔寺双塔，安德州的清峰塔，榆州的十八里堡塔，潭州的四官营子塔，利州的利州城塔。还有 6 座有明确建塔或维修纪年但已经完全损毁的辽塔，它们是朝阳定光佛舍利塔、朝阳东塔、柳城梁氏塔、释迦定光佛舍利塔、朝阳铁塔、凤凰山华严塔。除此之外，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朝阳地区还发现 56 处辽代的塔基遗址。

（一）现存的辽塔（13 座）

（1）朝阳北塔。位于朝阳市内，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85 年前后）在三燕宫殿夯土台基上修建“思燕佛图”，为木构楼阁式塔，后毁于火灾；隋仁寿二年（602 年）在“思燕佛图”台基上修建密檐式砖塔，称为保安寺塔；唐天宝年间曾修葺一新；辽初和辽重熙十三年（1044 年）两次维修，更名为延昌寺塔。该塔方形十三级密檐，高 42.6 米，塔身空心。

（2）朝阳南塔。位于朝阳市内。该塔为方形空心密檐式十三级砖筑佛塔，塔高 45 米。建于辽大康二年（1076 年）。

（3）朝阳云接寺塔（又称摩云塔）。位于朝阳凤凰山上云接寺西院。方形空心十三级密檐式 砖塔，高 45 米。辽代中期修建，为密宗金刚界塔。

（4）大宝塔。位于朝阳市区以东凤凰山北麓的王秃子沟。方形空心十三级密檐式砖塔，存高 16.5 米。是辽代密宗金刚界佛塔，时代为辽代早中期。

（5）青峰塔。位于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方形空心十三级密檐式塔，现存高 29 米。塔东面山下村内为辽代安德州城址，辽圣宗统和八年（990 年）置。根据其形制，为辽圣宗统和年间修建，为辽代密宗金刚界佛塔。

（6）八棱观塔。八棱观塔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塔营子屯北山上。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砖塔，高 29.43 米。与辽代太祖时期的建州城址隔河相望。该塔建于辽圣宗迁建州之前的辽中早期。

（7）黄花滩塔。位于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村西塔山上。八角形实心十三级密檐式砖塔，现残高 31.7 米。据历史记载，辽圣宗时为避水患，将建州迁至黄花滩村，该塔当为辽圣宗以后兴建。

（8）东平房塔。位于龙城区大平房镇东平房村东北塔山上。平面六角形，空心九级，密檐式，塔高约 20 米。此塔为辽代中期所建。

（9）双塔寺双塔。位于朝阳县木头城子镇郑杖子村西北山沟里。两塔东西相距 23 米。西塔为空心八角形三层檐式，高约 13 米。建于辽代中期。东塔为空心八角形单檐式，高 11 米，建于辽代晚期。

（10）槐树洞石塔。位于朝阳县南双庙乡三官营子村尺不袋沟。石塔由青砂岩雕制而成，残高 2.2 米。八角、三级、空心仿楼阁式小塔。此塔建于辽代晚期。

（11）利州城塔。又称大城子塔、精严寺塔，位于喀左县大城子镇高中院内。八角空心七级楼阁式与密檐式相结合的塔，高 34 米。此塔为辽代中期所建。

（12）榆州塔（十八里堡塔）。位于凌源市凌河乡十八里堡村。八角形空心七级密檐式砖塔，现残存五级，高约 13 米。此塔建于辽代早期，中晚期维修。

（13）四官营子塔。位于凌源市四官营子乡汤杖子村。六角形、实心、五级密檐式。高 10 米。为和尚灵塔。

（二）有记载的辽塔（6 座）

（1）朝阳定光佛舍利塔。位于朝阳市内，建于辽统和二年（984 年），形制体量不清，倒塌时间不详。

（2）朝阳东塔。位于朝阳市关帝庙内，建于辽开泰六年（1017 年），方形、十三级。毁于乾隆八年（1743 年）。

（3）柳城梁氏塔。位于朝阳市内。柳城人梁氏建于辽太平九年（1029 年），“凡一十三级，通百有余尺”，“有千岁灯，以然于内”，为舍利塔。清代以前损毁。

（4）释迦定光佛舍利塔。位于朝阳市内。该塔建于辽重熙十五年（1046 年），于天庆二年（1113 年）将此塔拆掉迁建。该塔“立十三檐，亘二百尺”，为定光佛与释迦佛舍利塔。

（5）朝阳铁塔。位于朝阳市内。为天庆二年（1113 年）迁建的释迦定光佛舍利塔。毁损于清代以前。塔寺合一。具体体量、形制不详。

（6）凤凰山华严塔。位于朝阳市凤凰山上寺。建于辽世宗时期，辽大康十年（1084 年）重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此地建设发射塔，将此塔炸掉。现已无法具体弄清其形制和体量。

（三）现存的塔基（56 处）

（1）下洼塔基址。位于朝阳县柳城镇下洼子村北台地。

（2）塔子沟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大庙镇宁杖子村塔子东沟村西 100 米塔台子地上。

（3）青沟梁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上店组青沟隧道顶部山坡上。

（4）西梁沟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大庙镇青山村大青山北城遗址西 100 米主峰东南 100 米的一处开阔地上。

（5）六家子塔山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六家子镇六家子村西约 500 米塔山山顶。

（6）南塔子塔基址。位于朝阳县长在营子乡南塔子村东北约 500 米处的一小山上。

（7）塔梁山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台子乡台子村朱家沟村民组东约 80 米的塔梁山顶上。

（8）白塔子塔基址。位于朝阳县胜利乡西山村后街村民组西北约 1000 米的坡地上。

（9）北塔子地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南台子村东南约 200 米的北塔子地中。

（10）古山子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和平村古山子山山顶。

（11）塔子沟塔基址。位于朝阳县羊山镇塔子沟村西 150 米处。

（12）小塔子塔基址。位于朝阳县松岭门乡大二台村交通希望小学东约 300 米的台地上。

（13）塔子山塔基址。位于朝阳县七道岭乡庞家窝铺村上洪家沟组西北约 1500 米的塔子山山顶。

（14）蒙古营子后山塔基址。位于朝阳县南双庙乡蒙古营子村北 30 米塔山上。

（15）东窑白塔山塔基址。位于建平县万寿镇黄土梁村东窑组 200 米白塔山上。

（16）北塔子太平地北山坡塔基址。位于建平县建平镇北塔子村太平地村民组东北 500 米的山顶上。

（17）北梁塔山塔基址。位于建平县八家乡新房身村北梁村民组西侧塔山上。

（18）白塔子洼塔基址。位于建平县黑水镇兴隆沟村胜利屯组。

（19）沟子沟塔基址。位于建平县黑水镇安家楼村塔子沟组。

（20）塔子下房身塔基址。位于建平县深井镇小马厂村塔子下村民组。

（21）白塔子塔基址。位于喀左县白塔子镇白塔子村。

（22）塔山西南塔基址。位于喀左县公营子镇小塔子沟村塔山西南约 200 米耕地。

（23）白塔山塔基址。位于喀左县兴隆庄乡七家村七家屯北 400 米处小土台山。

（24）塔下村塔基址。位于喀左县公营子镇塔下村。

（25）西台吉塔山遗址。位于北票市台吉镇西台吉村西的塔山顶上。

（26）白塔子塔基址。位于北票市北塔乡白塔子村东北 300 米老庙山顶部。

（27）塔山塔基址。位于北票市黑城子镇祥顺号村大庙组东 100 米的塔山山顶。

（28）塔子山遗址。位于北票市小塔子乡小塔子村村小学北 20 米塔子山上。

（29）小塔山塔基址。位于北票市马友营乡大庙村河东组东 200 米的小塔山南坡。

（30）房身塔山沟塔基址。位于北票市三宝营乡房身沟村塔山沟组西南 500 米的塔山顶上。

（31）塔子沟塔基址。位于北票市章吉营乡牦牛营村塔子沟组。

（32）塔山塔址。位于北票市南八家乡红村村上石家子组。

（33）塔营子塔基址。位于北票市蒙古营乡塔营子村西北组塔子山顶部。

（34）尚家窑南塔基址。位于北票市西官营镇梁杖子村一组白塔子地。

（35）彩凤沟塔基址。位于北票市巴图营乡彩凤沟村黄家屯西 80 米塔山顶部。

（36）秀塔书院塔基址。位于凌源市北街街道办事处。

（37）双塔塔基址。位于凌源市三家子乡苏官杖子村双塔子村民组北 1500 米又塔子后山东坡。

（38）塔沟塔基址。位于凌源市三家子乡天盛号村塔沟村民组北 200 米西山南部山顶。

（39）塔山屯塔基址。位于凌源市四官营子镇后朱杖子村塔山屯。

（40）塔沟村八放地墓地塔基址。位于凌源市沟门子镇塔沟村西北 800 米夹梁山东坡。

（41）苏杖子塔基址。位于凌源市河坎子乡苏杖子村西洼村民组西侧 80 米塔山脚下。

（42）塔山庙塔基址。位于凌源市河坎子乡苏杖子村西洼村民组。

（43）八棱观塔塔北塔基。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八棱观塔北 130 米。

（44）八棱观塔东塔塔基。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八棱观塔东 50 米。

（45）八棱观塔东北塔基遗址。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八棱观塔东北 250 米处。

（46）黄花滩西塔塔基址。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塔西 14 米处。《塔子沟纪略》卷六载：“庄头营子东去五里至黄河滩，西距塔子沟二百里，东距三座塔一百里，有古城基址……城西北山坡有古塔一座，高十七层，围圆十二丈，塔下又小塔一座，高七层，围圆四丈。”由此可知，此塔体量小于现黄花滩塔，高七层，围圆四丈。

（47）赵家沟塔山塔基遗址。位于龙城区大平房镇赵家沟村北塔子山顶部。

（48）塔子山塔基址。位于龙城区联合乡下三家子村南杖子村民组西北塔子山山顶上。

（49）塔子山塔基址。位于龙城区联合乡黄杖子村村东九龙山顶上。

（50）马山塔基址。位于龙城区边杖子乡边杖子村马山南侧 800 米马山山峰上。

（51）白塔梁塔基址。位于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水泉村西北 800 米白塔梁顶部。

（52）头道湾子北山塔基址。位于龙城区七道泉子镇铁匠炉村头道湾子组北侧山顶上。

（53）桃花山塔基址。位于双塔区桃花吐镇李家窝铺村桃花山主峰电视信号塔东 200 米处。《塔子沟纪略》卷六《古迹》载：“三座塔东北距城四十里平阳之中，有山壁立，自下而上五里余围圆则十六里，其山顶平坦处，东西南北各长十丈，中有古塔一座，人谓山上有大铁锅一口，面宽丈许，侧埋于山……塔傍有断碑两截，字多模糊，尚存有重修金山神庙数字，年月皆无可考，而山势之巍然在望，宛若金山壁立于扬子江。”

（54）小白塔子山塔基址。位于双塔区桃花吐镇白腰村白腰村民组西北 1000 米耕地上。

（55）狼山塔基址。位于双塔区燕北街道二其营子村狼山山顶。

（56）四官营子塔基址。位于凌源市四官营子镇魏杖子村小塔子沟大黑山下塔洼里。

燃灯佛舍利塔和释迦牟尼佛舍利塔同现一个城市，两佛舍利又同时在辽代供奉，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辽塔的砖雕或石雕精美绝伦，内涵丰富。其中摩云塔的须弥座上有一幅砖雕的西域胡人的献宝图，北塔天宫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西域文物的精品如波斯执壶等，这些砖雕和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了契丹王朝与当时的中原政权，西域诸国东亚地区各民族有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佛塔的建筑与佛寺的建筑紧紧连在一起，有寺必有塔，有塔一般也有寺，特别是统治阶级崇尚佛教时期，佛塔、佛寺就成为当时社会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在朝阳地区塔、寺的建筑达到了星罗棋布的程度。从有塔必有寺的规律看，朝阳地区围绕塔的寺庙就应该有近 70 座。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辽代寺庙。但这些寺庙均被损毁，如朝阳狼山的祥銮寺就是辽代所建，金代将三学寺迁到祥銮寺旧址。凤凰山上天庆寺殿前的唱和诗碑，上刻辽寿昌五年（1093 年）天庆寺住持智述的诗《题玉石观音像》和当时兴中府文人雅士、官吏、高僧等 25 人的 26 首唱和诗。

三、朝阳地区出土的墓志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也有只用志或只有铭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朝阳地区出土的辽代墓志有 40 方。

（1）张建立墓志铭[16]。1983 年出土于凌源县宋杖子乡十八里堡村。辽保宁元年（969 年）刻。墓主张建立为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行榆州诸军事兼榆州刺史西南路番汉都提辖使御史大夫上柱国。

（2）刘承嗣墓志铭[17]。出土于朝阳市西大营子乡西涝村。辽保宁二年（970 年）刻。墓主刘承嗣为大契丹国左骁卫将军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3）刘宇杰墓志铭[18]。出土于刘承嗣家族墓中。辽统和十八年（1000 年）刻。刘宇杰为刘承嗣之子，辽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左千牛卫将军兼殿中侍御史武骑尉。

（4）刘日泳墓志铭[19]。出土于刘承嗣家族墓中。辽重熙十五年（1046 年）刻。刘日泳为刘宇杰之子，为辽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宿州诸军事，宿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柱国、彭城县开国子。

（5）刘从信墓志铭[20]。出土于龙城区半拉山街道，朝阳电力修造厂院内。刻于辽大安九年（1093 年）。

（6）刘宇一墓志铭[21]。2008 年出土于朝阳市双塔区桃花吐镇林四家子村王坟山。刻于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 年）。刘宇一为刘守奇之孙，曾任辽彰武军节院使、使持节蓟州诸军事蓟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崇德宫汉儿都部署、户部使、使持节霸州诸军事霸州刺史。

（7）王裕墓志铭[22]。1975 年出土于喀左县甘招乡羊角沟。辽乾亨二年（980 年）

刻。王裕为辽崇义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宜州诸军事行宜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开国侯。

（8）王奉绪墓志[23]。与王裕墓志出土于同一墓地。辽统和三年（985年）刻。墓主为辽积庆宫汉儿副部署，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上柱国。

（9）耶律延宁墓志铭[24]。出土于朝阳县西五家子乡柏树沟村。辽统和四年（986年）刻。墓主为大契丹国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尉同政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漆水县开国伯。

（10）韩瑜墓志铭[25]。出土于今龙城区边杖子乡椴木村。刻于辽统和年间。墓主为辽左羽林军大将军、内客省使等职。

（11）韩椅墓志铭[26]。1949年前在朝阳县出土。刻于辽重熙六年（1037年）。墓主在辽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彰愍宫都署、长宁军节度使、归义军节度使等职。

（12）韩瑞墓志铭[27]。1988年出土于朝阳市龙城区他拉皋乡褚杖子村。刻于辽大安八年（1092年）。

（13）王悦墓志铭[28]。出土于喀左县坤都营子乡钱长子村。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刻。墓主为辽宁远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武骑卫太原公。

（14）常遵化墓志铭[29]。出土于朝阳市纺织路。辽统和二十六（1008年）年刻。墓主为辽西州刺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监察御史武骑尉。

（15）耿崇美墓志铭[30]。2001年出土于朝阳市龙城区边杖子乡姑营子村。辽保宁元年（969年）刻。墓主为大契丹国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太师赠同政门下平章事。

（16）耿延毅墓志铭[31]。辽开泰九年（1020年）刻，墓主耿崇美之孙，为大契丹国户部使武平军节度澧朗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使持节朗州诸军事朗州刺史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矩鹿县开国伯。

（17）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铭[32]。辽统和三十年（1012年）刻。墓主为耿延毅妻，漆水郡夫人。

（18）耿知新墓志铭[33]。辽太平七年（1027年）刻。墓主为耿延毅之子，辽昭德军衙内都指挥使。以上（15）~（18）墓志均出土于耿氏家族墓地。

（19）韩绍娣墓志铭[34]。出土于喀左县老爷庙乡果树营子村兴隆沟。辽太平二年（1022年）刻。墓主为黔州仓库都监。

（20）宋匡世墓志[35]。出土于凌源市北孙家杖子。辽太平六年（1026年）刻。墓主为辽儒林郎前守北安州兴化县令晋国公主提辖使。

（21）赵匡禹墓志铭[36]。出土于朝阳县台子乡山嘴子村。辽清宁六年（1060年）刻。墓主为辽遂州观察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知临海军节度使事。

（22）赵为干墓志铭[37]。出土于赵氏族墓。刻于辽重熙八年（1039年）。墓主为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沂州诸军事沂州刺史兼殿中侍御使飞骑尉天水县开国男。

（23）耶律仁先墓志铭[38]。出土于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刻于辽咸雍八年（1072

年）。墓主为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

（24）耶律智先墓志铭[39]。刻于辽大安十年（1094 年）。墓主为大辽果州防御使，他是耶律仁先的五弟。

（25）耶律庆嗣墓志铭[40]。辽大安十年（1094 年）刻。墓主为辽尽忠平乱功臣兼侍中赠中书令，他是耶律仁先之子。以上两方墓志出土于耶律氏墓地。

（26）秦德昌墓志铭[41]。出土于建平县三家子乡五十家子村。刻于辽大康四年（1078 年）。

（27）郑恪墓志铭[42]。出土于建平县和东村张家营子东山。辽大安六年（1090 年）刻。墓主为大契丹朝散大夫守少府少监知上京副使飞骑尉。

（28）龚祥墓志[43]。出土于今龙城区新华街道，刻于辽乾统四年（1104 年）。

（29）张让墓志[44]。出土于龙城区大平房镇黄花滩村，刻于辽乾统五年（1105 年）。

（30）姚璹墓志铭[45]。出土于北票市桃花吐乡四家子后山。辽天庆七年（1117 年）刻。

（31）刘知新墓志铭[46]。2016 年 6 月出土于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水泉村。刻于辽寿昌五年（1099 年）。刘知新曾任辽营州军事判官、沈州观察判官、大理评事守同州东平县令、兴中府闾山县令、云内州观察判官、中京留守推官、辽西路钱帛都勾判官、兴国军节度副使、尚书虞部郎中天积库使。

（32）刘知微墓志[47]。刘知微是刘知新二弟，墓志与刘知新墓志出土同一墓地。刻于辽道宗大安三年（1087 年）。刘知微曾任右承制、良县商铁麴监。

（33）刘知古墓志[48]。刘知古是刘知新三弟，墓志与刘知新墓志出土同一墓地。刻于辽道宗寿昌三年（1097 年）。

（34）石延煦墓志[49]。出土于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1998 年朝阳市博物馆征集。刻于辽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石延煦为石敬瑭之孙，出帝石重贵之子。曾任辽保静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建州诸军事建州刺史。

（35）石重贵墓志[50]。出土于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2000 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刻于辽景宗保宁六年（974 年）。石重贵为石敬瑭之子，后晋出帝。

（36）李太后墓志[51]。出土于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

（37）安太妃墓志[52]。出土于朝阳县乌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村。

（38）杨从显墓志[53]。出土于北票市南八家子乡。2016 年，北票市公安局收缴后移交给北票市博物馆。墓志刻于辽兴宗重熙二十年（1051 年）。

（39）王仲兴墓志[54]。出土于朝阳县西营子乡姜杖子村。2016 年朝阳县公安局收缴后移交给朝阳县博物馆。刻于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 年）。王仲兴曾任辽高州观察判官、知文安县事、武定军节度副使。

（40）□奉殷墓志[55]。1973 年出土于喀左县老爷庙十八畜村。刻于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 年）。

上述这些墓志的墓主就有许多名门望族，如辽代皇族耶律仁先家族、“久居辽霸”“武功开国”的皇亲国戚耿氏家族、“入则为王爪牙，出则为民父母”的韩氏家族、“兴隆于燕谷，荣茂于柳城”的刘氏家族、“勋阀富盛”之一的赵氏家族等。这些墓主中就有许多辽代的风云人物。

耶律仁先，字纥邻，生于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 年），其父隗引为南府宰相，封燕王。景福元年（1031 年）辽兴宗命仁先为护卫銮舆、左千牛卫将军等。重熙十一年（1043 年）辽将取宋朝的晋阳（今山西太原）和瓦桥关（今河北雄县）等十县之地，辽遣仁先为正使赴宋谈判，因功授南京留守。重熙十八年（1050 年，任北院枢密使、东京留守、封燕王。辽道宗清宁初任南院枢密使，时阻不塔里干叛命朝廷，仁先被委以西北路招讨使，不战而降阻不塔里干。清宁九年（1063 年）辽道宗狩猎太子山，耶律重元集结亲信，欲弑君篡位，仁先平叛有功被道宗封为尚父，追封宋王，为北院枢密使。道宗咸雍元年（1065 年）加封仁先为于越，改封为辽王。咸雍八年（1072 年）卒，享年 60 岁。其子耶律庆嗣，在耶律重元谋反时，在耶律仁先的指挥下奋勇当先建立军功，受赐平乱功臣，拜殿前点检司事，授忠正军节度使，后又授高阳、临海两军节度使，后改西南面招讨使，在劝降阻不酋长磨古斯时被害，享年 58 岁。

韩瑜，韩知古之孙、韩匡美之长子。辽景宗应历年间，出仕为官，初任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不久又奉诏入朝，授检校工部尚书，右金吾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辽景宗耶律贤继位后不久又授予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左羽林军大将军，后升迁为内客省使，检校太傅，守儒州刺史，因政绩卓著，升迁为内客省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郡开国侯。辽圣宗统和年间，宋军犯境，占涿、易等州，辽军收复涿州后，辽帝诏韩瑜为涿州刺史。次年，圣宗皇帝率师伐宋，韩瑜随军为将，兵至长城口，韩瑜身先士卒，率军袭击宋营，被流矢中其头部，仍抱头催兵攻战，后因伤疮发作，生命垂危。承天太后（即著名萧太后，萧绰、萧燕燕）和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累颁尽力医治的诏书并亲自探视他的伤情。辽统和五年（987 年）十一月十日韩瑜薨于行营，终年 42 岁。

韩椅，字正声，小字三哥。韩瑜之子。他“体貌魁硕，宇量渊弘”，“尤工骑射，油晓韬钤”。出仕做官后，职务不断升迁。“初授西供奉官，迁御院落通进。”在此期间，韩椅出使夏国持诏书封夏国王李继迁为西夏国王。统和二十三年（1005 年），韩椅以右颁给库使之职任贺正旦副使，出使北宋首都汴京，出使归来后，皇上授以引进使，转任客省使。后随圣宗皇帝亲征高丽，得胜，因功授予左第一骁骑，加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归化州军州事。在任期满后，转任彰德宫都部署，又出任燕京留守衙内骑军指挥使，易州兵马都监，再转弘义宫都部署，拜侍卫亲军步军指挥使，利州观察，领禁卫之旅。后又因事获罪，入狱。皇上念其是旧日有功之臣，遂以刑罚处置，未削其官职。出狱后，韩椅奉命出使沙州，册封沙州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出使过程中，“路歧万里，砂碛百程，地乏长河野无丰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沙州岩泉，因劳累过度而昏死过去，直到晚上才醒过来，在沙州完成使命回归后授予乾、显、宣、锦、建、霸、白、川等七

州都巡检使，又改任彰愍宫都部署。依旧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圣宗太平五年（1025 年）又受命出使高丽，庆贺高丽王王询的诞辰。这年冬，又任涿州观察使，知易州军事，兼沿边安抚屯田使统兵马提辖，不久，改住长宁军节度使，白州州管内观察处置使。太平九年（1029 年）秋，渤海大延琳反叛，窃据襄平，朝廷发兵征讨，命韩椅率领控鹤、义勇、护圣、虎翼四军，充当该城副部署。征讨获胜后官拜永清军节度使，易、博、冀等州观察处置使，管辖义勇军，镇守辽东。后又镇守沈州。辽兴宗重熙二年（1033 年），以昭德军节度使之职出使北宋，回归后晋升为北院宣徽院使，归义军节度使，沙州管内观察处置。未及两年，进位南院使，加检校太尉。重熙五年（1036 年），在燕京主持宫掖祠寺修缮。不幸染疾，多方求医诊治无效，九月二十五日去世。

耿延毅。祖籍上谷，生于辽穆宗应历十七年（967 年）。其祖父耿崇美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破上谷时投降契丹，授通事一职。会同六年（943 年）在辽伐晋的战役中，战功卓著，被授予同州节度使后又授武定军节度使。会同十年（947 年）授昭义军节度使。天禄二年（948 年）再授武定军节度使，上谷郡开国侯。同年十一月卒，享年 56 岁。耿延毅之父耿绍纪曾任左武卫大将军，涿州刺史，左羽林军大将军之职。耿延毅，十七岁，荫补为供奉官，后转充御院通进。辽统和十五年（997 年）被授西南面招安使，负责戍守蔚州城、飞狐、灵丘一线，他充分利用当时的自然险阻，夙夜不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统和十九年（1001 年）辽军再次攻守受挫，耿延毅“伏草依岩，卷旗卧鼓，身先勇士，衔枚进击”。保证了辽军撤退，被辽圣宗授予右骁卫将军。统和二十三年（1005 年）寻除控鹤都指挥使，进位左领军卫大将军后改帅长宁军，移镇昭德军，入授永兴宫、崇德宫都部署兼帅武平军后转为户部使加太尉。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 年）病逝，享年 52 岁。

四、朝阳地区出土的辽代文物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朝阳地区在生产建设和基本建设中发现的辽代墓葬近千余座，这些辽墓只有少数保存完整，80% 以上遭到前期破坏。经考古发掘的辽墓近百座，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除此之外，在辽代遗址和朝阳北塔出土了大批的文物。这些文物涉及辽代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礼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朝阳地区在辽代的社会面貌。

朝阳市博物馆、北塔博物馆及各县、市、区博物馆均有大量的辽代文物收藏。《朝阳馆藏文物精华》《龙城宝笈》辑录的辽代精品文物就近百件。

1. 陶器

陶器一般较坚硬，胎质较细腻，火候较高，多小型日用器。釉陶在辽代陶器中极具特色，如绿釉火焰纹鸡冠壶、釉陶塑贴童子鸡冠壶、绿釉环梁鸡冠壶、釉陶鸡冠壶、釉

陶莲花纹凤首瓶、釉陶凤首瓶、釉陶长颈瓶、釉陶葫芦形执壶、釉陶莲瓣纹带盖执壶、釉陶凤首瓜棱腹执壶、釉陶莲瓣纹渣斗、釉陶花式口托盏、釉陶渣斗、釉陶盘、釉陶花式口碗、釉陶钵等。三彩釉陶器有三彩釉陶花式口盘、三彩釉陶牡丹花纹圆盘、三彩釉陶砚、三彩釉陶枕、三彩印蝴蝶海棠式长盘、三彩八棱驯犬纹暖盘等。

2. 瓷器

瓷器主要有白瓷、青瓷、影青瓷等，如缠枝牡丹剔花填彩梅瓶、缠枝牡丹剔花填彩罐、白釉瓷雕莲瓣纹执壶、白瓷盏托、白瓷粉盒、白釉瓷贴花提梁注壶、白釉瓷盖罐、白瓷钵、白瓷温碗、白瓷剔牡丹花式口盘、白瓷折腹大碗、凹弦纹白瓷罐、白瓷葫芦形注壶温碗、白瓷铁花盖盒、白瓷刻海棠花式口碗、白瓷刻蕉叶纹注壶、白瓷刻莲花纹芒口钵、白瓷葫芦瓶、白瓷刻莲瓣纹六花式盏托、白瓷刻菊瓣纹注壶、白瓷雕花卉纹提梁注壶。青釉瓷塑贴鱼纹碗、青瓷六花式立足杯、青瓷雕缠枝牡丹纹带盖执壶、青瓷注壶、芒口影青釉瓷钵、影青釉瓷足杯、影青釉瓷净瓶、影青釉瓷钵等。

3. 铜器

铜器主要有铜镜、铜印、铜面具、铜带具、铜铺首、铜铃、铜净瓶、铜釜、铜刀等。例如，铜人面具、铜鎏金力士铺首、铜鎏金圆铃、铜鎏金带盖小净瓶、铜童牛驮金纹带具、铜三足铸牡丹纹盖釜、铜龙首刻线纹刀、铜八曲丹心镜、铜四碟纹镜、铜亚形镜、铜亚形缠枝牡丹连珠纹镜、铜方形连纹镜、铜连环连珠纹镜、铜双凤纹镜、铜四凤连珠纹镜、铜菱花形素面镜、铜四蝶连珠龟背纹镜、铜花树人物镜、铜牡丹连珠纹镜、铜海水波浪纹镜、铜莲花形镜、铜兴中府绫锦印、铜白文印、铜契丹文印、铜右第一军使印、铜富庶县印、铜惠州监支纳印等。

4. 金银器

金银器主要有银人脸面具、银鎏金舍利罐、银鎏金面具、鎏金银童戏带具、金镂空丝球、金錾花童子戏花纹龙首镯、银鎏金面具、银鎏金錾荷花扞腰、錾摩羯鱼纹亚腰形银盘、银錾金双凤云珠纹扞腰、银鎏金双扣双铊尾独角兽腰带饰、金舍利罐、银经卷、银菩提树、金法轮、银囊盒、鎏金银塔、银罐等。

5. 玉石器

玉石器有玛瑙围棋、水晶斧、石雕骨朵、水晶雕骨朵、玉雕骨朵、白玉雕山形纹带饰等。

6. 石器

石器有石雕坐狮、石雕男立侍俑、石雕女仕俑、石雕人物驯狮座莲花灯、有柄石香

炉、地宫石函、绿砂岩石雕荷叶式枕、菩提达摩石雕像等。

除上述辑录的文物外，朝阳市各级博物馆还有数千件辽代文物。这些文物为研究朝阳地区辽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综上所述，朝阳地区辽代遗存丰富多彩，它是朝阳地区各民族人民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它不仅丰富了辽代文化的内涵，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艳丽的奇葩。随着时光的推移和朝阳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朝阳地区必将发现更多的辽代遗迹和出土更多的文物，将进一步说明朝阳地区是契丹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对辽代文化进行深入宣传、展示、研究将为提高朝阳的知名度，树立朝阳形象，振兴朝阳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注　释

[1]（元）脱脱，等．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喀左县辽王悦墓［J］．考古，1962（9）.
[3] 同［1］.
[4] 韩宝兴．辽宁凌源天盛号金代石拱桥［J］．北方文物，1987（3）.
[5] 同［1］.
[6]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6·宋匡世墓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6.
[7] 同［1］.
[8] 同［1］.
[9] 田立坤．三燕与唐昌黎考［J］．辽海文物学刊，1993（1）.
[10] 李宇峰等．辽宁朝阳市辽赵氏族墓［J］．文物，1983（9）.
[11] 同［1］.
[12] 金殿士．辽代安德州今地考［J］．社会科学辑刊，1982（2）.
[13] 同［1］.
[14] 王晶辰等．辽宁碑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107.
[15] 同［1］.
[16] 同［14］：104.
[17] 同［14］：106.
[18] 同［14］：111.
[19] 同［14］：124.
[20] 同［14］：337.
[21] 杜守昌，李宇峰．辽代《刘宇一墓志》考释［A］．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2）［C］．沈阳：辽海出版社，2013.
[22] 同［14］：107.

[23] 同 [14]：329.
[24] 同 [14]：111.
[25] 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编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3.
[26] 同 [14]：330.
[27] 同 [14]：335.
[28] 同 [14]：113.
[29] 同 [14]：113.
[30] 刘凤翥.《耿崇美墓志》校勘 [A]．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31] 同 [14]：116.
[32] 同 [14]：115.
[33] 同 [14]：120.
[34] 同 [14]：118.
[35] 同 [14]：118.
[36] 同 [14]：127.
[37] 同 [14]：333.
[38] 同 [14]：134.
[39] 同 [14]：338.
[40] 同 [14]：139.
[41] 同 [14]：335.
[42] 谷丽芬．辽《郑恪墓志》考释 [A]．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3] 同 [14]：338.
[44] 同 [14]：349.
[45] 同 [14]：145.
[46] 李道新．辽代刘知新三兄弟墓志考释 [A]．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7] 同 [46].
[48] 同 [46].
[49] 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 [A]．边疆考古研究 [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50] 同 [49].
[51] 杜晓红，李宇峰．辽宁朝阳县发现后晋李太后、安太妃墓志 [A]．边疆考古研究 [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52] 同 [51].
[53] 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杨从显墓志 [A]．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C]．北京：科学

出版社，2017.
［54］ 张振军. 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王仲兴墓志［A］.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55］ 同［14］：114.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Liao Dynasty Remains in the Chaoyang Area

Li Daoxin

Abstract: The Chaoyang area is one of the main areas active in the Liao Dynasty. Many ancient sites, tombs and building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Chaoyang area. Dozens of Liao Dynasty epitaphs and thousands of excellent Liao Dynasty artifact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is paper, the remains of the Liao Dynasty in Chaoyang area are preliminarily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ao Dynasty history.

Keywords: Liao Dynasty; City site; Pagoda; Epitaph; Artifacts

辽宁辽阳苗圃墓地元明墓发掘简报

徐沂蒙[1]　李海波[2]　王　闯[3]

（1.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110167；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沈阳，110003；
3.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沈阳，110036）

内容摘要：2008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省辽阳市苗圃墓地发掘区北部发现一座元明时期墓葬。墓葬为南北向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墓室拱门形券顶，北、东、西三面砌壁龛。墓内葬具为木棺一具，墓主女性，仰身直肢葬。墓内随葬有金耳环、金首银脚簪、金银饰件、铜钱、瓷碗、釉陶香炉、瓷瓶、花纹砖等器物。经综合分析，将此墓年代推断为元末明初，具体年代范围在元至正年间到明洪武四年左右，即 14 世纪 40 ~ 70 年代。本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辽阳地区元明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透视元末明初辽东地区社会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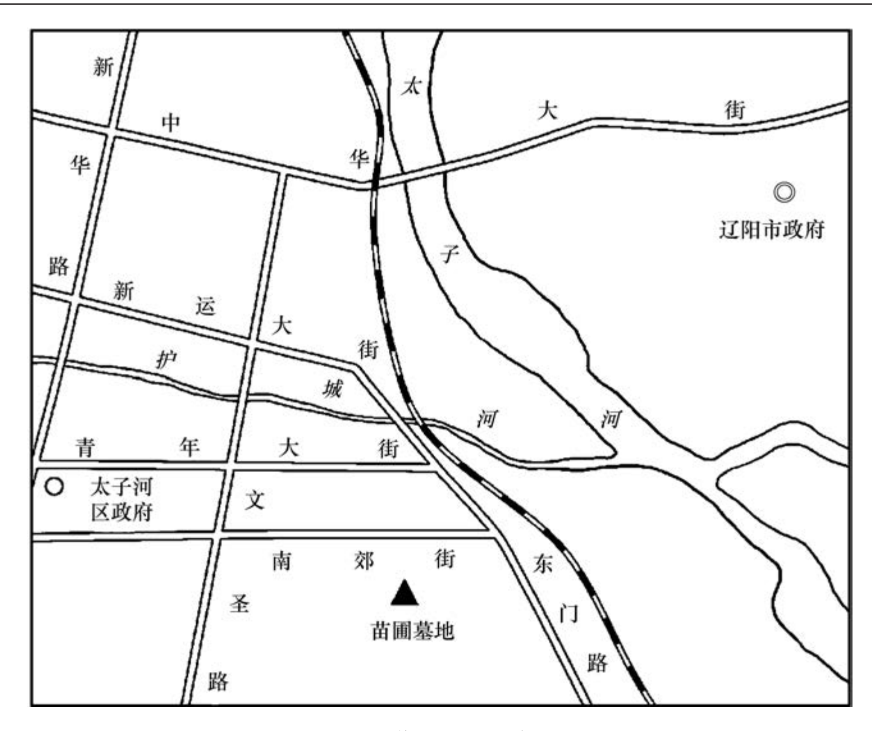
关键词：辽东地区；苗圃墓地；元末明初；砖室墓

苗圃墓地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原林业科学研究院苗圃院内，太子河西岸台地上，其西北距辽阳老城区约 2 千米（图一）。为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土地开发，2008 ~ 2015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苗圃院内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 200 余座。这些墓葬绝大多数为两汉到魏晋时期墓葬，个别为辽金时期。2008 年，在整个发掘区的北部发现一座元明时期墓葬，将其编号为 08LMM100，现将其发掘情况及收获进行简要介绍。

一、墓葬形制

墓葬距地表 105 厘米，开口于第 1 层下，第 1 层为黑褐色表土，土质疏松。墓圹平面呈凸字形，长 690、宽 495 厘米，由墓道和墓室组成。

墓道位于墓圹南部，梯形斜坡状，上端口长 283、宽 170、深 130 厘米，下端口长 230、宽 150、最深处 290、最浅处 220 厘米。墓道斜坡上端距墓口约 40 厘米。墓道内填土共分 2 层：第 1 层，厚约 120 厘米，灰褐杂花土，土质较疏松；第 2 层，厚约 100 厘米，黄褐色夯土，土质坚硬。



图一　苗圃墓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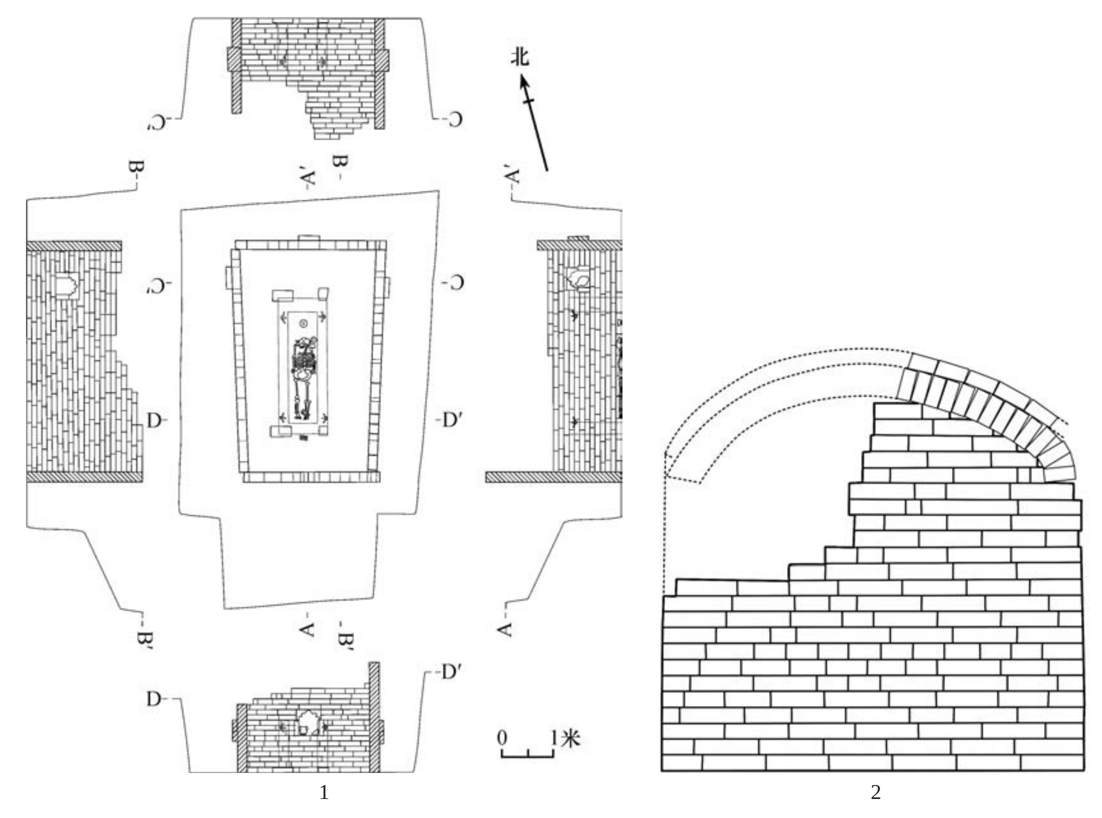
墓室墓壁砖砌，无铺地砖，平面呈梯形，拱形券顶。方向195°，长460、最宽处300、最窄处260厘米，墓室内残高约260厘米（据残留券顶判断，券顶最高点距墓底约280厘米）。墓室上部坍塌严重，仅在墓门东部和东壁南部保存较好。墓壁用单层40厘米×20厘米×9厘米的青砖错缝平砌，北壁和墓门封堵东、西两壁，无榫卯结构。墓室各壁残高130 ~ 220厘米。墓室东、北、西三壁均有顶部火焰状的拱门形壁龛，壁龛外侧用墓砖封堵。东壁小龛通高40.5、宽34、进深18厘米，北壁小龛通高48、宽34、进深17厘米，西壁小龛通高42、宽31、进深18厘米。墓室内填土为夹杂墓砖倒塌堆积的杂花土。

墓室部分券顶用砖有人工敲打痕迹，被修整为楔形，沿墓室南北向中线分布。这些楔形砖应为券顶最高处用砖。墓壁用砖多为长方形，也有一些将长方形砖截取一半成为近正方形砖砌筑于墓壁。墓室各砖层间缝隙均涂有白灰，墓门用砖封堵后，以木炭填塞与券顶处的缝隙，并用白灰将墓门外表面抹平。墓底经夯实后铺有约2厘米的白灰。

墓室内未经扰动，中部发现木棺一具，已经腐朽，有红色漆皮的痕迹，个别部位有朽木残留，木棺规格为255厘米×96厘米×90厘米，现存棺板最厚处达20厘米。木棺四角上部均镶嵌铁质铺首，并在其四周有棺钉若干。棺底四角各垫砖一块。

棺内有人骨一具，保存较好，头向北，仰身直肢，女性（图二）。

随葬品有金耳环、金银饰件、铜钱、瓷碗、釉陶香炉、瓷瓶、花纹砖等器物。



图二　墓葬、墓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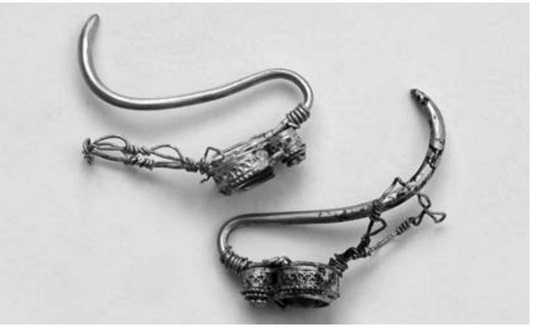
1. 墓葬平面及四壁剖视图　2. 墓门正视图

二、出 土 器 物

1. 金属器

金耳环　2 件。出土于人骨颅骨两侧（图三）。





1　　2

图三　金耳环（08LMM100：1、08LMM100：3）

1. 正视图　2. 侧视图

08LMM100：1，通高 2.2、通宽 4.62 厘米，重 9.91 克。环身平面近等腰三角形，金丝缠绕编织而成。三角形顶角穿系并焊接一近“8”字形累丝托座，托座金片为底，底部穿系并焊接金丝与环身下部连接，边框用细金丝折曲围成，边缘缀焊粟粒金珠。“8”字上半部略小，正面为细金丝与小金珠组合成的菊花形花朵，下半部较大，内嵌一颗绿松石。三角形两腰及两底角处金丝呈半圆形缠绕，原应穿有珍珠。环脚是较粗的金丝，呈一个弯曲弧度不大的“S”形。

08LMM100：3，通高 2.3、通宽 4.07 厘米，重 8.29 克。形制与 08LMM100：1 相同，但镶嵌的绿松石遗失。

花朵形金首银脚簪　2 件。形制相同，一件残断。出土于人骨颅骨一侧（图四）。

08LMM100：12，通长 12.29、通宽 1.79 厘米，重 9.05 克。簪首花朵形，簪脚圆锥状。银制，簪首包金。簪首金片捶揲为六瓣花状，花瓣上錾出细细的斜线平行纹路以像生，花蕊处打做似“卍”字纹。

08LMM100：13，通长 11.93、通宽 1.67 厘米，重 6.39 克。与 08LMM100：12 形制相同，簪脚残断。

荷叶形金饰件　1 件。出土于人骨左肱骨附近（图五）。



图四　花朵形金首银脚簪（08LMM100：12、08LMM100：13）



图五　荷叶形金饰件（08LMM100：4）

08LMM100：4，通长 2.01、通宽 1.25、通厚 0.55 厘米，重 1.76 克。金片捶揲为荷叶状。叶中心打做圆形凸起，两侧各一小圆孔，或者曾连缀珠宝。背焊有一细管状銎，可供穿系。故推测此物为簪钗或耳环等首饰装饰件。

菊花纹金饰片　1 件。出土于人骨胸骨附近（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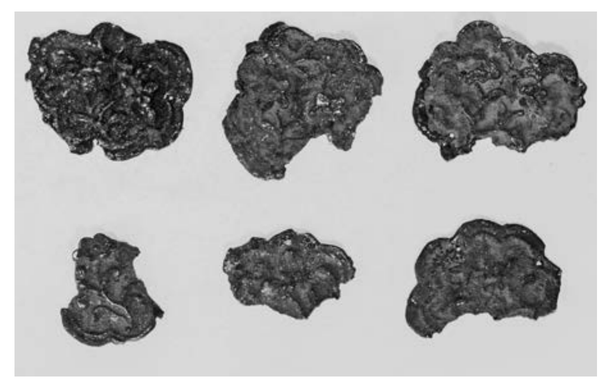
08LMM100：2，通长 2.3、通宽 2.13、通厚 0.16 厘米，重 0.95 克。两端残缺。金片捶揲而成。中心纹饰为一朵菊花，花瓣、花蕊錾细线，菊花周围绕若干叶片、花苞等。花簇上承托一月牙形物，推测原应为圆形，发现时残缺。

花形银饰片　6 件。形制相同，均残缺。出土于人骨胸骨附近（图七）。

08LMM100：14，通长 3.16、通宽 2.61、厚 0.2 厘米，重 0.79 克。残缺。花朵形，



图六 菊花纹金饰片（08LMM100：2）



图七 花形银饰片（08LMM100：14 ~ 08LMM100：19）

银片捶揲而成。边缘残留三个小孔。纹饰为两朵折枝六瓣花卉，锈蚀严重，具体纹饰不可辨识，或茶花或木槿花或栀子花。

08LMM100：15，通长 3.16、通宽 2.51、厚 0.11 厘米，重 0.66 克。残缺。与 08LMM100：14 形制相同，边缘残留两个小孔。纹饰为两朵折枝五瓣花卉，锈蚀严重，或为梅花。

08LMM100：16，通长 3.11、通宽 2.72、厚 0.14 厘米，重 0.97 克。残缺。与 08LMM100：14 形制相同，边缘残留一个小孔。纹饰为两朵折枝复瓣花卉，锈蚀严重，具体纹饰不可辨识，或为芙蓉花。

08LMM100：17，通长 2.1、通宽 1.6、厚 0.1 厘米，重 0.31 克。残缺。与 08LMM100：14 形制相同，纹饰残留一朵折枝六瓣花卉，锈蚀严重，具体纹饰不可辨识，或茶花或木槿花或栀子花或水仙花。

08LMM100：18，通长 2.38、通宽 1.5、厚 0.1 厘米，重 0.38 克。残缺。与 08LMM100：14 形制相同，锈蚀严重，具体纹饰不可辨识，似乎是卷草或折枝纹。

08LMM100：19，通长 3.02、通宽 1.77、厚 0.13 厘米，重 0.53 克。残缺。与 08LMM100：14 形制相同，边缘残留三个小孔，纹饰残留一朵折枝六瓣花卉，及两只展翅飞翔的禽鸟。

铜钱 45 枚。出土于人骨颅骨、肋骨、盆骨附近。

有开元、景德、元封、熙宁、天圣、皇宋及政和等年号。

2. 陶瓷器

瓷碗 3 件。

08LMM100：7，口径 18、圈足径 6.2、高 7.7 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弧内收，圈足。素面。胎色红褐、部分青色，釉色青。外壁腹部有刮削修整痕，口部内壁略有流釉，内底施釉较薄，圈足未着釉。出土于人骨颅骨左侧（图八，1）。

08LMM100：8，口径 18、圈足径 6.1、高 6.3 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弧内收，圈



1



2



3

图八　瓷碗

1. 08LMM100：7　2. 08LMM100：8　3. 08LMM100：10

足。素面。胎黄白色，釉色黄。内底无釉露胎，可能是叠烧所致。内外壁口部均有流釉现象，圈足上施釉较薄，圈足底边、内壁及碗底无釉。出土于棺内人骨头部（图八，2）。

08LMM100：10，口径 17.7 ~ 18.4、圈足径 6.2、高 7.5 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弧内收，圈足。素面。部分胎青白色部分黄褐色，釉色青。外壁腹部隐有刮削修整痕迹，口部内壁略有流釉现象，内底施釉较薄，唇部部分露胎，圈足上及碗外底无釉。出土于墓室北壁壁龛内（图八，3）。

釉陶香炉　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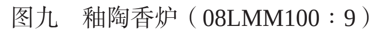
08LMM100：9，口径 12.5、最大腹径 13.1、高 4.3 厘米。侈口，方唇，唇部有一周凹槽，颈斜直内收，溜肩，鼓腹，肩部和口部连接有两个对称的立桥形耳（耳上端残），底平，下腹部有三个略呈“S”状上粗下细的足。内底似残留有香灰。胎体灰色夹有铁黑色砂粒，施釉厚处黄色，施釉薄处青灰色，因铁黑色砂粒故，表面出现铁黑色斑点。内壁口、颈部施釉，外壁口、颈、耳、腹施釉，底部无釉，足施半身釉。内壁及腹部近底处略有流釉现象，釉面不光滑，略呈酥粉状。出土于墓室北壁壁龛内（图九）。

瓷瓶　1 件。

08LMM100：11，口径 4.7、底径 6 ~ 6.2、腹径 13.5、高 25.3 厘米。弇口，折颈，

溜肩，上腹部直壁下腹部弧内收，圆唇，腹壁弧内收，平底。制作较粗糙，底部不平。缸胎。胎灰黑色，釉色黄、红褐，腹部部分青灰色。出土于墓室西壁壁龛内（图一〇）。





图九　釉陶香炉（08LMM100：9）



图一〇　瓷瓶（08LMM100：11）

花纹砖　2件。

08LMM100：5，残长18.8、宽8.8、厚3.7厘米。长方体，夹细砂灰陶质，模制，一面浮雕卷草纹。出土于墓室填土内、南侧近墓门处（图一一，1）。

08LMM100：6，残长18.7、宽8.8、厚4.1厘米。与08LMM100：5形制相同。出土于墓室填土内、南侧近墓门处（图一一，2）。



1



2

图一一　花纹砖

1. 08LMM100：5　2. 08LMM100：6

三、结　　语

1. 关于墓葬年代的推测

综合分析此墓墓葬形制及出土随葬品，将其年代推断为元末明初。

第一，从墓葬形制判断。

此墓的墓室形制与辽宁地区以往发现的元墓如康平方家屯[1]、大连寺沟[2]等略有类似，均为长方形砖室墓，与北京、河北地区的一些小型元墓类似，为长方形单室拱形券顶砖墓[3]。其东、西、北三壁有小龛，与大连寺沟元墓一致。但寺沟元墓北、西壁小龛为正方形，东壁小龛为长方形，此墓小龛均为顶部火焰状的拱门形。单论小龛的形状，又与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元代晚期墓[4]相似，与南京白马村仇成墓（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5]、南京石马村长兴侯夫人陈氏墓（洪武三十五年，1402 年）[6]、宋晟夫人丁氏墓（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7]等明早期墓葬壁龛类似。而从小龛的尺寸看，进深较浅，与元晚期墓、明初期墓相类（如南京小市镇蕲国公康茂才墓[8]壁龛，进深 0.14 米）。本墓不铺地砖的构筑方式，也与一些元、明墓的建筑方式类似，如杭州鲜于枢墓[9]、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吴良墓[10]等。

另外，在墓室填土内、南侧近墓门处发现卷草纹花纹砖 2 件，或许是墓门或墓顶的仿木结构装饰，因墓顶坍塌而不知其原状。这种用砖雕装饰墓室或墓门的建墓方法，常见于金元时期。至明初，由于严格的礼仪制度，用砖雕、壁画装饰墓室的习俗骤然衰落。依照礼制，可以使用仿木结构建筑的墓室，应为高等级贵族墓葬[11]，如蕲国公康茂才墓（洪武三年，1370 年）中同样发现了浮雕花纹砖。

第二，从墓葬建筑材料形制判断。

砌筑此墓的完整墓砖尺寸较大，比一般砖室元墓用砖要大一些。经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元代前期砖室墓（如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12]，蒙古蒙哥二年，即 1252 年）的长方形砖尺寸一般为 30 厘米 ×15 厘米 ×5 厘米左右，即边长最长 30 厘米；元代后期砖室墓（如霸州任水村 M4，元元统二年，即 1334 年）用砖开始增大，最长边可达 36 厘米；明代砖则更为宽厚，长可达 40 厘米，与明代南京城墙用砖大体相同，如仇成墓、南京蒋王庙薛显墓（洪武二十年，1387 年）[13]、南京邓府山福清公主墓（永乐十五年，1417 年）[14]等，本墓砌筑所用砖尺寸与仇成墓基本一致。

第三，从随葬品类型判断。

金耳环之形制为八珠环，金丝的半圆处原穿系有珍珠。八珠环是宋元传统样式，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载：“环……或是天生葫芦，或四珠，或天生茄儿，或一珠。”[15]“四珠”为一只耳环，一对耳环共珍珠八颗，故又称“八珠环儿”[16]。此前发现的八珠环实物均出土于明墓，如宋晟夫人叶氏墓和许氏墓、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夫妇墓[17]等墓葬。其中宋晟夫人叶氏、许氏墓为明早期墓（永乐十六年，1418 年；永乐十九年，1421 年），制作耳环的金丝较粗，环脚环状挑起，耳环整体风格较粗犷，从墓志可知，叶氏、许氏一位出生于至正十六年（1356 年），一位出生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均为元代晚期出生，耳环作为墓主随身首饰，制作时间应早于墓葬建造时间，故很有可能是元末或明初制品。而明正统、景泰年间梁庄王墓[18]出土金耳环金丝较细、环脚长，绿松石打磨更精细，整体风格显得纤细精致，明嘉

靖、万历年间益庄王墓[19]中的环脚呈圆形，镶了红宝石，更显尊贵。此墓出土的金耳环，金丝粗，环脚比宋晟夫人墓出土者短，与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0]出土的金葫芦环环脚形态相似，累丝形态与元代累丝饰件相似。故推测其为元代饰物。

金首银脚簪为锥脚簪。锥脚簪在元代即较常见，如株洲县堂乡元代窖藏出土的若干锥脚簪[21]。本墓出土的这两支，顶部较小，簪首为花卉状，中央做成“卍”字以象征花蕊。从纹饰看，与内蒙古敖汉旗朝阳沟出土的元代莲花纹银饰[22]中央的那一朵俯视的莲花颇为相似；从形制看，明代更常见，如仇成墓、宋晟母亲墓等皆出土花卉顶锥脚簪；从制作方法看，株洲县堂乡元代窖藏中有一支银六方花头顶锥脚簪，簪首背后可见清晰的银片包裹痕[23]，与本墓出土者类似；从制作材质看，簪首包金、银质簪脚的做法，称之为“金裹头”，宋代即有，不过簪首多为圆球状，至明代则簪首为花卉形[24]。此前实物例证多为明中晚期墓葬出土，如武进王洛家族墓[25]、泰州森森庄明墓[26]等。但形制上，明中晚期簪首纵剖面常呈蘑菇状，本墓出土的锥脚簪簪首顶部平，与元代式样更为接近。

菊花纹金饰片经仔细观察并比对既往考古发掘成果，发现中心最大的一朵菊花上方所托月牙是残缺的，推断其原应为圆形。其原形应与张士诚母曹氏墓、南京汪兴祖墓（洪武四年，1371年）[27]出土的“日”“月”字纹金饰件相似。因其残缺，且仅只一片，不知其为“日”还是“月”字饰件。这种由带有吉祥寓意的纹饰托起圆形的刻着“日”或“月”字的饰片，最早见于元代末年——张士诚母曹氏墓中，为金质，被墓主握于手中。至明代中期仍可见，不过变为银质，见于男性墓主身上，如徐达五世孙徐俌墓[28]（正德十二年，1517年）。

瓷碗的形制与苏州吴山岭明刘德贞墓（洪武三年，1370年）[29]中出土的青瓷碗相同，看其对釉色釉质的描述，应也类似。另与薛显墓中出土者亦颇相似。

釉陶香炉的形制与山东茌平县元代窖藏[30]中出土的绿釉陶香炉形制最为相像，而其器身侈口、直颈、鼓腹、腹下三个小矮足的形制，与喀左大城子元墓[31]、朝阳市仁济药材工地元墓群M6[32]、大同元冯道真墓（至元二年，1265年）[33]、大同元代壁画墓[34]、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至顺二年，1331年）[35]等所出土的香炉都颇为形似。这种鼎式炉到明代即发生较为明显的形制变化：“……元代鼎式炉颈部为长直颈，明早期的鼎式炉颈部相对较短；……元代鼎式炉的炉足多为曲形或锥状的矮足，……明早期鼎式炉的炉足要高于元代，多为粗壮的兽蹄形足……。”[36]

瓷瓶以往一些文章中习称“韩瓶”，据传系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创，故而名之[37]。据研究，其为酒器，金代至明代均有，早期口沿处带系，后变为无系。也有据其形态名之为“鸡腿瓶”者。本墓中出土的这种缸胎瓷瓶，与喀左大城子元墓、河北三河高楼元墓M11：1[38]、北京昌平兴寿镇元墓M53：1[39]等出土者相似，与明初的河北乐亭县前炕各庄M7：3（该墓同出“洪武通宝”）[40]、南京薛显墓、安徽滁州南小庄王妙安墓

（洪武三十年，1397 年）[41] 出土者相似。

其他文物：北宋钱币的出土，证明该墓不早于北宋政和年间，且元代墓葬中常见随葬宋钱；荷叶形金饰件的像生“荷叶”之造型，多见于宋元时期；花形银饰片的形制与纹饰，亦符合宋元文物的时代风格；花纹砖上的卷草纹，常见于元、明时期各种文物上。

第四，从随葬品组合判断。

本墓出土的首饰包括八珠环一对、花头锥脚簪一对、荷叶形簪或钗头饰片一件，这几种首饰组合比较随意，完全不能与明代成套、组合较固定的头面首饰相比，种类也不能涵盖宋、元时期女子头面首饰类型的全部，非常有元代特点。

其中，八珠环在明代有礼制意义，凡保存完整的宗室及异姓勋爵墓葬必出，而宗室、勋爵之外人等墓葬几乎没有发现[42]。明代墓葬出土八珠环者，除永乐十九年埋葬的宋晟夫人许氏墓外，均同出挑心、分心、掩鬓等其他插戴于鬏髻上的首饰。与明代相比，八珠环在元代就不那么严格地用于宗室勋贵，如《朴通事谚解》中提到将八珠环典当、下聘等事[43]，可见八珠环在元代是全社会女性普遍喜爱、佩戴的一种耳饰。另外，耳饰在元代受到特别重视，《元史·舆服志》对耳环质料的规定较其他首饰而言格外宽松[44]，“庶人……首饰许用翠花，并金钗锦各一事，惟耳环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45]。

花朵形金首银脚簪作花卉状，并只有一对。这种不成套的、簪戴比较灵活的小簪，在明代墓葬中往往一出土便发现多件，如王洛家族墓王洛妻盛氏墓、江阴长泾夏彝夫妇合葬墓、青阳夏谅妻邹氏墓[46]等。王洛妻盛氏为孺人，夏彝妻蒋氏为宜人、夏谅妻邹氏为孺人，地位低于宗室勋贵。

本墓首饰组合简单，并且既出土了数量少于明代一般官宦人家墓葬的簪钗，又出土了宗室勋贵使用的八珠环，这正反映了本墓葬的时代应是对耳饰佩戴等级要求不严格的元代，或是明初丧葬从简尚朴之时。

另外，本墓出土的花朵形金首银脚簪、荷叶形金饰件、菊花纹金饰片、花形银饰片等，均以像生植物为纹样题材，更符合元代的设计理念，而锥脚簪以“卍”字为花蕊，似乎有明代纹样设计之端倪——“宋元多选择清新活泼的自然景物，明代则更倾向于把花草禽鸟组织为各种祥瑞图案”[47]。

综合以上因素可知，此墓葬各方面同时具有元代晚期和明代早期的特点，颇具过渡性，故推测此墓为元末明初墓葬。

结合文献看，元末，红巾军、辽东地方豪强势力轮流控制了辽阳地区，明洪武四年（1371 年），本地豪强势力归附，明廷在辽阳城设置定辽东都卫指挥使司，并派遣官员在辽东任最高武官，自此辽东彻底归由明朝统治[48]。而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制定了可以说是繁缛的礼仪制度，严禁僭越，故明开国公侯的墓葬均尚俭，随葬品稀少[49]。本墓显然非公侯之墓，却拥有可比肩于公侯的金饰品随葬并出土了装饰墓室的雕花砖，故

而其年代下限应在明洪武四年左右——本墓具体年代范围在元至正年间到明洪武四年左右，即 14 世纪 40 ~ 70 年代。

2. 关于墓葬发掘的意义

本墓葬发掘之前，辽宁地区发掘的元代墓葬有康平方家屯、抚顺土口子[50]、大连寺沟、凌源富家屯[51]、喀左元墓[52]、朝阳开发区仁济药材工地墓群等，明代墓葬在辽宁地区有代表性的是鞍山倪家台崔源族墓[53]，总体而言，发现不多，资料也比较零散。本墓葬的发掘，对于辽宁地区元明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墓葬中出土的金饰品均不常见，尤其是元代八珠环的发现，填补了此前元代这种类型耳环只见于文献不见实物的空白。

从墓室建筑方法、墓室结构、随葬品等方面看，本墓葬与江苏地区明初墓葬非常相似，而与以往发现的辽东地区元代、明代墓葬有一定差异。据文献记载及研究[54]，辽东地区元代为多民族杂居、融合的地区，大量内地移民迁入，元末，红巾军、辽东地方豪强势力轮流控制本地区，洪武四年明廷设置辽东都卫指挥使司，辽阳地区正式纳入明中央统治地域。推测本墓墓主为汉人，且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许其与当地豪强势力或明廷派遣官员有一定关系。本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辽阳地区元明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透视元末明初辽东地区社会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附记：本墓出土的金银首饰的断代得到扬之水先生的指点，谨表谢忱。

发掘：李海波　赵少军
绘图：李海波　王　宇
摄影：穆启文　图旭刚
资料整理：徐沂蒙　李海波
执笔：徐沂蒙　李海波

注　释

[1] 张少青．康平方家屯元墓［J］．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创刊号．

[2] 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J］．文物，1983（5）．

[3] 宋蓉，罗斌．北京地区蒙元墓葬研究［A］．边疆考古研究（第 20 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 a.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尉氏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6（3）．

b. 经刘未先生分析，该墓为元代晚期墓葬。刘未．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J］．故宫博物院院

刊，2007（3）.

［5］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4（9）.

［6］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南郊两座大型明墓的清理［J］．考古，1999（10）.

［7］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中华门外明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2（9）．本简报发表了明西宁侯宋晟家族墓葬简报，包括宋晟父母、宋晟、宋晟三位夫人（丁氏、许氏、叶氏）六座墓葬。下文凡宋晟家族墓葬相关资料均出自本简报，不再另注。

［8］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J］．考古，1999（10）.

［9］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发现元代鲜于枢墓［J］．文物，1990（9）.

［10］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明墓［J］．考古，1983（6）.

［11］　张佳．以礼制俗：明初礼制与墓室壁画传统的骤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8（6）.

［13］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两座明墓的清理简报［J］．华夏考古，2001（2）.

［14］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邓府山明代福清公主家族墓［J］．南方文物，2000（2）.

［15］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06.

［16］　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5：76.

［17］　“梁庄王墓、益庄王夫妇墓出土八珠环图”见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5：76，77.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5）.

［19］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庄王墓出土文物［J］．文物，1959（1）.

［20］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5（6）.

［21］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50～252.

［22］　于建设．赤峰金银器［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95.

［23］　同［21］：250.

［24］　a. 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5：34～36.
b. 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

［25］　武进市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J］．东南文化，1999（2）．下文凡王洛家族墓葬相关资料均出自本简报，不再另注。

［26］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11）.

［2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汪兴祖墓清理简报［J］．考古，1972（4）.

［28］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市博物馆．明徐达五世孙徐俌夫妇墓［J］．文物，1982（2）.

［29］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吴山岭明刘德贞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6（6）.

［30］　聊城地区博物馆．山东茌平县发现一处元代窖藏［J］．考古，1985（9）.

［31］　徐英章．辽宁喀左县大城子元代石椁墓［J］．考古，1964（5）.

［32］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开发区仁济药材工地元代墓群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2009（1）.

[33]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 [J]. 文物，1962（10）.
[34]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元代壁画墓 [J]. 文物季刊，1993（2）.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 [J]. 文物，2004（3）.
[36] 樊莉萍．考古出土的明代瓷质香炉研究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7] 同 [13].
[38]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三河市文物管理所．河北三河高楼元代墓群 [J]. 文物春秋，2015（5）.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 [J]. 文物春秋，2012（3）.
[4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乐亭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乐亭县前炕各庄墓群发掘报告 [J]. 文物春秋，2007（1）.
[41] 滁州市文物管理所．安徽滁州市南小庄发现明墓 [J]. 考古，1996（11）.
[42] 仇泰格．明代金银首饰研究 [D].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4.
[43] 李芽．中国古代耳饰研究 [D].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122～124.
[44] 同 [43]：119.
[45] （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十八·志第二十八·舆服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943.
[46] 唐汉章，翁雪花．江阴长泾、青阳出土的明代金银饰 [J]. 文物，2001（5）.
[47] 扬之水．奢华之色·卷二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225.
[48] a.（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四十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5.
b.（清）张廷玉等．明史·志第十七·地理二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952.
c. 李健才．明代东北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5，6.
[49] a. 仇泰格．明代金银首饰研究 [M].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4.
b. 张佳．以礼制俗：明初礼制与墓室壁画传统的骤衰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c. 马晓光．长江下游地区元、明墓葬 [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0] 徐家国．辽宁抚顺土口子村元墓 [J]. 考古，1964（5）.
[51]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 [J]. 文物，1985（6）.
[52] 傅宗德．辽宁喀喇沁左翼自治县元墓 [J]. 考古，1990（2）.
[5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鞍山市文化局文物组．鞍山倪家台明崔源族墓的发掘 [J]. 文物，1978（11）.
[54] a. 同 [48] c：1～6.
b. 杜洪涛．元明之际辽东的豪强集团与社会变迁 [J]. 史林，2016（1）.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Tomb in Liaoyang Miaonu Cemetery, Liaoning Province

Xu Yimeng Li Haibo Wang Chuang

Abstract: In 2008, the Liaon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discovered a tomb dated to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n the north of the excavation area of Miaopu cemetery in Liao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The tomb is composed of a brick chamber with a sloping corridor in on a North-South axis. The vaulted roof of the tomb is built with niches on the North, East and West sides. A wooden coffin was found in the tomb containing the remains of a woman. She is buried on her back with straight limbs. The tomb is furnished with grave goods such as gold earrings, hairpins, gold and silver ornaments, copper coins, porcelain bowls, glazed pottery incense stoves, porcelain vases, striped bricks etc.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tomb age can be inferred as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pecific age ranges from the Zhizheng era under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fourth year of the Hongwu era, that is, from the 1440s to the 1470s. The excavation of this tomb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dissemination in Liaoyang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o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s in eastern Liaoning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Keywords: Liaodong; Miaopu Cemetery; During Yuan-Ming Dynasties; Brick Chamber Tomb

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橡子利用：民族史志的视角

陈国鹏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民族学研究展现了橡子在狩猎采集者生计中的重要作用，橡子利用同时也是早期农业生计的重要补充，研究橡子的利用对理解农业起源及早期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均有橡子发现，但相关研究集中在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上，对橡子利用缺乏专门研究。本文综合生态环境、橡子的营养价值、加工橡子投入产出率的研究，探析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利用橡子的可行性，并结合考古材料、民族志和历史文献探索该地区橡子加工的可能模式与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了解橡子利用在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生计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橡子利用；民族志；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田螺山遗址

一、引　　言

在农业发生以前，广谱型的生计模式曾经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橡子作为一种野生资源在各地都有广泛利用。然而，中国史前遗址中关于橡子的报道不多，记述很不详细[1]。由于有机质极易腐蚀，很多材料难以保存下来。即使遗址保存状况很好，有大量橡子被保存下来，由于橡子的采集和加工有时是在遗址外（off-site）进行的，普通的发掘也难以发现这些小型的营地，需要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调查与发掘[2]。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保存状况很好，大量的橡子在饱水的环境中得以保存下来。有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橡子利用的重要性[3]，但由于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长期占据着这些遗址学术讨论的核心，吸引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注意，故而鲜有研究专门讨论橡子的开发利用。

本文拟结合考古材料、民族学记载和历史文献，分析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橡子利用的可行性，探讨橡子利用的模式和操作链（Chaîne opératoire），展现橡子在当时人群生计中的作用。具体来说，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新石器时代浙江地区的生态环境能否支持大规模橡子利用?

（2）橡子自身的营养与能量价值是否值得狩猎采集者进行大规模利用?

（3）从加工橡子的投入产出比来看，橡子利用是否为一种经济有效的资源获取手段?

（4）如果橡子是一种可以并且值得大规模利用的资源，那么人们利用这些资源的模式可能有哪些?

（5）针对这些资源利用模式，具体的利用流程是怎样的?

（6）考古材料的发现与上述问题有何关联?

通过回答上述六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考古遗址中的各种材料，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后的考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深入分析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橡子利用的可行性及细化其利用方式，同时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新石器时代农业发展早期人们的生计方式与适应策略。

二、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橡子材料

判定植物是否为橡子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观察，另一种是通过植物残留物分析。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橡子发现都是实物，主要发现在上山[4]、小黄山[5]、跨湖桥[6]、河姆渡[7]、田螺山[8]等遗址中。具体出土情况如下表所示（表一）。

表一　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橡子情况

<table>
<tr><th>遗址</th><th>出土单位</th><th>年代（校正后）/ 年</th><th>出土状况</th><th>种类</th></tr>
<tr><td>上山、小黄山</td><td colspan="3">遗址中直接出土完整的橡子，刘莉等通过石磨盘上的植硅体、淀粉粒分析，得出该遗址利用过橡子的结论</td><td>栎属（Quercus sp.）
石栎属（Lithocarpus sp.）
青冈属（Cyclobalanopsis sp.）</td></tr>
<tr><td rowspan="5">跨湖桥</td><td>H17</td><td>距今 7700 ~ 7300</td><td>口部有“井”字形木构西壁近底有一木板，坑底北、西南角有木桩。坑内保存丰富的橡子</td><td rowspan="5">1. 麻栎果（Quercus acutissima）：没有见完整的壳斗，坚果卵球状形，直径 1.5 ~ 2 厘米，果脐凸出；
2. 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没有壳斗，坚果卵圆形，直径 1.3 ~ 1.5 厘米，果脐凸出；
3. 白栎果（Quercus fabri）：没有见到壳斗，坚果呈长椭圆形，直径 0.7 ~ 1.2 厘米，长 1.7 ~ 2 厘米，表面光滑，果脐略隆起</td></tr>
<tr><td>H22</td><td>距今 8200 ~ 7800</td><td>口部有 4 根木条围成“井”字形。南壁有一块大木板和木条，上有厚木板支撑。坑内保存丰富而纯净的橡子</td></tr>
<tr><td>H16</td><td>距今 7700 ~ 7300</td><td>填土为黑色淤泥，包含大量的橡子</td></tr>
<tr><td>H23</td><td></td><td>黑色土，较多杂质，如碎木、橡子等、坑底铺垫沙</td></tr>
<tr><td>H19</td><td></td><td>填充淤泥，包含橡子</td></tr>
<tr><td>河姆渡</td><td>H19</td><td>距今 7000 ~ 6500</td><td>坑内堆积橡子和菱角等植物果实</td><td></td></tr>
</table>

续表

遗址	出土单位	年代（校正后）/年	出土状况	种类
河姆渡	H27	距今 7000 ~ 6500	灰黑色土，质疏松，有夹炭黑陶陶片，还有鱼骨、烧焦的小树枝、橡子、菱角等。底部铺垫一层苇席	
	H22	距今 6300 ~ 6000	出土了橡子、菱角、芡实和一件骨镞。苇席铺口垫底	
	H23	距今 6300 ~ 6000	出土了大批橡子、稻叶、有芦苇印痕的红烧土块、陶片及萤石	
田螺山	T103		褐灰色土，包含大块陶片、木块、木屑、树叶、菱角、橡子、酸枣、稻谷壳、动物骨头等有机质	没有鉴定种属，但有学者根据形态推测为石栎属（*Lithocarpus* sp.）和青冈属（*Cyclobalanopsis* sp.）
	H22		有许多橡子	

这些遗址大多保存状况良好，遗址都处在河流附近，且饱水环境好，有些橡子直接被保存在水坑中，跨湖桥遗址中的橡子坑有明显加工设计的痕迹，口部有井字形的木板，底部也有木板支撑。除了出土橡子之外，这些遗址还有其他野生资源的利用，如芡实、菱角、酸枣等，同时也有稻类作物遗存。跨湖桥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有很多甚至还保留着锅巴，已有分析表明与食物加工有密切的联系[9]。一些芦苇编织物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有些垫在橡子坑的底部。遗址出土的遗物中研磨工具较多，淀粉粒分析显示与橡子加工有关[10]，并且随着年代的推移，研磨工具占石器的比例越来越小。由于这些遗址往往与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有密切联系，因此相关考古报告和研究对稻谷介绍得很详细，而对橡子的介绍大多一笔带过，缺乏具体数量、重量、种属等重要信息。但世界很多地区（如地中海地区和北美）至今仍有食用橡子的习惯[11]，故而史前橡子的研究也更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相关资料也更加丰富，因此下文对橡子利用的分析主要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三、橡子利用的可行性

（一）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环境背景与栎树分布

橡子是壳斗科栎属植物的种子，栎属约有 450 种[12]，目前中国有 110 多种，不同种属的分布范围不同[13]，其中浙江地区产 10 种、2 变种[14]，分布甚广，数量较多。但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环境背景与现在不甚相同，因此我们还需要结合古环境分析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能否支持大规模橡子利用。

学者虽然对这些遗址有相关的自然条件和古环境研究[15]，但仅跨湖桥、河姆渡、田螺山遗址有具体的古植被复原，跨湖桥遗址的“植被中木本以栎、槭为主体，亚热带植物枫杨、胡桃、漆、栗等常见，草本植物以禾木科为主，可见蒿、藜科等”[16]，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在“距今 7000 年前气候湿润温暖，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树种有蕈树、枫香、栎、栲、青冈属、山毛榉和樟科等”[17]。一项全新世中国地区的孢粉研究展现了 10000 年来中国栎属孢粉的分布情况，从该研究结果来看，距今 10000 ~ 4000 年，中国范围内栎树植物资源都很丰富，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直到距今 6000 年，长江下游地区都是栎属植被覆盖率较高的地区之一，并且在距今 8000 ~ 6000 年期间覆盖率最高[18]，这也和本文涉及的几个遗址年代相吻合。综合以上资料，新石器时代浙江地区分布着比较丰富的栎属植被资源，其种子橡子的产量又很大，因此从自然条件看，存在大规模利用橡子的可能性。

（二）橡子的营养和能量价值

除了自然环境条件外，大规模的橡子利用还必须建立在橡子自身较高的营养和能量价值上。橡子的营养价值因品种而异，一般来说，橡子内含有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主要是维生素 A 和 C）[19]。根据 Kislev 和 Bar-Yosef 的估计，每 200 克干燥的橡子中含有蛋白质 4.8、油脂 5.1、碳水化合物 53.9 克[20]。橡子中的淀粉含量也很高，可以与玉米、土豆媲美[21]。当然，橡子也含有单宁酸和微量的氢氰酸，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并且有一定的毒性，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冲洗或浸泡的方式来清除这些有毒物质。

（三）橡子加工的投入产出比

除上述两个因素外，加工橡子所投入的能量与从橡子中获得能量的比例也是衡量橡子是否值得大规模利用的重要因素。根据最佳采集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狩猎采集者会综合考虑收入和产出的能量比例有意识地选择回报率高的食物资源[22]。结合橡子的加工来看，不同品种的橡子所含营养价值不同，不同的加工方式消耗的能量也难以统一计算，同时加工过程中也会损耗一部分营养成分，这些都为准确计算橡子加工的投入产出比造成了困难。但目前有研究分析了处理橡子的时间投入及可供使用的时间，研究认为橡子加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成本花费在采集和研磨上，根据食物采集和加工的功效来看，在人类活动 25 千米范围内橡子采集加工要优于其他野生资源，甚至优于野生大麦和小麦[23]。Goldschmidt 指出将 2.7 千克干燥、去壳的橡子制作成面粉所需的时间在 3 小时以内[24]。Gayton 进一步认为一天的研磨工作平均可以

支持普通家庭 2 ~ 3 天的生计[25]。综合考虑新石器时代浙江地区的植被环境、橡子的营养能量及加工收益，本文认为当地大规模的橡子利用是可行的，下文将进一步分析这种利用的主要模式和流程。

四、民族史志中橡子利用的模式和流程

浙江地区很多遗址虽然出土了数量可观的橡子，但已有的资料记载很不充分，橡子是如何被利用的以及被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我们难以窥探，因此下文将利用中程理论的思路，结合民族史志及相关文献中对橡子利用的记载，讨论浙江地区橡子利用的模式和流程。

（一）民族史志中的橡子利用

民族史志中有很多关于橡子利用的记载，其中美国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地区、墨西哥、中美洲、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及东亚地区（以日本和韩国为主）记载较为详尽[26]。根据这些民族史志记载，我们可以将橡子的主要用途归纳成玩具、商品、饲料、食物四大类。橡子可以被制作成类似于陀螺的玩具，现在长江下游地区仍有这样的玩具制作。橡子作为商品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与工业用途有关，如提取橡子中的单宁酸[27]。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橡子是主要的交换商品之一,一般是交换当地没有的橡子品种[28]或是加工成食物[29]。

橡子的后两种用途对于我们理解考古遗存中的橡子利用更有帮助。将橡子当作饲养家畜、家禽的饲料在各地民族史志材料中均有记载[30]。利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橡子成熟的时节直接将家畜、家禽放养于橡树林中，饲养者将橡子简单去壳后，任它们自由进食[31]。有学者认为这是最简单而经济的做法[32]，但由于橡子中含有单宁酸，过量食用会对动物的身体造成损伤，因此也有将橡子收集带回住所后简单加工成饲料喂养牲畜的做法，这后一种做法更普遍[33]。

民族史志中橡子利用最主要的方式是将橡子加工成食物。不同地区加工的食物不同，主要有粥、面包、饼干等，熬制粥时有时会加入一些蔬菜、肉、玉米粉、糖浆等进行调味[34]。印第安人则会直接将橡子烘烤后食用[35]。这些食物在有些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地区）被作为一种主食，部分地区则是作为零食或饥荒时期的食物，甚至是特殊场合如节日庆典时的专门食品[36]。

（二）相关文献中的橡子利用

古代诗文和史料中均有橡子的记载，而史料的记载往往更全面，信息更丰富，因此本文梳理了史料中关于橡子的记载，归纳出中国古代橡子利用的几种模式（表二）。

表二　相关文献中的橡子利用举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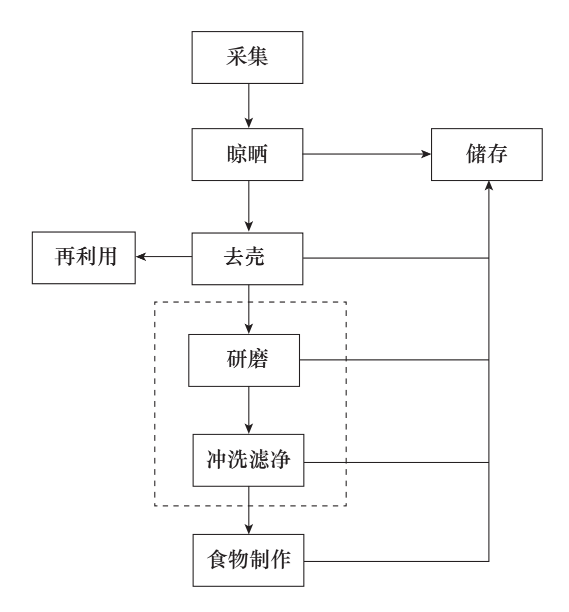
序号	用途	文献内容	出处	备注
1	灾荒饥粮	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实以自资	《后汉书》卷51《李陈庞陈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3页	政府组织采食橡子
2	灾荒饥粮	饥民者，……弃其采橡梠、捕禽鱼、可以得生之计，而希求自至之口实，固未能厌其欲而使有终年之饱也	王夫之撰：《读通鉴论》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页	百姓自发采食橡子
3	主食	（鲍焦）饰行非世，廉洁而守，荷担采樵，拾橡充食	《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61页	鲍焦为一隐士
4	主食	因皆销声匿迹于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涧而饮	赞宁：《宋高僧传》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60页	高僧
5	零食	八、九月拾橡栗作粉食	孙廷铨：《颜山杂记校注》卷2《风土岁时》，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68页	将橡子磨成粉作特殊时令的零食
6	零食	橡斗栗磨粉则成黄豆腐	俞樾：《茶香室四钞》卷25《五色豆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84页	橡子粉制豆腐
7	零食	香饼用栎炭和柏叶、葵菜、橡实为之	刘幼生编校：《香学汇典》卷3，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304页	橡子等原料制香饼
8	染料	项元汴蕉窗九录纸录染宋笺色法：黄柏一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复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	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3页	给剪纸上色
9	染料	按“驼褐”“捍草褐”“橡子竹褐”皆是传统织物色彩中的褐色品种，前者深，后者浅	王继宗校注：《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02页	“橡子竹褐”乃橡子所制丝织物染料
10	灾荒饥粮/饲料	橡子，俭岁可食以为饭；丰年放猪食之，可以致肥也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注：《齐民要术今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0页	
11	药用	橡实，味苦，微温，无毒。主下痢厚肠胃。肥健人，其壳为散及煮汁服。亦主痢	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校笺》卷20，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42页	
12	见面礼	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曲礼下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1页	椇即为橡子
13	计量单位	殆至六旬，得遇天人，授饮美酒，若橡斗许，面赤若醉……年几六十，再遇异人，授以玄酝一橡斗许	薛瑞兆编著：《金代艺文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56～958页	
14	辟邪工具	晨有道士来谒，授以药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副之，戒曰：“此去千日，当有大厄，宜封识如法，勿令妾妇见之，庶缓急可为备”	张邦基：《墨庄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页	

进一步归纳的话，史料中的橡子利用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作为灾荒饥粮，通常是发生重大饥荒时，政府组织或百姓自发地采食橡子；②作为主食，大多是隐士或高僧遁入山中，拾橡为生，大多数文献中只提橡子，有些文献也提及诸如野菜、鱼类等其他食物；③作为零食，橡子可以制作成粉、香饼、黄豆腐等特殊时令的佳肴；④作为染料，可以给纸、丝织物染色，更有一种染料名曰"橡子竹褐"；⑤作为饲料，通常是养猪；⑥其他功能，如用作药物、见面礼、计量单位、辟邪工具等。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没有证据表明橡子制作成了染料或是用作见面礼、计量单位等，而作为食物资源（主食、零食或灾荒饥粮）和饲料都是有可能的。

（三）橡子利用的"操作链"

结合民族史志和相关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橡子具体加工成食物或饲料的流程，这些内容通常是从考古材料中很难直接观察到的。我们对利用过程的充分了解将有助于理解考古现象。下文将结合民族学和考古材料，对橡子加工的"操作链"进行分析。

将橡子加工成食物的主要流程包括采集、晾晒、去壳、研磨、冲洗滤净、食物制作、运输、储存等步骤（图一）。



图一　橡子食品加工的操作链
（其中研磨和冲洗的顺序可以互换）

1. 采集

橡子成熟后会吸引各种动物和昆虫，因此人们需要及时采集。不同品种的橡子成熟时间不同，同一品种的不同个体也会有成熟的先后差异，这就需要采集者熟悉附近的橡树生长情况，掌握大部分橡子成熟的时节，并且需要定期查看橡子生长动态。橡子的成熟时间一般在秋冬之际。

采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拣取脱落于地面的橡子[37]；第二种较为常见，即采摘树上尚未脱落的橡子。不同的采集者对橡子成熟度的选择各异，虽然成熟的橡子味道更甜，但也有采集者偏爱未完全成熟的青橡子，因为青橡子可以熬制成清白黏稠、顺滑爽口的汤粥，而完全成熟的橡子则会熬成一锅黑粥。从获取资源的成本看，往返采集点消耗的能量和时间很大[38]，因此橡子采集一般在聚落附近进行，一天内可以往返。当资源所在地较远或资源需求量较大时，有些部族会在橡树林中搭建临时工棚，并在工棚中完成晾晒、去壳等简单的预处理。

2. 晾晒、去壳、研磨

晾晒行为可能发生在中心营地或是临时工棚，通常是在太阳下暴晒，也有用火烘烤的。有时已经晒干的橡子也会拿出来再次晾晒。晾晒橡子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真菌感染和蚊虫叮食。同时，晒干的橡子重量也相应减轻，方便运输[39]。

去壳的过程除了去除橡子坚硬的外壳外，还包括外被衣的去除。去壳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用牙齿嗑咬、用石头劈砸、用磨盘磨棒处理[40]。具体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橡子的数量、品种（橡子壳的厚度）及成熟度，如尚未完全成熟的青橡子可以用牙齿直接去壳[41]。文献中对于橡子壳的处理鲜有记载，不过橡子壳也有可能会被再利用，晒干后可作为燃料[42]。

研磨的工具主要是石磨盘和石磨棒，也有木制工具[43]。经过研磨的橡子粉通常会被筛滤，分出粗粉和细粉，粗粉通常会被再次研磨[44]。筛滤的工具通常是编制的篮筐，也可以放在平板工具上摇晃来实现分选的目的。

3. 冲洗滤净

研磨和冲洗滤净的先后顺序在不同的民族史志材料中有一定差别。冲洗滤净的主要目的是去除橡子中的单宁酸。为了有效地去除单宁酸，人们通常会将去壳后的橡子或研磨后的橡子粉用植物叶子包裹后放在流水中长时间的冲洗，时间为数周甚至数月[45]，有时也会将橡子烹煮若干小时[46]，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在水中加入一些草木灰，利用碳酸钾的碱性中和单宁酸[47]。这个过程虽然可以有效地去除单宁酸，但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48]，并且也会造成橡子中脂肪的流失，造成能量损耗[49]。

4. 食物制作

不同地区加工成的食物有所区别，中国的橡子食物主要是汤粥或面食，现在有些地区仍在食用[50]。相关文献中也记录了一些用橡子加工成零食的现象（表二）。

5. 运输与储存

当橡子的采集和加工场所与日常居所相距较远的时候就会涉及橡子的运输问题。运输的橡子可能是没有经过处理的，也可能是已经经过预处理的，也有的是已经做成食物的[51]。运输的工具通常是篮子或毯子，一般来说女性承担着主要的运输工作，有时也会有其他人帮助[52]。

利用橡子资源较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橡子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在资源紧张的时节，储存的橡子就成了维系生存的重要物资。一般来说，储存的橡子是没有经过去壳处理的[53]，少数是去壳的或是橡子粉[54]。橡子储存的地点大部分是在特定的粮仓中[55]，有的包裹起来埋在地下，有的是埋进泥巴里[56]，少量加工好的食物也会保存在罐子中[57]，一般可以

储存长达 2 年[58]。

五、考古材料中可见的橡子利用

（一）采　　集

考古遗存中，发现采集橡子搭建的临时工棚对于解释采集者的行为模式大有裨益。如果保存了较完整的橡子壳，我们可以获知大致的采集量、所需劳动力，进而计算采集所耗费的时间和能量，结合其他数据，我们有可能完整地计算当地橡子利用的投入产出比例并分析橡子利用的模式。因此，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可以进行“遗址外”调查，以尽可能揭露更多的信息。

另一项考古遗存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用火情况。秦岭等学者已经注意到用火可以有效地辅助跨湖桥遗址中橡子的采集[59]。采集者通过焚烧采集地的小灌木，一方面可以方便采集行动，同时也更容易发现坠落的橡子。焚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提高来年橡子的产量，因为此过程可以有效地杀死寄生虫和病菌。此外，橡树下的小灌木、干枯的枝叶等都是易燃物，在面对森林火灾时很容易将火势扩大，定期地燃烧这些灌木可以有效降低火灾的风险，间接地保证了橡子的产量[60]。浙江地区的遗址中，跨湖桥、河姆渡等遗址存在类似的用火现象，我们可以推测与有规划的采集行为有关。

（二）晾晒、去壳、研磨

晾晒行为在考古遗存中难以体现出来。

考古遗存中的很多石器均可用来为橡子去壳，但我们无法确定具体运用的是哪种工具。河姆渡、田螺山遗址中有些灰坑中有橡子壳出土，这可能是抛弃的垃圾，但也不能排除是囤积起来以备作燃料的可能性。

中国考古遗存中研磨石器的功能探索一直在进行中。传统观点认为研磨石器与谷物加工有关[61]，也有学者认为石磨盘最早用来加工植物果实，后来也被运用到农产品的加工中，但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工具[62]。除了食物加工功能外，有学者认为研磨工具有揉皮[63]、加工颜料[64]等功能。刘莉通过与北美、日本民族学材料的类比，推测中国史前研磨工具可能与坚果（尤其是橡子）采集有关，并运用栎树孢粉资料和考古材料中出土的研磨工具进行比照，发现高比例的栎树孢粉往往伴随着高比例的研磨工具使用，从而验证了研磨工具与橡子利用有关联性的假说[65]。研磨工具通常是多用途的，具体的功能只能根据遗址情况进行分析。近年来，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成为研究研磨工具功能的主导手段，这在浙江地区考古遗存中也得以体现，刘莉等学者就通过对磨盘磨棒上的淀粉粒、植硅体分析，揭示了上山、小黄山遗址对橡子的利用，并鉴定出种属[66]。

类似的研究在其他地区的遗址（如北京平谷上宅[67]、裴李岗遗址[68]、山西武乡牛鼻子湾遗址[69]）中也展现了橡子利用的重要性。

（三）冲洗滤净

由于冲洗滤净这一步骤需要大量流水，因此橡子利用频繁的聚落一般会离流水不远，这也与浙江地区可能有橡子利用的遗址情况相符合。另外，浙江地区出土的橡子大多是在饱水环境中，除了遗址形成的自然原因之外，古人有意地将橡子储存在水坑中的可能性亦存在[70]。

（四）食物制作

跨湖桥遗址中很多器物内外壁积有食物残渣和锅巴[71]，通过淀粉粒分析，陶片内壁附着的炭化锅巴包含了 7 类 8 种作物种子和果实的淀粉粒，其中就包括橡子和与橡子较为接近的七叶树果实。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跨湖桥遗址中橡子加工的主要食物是汤粥类，长期食用后在器物上留下了锅巴。其他遗址中食物的种类难以推测，但河姆渡、田螺山中出土的大量橡子壳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橡子曾经被较大规模地利用过。

（五）运输与储存

在跨湖桥、田螺山等遗址中有芦苇编织物出土，有些存放橡子的灰坑底部也有芦苇编织物，除了支垫的作用外，也可以将采集到的大量食物资源置于其上，方便运输。另外，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也与野生资源的开采和运输有关。

在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一般橡子直接埋在泥土中加以储存，跨湖桥的有些橡子储存坑还有加之以木板固定。跨湖桥报告中认为橡子的储存能力不如禾本科植物，因而古人逐渐将粮食储存的注意力集中到稻谷上，但从民族学材料来看，橡子的储存能力非常强。这样长时间的储存能力不仅可以作为古人在正常年岁中的主食，也可作为应对饥荒时期的灾粮。考虑到当时适合人们采集食物的季节仅限于夏秋两季，橡子的这种高储存能力就显得十分可贵，因此橡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的生计中应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讨　　论

（一）橡子与人类生计

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虽然都有稻谷出土，但当时的稻作农业还处在刚刚起

步的阶段，远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生计需求，故而野生资源的利用十分重要[72]，而橡子凭借出色的产量、营养价值和良好的储存能力在野生植物资源的利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借助民族史志的相关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分析，可以推断新石器时代浙江地区橡子的主要利用模式为食物，橡子既可以作为日常生计的主食，也是防备饥荒的灾粮，当然不能排除其加工成饲料的可能性。随着农业的发展，稻谷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加，橡子的使用被农业取代。取代的原因是很值得思考的，尽管橡子有毒性，加工流程较烦琐，劳动投入大，但考虑到稻作需要开垦土地、照顾庄稼，劳动投入有可能高于橡子利用；再者，稻作的预期回报更不确定（比如遭遇洪涝灾害），其风险比橡子利用更高。但是橡子利用最大的不足是它很难扩大规模，树木生长周期长，人们很难等待从种植到收获的漫长周期，相比而言，水稻属于一年生植物，便于扩大规模。如果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话，稻作是比橡子利用更好的选择。因此，在后来的良渚等文化中，橡子的发现就逐渐减少，以野生资源为主的采食模式逐步被农业取代。

（二）橡子与人类社会

橡子的利用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人类生计的信息，也能反映出一些人类社会的信息。Jackson 分析了橡子加工利用的各个流程，认为女性在此活动中的作用巨大，对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计贡献很大。从社会交往来看，加工橡子虽然很耗时间，但是提供了人际互动的机会。橡子的研磨一般由女性执行，而女性又通常是照顾孩子的那一方，因此通过共同研磨橡子可以增进亲子间的交往。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看，加工橡子需要较多的时间，因此加工一天橡子就意味着少出去采集一天，再加上橡子的产量大，保存时间长，加工一到两个月可以预存一年的食物，妇女花在采集上的时间就减少了，这样一来，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就大大降低了[73]。McCorriston 认为大规模利用橡子的行为往往出现在人口规模大而领域资源有限的群体中，通过强化利用橡子来维持生计[74]。人口的增长使得原有的资源结构难以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因而开始强化橡子利用。刘莉在《中国考古学》一书中也结合了中国的考古材料，探讨了橡子利用与储藏和定居行为的密切关系，认为橡子类适合储藏的食物是促成定居及食物精细加工的重要原因[75]。橡子利用可能是人口规模扩大与资源边界明晰化的产物，同时，橡子利用有利于人群的流动性降低，甚至定居，而这又反过来有利于人口进一步增加与资源边界的固定化。在这个方面，橡子利用发挥了与稻作类似的作用。

（三）橡子与考古发掘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民族史志记载和我国相关历史文献推测出关于橡子利用的信息，但如果缺乏坚实的本地区考古材料，这些推测都很难进一步被证实。橡子在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古人的生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相关的考古报告大

多只以“出土大量橡子”六字一笔带过，遗失了许多重要的数据信息。为了进一步对橡子利用进行更加细致的定量研究，今后的考古工作需要注意以下内容：①对出土橡子的数量、种属、营养成分等信息作更细致的提取和分析；②除了发掘工作外，尽可能做好相关的系统调查，关注遗址外的橡子加工信息；③通过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孢粉分析，尽可能地获取古生态环境和食物加工利用的信息。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才能对橡子加工的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方能把握稻作农业兴起的初期人类的生计模式和社会图景。

七、结　　语

本文通过对民族史志中橡子利用资料的梳理，结合考古遗存基本确定了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橡子的基本利用模式是用作食物或饲料，复原了橡子加工的操作链，揭示了橡子利用在农业产生早期人类生计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橡子的加工利用还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有关，甚至促成人群定居。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除了可以关注人类对橡子的利用，也可以关注橡子对人生活的影响，关注人与橡子、橡子与其他资源的相互纠缠关系[76]。例如，橡子的加工如何影响人们的时间分配从而影响其他活动的时间、对橡子的强化利用如何影响其他野生资源的分布乃至附近地貌生态环境的改变等，这些研究的开展也对更细化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提出了要求。

注　　释

［1］ 有一些研究如：a. Liu L, Field J, Fullagar R, et al.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grinding stones from an early Holocene site at Donghulin, North China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0, 37 (10): 2630-2639.

b. 杨晓燕，郁金城，吕厚远等．北京平谷上宅遗址磨盘磨棒功能分析： 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J］．中国科学，2009（39）：1266 ~ 1273.

c. 王强．海带地区史前时期磨盘、磨棒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 Lev E, Kislev M E, Bar-Yoserf O. Mousterian vegetal food in Kebara Cave, Mt. Carmel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5, (32): 475-484.

［3］ a. Chang K-C. *The affluent forage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Extrapolation from evidence on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M]. in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Suita,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81: 177-186.

b. 俞为洁，徐耀良．河姆渡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J］．东南文化，2000（7）：25 ~ 32.

c. 秦岭，傅稻镰，Harvey R，McCarthy H. 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A］．东方考古（第3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07 ~ 350.

d. Fuller D, Harvey E, Qin L. Presumed domestication? 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5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Yangtzeregion [J]. *Antiquity*, 2007 (81): 316-331.

e. 秦岭，傅稻镰，张海．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J］．第四纪研究，2010，(2)：245 ~ 261.

［ 4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上山［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 5 ］ a.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N］．中国文物报，2005-9-30（1）.

b. Liu L, Field J, Weisskopf A, et al. The exploitation of acorn and rice in early Holocene Lower Yangzi River, China [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10, 29 (3): 316-377.

［ 6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 7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8 ］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2004 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7，(11)：4 ~ 24.

b. 傅稻镰，秦岭，赵志军等．田螺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分析——野生植物资源采集与水稻栽培、驯化的形态学观察［A］．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7 ~ 96.

［ 9 ］ 同［6］.

［10］ 同［5］b.

［11］ Zohary D, Hopf M.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3.

［12］ Willis, J. C. *A dictionary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922.

［13］ 周浙昆．中国栎属的地理分布［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10（1）：95 ~ 108.

［14］ 分别为巴东栎、乌冈栎、尖叶栎、栓皮栎、麻栎、小叶栎、槲栎、锐齿槲栎、短柄枹、白栎、槲树、黄山栎。参见王景祥．浙江植物志 · 第二卷［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55 ~ 62.

［15］ 上山遗址的相关研究参见：a. 徐怡婷，林舟，蒋乐平．上山文化遗址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J］．南方文物，2016，(3)：131 ~ 138.

b. 毛龙江，莫多闻，蒋乐平等．浙江上山遗址剖面记录中更新世以来的环境演变［J］．地理学报，2008，(3)：293 ~ 300.

c.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编．浦江上山［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261，262.

小黄山遗址的相关研究参见：胡飞，杨玉璋，张居中等．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古环境分析［J］．南方文物，2016，(4)：209 ~ 214.

跨湖桥遗址的相关研究参见：同［6］：229，240，271，272.

河姆渡遗址的相关研究参见：a. 江大勇，王新平，郝维城．浙江全新世古气候古环境变化与河姆渡古人类［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35（2）：248～253.

b. 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史前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J］．华夏考古，2002，（1）：28～32.

c. 魏女．环境与河姆渡文化［J］．考古与文物，2002，（3）：57～60.

d.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358～361.

田螺山遗址的相关研究参见：a. 王淑云，莫多闻，孙国平等．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古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分析——植硅体、硅藻等化石证据［J］．第四纪研究，2010，30（2）：326～334.

b. 郑丽波，郝秀冬，禚彬等．全新世以来浙江余姚河姆渡－田螺山遗址的古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J］．古地理学报，2016，18（5）：879～894.

［16］ 同［6］：271.

［17］ 黄渭金．试论河姆渡史前先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J］．华夏考古，2002（1）：29.

［18］ Ren G Y, Beug H. Mapping Holocene pollen data and vegetation of China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 2002 (21): 1395-1422.

［19］ Kiple K F, Ornelas K C.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14.

［20］ Kislev M E, Bar-Yosef O. The legumes: The earliest domesticated plants in the Near East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8 (29/1): 175-179.

［21］ Bainbridge D. A.Use of acorns for food in California: Past, present, future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Multiple-Use Management of California's Hardwoods* (2) [C]. California: San Luis Obispo, 1985.

［22］ Winterhalder B. Optimal foraging strategies and hunter-gatherer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models [A]. *Hunter-gatherer foraging strategies: Ethnographic and archaeological analyse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13-35.

［23］ Barlow K R, Heck M. More on acorn eating during the Natufian: expected patterning in diet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subsistence [A]. *Hunter-gatherer Archaeobotany. Perspectives from the northern temperate zone* [C].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2: 128-145.

［24］ Goldschmidt W. Subsistence activities among the Hupa [J]. *Indian land use and occupancy in California*, 1974 (1): 52-54.

［25］ Gayton A H. *Yokuts and western Mono ethnography* (Vol. 10, No. 1-2) [M].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mpany. 1948: 178.

［26］ Mason S L. *Acorns in human subsistence* [D]. London :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2.

［27］ Thompson R C. Western North America: vegetation dynamic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modes of response to climate fluctuations [A]. *Handbook of Vegetation Science* 7 [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418-458.

[28] Barrett S A, Gifford E W. *Miwok material culture* [M]. El Porter: Yosemite Natu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33: 127-177.

[29] Castetter E F, Bell W H. *Yuman Indian agriculture: primitive subsistence on the lower Colorado and Gila Rivers* [M].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51.

[30] 同［19］：1714, 1715.

[31] Mason S. Acornutopia? Determining the role of acorns in past human subsistence [A]. *Dobson. Food in Antiquity* [C].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 1996: 15.

[32] Renfrew J M. *Palaeoethnobotany* [M].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73: 155.

[33] Harrison R J. Arboriculture in Southwest Europe: Dehesas as managed woodland [A].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C]. London: UCL Press, 1996: 363-367.

[34] 同［26］.

[35] Gunther E. Ethnobotany of Western Washington: *The knowledge and use of indigenous plants by Native Americans* (Vol. 10, No. 1) [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36] 同［31］：23.

[37] Gifford E W. The Southeastern Yavapai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29)*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2: 177-252.

[38] Bettinger R L, Malhi R, McCarthy H. Central place models of acorn and mussel processing [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 (10): 887-899.

[39] Gould R A. Ecology and adaptive response among the Tolowa Indians of Northwestern California [J]. *The Journal of California Anthropology*, 1975, 2 (2), 148-170.

[40] Basgall M E. Resource intensification among hunter-gatherers: acorn economies in prehistoric California [J].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1987, 9 (198), 21-52.

[41] Spier H J. Foothill Yokuts [A]. R.F. Heizer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 Vol. 8 [C]. California ,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ititution, 1978: 471-484.

[42] 同［28］.

[43] Hudson T, T C Blackburn. *The Material Cultural of the Chumash Interaction Sphere. Vol.2. Food Preparation and Shelter* [M]. Los Altos/ Santa Barbara: Ballena Press/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oorperative Publication, 1983: 721, 722.

[44] McLendon S. Ethnographic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astern Pomo and their neighbours the Southeastern Pomo [A]. *Contribu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acilit*y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37): 1-64.

[45] 同［21］：1-9.

[46] 同［31］：21，22.

[47] 桥口尚武．七叶树果实的食用习俗与石锤及石砧［J］．刘恒武译．南方文物，2010（2）：125.

[48] McCorriston J. Acorn eating and agriculture origins: California ethnographies as analogies for the

ancient Near East [J]. *Antiquity*, 1994 (68): 102.
［49］ 同［38］.
［50］ 李海清，罗金莲，李畅．一种橡子黄芪面的配料及制备方法［P］．中国专利，201110291242.7. 2012-02-15.
［51］ Bean L J. Mukat’s people: *The Cahuilla Indian Burning in California* [M].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52］ Driver H E. The acorn in North American Indian diet [J].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Science*, 1952 (62): 56-62.
［53］ a. 同［28］.
b. Goldschhmidt W. Nomlaki ethnography [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 1951, 42 (4): 303-443.
［54］ Kniffen F B. Pomo Geography [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939, 36 (6): 353-400.
［55］ 同［53］b.
［56］ Opler M E. *An Apache life-way: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of the Chiricahua India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1.
［57］ 同［51］.
［58］ De Ceunynck R. A find of charred acorns in Euergem-Ralingen near Ghent (Belgium Iron Age) [A]. *New Light on Early Farming* [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1: 289.
［59］ Fuller D Q, Qin L.Water management and labour in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Asian rice [J]. *World Archaeology*, 2009, 41 (1): 88-111.
［60］ Anderson K. *Tending the wild: Nativ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alifornia’s natural resourc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88.
［61］ a. 宋兆麟．史前食物的加工技术——论磨具与杵臼的起源［J］．农业考古，1997（3）：187～195.
b. 周昕．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磨棒［J］．古今农业，2000（3）：1～8.
c. 陈文华．农业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62］ 吴加安．石器时代的石磨盘［J］．史前研究，1986（1-2）：46～54.
［63］ 赵世纲．石磨盘、石磨棒是谷物加工工具吗？［J］．农业考古，2005（3）：134～147.
［64］ 石金鸣，宋艳花．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J］．考古，2010（10）：16，17.
［65］ 刘莉．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坚果采集、定居及农业起源［A］．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105～127.
［66］ 同［5］b.
［67］ 杨晓燕，郁金城，吕厚远．北京平谷上宅遗址磨盘磨棒功能分析：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J］．中国科学，2009，39（9）：1266～1273.
［68］ 张永辉，翁屹，姚凌．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表面淀粉粒的鉴定与分析［J］．第四纪研究，

2011，31（5）：891 ~ 899.

［69］ 刘莉，陈星灿，石金鸣．山西武乡县牛鼻子湾石磨盘、磨棒的微痕与残留物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4（3）：109 ~ 118.

［70］ 傅稻镰，秦岭，赵志军．田螺山遗址的植物考古分析——野生植物资源采集与水稻栽培、驯化的形态学观察［A］．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7 ~ 96.

［71］ 同［6］.

［72］ 同［3］c：307 ~ 350.

［73］ Jackson T L. Pounding acorn: Women's production as social and economic focus [A]. *Engendering Archaeology* [C].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301-325

［74］ 同［48］：97-107.

［75］ Liu L, Chen X.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1, 72.

［76］ Hodder I. *Entangl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ings* [M]. Maden and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2012.

The Utilization of Acorns in Neolithic Zhejiang: A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Records

Chen Guopeng　Chen Shengqian

Abstract: Ethnological research has shown the significance of acorns in hunter-gatherers' subsistence. Acorn is also a vital nutritional supplement in early agricultural societies and thus can provide the researchers with fresh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agricultur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acorns were discovered in Zhejiang in the Neolithic period, yet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o far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origin of rice farming, with scarce scrutiny of acorn exploitation. This article will synthesize current study of prehistoric ecology,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acorns and the output-to-input ratio of acorn processing to probe into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large scale use of acorns in Neolithic Zhejiang. Furthermore, we will explore the potential mode and chaîne opératoire of acorns intensification and the role acorns played in prehistoric subsistence in such time and area with the guidance of a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cord，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Keywords: Acorn exploitation; Ethnography; Shangshan site; Kuahuaqiao site; Tianluoshan site

贺兰山“狩猎岩画”再读*

刘学堂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00）

内容摘要：贺兰山岩画中最常见的是持弓箭人物和动物的组合画面，多用狩猎巫术进行解释。本文通过对岩画中人物与动物的关系、弓箭和人物的刻绘风格的考察，认为这些画面的弓箭并非用于狩猎的武器，而具有象征寓意，是“生殖弓箭”；持弓箭的人物，也不是狩猎者，而具有象征寓意，是“生殖人物”。由“生殖弓箭”和“生殖人物”构成的画面别有寓意。传统上将此类岩画释读为“狩猎岩画”，并由此构成北方动物岩画学解释的基础，实际上是望“图”生义的误读，这些所谓的狩猎岩画，绝大多数是丰产巫术岩画。

关键词：狩猎岩画；猎人与动物；生殖弓箭；生殖人物；丰产巫术

贺兰山山脉南北绵延200多千米，历史上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频繁活动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贺兰山发现了万余幅岩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1993年出版的《贺兰山岩画》(以下简称《岩画》)一书，记录了数以千幅[2]的画面，由《岩画》一书看，贺兰山岩画中最常见的纹样题材是弓箭、持弓箭的人物、动物，以及由它们组合成的画面,《岩画》认为这些画面都表现了狩猎内容，狩猎形式多样，有的采用挖陷阱或设羁绊的方式，有的则是群猎、双人猎、独猎，猎取以野山羊为主的各种野兽，并认为“从大量的狩猎岩画看，远古时期的人们是以狩猎业作为主要的生产部门”[3]。

包括贺兰山岩画在内，整个欧亚北方山地区草原岩画研究领域，岩画狩猎说十分盛行，奠定了中国北方动物岩画释读的基础，为学界广泛接受。持弓箭者与动物组合画面的岩画狩猎说，自这类风格的岩画发现伊始就被主观认定，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质疑。本文通过对贺兰山岩画中的“狩猎岩画”分类考察，辨析“狩猎岩画”中“猎人”的真面目，探讨岩画中“弓箭”的象征意义，从象征人类学和情景考古学[4]的视角，重新审视这类岩画，举出《岩画》中的实例，认为学界众口一词的那些“狩猎岩画”，大多是望“画”生义的误读；这类岩画绝大多数并不反映狩猎巫术内容，而是一种丰产巫术岩画。丰产巫术岩画的流行与这一地区游牧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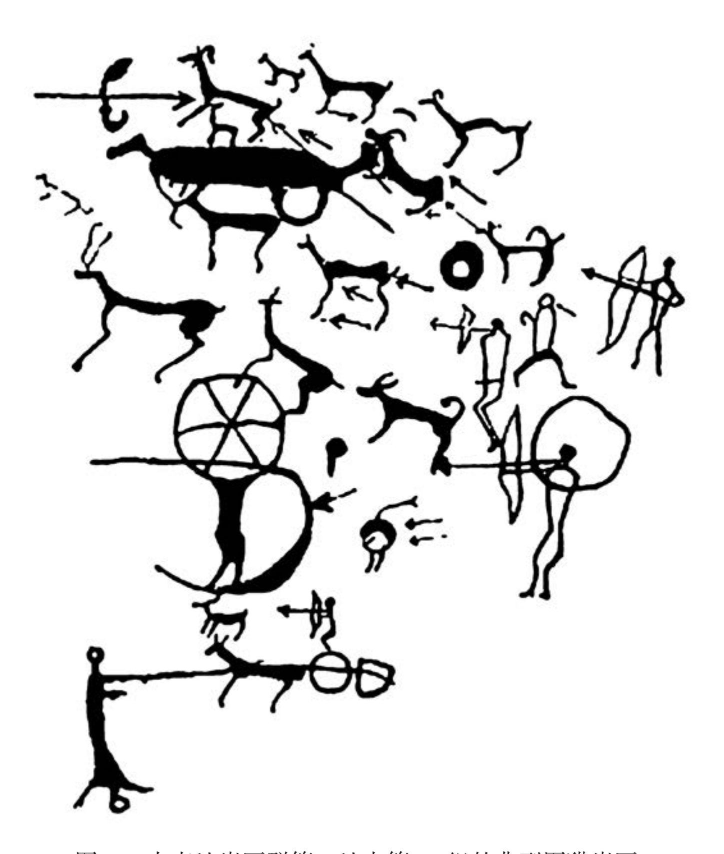
---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楼兰地区史前遗存的多学科研究》成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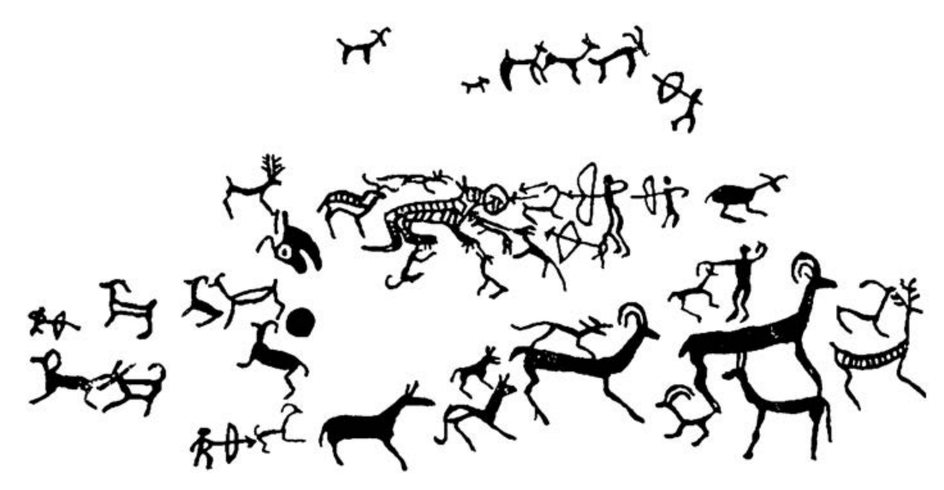
一、“狩猎岩画”的不同情景

贺兰山大麦地岩画群中有一幅“围猎”岩画。这幅岩画画面的上方是一群岩羊和北山羊，右侧是几个猎人，猎人挽弓搭箭，箭矢四射，被围的野羊惊恐四散，有的野羊已被围猎者的箭矢射中，整幅画面感强，狩猎的场景紧张激烈[5]（图一）。中卫市沙坡头区苦井沟的一幅“围猎”岩画，内容更丰富，动物种类较多，有羊、鹿、狗、猛兽等，整个画面由几组射猎场面组成。画面上方并排站着数只岩羊，猎人立于前方，举弓欲射。左侧上方猎人侧身举弓，迎面是几只北山羊；下方像是一条狼紧追一只奔命的盘羊。画面中央是一头猛兽，身体上有花斑刻线装饰，张口露齿，十分凶猛，前方三个猎人仰面挽弓射击猛兽，几支箭镞已射中猛兽的头部，四周几条猎狗也张口围扑猛兽。画面周围，特别是下方有奔跑的梅花鹿、北山羊、盘羊和马等（图二）。这幅岩画表现了数位猎人正在围攻猛兽的情景，画面感强，场景紧张激烈。这幅岩画一方面表现围猎，另一方面是猎人在保护牧群，以免受猛兽的袭击。

这是两幅较为典型的狩猎岩画。不过，像这两幅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激烈围、狩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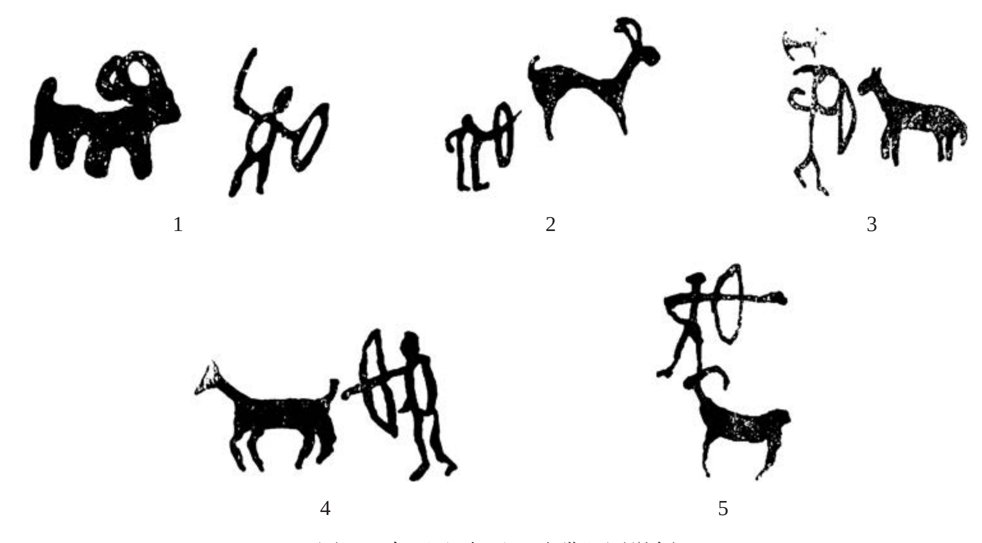
图一　大麦地岩画群第一地点第 19 组的典型围猎岩画



图二　苦井沟岩画第 10 组典型狩猎岩画

面的岩画，在《岩画》中很少发现。《岩画》公布持弓箭人和动物岩画，绝大多数画面情景相对安静，与前述的典型狩猎岩画形成明显对比。这类岩画表现的内容、画面结构、持弓箭人的动作、人和动物的神态变化并不大，从持弓箭人与动物等组合情况，大体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画面中有一个持弓箭人物、一只动物，这类岩画多被称为“独猎”（图三）。岩画中的人物多采用平面凹磨法绘刻而成[6]，刻绘得较为具象；有的用线描法[7]，刻出剪影式人物，人物和动物表现得较为抽象，部分人物简化为符号状。大多数人物，一手持弓，另一臂弯曲呈半圆形，是拉弓形态的象征表现。甚至那些刻成符号状的人物，其右臂也多弯曲呈半圆。贺兰山岩画中的“猎人”，与持弓箭相对的一侧的上肢，大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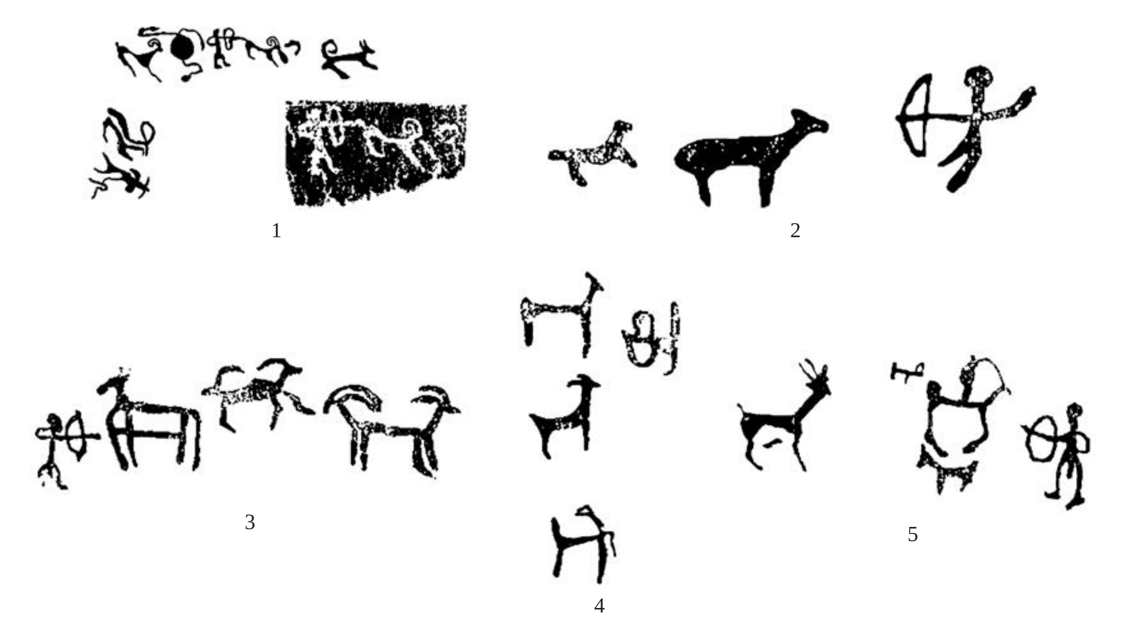


图三　贺兰山岩画“独猎”图举例

1.《岩画》37 页，图 176　2.《岩画》59 页，图 291　3.《岩画》61 页，图 308　4.《岩画》209 页，图 1042　5.《岩画》233 页，图 1182

数蜷成半圆，并成为程式化表现方式。另外，岩画中的“猎人”多夸张男根。

第二类，画面中一个持弓箭人和两只或多只动物，一般被命名为“猎群羊”（图四）。这类岩画中的动物和人物亦多用平面凹磨法刻绘，少数用线描法表现。动物多静态，或前后相随或仰面静立，形态各异。少数形态比较丰满、逼真，具有动感。人物少数刻绘出四肢，大多只绘出轮廓，也有一些刻化十分简约，或仅表现人体，或呈符号状。岩画中的“猎人”多夸张男根，头部的表现呈圆形或球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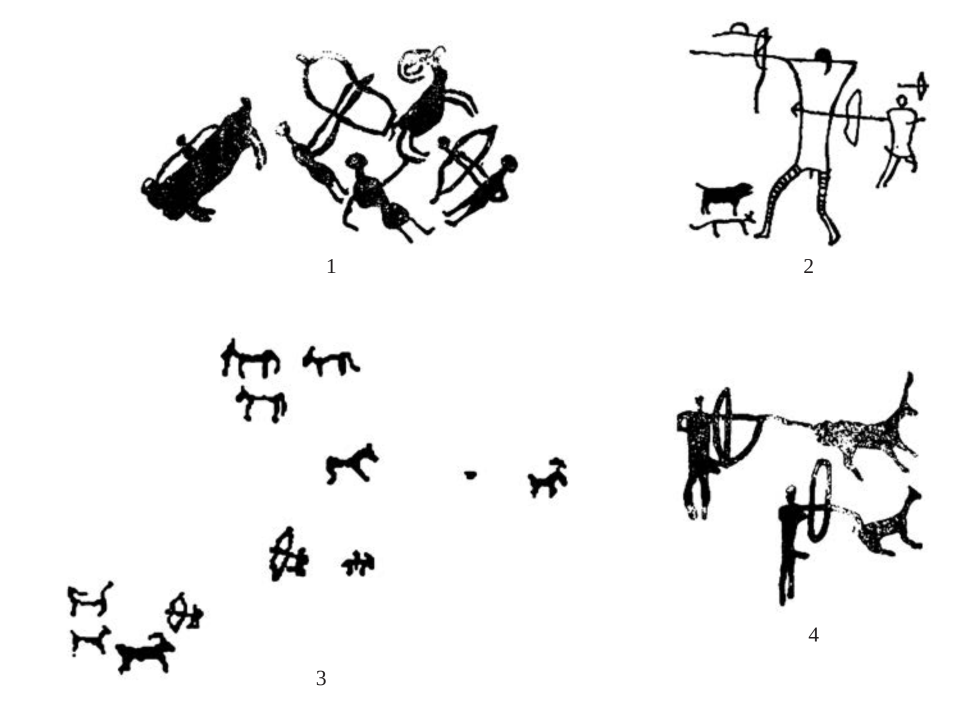
图四　贺兰山岩画“猎群羊”图举例

1.《岩画》201 页，图 1017　2.《岩画》17 页，图 46　3.《岩画》261 页，图 1382

4.《岩画》291 页，图 1560　5.《岩画》293 页，图 1578

第三类，画面中有两个或多个持弓箭人物，一只或多只动物，或者一群动物，场面较大。亦大多用平面凹磨法表现，个别用线描法。这类岩画多被称为“群猎”（图五），岩画中的弓箭大多夸张，有的都超过人物，有的比画面的人物还大数倍。有的持弓箭者静立在羊后，露出夸张的男根，所持弓箭箭杆弯曲，与动物的尾部相接。有的人头和箭矢表现风格接近，绘呈圆球形。

贺兰山白头沟第 1 组岩画的所谓“群猎”图十分典型，引人注目（图六）。《岩画》中说，这一“画面的左侧是一群马，皆双钩刻线构图。中间上方是一只奔跑的羚羊，中间猎人举弓射杀前方的马，弓体打破一只羊的图像；下方是一个骑者，其前方有一匹马，身体上有涡纹装饰。右上角猎人一手抚头，一手挽弓搭箭；束腰，臀部肥大，夸张地凿刻出男性生殖器官，并用两个较大的凿点表示睾丸，需凭手感辨别。弓前是两匹马，上方马双钩刻线构图，下方马通凿”。白头沟第 1 组岩画中的动物和人物都很安静，右侧的一组，从人和动物表现出来的关系看，属于独立的一幅画面。画面左侧站立的男



1　2　3　4

图五　贺兰山岩画“群猎”图举例

1.《岩画》156 页，图 755　2.《岩画》56 页，图 270　3.《岩画》129 页，图 626　4.《岩画》293，图 1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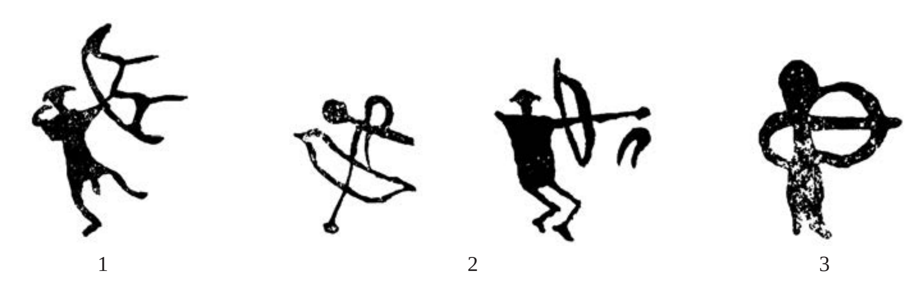
1　2

图六　贺兰山白头沟第 1 组岩画

1. 以岩面为单位的岩画　2. 一幅岩画

性，雄武有力，举弓持箭面对一雌马。人和马均用平面凹磨的技法表现，磨刻技法娴熟，堪称贺兰山动物岩画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雌马肚下有一正在吃奶的小马驹，“猎人”和雌马间，有一家犬，悠闲地站着。岩画磨刻风格洗练简约，寥寥几笔，便把岩画动物、人物表现得绘声绘色。《岩画》认为该岩画表现了狩猎内容，名“射猎”图[8]。

第四类岩画，只有持弓箭的人物，画面中没有动物。一般被称为“猎人”图（图七）。这类岩画中的弓箭硕大，弓矢端圆粗或鼓为圆头；人的绘法更为写意、抽象。多用平面凹磨的方法，表现人体的轮廓，特别是头部，绘成圆首状或蘑菇状，相当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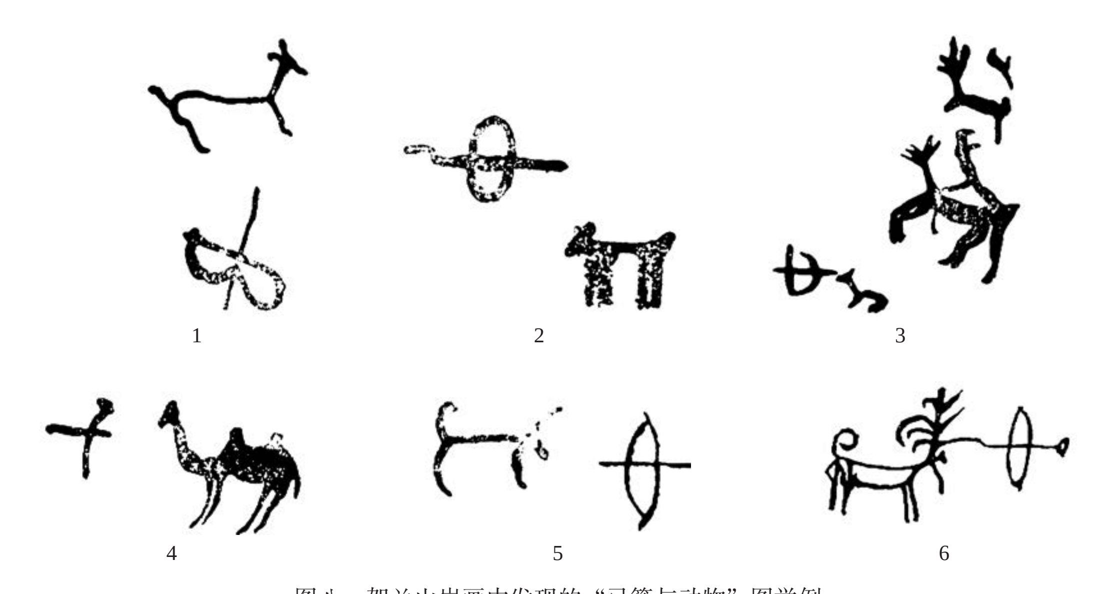


图七　贺兰山岩画中“猎人”图举例

1.《岩画》第 153 页，图 744　2.《岩画》224 页，图 1130　3.《岩画》233 页，图 1193

分“猎人”夸张男根。

第五类岩画，画面只有弓箭和动物，缺持弓者，称为“弓箭与动物”（图八），多用线描法，少数用平面凹磨法表现画面。画面中的动物多静立，弓箭和动物的关系或仰面相对，有的箭的头部弯曲与动物的头相接，或将弓箭与动物分开。弓箭的表现方式不一，有的简略地刻绘成符号状。个别画面中表现动物交配的情景。



图八　贺兰山岩画中发现的“弓箭与动物”图举例

1.《岩画》291 页，图 1558　2.《岩画》126 页，图 603　3.《岩画》260 页，图 1370

4.《岩画》289 页，图 1551　5.《岩画》310 页，图 1671　6.《岩画》320 页，图 1731

以上，我们以“幅”为单位，考察了贺兰山岩画持弓箭人物、动物组成画面，以及由弓箭和动物组成画面的各种不同情况。这些狩猎岩画表现出基本一致的风格：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绝大多数都处于相对的静态，画面上看不出持弓箭人物是一位正在捕猎的猎手，“被围猎”者悠然、安闲地静立于画面中，一点也看不出来是正在被追捕的猎物所应有惊恐奔逃的样子；持弓箭者与动物之间，画面构图、人和动物的神态上，一点看

不出来他（它）们是猎者与被猎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相反，整个画面更多地显现出来的是人与动物间的亲近与和谐。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所谓狩猎岩画，被“猎”的动物大多数都面向“猎人”，迎着弓箭静立或走来，这种和谐的氛围所要表达的是动物和人物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难以将其与紧张的狩猎活动联系起来。

二、神秘的弓箭

贺兰山岩画中“猎人”手中所持的弓箭、画面中单独与动物共处搭配的弓箭，弓体绘成扁椭圆形，有的绘成半圆形，个别简化得只有弯曲的弓体，没有弓弦。弓箭箭矢的表现方式也引人注目，多数弓箭的箭矢似乎是整个弓箭所要表现的中心，这些箭矢刻绘得并不尖锐，大多呈圆头，少数或表现为蘑菇状。将其与前述两幅典型狩猎岩画比较，不仅画面情景有完全不同的感觉，画面中弓箭的表现方式也判然有别。典型狩猎岩画中的箭矢锋利，矢端呈锐三角状，有的箭矢已离弓飞射向动物，被围猎的动物陷入重围，猎犬在外围绕着围猎的人群，仰头狂吠，表现得神形兼备。后者大量“狩猎”画面中的所谓箭矢，矢端头呈圆球或蘑菇状平凸，杆部粗壮，其形态与岩画中常见的被夸张了的男根形态十分接近，可以认为，这些箭所要表现的并非狩猎的武器，在这里箭与男根合为一体。箭不是射杀动物的箭，而有其他象征意义，箭矢模仿男根，弓箭被赋予生殖神力。我们称这类弓箭为“生殖弓箭”，与典型狩猎岩画中作为武器的弓箭区别开来。

贺兰山岩画中有不少这样的图案，一是画面中立一只或数只静立的羊，羊后面紧跟着一位持弓箭的人，画面中人物大多绘得很小，只是用线条简约勾画出持弓人的外轮廓以及动作特征，而人物手中所持的弓箭巨大；二是人持弓箭，正面仰面站立一只或数只静立的羊；三是有的箭矢弯曲，弯曲的线条与羊的臀部连接起来。这些画面中的弓箭都是“生殖弓箭”，具有传递着生殖神力的能力。这里的弓箭把人、动物联系起来，箭在这里延长了人的生殖神力，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殖力的传递和互渗[9]。





图九　宁夏平罗大西峰沟第三地点第1组岩画
（图引自许成、卫忠编著:《贺兰山岩画》55页，图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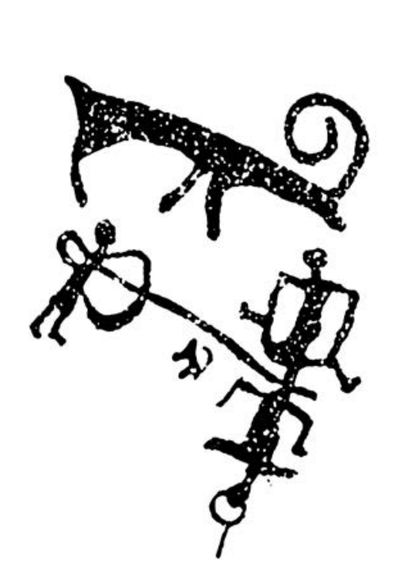
“生殖弓箭”除以其象征性普遍出现在所谓的狩猎岩画中之外，在一些特殊岩画中，还将弓箭与生殖画面直接联系起来。这对揭开“狩猎岩画”中弓箭神秘面纱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贺兰山平罗大西峰沟第三地点第1组岩画，画的是三组男女交欢图（图九）。画面上方的交欢图，用线描法表现，女性平卧，四肢平伸，男性下肢弓屈站立；下面两组交欢图用平面凹磨法表现，左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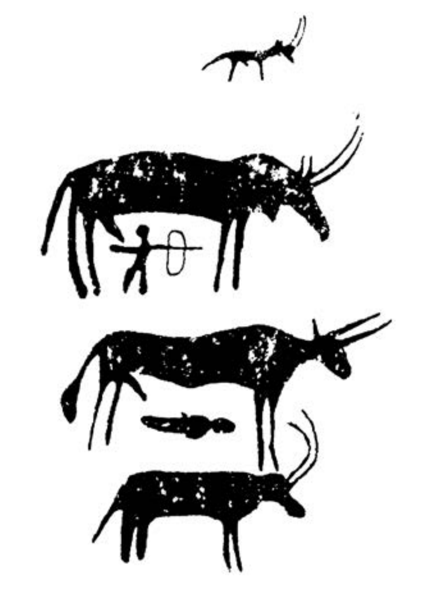
男女交欢图，女性平卧，四肢平伸下屈，男性下腿弓屈站立，形态与上方交欢图一样。右侧是两组男女同体，站立交媾图，其中一组同体像的头部呈三角状。另一组人像的头部呈弓箭形，伸长的箭矢正指向左侧的正在交欢的男性[10]。

新疆阿尔泰山哈巴河县唐巴勒塔斯发现了一幅生殖岩画。画面主体是男女交欢图，男女均采取平卧屈肢的形式，左侧有一持巨弓者，持弓人左手屈成半圆，右手持巨弓，弓箭很长，直指并“刺中”处于交欢状态的男根，持弓人和交合状态中的男性头部呈圆球状。画面上下有一大一小的两只山羊，均用平面凹磨法表现[11]（图一〇）。

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岩画中，有一幅画面，十分独特（图一一）。画面中的三只牛上下排列，上两只雄牛伸出生殖器。最上边的牛腹下站立一持弓箭者，中间的牛腹下则仰躺一女性，牛的生殖器指向女性，这寓示牛与人之间的交媾。牛在这里被认为具有图腾的意味，图腾牛和氏族成员之间通过交媾，可以达到氏族共同的繁盛的目的[12]。下边静立的可能是雌牛。从岩画情景判断，最上边牛腹下站立的持弓人，绝非在狩猎，而是在祈求生殖。



图一〇　新疆阿尔泰山哈巴河县唐巴勒塔斯生殖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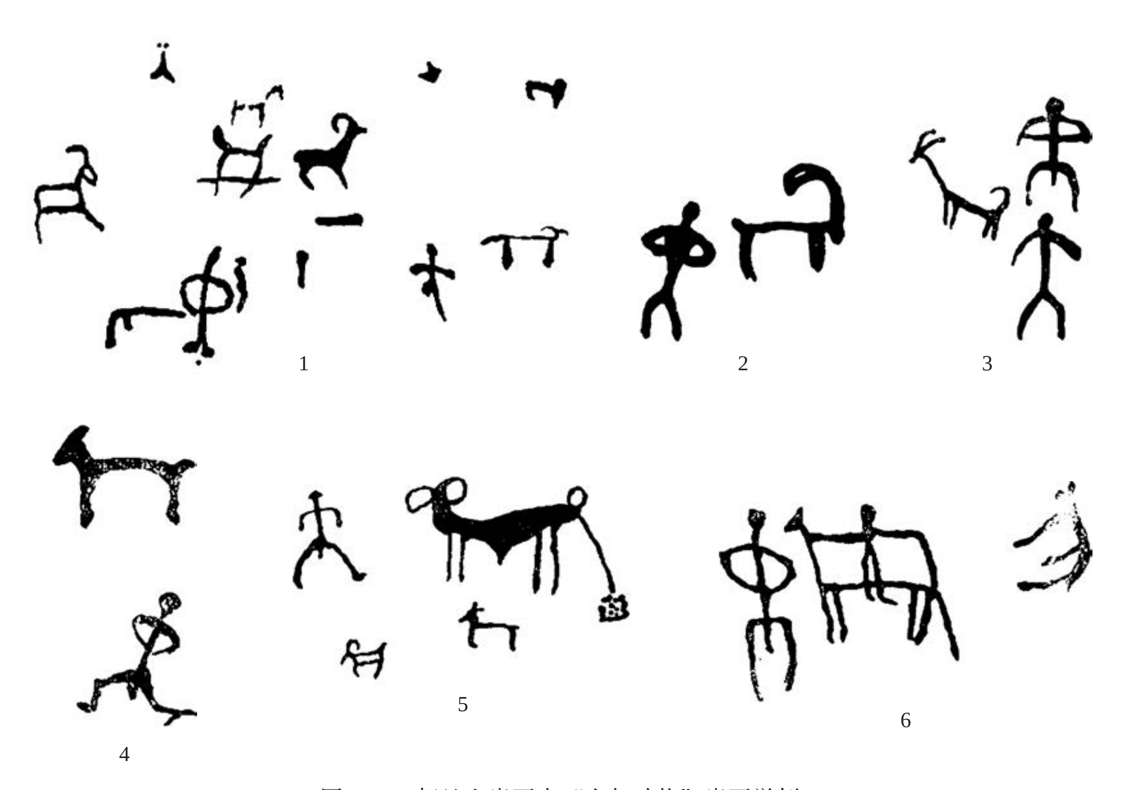
图一一　新疆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岩画

目前的考古材料看，弓之箭作为男性生殖力的象征，最早出现在史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安德列·勒鲁伊·古昂对此做过很深入的研究[13]。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是一处著名的青铜时代遗存，墓地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是完好保存的生殖崇拜文化遗物。这一墓地的有些男性墓葬，随葬了成束的木箭，这些木箭都是不实用的武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随葬品，箭杆上雕刻出密集几何纹样，有的女性墓葬还随葬了很小的弓[14]，都是具有生殖神力的象征物，都不是狩猎用具，而是“生殖弓箭”。历史时期，中外许多民族

中存在对弓箭生殖神力的崇拜现象，这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15]。民族志材料中，关于弓箭象征生殖记载更多，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信仰，他们认为弓箭与生殖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16]。对“弓箭”所具生殖神力的信仰，是人类历史文化中非常独特和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普遍而统一，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三、“猎人”的真面目

贺兰山“狩猎岩画”中人物的形象、表现方式，也值得注意。无论是手中持有弓箭的“猎人”，还是其他画面中的人物，多具有共同的特征。人物的头部、上躯、上肢部分的刻绘和弓箭的表现一样，下肢叉开，特别是头和上躯，和岩画中男根的表现方式几乎一致。贺兰山还有这样一类画面，画面中只有人物和动物，省略了弓箭，这种岩画多称为“人与动物”（图一二）。这类岩画中的人物表现风格很具代表性，岩画中大多的画面，只表现一个人，个别情况下表现两个人，动物有一只或数只，画面的动物多绘得简单、抽象，多突出人物，人物的绘法十分独特。人的头部也基本呈圆球状，上身呈弓形，下肢叉开，或暴露生殖器。有的人物绘得十分简约，呈符号状。少数画面中有数个人，



图一二　贺兰山岩画中“人与动物”岩画举例

1.《岩画》126页，图598　2.《岩画》127页，图613　3.《岩画》256页，图1336　4.《岩画》315页，图1697　5.《岩画》325页，图1754　6.《岩画》338页，图1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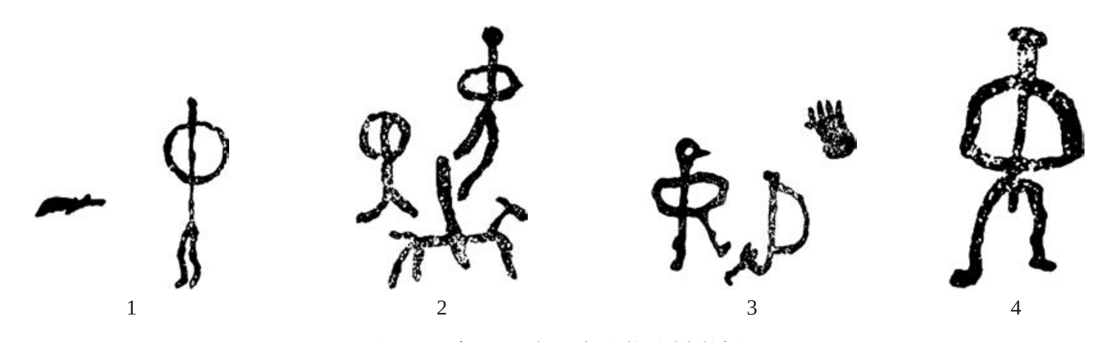
一群动物，场面较大，这种岩画常被称为“群舞图”。贺兰山苦井沟岩画中有一幅“群舞图”，画面中多位人物，动物绘得简单，是典型的剪影式表现手法。人物双臂平伸，又曲肘下屈，双腿呈弓步，腿间露出生殖器，呈舞蹈状，众人夹在一群动物之间，正在跳一种生殖舞蹈（图一三）。



图一三　贺兰山苦井沟岩画 23 地点 5 组“群舞图”

岩画中绘的弓箭，其意并不在于狩猎，已如上述。画面中人物多绘得简单抽象，不少简化为符号状，突出的特点是将人物的上身和弓箭的表现方式一样，人头绘成圆首或蘑菇状，个别绘成鸟首状。这里的人物明显是将弓箭、男根、人物上身合而为一的结合体。岩画制作者在刻绘人物时，并不在意于“猎人”的勇猛有力，所表现焦点集中在人体具有的生殖神力上。我们根据这类人物的形象，将其称之为“生殖人物”，以区别其他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像。

贺兰山岩画中的“生殖人物”，巧妙地将人体、弓箭、男根互通，这里人的上躯、箭矢和男根互相借用、互为一体，是原始思维中互渗律的一种表现。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认为原始思维受互渗律的支配，在原始人思维中，并未给特定事物划出规定性的界线，“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17]。“狩猎岩画”中的弓箭，既是弓箭，又是男性生殖器；岩画中的“猎人”既是人躯，又是箭矢，同时又是男根，互为一体。实际上，在原始生殖信仰体系中，它们是本质相同的事物。岩画制作者，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通过借用、夸张、变形等手法，赋予弓箭和人物特殊的生殖灵性、特殊的生殖神力，传递生殖信息，表达生殖意境（图一四）。



图一四　贺兰山岩画中人物纹样举例

1.《岩画》278 页，图 1476　2.《岩画》305 页，图 1634　3.《岩画》330 页，图 1778
4.《岩画》170 页，图 833

贺兰山岩画人物与弓箭，除前述少量的典型狩猎图外，绝大多数都绘成“生殖人物”、“生殖人物”和“生殖弓箭”互相对应，是包括贺兰山岩画在内中国北方“狩猎岩画”最典型的风格，是有别于其他艺术中人物和弓箭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这里，“生殖弓箭”和“生殖人物”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揭开“狩猎岩画”神秘面纱，探索“狩猎岩画”的本质，提供了依据。

四、丰产岩画

包括贺兰山岩画在内，中国北方岩画中发现的弓箭，以及包括弓箭在内组成的画面，不能简单地都理解为狩猎巫术岩画，那些动物也不能全看成是出没于山间沟壑的野生动物群。岩画中的男女交欢图，以最直接和原始的形式表现生殖崇拜，游牧民族以这种交欢图来祈求家庭和家族的兴旺，是丰产岩画的典型作品。有些画面将弓箭与男女交欢图相互联系在一起，直接说明当时人们赋予弓箭某种灵性，弓箭已成为具有可以沟通神界、并能将生育能力传递到人或动物身上的特殊神力的“巫器”。弓箭作为生殖神力象征的符号，出现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中，从史前延续到近现代民族中。

理解了“生殖弓箭”在原始巫术、宗教中的作用，就不难解释那些看起来很不像是狩猎图的持弓人和动物岩画的本质含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岩画中，持弓箭人为什么一定要绘出生殖器，弓箭为什么多呈男根状；“生殖人物”概念的提出，就更容易理解，大量的所谓的“狩猎岩画”，画面中的动物和“猎人”之间都无例外地表现出和谐，甚至有些亲密的情形。原来他们并不是在狩猎，“猎人”不是真正的狩猎者，是生殖神，他通过弓箭的神力，在向动物传递生殖神力，是通过巫术仪式，来祈求动物的丰产——是一种丰产巫术。画面中的那些动物，有的可能是野生，通过生殖力的传递，希望野生动物更多的繁殖，从动物的形态看，更多的可能是放养的家畜。由持弓箭人和动物岩画的解读方法，还可以应用到那些更多的动物和动物群岩画，这些岩画中或省略弓箭，或省略了人物，或没有动物出现。这些岩画都用狩猎巫术说来解释，不如用丰产巫术说更有说服力。前面举的贺兰山白头沟第 1 组岩画的例证，岩画右侧的独立画面，是贺兰山丰产岩画中的代表作品，画面左侧的男性生殖神，暴露出夸张的生殖器，他手持的弓箭正将生殖神力传递给右边的雌马，马与弓箭间十字圆轮，也值得注意，它无疑是象征太阳，通过太阳的作用，生殖力进一步得到增强，雌马肚下很可能是刚生产的马驹正在吃奶，对岩画的寓意做了形象直接的诠释。

五、结　语

欧亚北方岩画中动物岩画流行，与这一地区游牧经济形式和游牧族群出现有关。游牧经济出现之前，主要是史前时期，北方草原地带的人们，更多地依赖狩猎和采集获取

生活资料，狩猎和采集是一种缺乏保障的攫取式经济形态，在漫长的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可能出现过更多的祈求狩猎成功、获取更多的猎物为目的的祭祀活动，如欧洲一些洞穴岩画中表现出来的那样[18]，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逐渐过渡到生产经济时代，狩猎和采集成为经济生活的补充，除在特殊的环境或地理条件下，它已不是人类主要的经济形式。游牧是人类历史以来重要的生产经济类型，它最早出现在北方草原地区，游牧经济出现后，人们更多地依靠或者说通过游牧、畜牧来获得基本生活资料，对于此前的狩猎和采集经济来说，游牧生产经济的形成，是生活在草原地带古代畜牧民族的一次产业革命，人们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资源，游牧族群人们有了新的财产观念，就像定居的农业民族将土地作为基础的财产一样，游牧民族则将畜群当成其主要财产，是家族和部族兴盛的物质基础和标志。扩大畜群成为当时社会生产的基本目的，这一时期狩猎经济已经处于补充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游牧经济的背景下，人们通过岩画这种山区地带很容易发生的巫术形式，来祈求畜群的增殖是很容易理解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游牧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以祈求牧畜的丰产为目的巫术活动——刻划持弓箭人和动物岩画在北方以游牧为主的经济区普遍流行的社会原因。

注　释

[1] 1991、200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岩画委员会在亚洲召开的两次年会，都选择在银川举行，1996 年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岩画刻绘在较平整的岩面上，岩画内容受岩面大小、形态的限制。一些较大的岩面上岩画内容丰富，表现出不同的刻绘风格、内容，显然是不同时期所绘。岩画工作者在调查记录岩画时，多以岩面为单位，同一岩面的内容常被称为一幅岩画。近来一些研究者对这种记录方式的提出疑问，认为应该根据岩画的刻绘方法、表现风格、岩画内容以及保存情况等，利用考古类型学对岩画分“幅”。“幅”在这里类同陶器中的器类，是岩画分类的基本单位，也是岩画研究的基础单位。本文中的“幅”即是这样的概念。王建新，何军锋. 穷科克岩画的分类及分期研究［J］. 考古与文物，2006（5）.

[3] 许成，卫忠编著. 贺兰山岩画［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367 ~ 370.

[4] 许永杰.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情景分析［J］. 考古与文物，2011（1）.

[5] 同［3］：322.

[6] 平面凹磨法是贺兰山岩画最常用的刻绘方法，一般先勾画人和动物等的轮廓线，然后采取平面磨凿岩面，表现人物、动物等,《岩画》一书称其为“通凿”法。

[7] 线描法是贺兰山岩画常用的刻绘方法，大多先刻划出人、动物等的外轮廓，然后加以修饰，人和动物等的形象用线条表现出来。《岩画》一书一般称其为单构线或双构线。

[8] 同［3］：74.

[9]　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130，131.
[10]　同［3］：55.
[11]　苏北海．新疆岩画［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62 ~ 73.
[12]　同［11］：98
[13]　安德列·勒鲁伊·古昂．史前宗教［M］．俞灏敏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14]　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李文瑛．解读楼兰史前文明之谜——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A］．中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5]　同［9］.
[16]　a. 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b. 宋兆麟．生育神性巫术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c. 锋晖．中华弓箭［M］．北京：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17]　列维 - 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0.
[18]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8：260.

Restudying the Hunting Theme in Rock Paintings from Helan Mountain

Liu Xuetang

Abstract: The most common theme in the rock art of Helan mountain is the combination of figures armed with bows and arrows, and animal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gures and animals, bows and arrows, and the styles of engraving and painting of figures in cliff paintings, this paper points out at the fact that the bows and arrows in these pictures are not used as hunting weapons, but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The figure with bow and arrow is not a hunter, but he stands for the “reproductive figure”. Cliff paintings composed of “bow and arrow” and “reproductive figur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interpreted as “hunting figures”, an interpretation that extends to all animal cliff painting in the north.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explanation against current mis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Hunting Rock Painting; Hunters and Animals; Bow and Arrow; Reproductive figures; Fertility witchcraft

论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

韩金秋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050031）

内容摘要：赵北长城是赵国北部的长城，有别于赵国南部的赵南长城。修建于战国晚期。根据《史记》记载，赵北长城的西起高阙，东到代。但对高阙和代两个地方的具体位置，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参加了 2009 ~ 2010 年张家口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并于 2014 ~ 2015 年对新发现的尚义县早期长城做了调查。本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历史地理、考古学文化等方面的材料，提出了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在尚义县、张家口市万全区交界的鱼儿山的观点。

关键词：赵北长城；东部端点；尚义县；鱼儿山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列国之间征伐不已。出于划分疆界、防御敌国的目的，齐国率先于春秋晚期修筑了长城。到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普遍在边境上修筑长城，掀起了中国第一次修筑长城的高潮。中原各诸侯国在相互杀伐的同时也向北扩张，逐渐与匈奴等游牧部族接触，秦、赵、燕三个国家在各自的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赵国、燕国在南境和北境都修筑了长城，为与南境的长城相区分，一般将两个国家北部的长城分别称为“赵北长城”和“燕北长城”。河北省北部在战国时期分属燕国、赵国。赵北长城的东端和燕北长城的西端都在河北省境内，但对这两个具体位置所在则众说纷纭。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探究赵北长城东部端点的地望。

一、赵北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

赵北长城修筑以前，赵国北与白狄建立的代国为邻。代国领地西起晋北东至延庆，北靠蒙古高原，南临恒山。在考古学上称为玉皇庙文化[1]，兴起于春秋中期。在文化面貌上，与中原文化较为接近。贵族阶层仰慕中原礼制，墓葬中随葬有中原系统的青铜

*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赵北长城东部端点研究》（HB15LS010）的最终成果。

礼器。公元前476年，赵简子卒，赵襄子在服丧期间设计灭代。此时为春战之际。自此以后，代国或者说玉皇庙文化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地白狄人群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赵襄子灭代，是中原文化与戎狄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从此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接为邻。在此以前，中原的史书中没有匈奴或者其他游牧人群的只言片语。这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中间有戎狄人群相隔，没有文化交流。而此后，中原的史书上关于游牧人群的记载多了起来。中原人对不同族群也有了区分，胡、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不同称呼开始出现。从长远看，这个事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立、冲突、交流、融合的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持续2000年长城修筑历程直接的导火索。由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形态天然的差异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甫一接触，彼此的陌生和隔阂造成了二者的关系主要是冲突和对立。最初阶段，中原的诸侯国势力较强，在赵武灵王、燕昭王等有为君主的统领下，向北驱赶游牧人群，并在新占领土地上修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中将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的史实一并叙述，正是基于此。《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至二十七年（前299～前298年）屡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赵北长城修筑于破林胡、楼烦之后，相当于在前298年或稍晚。燕北长城的修筑时间应在燕昭王后期，即公元前280～前278年[2]。在通行的战国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期中，燕赵两国修筑长城的时间相当于为战国晚期早段。

二、关于赵北长城东部端点的各种观点

据《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置云中、雁门、代郡”。这段话的意思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打败了北方的林胡、楼烦，在新占的土地上修筑了长城。东部从代开始。“并”，《史记·集解》：“骃案音傍，白浪反”，意为旁边、附近。“并阴山下”，为在阴山的山麓地带筑长城。西部的止点在高阙。在长城内侧新占土地上设置了云中、雁门、代等三个郡。从这段话可以知道，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在代，即新设置的代郡。据《汉书·地理志》，代郡包含18个县，辖地大体包括河北张家口市西部和内蒙古和山西部分地区。只是笼统地说长城起自在这个大的区域内。正因为如此，学界对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存在很多争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1）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但具体到端点的准确位置则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端点在兴和县北部，陈可畏认为在此与燕长城相接[3]。赵化成认为“东西两端的起止点尚有争论和疑问，已经调查过的地段由兴和县北部西行……”[4]。另一种观点认为，端点在兴和县二十号村。1996～199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逸友先生对赵北长城做了考察，在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部二十七号村鸳鸯河断崖上发现了长城剖面，而未发现长城向东延伸，在张家口西部的长城附近

仅发现秦汉时期遗物，没有见可早到战国的遗物，据此认为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就在二十七号村一带，并未进入张家口地区[5]。郑绍宗在《河北古长城》一书中也认同这种观点[6]。

（2）在蔚县。其中有的仅笼统说在蔚县[7]，有的则指出了大体方位，如近代学者王国良依据《历代地理志韵编》等志书认为代在蔚县东北[8]，赵北长城起自这里。更多学者认为在蔚县小五台山上，起自涿鹿县山涧口，沿蔚县南山向西，入山西境内，与雁门长城会合，最后入内蒙古境内。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首先提出，明清时期就已经广为流传，被《蔚州志》《宣化府志》《四镇三关志》等志书采用，到现代仍很有影响[9]。高鸿宾对这个观点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对其错误之处做了指正[10]，本文赞同。实际上，蔚县长城在进入山西后，并未折向内蒙古，而是一直向西延伸到河曲一带，与《史记》记载的“自代并阴山下”相矛盾。

（3）在宣化境内，经尚义县，跨东洋河进入内蒙古，经兴和县境内[11]。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宣化境内目前已经发现的长城只有一道，自赤城县、崇礼区、宣化县三地交界的大尖山西行，沿崇礼、宣化分界线向西入张家口市。宣化在战国时期为燕国上谷郡辖地，赵北长城修到这里是不合情理的。

（4）在张家口西部的坝头上。长城沿坝头自东向西延伸，与明长城相伴而行，入内蒙古境内。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对东部端点的具体位置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是某个区域范围内，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如有认为端点在万全、张北之间[12]；有认为在张北[13]；有认为在张北县南部[14]。另一种观点则给出了具体地点，如有认为在张北县的狼窝沟、黄花坪一带[15]；有具体到张石高速公路 2 号隧道出口南侧山顶[16]；有认为在张家口市张北、万全、崇礼交界处的黄花梁北麓[17]。这一类观点的立论前提是，赵襄子修筑的无穷之门在张北县南部坝头上，被认为是赵国北境的重要关隘，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起自无穷之门。

如果仅限于文献和史学的范畴，赵北长城的东段走向和端点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广泛认可的结论。不同于其他的学术争论，长城的走向和位置的争论通常会因为新的长城发现而停息，而新的发现则只能从实地调查中获得。

三、近年赵北长城的新发现

长城是一条线形的古代遗迹，要探寻它的端点，从已知的另一端持续追索是一条便捷的途径。赵北长城在内蒙古境内的走向和位置是清楚的，因此可以将内蒙古的赵北长城作为基点，探索其向东延伸的路径。

2014 年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兴和县东部的友谊水库北岸发现了早期长城，并向东南延伸到尚义县境内[18]。随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尚义县的早期长

城做了调查[19]。目前，尚义县新发现的长城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只能从一些简要的报道中对这道长城的走向和特征作一了解。

（一）新发现赵北长城的走向

这道长城实际就是 1996 ~ 1997 年李逸友先生调查的那道长城向东延伸。从内蒙古兴和县东部的二十七号村东南消失后，在友谊水库北岸出现，又越过友谊水库，自衙门号村东南越过省界，自西向东伸入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下马圈乡境内。沿上白窑村西北的大黑山北坡向东延伸，至一条南北向冲沟消失。在冲沟东侧的“边墙梁”上出现，拐为西南—东北向，在山体东坡消失。在下白窑村东北再度出现，至“脑包山”顶消失。在常胜湾村南，长城跨过银子河，开始沿银子河南岸山体修筑，断断续续大体连成一线。向东进入小蒜沟镇，经过王花窑村、洞上村、北槽碾村、乌良台村、下纳岭村、南营盘村、新庙村、小蒜沟村，在小蒜沟村南再次越过瑟尔基河，拐到河北岸，在小土台村南出现墙体，蜿蜒向东千余米消失。向东为甲石河乡，长城墙体仅存 2 段。烽火台则发现了数座，位于侯达子沟、甲石河、上和梁、大柳沟等村落附近，自西向东分布，可以连成一线。在大柳沟村东北的山体上发现了墙体，沿鱼儿山的西坡向东北延伸，至顶峰后转向西坡，继而消失。

在长城的西端，上白窑村南，有西南—东北向的 3 座烽火台，向西与内蒙古境内的东汉列燧相连，向东大体与上白窑长城 2 段相连。从这些烽火台的走向分析，自上白窑长城 2 段起向东的赵北长城在汉代被沿用。而上白窑长城 1 段则属于未被汉代利用的赵北长城。

（二）新发现赵北长城的功能

1. 划分疆域

一般认为长城是防御性的工程。但早期长城在防御方面的功能还不完善，划分疆域的作用更为显著。就赵北长城而言，在内蒙古阴山一线，基本修筑在阴山南麓山脚下，墙体低矮，不足以阻止敌人入侵。到河北段，尚义县赵北长城虽然修筑在山体顶部，但墙体比较低矮，无法拦住人马。而且各个段落彼此均不相连，断断续续大体可成一线。与墙体高大、防御严密的明代长城差距很大。《史记》上记载秦、赵、燕三国的长城都是在向北驱赶游牧族群后，在新占领土地上修筑的，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战国长城具有巩固新占土地的作用，同时也是划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界线[20]。

2. 防御功能

自常胜湾村开始，长城越过银子河，到河南岸，墙体均修筑于南岸山体上，直到小

蒜沟村南。从常胜湾村过河，应是古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西来的银子河到常胜湾村南，河道由 100 余米陡然缩小到 30 余米，河水由缓慢变得湍急。地形至此也发生了变化，从低矮的丘陵变为高峻的山体。长城从这里过河，可以最大程度利用地形和河道来增加防御效果。第一，河道的狭窄处，也是最容易突破的地方，需要增加防卫。第二，南北两山夹河对峙，形成一个门状的通道，易守难攻。

从常胜湾村向东，长城均沿山体顶部边缘修筑，北临银子河（自乌良台村以东称为瑟尔基河）。这也是受地形影响所致。这一带的山体均为火山喷发形成的台塬形丘陵，四周为陡坡，顶部平坦，呈西—东走向。将长城修在山体顶部的北侧，可以利用山体的高度和坡度，同时也利用了河流作为护城河，增加了突袭的难度。台塬形丘陵中间多有南北向的峡谷。墙体通常修筑于峡谷的西侧或东侧，一般到山顶即消失，可能是依靠银子河和河南岸高峻的山体，因险制塞，防御的重点为南—北向可通行的峡谷，起到“当路塞”的作用。

（三）与内蒙古赵北长城的比较

2014 ~ 2015 年的调查首次在河北境内发现证据确实的赵北长城。这道长城与内蒙古境内的赵北长城相连，是赵北长城的东段，与内蒙古地区的赵北长城在选址、墙体形制、附属遗物等方面相似处很多。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的赵北长城墙体多依河流而建[21]，与尚义县长城建于银子河岸边相同。墙体的建筑方式、尺寸、保存情况等也非常相似。卓资县三道营古城中的板瓦，外饰绳纹、内饰菱形纹及麦穗状几何纹，与尚义县赵北长城烽火台、障城采集的陶片特征非常相近。内蒙古地区的战国秦汉长城，从烽火台的形制特征和陶片看，长城的始建年代为战国，沿用到汉代，在汉代是外、中、内长城中的“内城”[22]。与内蒙古地区的赵北长城一样，尚义县赵北长城也被汉代沿用，烽火台和障城附近分布了大量汉代陶片，种类有罐、盆、瓮、瓦片等。

四、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的确定

尚义县赵北长城在鱼儿山主峰西侧消失不见。我们认为，尚义县赵北长城止于鱼儿山，鱼儿山就是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有以下三方面理由。

1. 地形上——鱼儿山适合做长城的端点

在尚义县、万全区、张北县三地交界区域，鱼儿山是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其东、西、南面地势较低，均无高山，鱼儿山孤峰峭立，显得分外高峻，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山体南坡陡峭，北坡较缓且与坝头相连，似从坝头伸出的桥头堡。将这里作为长城

端点，有显著的标识作用。与赵北长城的西部端点高阙一样，都是较高的山体，在地理特征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鱼儿山向东直到狼窝沟的坝头上，存在着多道长城。不少学者认为其中就有赵北长城，东部端点在无穷之门。我们认为赵北长城不会延伸到这里。原因在于，一是这里已经出了代郡的范围。二是无穷之门与赵北长城没有关系。在《战国策·赵二》“王破原阳”一章，赵武灵王在追溯先祖的事迹时候提到，“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昭后期远也”。交，鲍彪曰交犹接[23]，“交地”是土地交界、接壤。“城境封之”，鲍彪曰筑城境上为之封域[24]。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对“境”的认识，有人看作是赵与代的边境[25]，有人看作是灭代后赵与无穷的边境[26]。后者也正是赵北长城起自张北县坝头观点的依据。假使第二种理解正确，赵与无穷的边界很长，怎能肯定无穷之门就在张北县南部呢？况且无穷之门是一座城址，张北县坝头地区尚未发现春秋战国之交的城址。若第一种理解正确，赵与代的边界应该在恒山一线[27]，距北面的赵北长城有上百千米之遥。因此，这两种理解都难以支持赵北长城的东端在张北县坝头地区的观点。司马迁明言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在代地，没提到无穷之门。与西部端点为高阙这个确定的小地名不同，若无穷之门真是东部端点，如此重要的地名，司马迁为何没有记载下来呢？即便司马迁没提到，其他史书也应提到。事实上，无穷之门这个名词，除了战国策以外，其他史书上都未提及。可能在赵武灵王时期，无穷之门已经不存在了，史书中关于赵武灵王在代地和胡地的记载中，只有“无穷”“遗遗之门”。所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无穷之门在坝头上，也不能据此认为张北县的坝头是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

2. 历史地理上——鱼儿山是燕赵两国界线的北端

要找到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需搞清赵武灵王在北方设置三个郡中最东面的代郡的东界或者东部所在。因为长城具有标定领土范围和防御的功能，领土在哪里长城自然也会延伸到哪里，确定了领土的界限，也大体能确定长城的止点。另外，还需确定燕国上谷郡的西界的位置，上谷郡与代郡相邻，上谷郡的西界就是代郡的东界。这需要从历史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中加以考证。

战国时期代郡的属县史书上没有记载。《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代郡的属县有18个，汉因秦制，秦因战国，从汉代代郡属县可推知战国时期的情况。结合《水经注·㶟水》的内容可知，汉代延陵、且如、马城等三个县位于代郡东部。延陵即今兴和县沙河沟地古城[28]，且如在今怀安县柴沟堡西[29]，马城在今万全区北沙城，也有观点认为马城在怀安西大崖[30]。三地除了延陵，其他两个都在今怀安县、万全区一带。郑绍宗先生据此将代郡的东部界线画在新河口、高庙、北沙城、西沙城一线，以西为代郡，以东为燕国上谷郡。

战国时期的货币面文为铸币的地名，可以通过货币面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考证历

史地理。在赵国的布币中，方足小布中的面文较多。据统计，目前三晋方足小布中能确定国别的有 57 种，其中赵国的有 22 种[31]。有 2 种在张家口地区西部[32]，一为安阳，在阳原县一带，此为东安阳[33]。赵国还有西安阳，在内蒙古包头。二为邙（读作代），在蔚县东北，即代王城。三孔布中也有面文为安阳的，是赵国于战国晚期太原地区被秦攻取后铸造的。两种面文货币的存在，证实阳原、蔚县一带确为战国时期代郡辖地。方足小布始铸于战国中期，至少是战国中期晚段[34]，早于赵北长城的修筑年代。

上谷郡在燕国设置的五郡中位置最靠西，与代郡相邻。与代郡情形相同，上谷郡属县见于史籍也是到汉代。根据封泥、兵器等古文字资料，有学者考证出秦时上谷郡至少有 10 个县[35]，其中在西部的有宁县，在今张家口市西北，汉时为西部都尉治所。还有广宁县，在今万全区附近。这两地均与代郡邻近，即在张家口市和万全区以西不远处就是两个郡的边界。这个研究结果与前揭对代郡东部界线的研究若合符节。

从以上论述可以推知，战国时期，燕国、赵国在张家口地区的分界南起小五台山，过怀安、万全之间，再向北延伸到万全、尚义交界的鱼儿山。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在鱼儿山是符合当时燕赵疆域的分布形势的。

3. 考古学文化上——燕赵在鱼儿山至小五台山分界

赵灭代后，在代地设立封君实行管理。不过赵并未把注意力放到经营代地上，对赵国来说，西部强秦的威胁更为急迫。此前久被代国压制的燕国，则趁机渗透到代地东部，将其势力推进到怀来盆地[36]。怀来盆地及附近的燕国文化遗存的出现时间，是在战国早期，与代国被灭的时间大体衔接。主要有如下一些考古发现。

（1）赤城半壁店墓葬[37]，为 1991 年群众挖土时发现，出土了一组仿铜陶礼器，有鼎 3、鬲 2、簋 1、高柄小壶 2、方壶 1 件，器表均有彩绘，形制与燕下都战国早期同类器相似。

（2）下花园墓葬[38]，为 1986 年基建施工时发现，陶器出自 3 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陶器均为泥质灰陶，器物组合以鼎、豆、壶为中心，还有盘、匜、高柄小壶、带钩等。形制与北京、廊坊等地燕国早期墓葬同类器相似。

（3）张家口“第五类遗存”也属战国燕文化[39]，陶器多轮制的泥质灰陶，器类、形制都与中原战国陶器相同，有大量属于燕文化系统的夹砂云母红陶釜。可分为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晚期两个时段。战国早期以北门外墓地第一类遗存为代表。西阳城采集的泥质灰陶器可纳入此时。豆、壶、罐等有战国早期特征。

上文分析燕国遗存向西分布到宣化一带，那么再向西应该为赵国的范围。赵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占有了代地，与张家口地区燕国丰富的墓葬考古资料相比，这里的赵国遗存多为调查资料[40]和少量简短的发掘报道，至今尚未见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已经调查的城址中，级别最高的是代王城，多认为是代郡郡治所在。蔚县博物馆做过专题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41]。报告结语中认为该城址是西汉初期所筑，文末却又说“在

春秋时古城建筑已现端倪”。报告中发表了的同心圆纹、乳丁瑞兽纹瓦当和勾连纹瓦当，分别见于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42]、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43]、中山国灵寿城遗址[44]，说明城址的始建年代至少要早到战国。

刘建华曾对战国时期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的城址做过全面研究[45]。她认为，蔚县、阳原、怀安属代郡属地，18个县中有8个在此。宣化、怀来、涿鹿、崇礼、万全为上谷郡属地，15县中有11个在此。燕国和赵国的这里修筑有不同级别的城址，有郡治、县治、军事城堡等。县城和军事城堡可构成军事防线，用于守卫不同的军事目标，防御不同方向的敌人。上谷郡有4道防线，其中第3道是防御赵国的，南北向，城址包括宣化水泉、西阳城、付家堡，涿鹿朝阳寺等11座，东与第4道防线相连。代郡设防则不明显，仅能看出2道防线，第2道是防御燕国的，沿洪塘河设怀安旧城、第五窑等城址，北接第1道防线的尖台寨，南连小五台山。该文立论的基础是对城址的实地调查，多数城址采集了陶片类遗物，因此对城址的文化属性的区分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赞同该文的观点。上谷郡设立的防御燕国的防线和代郡设立的防御燕国的防线相距很近，两个郡的边界必定就在两道防线中间的区域内。巧合的是，郑绍宗先生划定的代郡与上谷郡的边界大体与两道防线处在相同位置。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燕、赵在张家口地区的分界，说明这个结论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一些简短的墓葬报道和零星的遗物中，也揭示出赵文化在张家口西部存在的史实。200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了蔚县北双涧大墓[46]，位于蔚县杨庄窠乡北双涧村南，为东西向的“中”字形大墓，东西长55米，墓底至封土高13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有陶罐、豆、瓮、盆，金泡、坠饰等，漆器、骨饰、贝币等。蒙发掘者慨允，笔者见到墓葬出土的部分陶器照片，陶罐、盆等有战国晚期特征。从墓葬规模分析，应该是高级贵族墓葬。这里离代郡所在地——代王城很近，墓主身份很可能是代郡的最高首脑，即某一代代君。蔚县博物馆内展览了一件蔚县公安局移交的青铜鼎，形制特征与三晋同类器相似，从足部形制及其位置看，应为战国早中期。

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人类活动的遗留，最能展现当时人们在某个区域生存、发展的情景和历程。通过以上对张家口地区燕国、赵国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战国早期燕国就进入了宣化怀来盆地。赵国遗存虽然发现的不多，但根据少量的线索也能够看出赵国对这里的经营。赵国修筑赵北长城在战国晚期早段，自然不会修筑到燕国已经占有的区域内，故可以有把握地说宣化以西不再是燕国的领土。

五、结　　语

赵北长城是河北省最早修建的长城，是河北历代长城的鼻祖，在河北省长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4 ~ 2015年的调查首次发现了证据确实的赵北长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纠正了以往关于河北省境内赵北长城的走向和位置的观点，为早期长

城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科学前提。本文以这次调查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材料，提出了赵北长城的东部端点在张家口市尚义、万全交界的鱼儿山这一新的论断。长城是一项庞大、复杂、系统的古代工程，长城研究需要以田野工作为基础、发挥多学科研究的优势，才能有所创建、有所进步。由于人的认识具有阶段性、局限性，揭示、复原古代遗存本来面貌常常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因而长城研究是与时俱进的、常新的课题。已有的认识会随着新发现而不断更新。同样，新的认识也需要以新的发现（包括田野考古的、古代文献等方面）加以检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阶段性的。

注　释

[1] 杨建华．再论玉皇庙文化［A］．边疆考古研究（第 2 辑）［C］．科学出版社，2002.

[2] 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11，212.

[3] 陈可畏．论战国时期秦赵燕北部长城［A］．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4] 赵化成．中国早期长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A］．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5] 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

[6] 郑绍宗．河北古长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38.

[7] 盖山林，陆思贤．阴山南麓的赵长城［A］．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8]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28.

[9] 张家口地区行署，张家口地区博物馆．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内部资料）［M］．1982：43.

[10] 高鸿宾．张家口战国长城考［J］．文物春秋，2003（6）.

[11] 白音查干．战国时期燕赵秦长城新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5）.

[12] 董耀会．瓦合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60.

[13] 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J］．社科科学辑刊，1979（1）.

[14]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5] a. 高鸿宾．张家口战国长城考［J］．文物春秋，2003（6）.
b. 景爱．中国长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8.

[16] 胡明．张北赵长城考实［A］．张北长城［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17] a. 李建立，李文龙．河北长城概况［J］．文物春秋，2006（5）.
b. 李文龙．河北北部赵燕秦长城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长城博物馆，2009（3）.

[1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 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J］．草原文物，2015（1）.

［1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尚义县早期长城资源调查［A］．中国考古学年鉴 2015［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0］ 王绍东．从赵长城的修筑看战国秦汉长城的双重功能［J］．邯郸学院学报，2014，24（4）.
［21］ 李兴盛，郝利平．乌盟卓资县战国赵长城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
［22］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遗迹［M］．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23］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0：998.
［24］ 同［23］.
［25］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81.
［26］ 王扶汉，孟明．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515.
［27］ 雁侠．先秦赵国疆域变化［J］．郑州大学学报，1991（1）.
［28］ 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
［29］ 郑绍宗．河北古长城［M］．石家庄：河北出版集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38.
［30］ 常文鹏．代郡马城考［J］．北方文物，2015（1）.
［31］ 吴良宝．中国东周时期金属货币研究［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198.
［32］ 同［31］：200.
［33］ 何琳仪．桥形布币考［J］．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
［34］ 同［31］：204.
［35］ 后晓荣．秦代燕地五郡置县考［J］．古代文明 2009（3）.
［36］ 陶宗冶，王培生．对代国与燕、赵两国关系的探讨［J］．文物春秋，2016（6）.
［37］ 李树涛．赤城县半壁店出土战国陶器［J］．文物春秋，2001（4）.
［38］ 张家口市文管所，下花园区文教局．张家口市下花园发现战国墓［J］．考古，1988（12）.
［39］ 陶宗冶．河北省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5（6）.
［40］ a. 范秀英．河北怀安王虎屯、小高崖遗址调查［J］．文物春秋，1994（2）.
b. 范秀英．河北怀安县第五窑城址调查简报［J］．文物春秋，1993（2）.
c. 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河北阳原桑干河南岸考古调查简报［J］．北方文物，1988（2）.
［41］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J］．文物春秋，1997（3）.
［4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出土瓦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3.
［43］ 同［42］：114.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 ~ 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49 ~ 52.
［45］ 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J］．文物春秋，1993（4）.
［46］ 任雪岩，李珺．蔚县北双涧战国墓［A］．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3［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23，124.

Study on the Eastern Endpoint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ern Zhao State

Han Jinqiu

Abstract: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ern Zhao State l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the Zhao dynasty and it must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Great Wall which l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Both of them were built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ShiJi,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ern Zhao State stretches from Gaoque in the West to Dai in the East. But the specific location of the eastern end of this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is still unclear. Although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t were put forward, there is no agreement among them.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has attended the Zhangjiakou Ancient Great Wall Survey in 2009-2010 and investigated the newly found Great Wall in Shangyi County in 2014-2015.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combined with data from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archaeology, this paper locates the eastern terminal of the Great Wall at Yu’er Mountain.

Keywords: Great Wall in North Zhao; Eastern Terminal; ShangYi County; Yu’er Mountain

护乌桓校尉治所宁城考

黄燕妮

（香港环境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香港，999077）

内容摘要：护乌桓校尉是汉武帝时为了管理乌桓、抵御匈奴始设立的官职，其职责是监领乌桓大小事务并对其实行羁縻统治和日常管理，作为其治所的宁城曾经在北疆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具体位置由于考古材料的缺乏而无法定论，只能凭文献记载加以推断，如今在学界中仍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议。文章根据对文献材料的整理与合理性判断，对宁城可能存在的地点提出了三种可能性：万全区孔家庄周边、万全镇和宣化区西张家口南，并结合考古证据对其进行了探讨。而且分别从对历史文献与学界不同观点的辨析，对日本学者《万安北沙城》发掘报告的分析，以及奔赴实地考察等几个方面，就北沙城不是冈城而是宁城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与考证。

关键词：乌桓；护乌桓校尉；治所；上谷宁城；广宁；北沙城

一、绪　　论

护乌桓校尉是汉武帝时为了管理乌桓、抵御匈奴始设立的官职，其职责是监领乌桓大小事务并对其实行羁縻统治和日常管理。

关于护乌桓校尉的设置，在史料记载中，东汉初年《后汉书》记汉光武帝“始复置校尉于上谷窜城”，唐人李贤注之：“窜城，县名。前书窜县作‘宁’，史记窜城亦作‘宁’，宁窜两字通也。”[1]另外，在《后汉书·陈龟传》中“匈奴数攻营郡”一句末尾，李贤也注解：“谓郡有屯兵者，即护羌校尉屯金城，乌桓校尉屯上谷之类。”[2]根据裴松之注的《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其中记载汉安帝时也同样提到“止乌丸校尉所治窜下”[3]，这个“窜”可以确定是“宁城”无疑。因此，护乌桓校尉府被光武帝置于上谷郡宁城，并至少延续到安帝时期是可以肯定的。

宁城作为护乌桓校尉的治所，曾经在北疆占据重要地位。但它的具体位置在学界中有很多说法。而本文试图提出一个假设，北沙城的汉墓与宁城之间存在关联性，并就北沙城不是冈城而是宁城的可能性进行探索与考证。

二、对宁城的文献分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宁城”又分“大宁城”和“小宁城”。

（一）广宁（大宁城）

田余庆在《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上）——〈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中写道：“代谷偏西的大宁，汉称宁城，属上谷郡，晋置广宁郡，今河北万全境。其地稍后又分化出大宁和小宁的名称，而大宁则是自东向西实行军事控制的要所，护乌桓校尉长期驻此。”[4]

从宁和广宁不可分割而论，要想定位宁的位置，必须先定位广宁的位置。

《水经注》云：“（黑城川水）东南迳黑土城西，又东南流，迳大甯县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东，迳大甯县故城南。《地理志》云广宁也，王莽曰广康矣。《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甯城。”[5]在《水经注疏》中熊会贞补充：“此大甯城谓下广宁县城，非上大宁郡城也。大宁郡城在宁县之西南，广宁县城则在宁县之东。盖旧以广宁县为大宁，以宁县为小宁，故《魏土地记》载两城，直以小宁城、大宁城名之。而郦氏叙两县，亦以小宁县故城、大宁县故城称之。”而杨守敬按：“（广宁）前汉、魏县属上谷郡，后汉、魏因。《一统志》，晋省。在今宣化县西北。”[6]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中记：“洪志有广甯。谢氏谓据《魏志·鲜卑传》护乌丸校尉阎柔治广甯河。是魏有广甯县。又云：据《一统志》补宁县。广甯、甯县，并在今宣化县西北，地相逼近。马城为塞外，则广甯、甯县，非魏所能有，知已弃为荒外，故校尉、太守治，俱内徙也。《一统志》表于三国魏，不列广甯、甯县，今从之。”又有对广宁的集解释义：“惠栋曰：《前志》作‘广寧’。《魏土地记》云：在下洛西北百三十里。马与龙曰：汉末广阳阎柔，因鲜卑众杀乌丸校尉邢举代之，治广甯，见《鲜卑传》及《魏志》。先谦曰：前汉县，三国魏废。《漯水注》：于延水迳大寧县故城南，《地理志》云广甯也。《一统志》：故城今宣化县西北。……《商榷》谓‘广甯’当作‘广寧’。”编者钱林书按“广甯县故城，即今河北张家口市。”[7]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广宁城：“州西北二百里。汉置广宁县，属上谷郡。后汉曰广宁县。晋置广宁郡，治下落城，县并入焉。其城亦曰大宁城。咸和二年，后赵石虎击代王纥那于陉北，纥那兵败，徙都大宁以避之。又咸康元年，拓跋翳槐国乱，奔赵。三年，赵将李穆纳翳槐于大宁。太元中，魏将奚斤等破越勤部于跋那山，西徙二万余家于大宁。义熙十三年，魏主嗣如大宁长川。宋永初三年，魏主嗣自南宫如广宁。景平二年，魏主焘东巡大宁。元嘉五年，魏主焘如广宁，观温泉。明年，复如广宁，临温泉，又置宫于此。大明初，魏主如广宁温泉宫。《北史》魏太和十六年，祀舜于广宁。时又

置大宁郡治焉。《水经注》：魏燕州广宁郡治广宁县。即此。孝昌以后，郡县俱废。高齐改置长宁郡，在今怀来卫。陉北，见山西重险勾注。跋那山，见陕西榆林镇。”[8]

《三国志外国传地理考证·乌桓鲜卑东夷传》中记载：“广宁，上谷属县。《魏土地记》‘去平城五十里，当在山西天镇县北境。’”[9]

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里也有几个相关词条：“广宁县”“广宁郡”“大宁县”“大宁郡”[10]。四个词条总结起来为：广宁县是最初西汉所置，属上谷郡，县治为今河北张家口市（广宁城），至西晋太康年间被废除，其辖地归入下洛县。与此同时上谷郡也被一分为二，其西部置广宁郡，郡治在下洛县（今河北涿鹿县），北魏孝昌年间被废除。北魏太和年间，下洛县被改名为广宁县，同时置大宁县与大宁郡，大宁县属大宁郡，县治为今河北张家口市，而大宁郡郡治为今河北怀安县东南，北齐时废。

根据以上文献史料记载，关于广宁的地理信息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

（1）广宁县又被称作大宁、大宁城、大宁县故城。

（2）广宁（故城）在今宣化区西北。

（3）大宁县治在今河北张家口市，大宁郡治在今河北怀安县东南。

（4）大宁城（广宁县城）在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

（5）黑城川水东南流经大宁县西，而南入于延水后东流经大宁县故城南。

（6）广宁县城在宁县之东。

（7）广宁县去平城五十里，当在山西天镇县北境。

（8）大宁郡设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至太康三年（283年），郡城在宁县之西南。

已知于延水就是现在的洋河，下洛城即涿鹿，平城即山西大同。

大宁郡郡治在怀安县东南，宁县的西南方向。

宣化区西北方向有万全区与张家口市。由《汉书·食货志上》[11]可知，汉代的度量衡延续了秦的步尺制度，根据出土秦汉铜尺的长度可知一尺等于0.231米，因此一里等于1800尺为415.8米。因此，可知广宁县城在涿鹿城西北54054米的位置，符合此条件的是张家口市，若是万全的话距离无论如何也超过了这个数值。《续汉书郡国志汇释》的编者钱林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根据广宁县城就在今河北张家口市的假设继续论证，张家口南侧的东西向河流为过去被称为于延水的洋河，而其境内西侧确实有一条自北向南（北偏东，南偏西）跨越全境的河流，名为清水河。清水河发源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桦皮岭南麓，在长城关隘大境门东侧流入今张家口市主城区，于西南方汇入洋河。根据《水经注图（外二种）》杨守敬编绘的地图[12]，其地理位置与记载描述的黑城川水接近，因此清水河也被认为就是黑城川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城川水应是张家口市东南，宣化东十五里的泥河。《清一统志·宣化府三》记载：“（泥河）自关子口西南流四十里与洋河合。即古黑城川水也”[13]，即今天的龙洋河。据此，大宁城（广宁县城）的位置应在宣化[14]。

至于“广宁县去平城五十里，当在山西天镇县北境”的说法可能有误。山西天镇县西北是怀安县，这句或许尚可琢磨。但平城是今大同，大同方圆五十里以内没有符合广宁县描述的城址，而更重要的是从大同延伸 20790 米是无法到达天镇县北境处的。

综合以上，可见广宁县治（大宁城）位于今张家口市是能得出的最具可信度，相较而言也较合理的结论；而同时，位于宣化附近也有一个符合水系，这也是一个从理论上也说得通的结论，因此都予以保留作为参考。

（二）宁（小宁）

定位了大宁城后，关键的“宁县城（小宁城）在哪”便成了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小宁城的记载并非很多，历史文献中记述其地理位置的内容也相对有限，并且根据其文也并非指向同一个地方，因此学者从而得出其所在位置的结论各不相同，比广宁县故城更具有争议性。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于延水又东，左与宁川水合，水出西北，登国二年，幸宁川。东南流迳小宁县故城西，东南流，注于延水，又东，迳小宁县故城南，《地理志》宁县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记》曰：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杨守敬于《水经注疏》中按：“其水（宁川）当在今万全县之西。……（宁县）前汉县属上谷郡，後汉、魏因。《一统志》，晋省。即今万全县治。”[15]另外，郦道元还记述了有关宁城一段传说：“昔邑人班邱仲，居水侧，卖药于甯，百余年，人以为寿，后地动宅坏，仲与里中数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药卖之。仲被裘从而诘之，此人失怖，叩头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后为夫馀王驿使来宁，北方人谓之谪仙也。”[16]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集解：“惠栋曰：《前志》作‘寧’，古书‘寧’与‘甯’通。《魏土地记》云：在广甯西二十里。应劭《汉官》云：永平八年，初置乌桓校尉屯此。何焯定作‘寧’。按后汉自作‘甯’，改之无据。马与龙曰：《乌桓传》：建武二十五年，置乌桓校尉于上谷，甯城校尉文穆，见《窦固传》。先谦曰：前汉县，三国魏废。《漯水注》：于延水又迳小甯县故城南。《魏土地记》云：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地理志》甯县也。《一统志》：故城今宣化县西北”，钱林书按：“甯县故城，即今河北万全县治。”[17]

清代《读史方舆纪要》记：“宁县城在州西北。汉县，属上谷郡，为西部都尉治。后汉曰宁县。建武二十五年，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领内附乌桓并鲜卑顾内属者。《西京旧事》：武帝于益州部置蛮奚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降夷，时已废而更置也。晋时县废，时谓之宁川。义熙四年，魏主 如豺山宫，遂至宁川。又谓之小宁城。《水经注》：大宁城西二十里，即小宁城。杜佑曰：小宁城，俗名西吐勃城，在怀戎县西北。”[18]

在《通典·边防典》记录乌桓的部分中，在“东汉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一

句下面可见杜佑自注，曰："在今妫川郡怀戎县西北，俗名西土（勃）城。"[19]

《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 乌桓鲜卑传》中记载："宁城即《地理志》宁县，属上谷，今为万全县地。"[20] 又"《水经注》作小宁城县（盖以广宁为大宁城），今宣化县西清水铺地。"[21]

道光点校版的《万全县志》中也有记："《水经注》有小、大宁县故城，及广宁郡矣。而雁门水所经又有大宁郡。所谓大宁郡者，又在小宁城西，与广宁郡治在下洛者又不同，岐说丝纷，大概如此。"[22] 在其卷一沿革篇中又记："惟《畿辅通志》，以为汉宁县，地者近是然。据《水经注》，汉广宁去宁县只二十里，而通志割之，以属宣化恐亦不无微误。"[23] 又"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分上谷郡地置广宁郡，以沮阳、居庸二县属上谷。下洛、涿鹿二县属广宁。余为镇分属。是时并广宁、宁二县于下洛，称广宁曰大宁城，宁曰小宁城。《水经注》曰：大宁地理志曰广宁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宁城，又西二十里有小宁城。地理志曰：宁县也。按此则县为晋并，可无疑义。"[24]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宁县""小宁县"两词条也有相关释义。总括如下：宁县最初于西汉时设置，为上谷郡西部都尉所治，三国时废除，其辖地与广宁县同样归入下洛县（今河北涿鹿县）。至北魏太和年间，原地置小宁县，属大宁郡。无论是宁县抑或小宁县，其县治皆在今河北万全。北齐时废[25]。

中华博物编辑的《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26] 中也有词条："宁县：汉置，后汉曰甯县，晋省，故城在今河北省宣化县西北。"

除了文献记载，这里再引述一个黄盛璋的观点：他认为杨守敬及一般人所引用的"大宁城为张家口，小宁城为万全"的观点不正确，因为与水系径流情况不符。他认为清水河为古宁川水，流经宣化城西的泥河为黑城川水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因此小宁城应在张家口南，洋河的北岸[27]（图一）。

根据以上文献史料记载，关于宁县或宁城的地理信息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

（1）宁川东南流经小宁县故城西，东南注入于延水，于延水东经小宁县故城南。

（2）雁门水经大宁郡，大宁郡在小宁城西边。

（3）宁川在万全区之西，宁县城在州西北。

（4）小宁城在大宁城西二十里处。

（5）小宁城县在今宣化区西清水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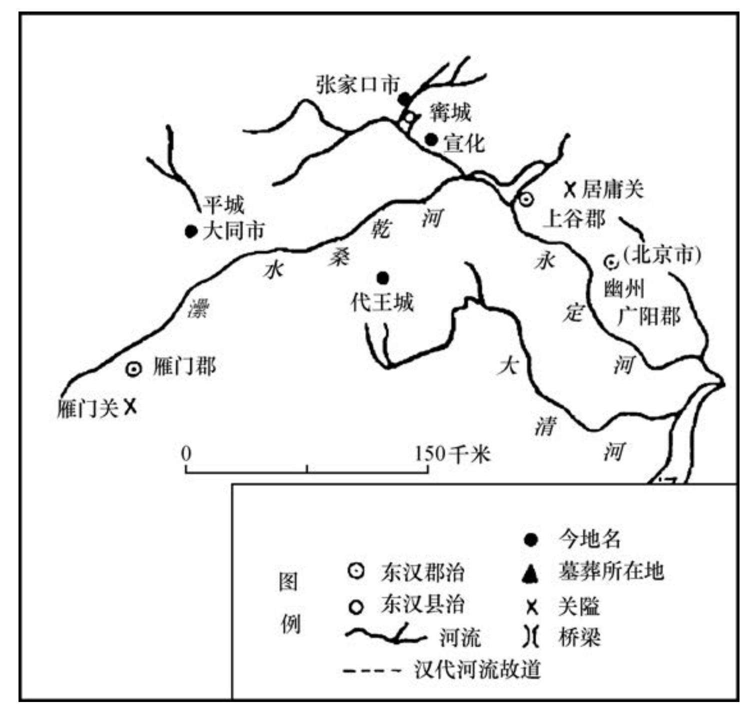
（6）小宁城俗名西吐勃城，在妫川郡怀戎县西北。

（7）宁县故城即今河北万全区治。

（8）小宁城在张家口南，洋河的北岸。

上一小节可知，大宁郡郡治在怀安县东南，被雁门水经过。雁门水就是今天的南洋河，东北流向注入今为洋河的于延水。而宁县在大宁郡的东北。

已知于延水就是现在的洋河，这是确凿无误的。而宁川水与黑城川水究竟是与现今



图一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地理示意图（部分）[28]

（采自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文物》1974 年 1 期）

哪条河流相对应却存在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万全区东一条自西北向东南的洋河支流是宁川水，而纵贯张家口市的清水河是黑城川水。《水经注图（外二种）》的编绘者杨守敬便采用的是此观点，根据其所绘地图[29]可看出。而这也是学界普遍采用的观点。

若沿此观点推论，那么广宁县城（大宁城）位于张家口市的结论便是合理的。

此洋河支流也是东南流并汇入洋河，与“宁川东南流经小宁县故城西，东南注入于延水”的描述相符，并且以万全区政府所在孔家庄周边为万全区的话，此支流确实在万全区之西，符合对宁川的描述。由此可知，小宁城在此支流以东，洋河以北，并且在大宁城（张家口）以西。

而这个范围以内可以进行假设的地点是今万全镇与万全区孔家庄周边（今万全区治）。

程妮娜在《汉魏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设置与治理》中写道：“上谷郡宁城县在今河北张家口西北。将迁来的乌桓部落分布在东北线长城之外，设官统领，使之为汉朝边地的藩屏，岁时朝贡。”依此说法，在张家口市西北并靠近东北长城线的应是万全镇才是。但根据《水经注》记载，可知小宁城在大宁城以西二十里（8316 米）处，而万全镇至清水河东岸的距离最短长 13000 余米，无论如何都远远超过了文献所记载的距离，而若小宁城在今万全区治的话，这个距离便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一点看，相较万全镇而言，万全区孔家庄周边是小宁城所在地的可能性更大，但也无法就此全然否定万全镇是小宁城的可能性。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清水河才是宁川水，而黑城川水应是泥河，即今龙洋河。黄盛璋在《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中阐述了赞同其观点的理由："流迳小宁城西的宁川水是古代这一带较著名的河，而流迳张家口西的清水河是洋河最大一条支流，唯一可与宁川水相当的只是清水河，明清志书一致认为清水河为古宁川水，而以流迳宣化城西的泥河当《水经注》的黑城川水，应该是正确的。"[30]《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黑城川"词条记："黑城川即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南宣化东十五里泥河。流入今洋河。"[31]而其"宁川"词条记："宁川即今河北崇礼县及张家口市境之清水河。"[32]《清一统志·宣化府三》记载："（泥河）自关子口西南流四十里与洋河合。即古黑城川水也。"根据文献所记泥河的位置，可知其位于宣化东6237米处，为西南流向，自关子口至与洋河汇合处长16632米的河流，虽然具体数字多少有些出入，如自关子口村至与洋河汇合处直线距离最少长21000余米，但与此条件基本相符的只有今龙洋河。

若沿此观点推论，那么广宁县城（大宁城）便极有可能是位于宣化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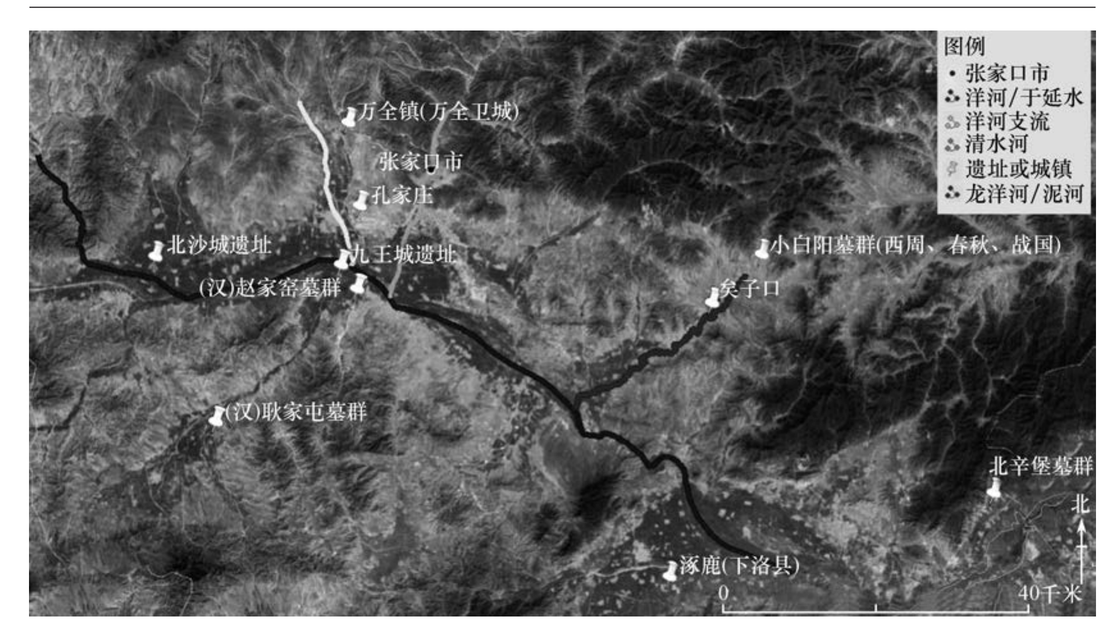
根据《通典》记述，可知小宁城俗名西吐勃城，在妫川郡怀戎县西北。妫川郡即妫州，唐天宝元年改妫州为妫川郡，安史之乱后复旧称。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怀来县、怀安县、涿鹿县及北京市延庆区等地。怀戎县辽时改名为怀来县，范围覆盖怀来县与涿鹿县保岱。其西北为宣化区，再西北为张家口市与万全区。小宁城县据《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乌桓鲜卑传》认为"在今宣化县西清水铺地"，这点疑为有误，宣化区西边只有清水河村尚与之名称接近，但并无名为清水铺之地，根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有清水铺之名的只有贵州毕节市东北的清水铺镇。不过虽然清水铺在宣化无法找到对应地名，但小宁城县在今宣化区西这点仍是存在可能性的。

根据《水经注》记述，于延水向东流与宁川水汇合，宁川水流经小宁城西，两水汇合后于延水东流经小宁城南。而以这个观点而论，即小宁城在清水河东侧，洋河的北侧。因此，黄盛璋认为小宁城在张家口南，洋河的北岸。这个结论符合上文提到的小宁城县在今宣化区西的可能。

但以清水河为宁川水，以泥河即龙洋河为黑城川水的话，仍有几处疑点。在万全区以西的河流只有上一观点被认为是宁川的洋河支流，而清水河在万全区以东，这与《水经注疏》中杨守敬所按的"其水（宁川）当在今万全县之西"不符。并且清水河的流向也不是自西北至东南，而是东北至西南注入洋河。

另外，《水经注》云，黑城川水"经大甯县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东，迳大甯县故城南"[33]，因此理论上大宁城应在龙洋河以东，洋河以北。但如此一来便与所记载的"大宁城西二十里有小宁城"不符了，因为清水河与龙洋河两河相隔约3万米，而二十里地只有8316米。同是各自在两河的东岸，既然在记载中是用了"流迳"一词，那么小宁城就不可能与被认为是宁川的清水河相距过远，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测量，两城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文献记载的这个数据（图二）。

通过上述对文献记载的辨析，对宁城可能存在的地点提出了三种可能：万全区孔家



图二　北沙城遗址与周边遗址、城市、水系示意图

（采自 Goolge Earth 卫星地图）

庄周边、万全镇和宣化区西张家口南。

根据文献记载的内容进行各种佐证而得出的结论，今万全区治是小宁城的可能性排在第一位，这也是学者普遍采用的观点。这个可能与文献材料相符程度较高，但有着一个决定性的缺陷，那就是其周边没有任何考古发现。一切定论都要靠事实说话，既然没有发现任何墓葬，也没有发现任何城址，那么就不能证明此地有城。

同理，虽然万全镇有城址，但那是明代的万全右卫城，经过考察也尚未发现万全右卫城的城下存在早期遗址的迹象，周边更没有汉墓群被发现。如果假设万全右卫城的城下存在汉城遗址，那么附近没有汉墓便显得很不自然。作为人口长期聚居的地方，城市里的居民生老病死，死后按照古代汉人的丧葬习俗基本都会土葬，所以周边不可能没有墓地。而汉代的丧葬观念使得他们的墓葬都较为显眼（封土高大），因此若说其“虽然存在，只是完全没有被发现而已”也不太可能。因为没有任何汉代遗迹出土，所以也无法证明此处曾经存在过汉城。

这三种推测里反而是小宁城在宣化区西张家口南的观点，存在能被考古材料佐证的可能——推测地点范围的西边不远处有汉墓群存在。这座汉墓群叫赵家窑墓群，坐落在怀安县左卫镇赵家窑村西，在洪塘河东岸的耕地上分布着 30 多座汉墓。从封土的形制与数量来看，这片汉墓附近也一定有个拥有一定人口与规模的汉代城市。

那么这片墓地会是可能存在于宣化区西张家口南的宁城的附属墓葬群吗？答案却是否定的。一方面，虽然两者相距不远，但也并非很近，更重要的是还隔着一条当时应该很宽、水流也不小的洋河（于延水），与其要抬着棺木辛苦渡河到如此远的地方

下葬亲族，为何不直接在洋河北岸城的周边寻处下葬？另一方面，即使上述疑问能得到解释，但赵家窑墓群附近已有了九王城遗址，虽然根据《大清一统志》记载“相传辽筑”[34]，但在文物普查时考察出下层为汉代夯筑，因此可确定九王城下曾存在过汉城[35]，那么很明显赵家窑墓群是汉代九王城的附属墓葬群才是更合理的解释。因此，小宁城在宣化区西张家口南的观点，与前两种观点一样无法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因此也同样无法定论。

三、对北沙城的考古论证

既然文献材料无法得出能被考古材料证实的合理的结论，那么便应不拘于文献记载，尝试从考古的角度出发，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立论，提出新的观点。

由于万全区尚未有其他汉代遗迹或城址被发现，以证明文献中所记载的几座汉代城市的存在与位置，因此唯一被发现的北沙城汉代遗迹便格外令人注目。

（一）《万安北沙城》考古报告分析

万安北沙城在当时位于怀安县与万全县合并所称的万安县，今为万全区西南缘边，隔河南邻怀安县北界，在京包铁路以南，东洋河与南洋河交汇的北岸，东洋河的东侧约十几米宽的台地上。台地离水面大约有 10 米，上面分布着大片高粱地，其南侧略微倾斜。北沙城在台地的西侧，距万安县有七八千米，东有富农窑村（今老龙湾村），北边山脚下是洗马林，以南跨河是现怀安县的柴沟堡。

墓葬集中分布在洋河北岸沿北沙城至阳门堡一线，其中尤以老龙湾周边最多。而水野清一等此次调查的就为富农窑村（今老龙湾村）东西两侧分布的十余座（根据其报告图版的标示与报告中的记述来看，至少有 14 座）墓葬。

从对北沙城墓葬的调查可得知一些信息，以此来推断的话，能得出一些结论或假设。

首先，以 6 号墓为主要对象分析墓葬的时期。6 号墓为合葬墓，夫妇合葬到西汉晚期才开始出现，在北疆地区的出现更是稍晚于中原，家族合葬则是到东汉时期才盛行，因此这座墓不会是西汉早期的。另外，杜林渊在《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中总结道：“西汉中晚期（北部边疆地区的）墓葬以壶、罐、灶（盘）等陶器为基本组合，个别墓葬也随葬有青铜器及车马器。”[36] 6 号墓中虽然没有出土车马器，但此种陶器组合和青铜器的存在都与杜林渊所总结的相符。并且出土随葬品的特点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如博山炉的造型、鼎和钫的使用、星云镜与昭明镜的存在都指向了西汉后期。因此，6 号墓的时期应是西汉晚期，即便北疆葬俗演变再慢于中原，最晚也不超过东汉初期。

其次，判断墓葬的类别。根据 6 号墓的发掘可知，其葬式与中原地区的汉墓相去无

儿，显然墓主在生产、生活习惯、伦理思想、丧葬观念上都与中原汉人基本相同，即应是同一个文化系统，有很大可能是汉族移民（或其后裔）。因此，这批墓葬有可能是中原汉族移民墓葬。

再次，判断墓主的身份。这里的墓葬封土都较高，7、14 号墓可能是木椁墓，而 6 号墓从发掘来看是有墓室的。虽然依蒋璐所说："从部分墓葬使用未经修整的圆木制作木椁来看，木椁墓的制作更多的是就地取材，在使用上也不仅限于级别较高的人群"[37]，但是从 14 号墓同时发现青铜鼎来看，即便厚葬之风盛行，这些墓葬显然不会是一般民众或级别较低的人所能达到，而可能是两种丧葬制度交替的演变时期的贵族墓。水野清一认为这里的墓主们应是与郡县的官衙有关系的人。

然后，还可推断当时的社会背景。从 6 号墓随葬品来看的话，这些陶器尚属于日常所用器皿，而非仓、俑等象征私有财产的模型明器。虽然西汉中期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就已经开始用陶仓模型明器代替礼器随葬，但这种新葬俗由中心区域传播到位于汉朝边疆的北方地区的时间要晚得多，这或许也是因为北部边疆地区的庄园经济并不发达，土地兼并情况并不严重的缘故。

另外，戳印"木亭"（有说是对"市亭"的误判）篆文陶器的出土，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在器物上加盖印文的做法起始于战国时期，在手工业与商业迅速发展和市场兴起的背景下，交易中对商品质量的要求便显得很重要，于是官方制定了市亭制度，对市场进行多方面的管理监控，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西汉，东汉时才逐渐消失。戳印文字是为了标记商品陶器的出处，或是表示该商品已经过官方检验和批准，是一种保证质量的凭证。根据戳记内容不同，陶器的出处可分为三种：中央官署监制的器物、地方官府监制的器物和部分民营制陶业的器物。词尾带"市"或"亭"字的便是由地方官府监制的器物。"市"或"亭"前是该地方的名称，通常简化为一个字。此类陶器多集中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市亭"的含义便是管理市场的官署，有时兼营官府手工业作坊[38]。北沙城墓葬出土数件印"木亭"陶文的陶器，这意味着附近的城邑有官府管理的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尚存疑的是"木（市）亭"二字，前字若是"木"的话，那会是什么地名的简称？若是"市"字的话，"市亭"为一物，那便等于没有标记该地名称，理论上失去了标记的意义，但若理解为"只表示是官府所出或所认可，具体是何地的官府并不重要"的话，这样解释也并非不能说通。总之关于此处出土的"木亭"二字陶文，还是存在疑问的。

除了富农窑村周边的墓葬以外，水野清一还在当时的北沙城村东北部对南北长 200 米左右，最后隐没村子之中的土城墙进行了些许的考察。报告记录了土城墙高 4 ~ 5 米，宽 7 ~ 8 米，其西边存在大面积的包含层，但再往西的部分由于河水侵蚀而已大部分坍塌。另外，东边的地形变化尚不明朗，因此无法确定村子东北部的城墙是这座城的哪一面墙。不过根据土城墙的方位，水野清一认为此城为西南走向，并推定已知的这面土城墙是城东墙北半部的一部分。

水野清一还在北沙城村西面菜园、西南面的断崖处、东南角的小祠堂附近几个地方发现了土里包含了数量不少的古瓦片、灰色陶器，还有兽骨的包含层，丰富的包含层甚至超过了一米，出土了大量碎片。其中采集的印“市亭”[39]的浅钵、深钵、高杯等陶器，同心圆纹样的瓦当、菱纹砖等，与富农窑村墓葬附近的东西或出土的遗物一模一样（6号墓中出土了菱纹砖，而这个在北沙城的古城址中也有发现），可认为这里当时存在一个同时代并与墓葬关系紧密的聚落。即意味着北沙城的土城与这座墓葬建于同一个时期，应是西汉晚期，水野清一推测是公元前1世纪。而墓葬打破了带竖穴的灰陶系文化层，因此可知灰陶系文化层的时间是早于墓葬的，但从遗物来看两者的文化和时期几乎相同，所以它们之间的时间差并不会很大，应是前后脚的关系，可以推断这些竖穴形成于西汉中期，早在北沙城土城建成前，这里就存在着聚落。

（二）北沙城遗址实地调查

古城址位于万全区西南部北沙城乡的北沙城村。北沙城村南四五百米临东洋河，东洋河北边沿岸是老龙湾村、岸庄屯村等，同时至阳门堡一线都呈带状分布着大量汉墓，东南4500米处是东洋河与南洋河的交汇点。

这座城位于北沙城村的中部，南墙紧邻110国道。城墙东南角在110国道与乡道垂直相交处西北，坐标为A_1点（40°42′19.74″N，114°27′25.25″E）和A_2点（40°42′19.68″N，114°27′24.96″E）；东北角原在丁字路口西南方位的院落内，现已被挖去，坐标为B点（40°42′25.85″N，114°27′28.73″E）；西北角是市场，墙体已不存在，因此无法确认西北角的具体位置，只能根据其他点勾出的形状估计为C_1点（40°42′30.59″N，114°27′20.39″E），北墙中部为C_2点（40°42′28.73″N，114°27′24.12″E）；西南角为D点（40°42′23.34″N，114°27′16.19″E）。把坐标相连后，可以在谷歌地球的卫星地图上看到北沙城古城址的轮廓近似为一个向西南倾斜的方形（图三）。

根据对城墙残余墙体的调查，可知四面墙体与墙角的保存情况。

城墙东南角的墙体残高6～7米，墙体上长满草木并建有民房，残损较严重，因此难以辨别是否有夯层。城墙东北角原在丁字路口西南方位的院落内，如今已被挖去，无法调查其高度与夯层的情况。但东墙与南墙保存相对完好，残留墙体较清晰可辨。

北墙墙体断续有残留，民房多建于城墙墙体之上。在C_2点的位置，墙体以阶梯上的地面为基准量出的残高为3米左右，阶梯的高度目测为2～2.5米，估算城墙墙体的残高大概为5～6米，墙体断面可以观察到夯层，每层厚度为13～15厘米，标准厚度是14.5厘米，并且现存底部（理论上是中部）墙体宽3.5米。另外，从断面还可看出虽然夯层土质相同，但有部分的夯筑技术规范不同，有两边加补，顶部加高的痕迹，这意味着城墙曾经过不同时代的修筑，即现在残留墙体为明代在早期遗址上加筑的城墙，而土



图三　北沙城城址轮廓图
（采自 Goolge Earth 卫星地图）

质相同即是表示加筑时是在原地取土。

西墙墙体残高 5 ~ 6 米，从夯土可看出上下堆积有所不同，上部夯层厚度为 16 ~ 17 厘米，下部夯层厚度为 14 厘米左右，墙体上部与下部的夯土都十分紧实，但中部是糟浮土。这种现象是后世在前代建造的下层遗迹坍塌后，于废土尚未清理的情况下就直接在其上进行新的夯筑的缘故。下部墙体中还包含了不少陶片、瓦片遗存，我们在此处的随机采集了 5 个标本。

另外，在北墙越过西北角继续向西延展的，大约长 240 米的墙体中也发现了大量陶片、瓦片的遗存，陶片纹饰有绳纹、凸弦纹、篮纹、戳印纹等。这部分墙体残高约 1 米，被压在民居之下。我们在这里随机采集了 12 个标本。定位为 E_1 点（40°42′ 33.53″N，114°27′14.21″E）和 E_2 点（40°42′34.74″N，114°27′11.52″E）。但由于此处情况尚未弄明白，因此对这段城墙不作讨论，仅以其包含的陶片遗存作为辅证。

据《明代夯土长城的城墙材料与构造——以大同镇段为例》中关于明代大同镇段长城城墙夯层厚度的统计可知[40]，明代城墙的夯层厚度以 15 ~ 25 厘米的居多，并且绝大多数城墙的夯土都掺杂着沙砾、碎石和块石等，用纯细粒土夯筑的几乎没有。而汉代的城墙绝大多数使用黄土，夯土一般不含杂质，比较纯净。据王银田在《汉代城墙浅议》一文所说：“汉代多数县城城墙的夯层厚 8 ~ 12 厘米”[41]；而大同市西郊吴官屯古城遗址的北城墙经调查，知其夯层厚 15 ~ 20 厘米，西城墙北段的夯层厚 10 ~ 20 厘米[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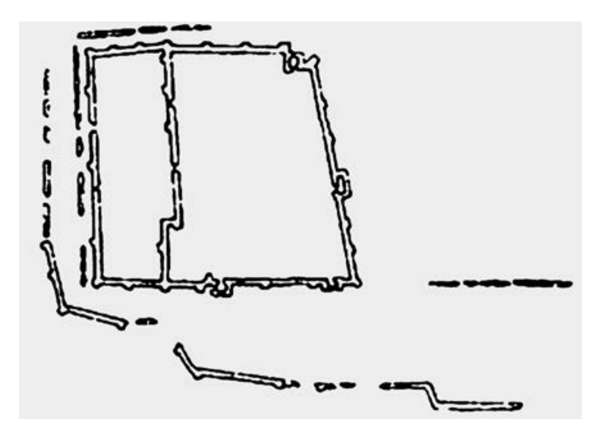
对比可知，汉代城墙的夯层相较明代城墙的夯层更薄，而夯层越薄，夯土就越坚硬，作为城墙而言也更坚固，但这也意味着对劳动力和成本的需求更大。并且汉代城墙的夯土较之明代城墙的杂质更少。王银田、何培总结："从现有的汉代城址资料看，汉代的筑城技术成熟而规范，各地的筑城方法基本相同，只有少量例外。"[43]

于是根据朝代夯筑规范的不同，可以看出北沙城遗址除了明代城墙以外，其下还应有更早期的，可能是汉代的城墙被叠压着，这一点在西墙遗址得到明确的体现。

如何证明被压在下面的早期遗址是汉代的产物？这可以通过墙体中出土的包含物来推断。从随机采集的 17 块陶片标本来看，纹饰有绳纹、凸弦纹、篮纹，是典型的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灰陶系遗物，由于建城时是就地取土再用杵夯筑而成的，因此建造时把当地的土连同其中的遗物一起筑入墙体内也并非无可能，而如此一来，城墙的始建年代便绝不会早于汉代，并且最早也不早于西汉中晚期。

根据 GPS 定位点勾画出的城墙轮廓，可量出每面城墙的长度：东墙长 238 米，南墙长 238 米，由于无法确定西北角的位置，只能以估算方法得出西墙与北墙的长度，分别长约 279 米和约 255 米，城墙周长在 1010 米左右，面积为 62291 平方米左右，整个城呈东北—西南走向。城的基本大小可以从保存较完好的东墙和南墙来看，两面墙的长度相同，都是 238 米。按汉代的度量衡标准来看，一尺等于 0.231 米，十尺为一丈，一丈即 2.31 米，那么 238 米便是一百丈有余，基本可以说这是个一百丈乘一百丈大小的城，数字上符合凑整数的习惯。

北沙城并不是一个正方形，但也非平行四边形。其东墙与南墙互呈 90°，长度相等，但北墙与西墙并非如此。虽然不能断定北沙城西北角的位置，但根据推算出的形状，它是一个锐角，两墙长度也完全不同。这种现象并非独为北沙城一例，考古调查得知，在北方边疆地区的许多城址都存在这种有一角为锐角的情况，如锁阳城（图四），并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蒙元时期。



图四　锁阳城遗址平面图[44]

（甘肃省，汉代，采自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瓜州县博物馆：《锁阳城遗址内城西北角发掘简报》）

虽然城墙破坏严重，残留下来的信息并不多，但这里曾经有汉城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到了明代，可能为了协助北部长城边防体系而有所增筑，在原本的汉代城址上重修城墙，因此会把汉代的遗迹砌到墙里，形成现在所见的样子。

（三）考证总结

结合《万安北沙城》考古报告与实地调查来看，水野清一当年考察的北沙城古城址与此次所调查的毫无疑问是同一座城，那么老龙湾汉墓群便无疑是围绕此城的墓葬群。如此一来信息便能结合在一起，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北沙城”是明朝在早期城址上原地进行了增筑的城市，增筑全貌尚未得知，但那早期城址毫无疑问是汉城。考察其年代，从 5 号墓处发掘的大量窖藏遗址证明此处早期曾有聚落，水野清一推测是公元前 2 世纪；而城墙是在聚落形成以后才修筑的，从墙体包含物可知其始建年代不早于汉代中晚期，而由于城址出土的遗物与 6 号墓的遗物皆为同一时期与文化的产物，因此水野清一认为两者建造时期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可以认为这座城是建于汉代中晚期，至少城墙是。

汉代的城市不可缺少的三部分是官寺、市和里，尤其是官设的市场，是居民进行日常交易的商业区。墓葬出土的带“木（市）亭”戳印的陶片更证实了北沙城中市亭制度的存在，出土陶器是由此地的地方官府监制或检验认可的器物，而由于“市”或“亭”前通常是经省略的该地方的名称，因此这也许可以成为推测该城究竟是汉代哪座城的线索。

老龙湾汉墓群的墓主基本可以断定就是汉代该城中的居民。根据墓葬的数量、墓葬规模、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来看，此城虽然不大，但在汉代时似乎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大多数墓主人属于中小地主或下级贵族阶级，并且其中还有些与官府有关的人（比如官僚），可见此城比较繁荣。

此处在汉代时是代谷地区，属上谷郡，是汉代的北部边疆地区。汉武帝时，为了巩固郡县制，增强汉朝对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朝廷根据现实情况实行了多次对边塞的大量移民和屯田戍边，有中原人口向边塞外徙，也有将乌桓内迁到边境诸郡的，在不同时期对西北边防进行巩固，并保障军队粮食的需求。从水野清一发掘的几座北沙城的墓葬（实际上，真正可参考的只有 6 号墓）葬俗与中原汉文化无异的现象来看，墓主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与中原汉人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即汉族移民（或其后裔）的墓葬；另一种可能是西汉中晚期边疆受强势的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汉式墓葬”。分辨究竟是哪一种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基本上这两种可能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即汉武帝以后为了巩固边防与安置内迁乌桓而在边郡建城，而“北沙城”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起的城市，城中的人口成分主要由移民组成。

从该城的规模来看，一百丈乘一百丈的范围略显偏小，尤其是较中原地区的城市而言，但北部边塞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越远离中原，规模越小，因此这个大小却是符合汉代边疆建城规律的，作为边疆城市而言，北沙城的规模毫无疑问是合理的。而从居民成分来看并非几乎都是农民，而是既有官府人员又有工商业者，因此也可推测该城是这地区内较大的聚邑，抑或是战略位置比较重要的含军事性质的小城，有可能是县治所的所在。

四、结　　论

从老龙湾汉墓群的发掘与北沙城城址的发现来看，北沙城存在是宁城的可能。

首先已知在城市国家时期的战国、秦汉，人口一般都集中在城市内，或是由城区向外辐射地围着城市居住。一般的农民平时也是住在城内，白天才到城外的田地耕作。而越是远离城郭的地区，人口便越是稀少。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附近埋葬自己的家族成员，除非大有缘由，否则不会埋葬到他乡异地去。因此，聚居地（城市聚落）与墓葬一定是同时存在，并且距离是不会离得很远。尤其是汉代北方边疆地区的墓葬，通常都分布在汉的障塞、农业新垦区和城址附近。这与老龙湾汉墓群和北沙城的情况完全符合。

根据上文对北沙城城址和墓葬的分析，可知该城虽然不大，但作为边疆城市而言其规模是合理的，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居民成分也不只是农民，还有官府人员和工商业者，中小地主或贵族阶层占了一定比例，可见此城比较繁荣，应该是此地区内较大的聚邑，可能是战略位置比较重要的含军事性质的边城，抑或是县治所的所在。

由于宁城多被认为是在万全区东南部，因此北沙城通常被认为是文献记载中的“冈城”，水野清一便是持如是观点[45]。“冈城”是战国时期燕国人蔡泽的城邑，在蔡泽任秦相被封为“纲成君”[46]后得以此名，又叫武冈城。根据《水经注·漯水》记载：“于延水又东径冈城南”[47]，从地理位置上看来，“北沙城即是冈城”似乎是符合描述的。但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通过对城墙包含的遗物与墓葬内的遗物对比，我们已经知道这座城是始建于汉代中晚期的，因此从年代上来看，明显与理应是战国时期，最晚也应在秦朝以前就存在的冈城不符。这个年代上的矛盾使定论“北沙城就是冈城”还为时尚早。反而北沙城是宁城的可能性变大了。

汉武帝元狩年间“始置护乌桓校尉”[48]，其治所未能确定，根据《汉宫仪》所记或许在幽州，但《后汉书》记东汉初年光武帝“复置校尉于上谷甯城”[49]，句中用了“复”字，既可以理解为“再次设置护乌桓校尉一职，治所设在了上谷宁城”，同时也能理解为“再次于上谷宁城设置护乌桓校尉”，若取后者之意，便有可能意味着西汉或许并非起初就将护乌桓校尉府设于宁城，但一定在后期曾经设置于此过。假定北沙城就是宁城的话，以第一种含义理解，便是宁城的建成早于东汉护乌桓校尉的设置，若以第二种含义理解，便是西汉护乌桓校尉的设置早于宁城的建成，护乌桓校尉府在前期可能设在幽州某处（如州治蓟县），后期才改设于宁城。如此看来，北沙城建于西汉中后期，若其就是宁城的话，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出的年代时期，也是完全能解释得通的。

另外，前文也总结出北沙城的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它是在自汉武帝以后为了巩固边防与安置内迁乌桓而建立的边塞军事城市，地扼要处，这一点也与宁城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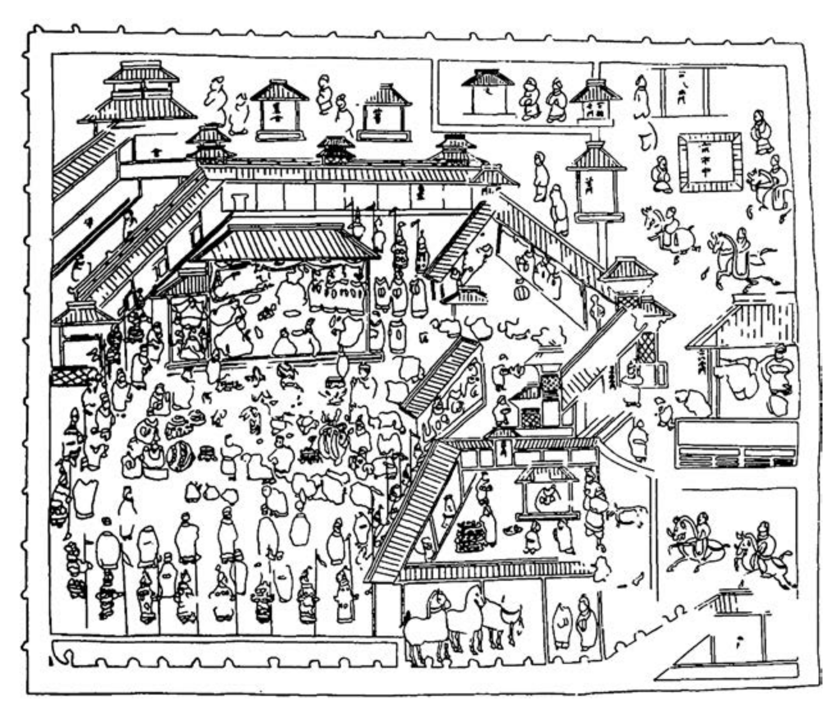
从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的“宁城图”中可以了解到，为了方便北方各民族经济贸易的

往来，宁城的护乌桓校尉幕府前、县城东门和南门之间标为“宁市中”的广场，被设为互市的主要场所，有市吏来回巡视，可见是有官府的专职人员管理互市的。而老龙湾墓葬带“木（市）亭”戳印陶片的出土，也证实了北沙城中存在市亭制度，并且地方官府会对要上市交易的商品进行监制或检验。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北沙城的市中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与何天明认为的“宁城周围的互市规模相当隆盛”[50]的情况接近。

从地理位置上看，虽然北沙城跟可能是宁川和黑城川水的河流的位置关系与文献记载不符，但也存在符合描述的点，那便是同样都在洋河的北岸。北沙城位于河谷的平原上，临东洋河与南洋河交汇之处，陆路属于必经要道，水路也较便利，从这一点看也是各民族之间进行互市的妥当地点。

综合以上数条理由，虽然与文献记载有相当的出入，但北沙城是宁城的可能性依然还是相当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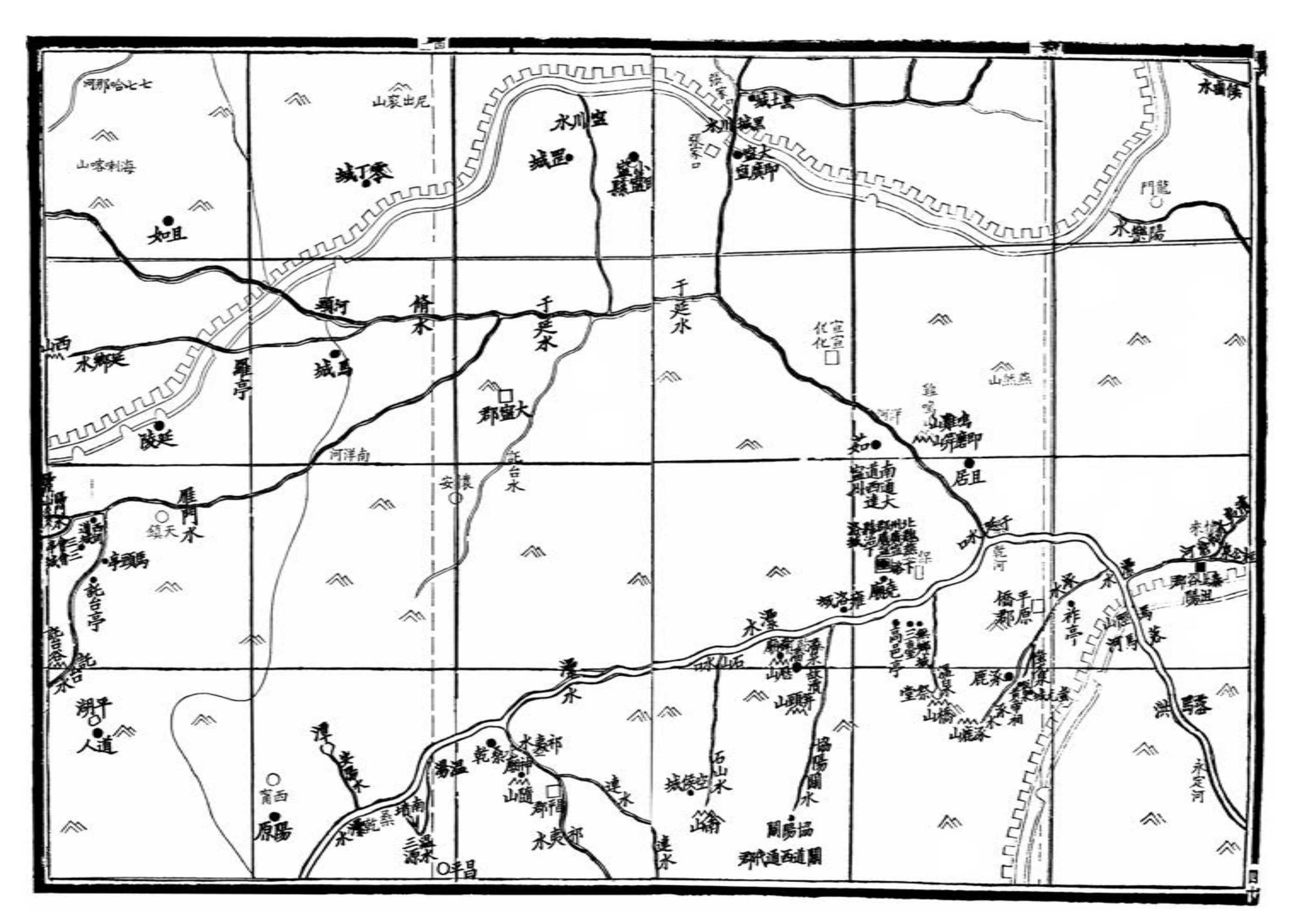
假设推定北沙城就是宁城的话，便可知宁城是个基本百丈见方，东南角为直角，西北角为锐角，呈东北—西南向，东、西、南城墙上各开一门，城垣宽厚，门有门楼的边城。城中有宁县寺（城东）、市场（城东南角）和占了很大面积的护乌桓校尉幕府。幕府内分为堂院、营舍和庖舍三部分，包括官府、粮仓、存放兵弩与资财的仓库、马厩等[51]。与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发掘报告结合，便能对宁城有更全面的了解，利于汉代边疆城市的研究（图五）。



图五　宁城图（局部）[52]

（采自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

附图一　《水经注·漯水》地理示意图



（采自杨守敬的《水经注图》）[53]



附图二 宣化府图

（采自《钦定大清一统志》宣化府卷）[54]

注　　释

［1］（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53册·史部11·正史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21．

［2］同［1］：139．

［3］（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54册·史部12·正史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27．

［4］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上）——《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J］．中国史研究，2000（3）：73．

［5］同［1］：218．

［6］（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中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180，1181．

［7］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403．

［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册）［M］．上海：中华书局，1955：772．

［9］（清）丁谦益．三国志外国传地理考证·乌桓鲜卑东夷传附鱼豢魏略西戎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校刊本）第1集［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15：374．

［10］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7, 220，221．

［11］（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49册·史部7·正史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32．

［12］（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3，114．

［13］（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474册·史部232·地理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8．

［14］黄盛璋．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与历史地理问题［J］．文物，1974（1）：41．

［15］同［6］．

［16］（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573册·史部331·地理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18．

［17］同［7］．

［18］同［8］．

［19］（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605册·史部363·政书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03．

［20］同［9］：359．

［21］同［9］：368．

［22］（清）左承业原修，施彦士续纂修．万全县志·序一［A］．新修方志丛刊·边疆方志之十三［C］．影印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23] （清）左承业纂修，施彦士绩纂修．万全县志·卷一·沿革十一［A］．新修方志丛刊·边疆方志之十三［C］．影印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
[24] 同［23］．
[25] 同［10］：189，843．
[26] 中华博物．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EB/OL］．http://www.gg-art.com/dictionary/index.php?bookid=33．2014年3月8日。
[27] 同［14］．
[28] 同［14］：39．
[29] 同［12］．
[30] 同［14］．
[31] 同［10］：2560．
[32] 同［10］：838．
[33] 同［16］．
[34] 同［13］：505，506．
[35] 刘建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J］．文物春秋，1993（4）：25．
[36] 杜林渊．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1（1）：70．
[37] 蒋璐．中国北方地区汉墓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9～29．
[38] 孙雅儒．从“美亭”陶文看市亭制度［J］．宝鸡社会科学，2011（2）：50～52．
[39] 考古报告中为“木亭”，疑为“市亭”的误判，因此在此采用“市亭”一说。
[40] 沈旸，周小棣，常军富等．明代夯土长城的城墙材料与构造——以大同镇段为例［J］．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1）：209．
[41] 王银田，何培．汉代城墙浅议［J］．中原文物，2010（2）：51．
[42] 曹臣明，白彦芳．大同市西郊吴官屯古城遗址调查［J］．文物季刊，1996（4）：18．
[43] 同［41］．
[44]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瓜州县博物馆．锁阳城遗址内城西北角发掘简报［J］．丝绸之路，2011（18）：34．
[45] 〔日〕水野清一，冈崎卯一．万安北沙城：蒙疆万安县北沙城及び怀安汉墓（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5册·第2卷）［M］．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6：76．
[46] （清）永瑢，纪昀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244册·史部2·正史类［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4～499．
[47] 同［16］．
[48] 同［1］：720．
[49] 同［1］：720．
[50] 何天明．两汉皇朝解决北方民族事务的统治机构——护乌桓校尉［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93．

［51］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7．
［52］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J］．文物，1974（1）：16．
［53］　同［12］．
［54］　同［13］：484，485．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Title "Huwuhuanxiaowei" Based in Ningcheng City

Wong Yin Nai

Abstract: "Huwuhuanxiaowei" was an important official title initiated by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ansty. It awarded to administrators who ruled in the City of Ningcheng, whose role was to fight against the Huns and manage the Wuhuan. Ningcheng City thu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rth, but due to a lack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ts location is still controversed.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 proposed three possible locations for the town: the surroundings of Kongjiazhuang in Wanquan County, Wanquan Town, or the west of Xuanhua County and the south of Zhangjiakou. In this paper, I will discuss these few possibilities, integrating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scholars' excavation report entitled "Wanan North Shache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eldwork.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I explore and research the probability that Ningcheng City was in fact in North Shacheng.

Keywords: Wuhuan; Huwuhuanxiaowei; Administrative place; Nincheng City of Shanggu; Guangning; North Shacheng

西安张安世家族墓地刍议

刘汉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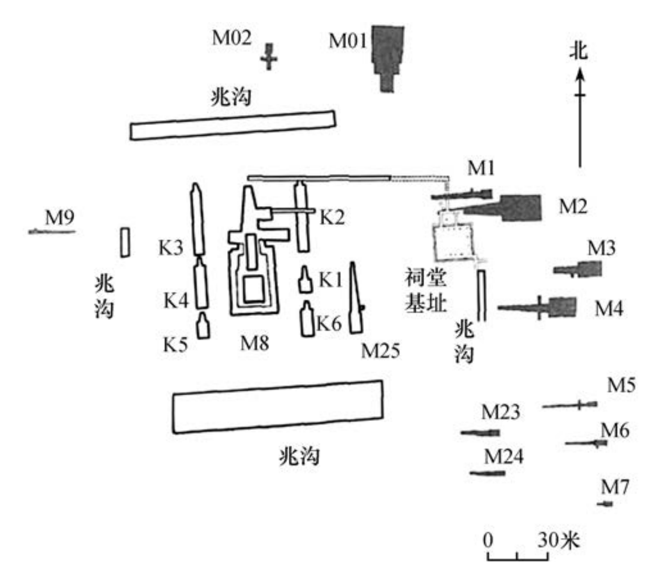
内容摘要：本文对西安南郊凤栖塬发现的张安世家族墓地进行讨论、分析，可知墓地内埋葬着包括张安世在内的五代人，并依据墓葬规模、出土遗物同时结合史料对墓地内的墓葬主人进行辨识。通过对墓地内葬俗分析可知，张安世家族墓地内夫妻合葬主要是以同坟异穴合葬为主，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则是同茔异穴合葬；墓位排列以早期墓葬为核心，晚期墓葬左右相聚；陵园内的建筑规模和规格都是符合当时规制的。家族墓地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不仅直接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而且还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张氏家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家业世承，利害与共，死后则长眠在族人共同的墓地中享受子孙按时的祭祀，这样的生活形态一直延续至今。

关键词：西安凤栖原；张安世；家族墓地；葬俗

2008 年 7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位于西安市南郊凤栖塬上的张安世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墓地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新莽时期，墓地内埋葬着张安世及其数代子孙，进而形成了家族墓地[1]。凤栖塬是杜陵塬的一部分，海拔 470 ~ 630 米，处在渭河南岸北眺汉长安城，南接巍巍秦岭，地势高亢，土厚水深，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埋葬之地。墓地处在凤栖塬的一道高岗之上，此地在秦汉时期，属于杜县。墓地东距杜陵陵园 6 千米，西距汉杜县县城亦 6 千米，北距汉长安城约 17 千米。本文依据墓葬规模、出土遗物结合史料对墓地内的墓葬主人及墓地内合葬礼俗、墓位排列及墓园附属建筑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墓 地 概 况

墓地的核心区是一块平面略呈方形的墓园，墓园内有 2 座“甲”字形大墓及 6 座陪葬坑、祠堂建筑基址、道路、排水道、四周的壕沟组成。墓园的北、东、西三面祔葬 12 座中、小型墓葬，墓园和祔葬墓共同组成了一个家族墓地[2]（图一）。



图一　张安世家族墓地总平面图

（采自张仲立、丁岩、朱艳玲：《凤栖原汉墓——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中国文化遗产》2011 年第 6 期）

墓园处于墓地的核心区域，东西长 195、南北宽 159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墓园内有“甲”字形大墓 M8、M25 及 6 座陪葬坑。M8 地表残留封土高 1 ~ 1.3 米，封土略呈长方形，现存面积约 4050 平方米。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带耳室的竖穴土坑砖、木椁墓。墓向朝北，墓室的东、南、西三面有“之”字形状的台阶。墓室分为前、后椁室。葬具为二椁一棺，具体为主椁室四壁砖砌椁室、砖椁内置木椁，形成两层椁室，内外层椁室之间填充木炭，木椁中间放置木棺。在后椁室木棺内出土了玉璧 9 件，以及玉衣残片、金器、铜器、陶豆、陶罐等。前椁室内随葬不少于 7 辆马车，其中 2 辆与原车等比例，5 辆是原车的 1/4。陪葬坑出土了不少于 2000 件的陶、木甲士俑及木质战车和各类金属兵器。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尤其是印章），综合判定 M8 的墓主人是西汉宣帝时期的重臣张安世。

M25 位于 M8 的东南侧 25 米处，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带耳室砖室洞墓，墓向亦朝北。砖室内设有木椁，盗扰被毁，出土了玉衣残片、玉璧、陶器、车马饰件。在耳室内发现了灰陶罐、釉硬陶壶、1/4 大小的车马器。综合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墓葬之间的距离，推测 M25 墓主人是西汉中期一位列侯夫人，即 M8 墓主张安世的夫人。

祠堂基址位于 M8 以东 80 米处，一号建筑基址主体部分是高台建筑，为面三进五的方形建筑，门道向东，边长 19 米。有完整的台阶、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建筑遗迹，从地层上观察，该建筑基址还经过扩建。

道路呈东西向，东接祠堂基址的北端，西接 M8 墓道的北部。道路长 35、宽 2.5、残存厚度约 0.4 米。道路修筑为先开挖基槽然后回填黄土夯实，再整修路面，最后在路两侧竖立方砖。

壕沟位于核心墓葬和祠堂的四周，以此成为墓园的标识。这些壕沟彼此互不相连，深 2 ~ 3 米，长宽则不同。南、北壕沟长 70 余米，其中南壕沟宽 20 米，东、西壕沟则为 20 余米。正如文中所说，壕沟的组合明确显示了墓园界域的存在和壕沟区域内确切是为某一特定人员所属[3]。

在墓园的北、东、西三部，分布了 12 座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的祔葬墓，这些墓葬均为 M8 墓主张安世的后代子孙墓葬。

北部 2 座，M01、M02 墓向朝南。囿于材料信息尚未发布，我们综合已经发掘的其他墓葬信息，对 M01、M02 墓葬进行大致的推测。M01 位于东侧，M02 位于西侧，二者之间的距离较远且 M01 的墓葬规模和体积大于 M02。其中 M01 的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积石、积炭墓。M02 的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墓道两侧带有耳室。综合其他同等规模的墓葬，我们可知这 2 座墓葬的墓主人应该是某一代列侯及夫人或有血缘关系的晚辈、同辈兄弟之间的合葬，合葬方式应该为同茔异穴。

东部 9 座，依据墓葬规模的大小及与墓园之间的位置关系，可分为两个北、南两区。

北区 4 座墓葬，位于墓园的正东方，墓葬形制较大且距离墓园较近，墓葬两两一组，呈“对子墓”的形式分布，墓向朝西，南北并列近似一排。

M1 位于最北端，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砖室墓，该墓保存较完整。耳室随葬了 11 件编织盛器及 1 件大型彩绘漆木箱。墓室内随葬了彩绘漆器及金、银、铜座漆器。报告认定墓主人为某一代列侯夫人。

M2 紧接 M1，位于 M1 的东南。墓葬规模和体积远远大于 M1，囿于报告中没给出 M2 的墓葬具体信息，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大体的推测。综合已经发掘的其他级别的墓葬，我们可以对 M2 的墓葬形制进行大体推测，墓葬形式为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墓，或积沙、积石、积炭，随葬品的等级和规模应该高于 M1。故我们认为墓主人应该为某一代的列侯，M1、M2 的关系应该为夫妻同坟异穴合葬。

M3 位于 M2 的东南，二者距离较远。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墓，墓室内填细沙。细沙之下有棚木朽痕，棚木之下发现棺椁构件的朽木板，由于墓室盗扰严重，仅发现口琀和铁钉。耳室保存完整，有陶器 13、铁戈 1 件及朽皮铠甲和麻织品[4]，墓主人应该亦为某一代的列侯夫人或官秩两千石中、高级官吏。

M4 位于 M3 的西南且二者距离较近，墓葬形制高于 M3 及其体积要大于 M3。M4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积石、积炭墓，墓室内填细沙、石，细沙、石之下亦有棚木朽痕。椁室最外层为砖椁，砖椁内安放木椁，砖、木椁之间放置木炭。其主椁室的做法亦如 M8 椁室。在椁室内出土了 1 件印“长乐未央”的龟形印章。南北耳室随葬品有陶罐（灰陶、釉陶、釉硬陶）、陶壶、车马器饰件、木箱、铁釜、陶钵、鎏金器物及铁质明器构件。该墓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墓主人为某一代的列侯，在该家族中具有很重要的社会地位。M3、M4 的关系应该为夫妻或同辈兄弟同坟异穴合葬。

南区 5 座墓葬，位于墓园的东南，墓葬形制相对于北区的较小且距离墓园较远。墓

葬两两一组，亦呈“对子墓”的形式分布，墓向亦朝西。墓葬南北并列，呈两列分布，一列 2 座（M23、M24）、一列 3 座（M5、M6、M7）（图一）。

M5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墓道南北两侧带有耳室。墓室为双层条砖修筑。墓室内发现“大泉五十”钱币。耳室里发现（灰陶、釉陶）陶壶、（灰陶、釉陶）陶罐、陶灶、麻织品、漆器（残）[5]。

M6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洞墓，墓室一侧有侧室，随葬品被盗严重，仅有“大泉五十”钱币[6]。

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我们可知 M5、M6 的时代为新莽时期，墓主人官秩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等中级官吏。

其余的 3 座墓葬形制应该亦为斜坡墓道土洞或砖室墓，囿于报告中尚未给出具体信息，我们不宜过多推测。但是纵观南区的墓葬形制和已经发掘的 2 座墓葬的信息，我们或可说南区的墓葬的时代上限不会早于新莽时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中期。其中 M23、M24，M5、M6 应该为夫妻或同辈兄弟同茔异穴合葬，M7 应该与 M5、M6 有着某种血缘或姻亲上的关系，身份应该为张氏大家族中某个小家庭中的一员。

西部只有 1 座墓葬 M9，墓向朝东，从墓葬形制来看可能为斜坡墓道砖室墓，且墓室的北侧有一侧室。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知道关于随葬品、墓葬年代等详细的信息。报告中指出墓葬的合葬形式为夫妻同坟同穴合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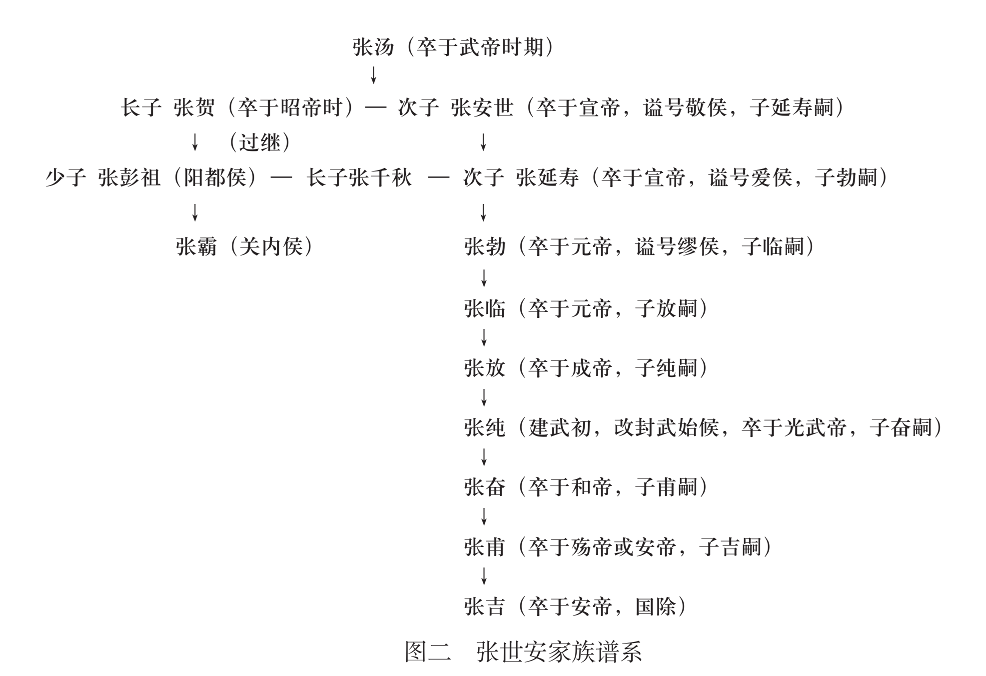
二、墓葬主人的辨识

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凤栖塬汉墓群应该是以 M8 所在的墓园为核心的家族墓地。从时空延续的角度上看，它是在西汉中期张安世墓园的基础上，逐渐地向四周延续扩大的家族墓地。这一由墓园向家族墓地变化的特征明显，祔葬墓时代越早，规模越大、体量也越大、墓室结构也越复杂，随着时代推移，规模逐渐变小、体量也在变小、墓室结构趋向简单。按照韩国河先生对汉代墓葬的四类分法[7]，张安世家族墓地中的 6 座墓葬（M8、M25、M1、M2、M3、M4）为二类墓葬，即诸侯王、列侯、郡太守及二千石以上官秩的墓，8 座墓葬（M01、M02、M5、M6、M7、M9、M23、M24）为三类墓葬，即县令或相仿等级的墓。整个墓地的时代从元康四年（前 62 年）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23 年），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张安世家族逐渐衰落的一个过程。

《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武帝时）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即位，……光以朝无旧臣，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将军光白太后，徙安世为车骑将军，与共征立昌邑王。……（宣帝）万六百户，功次大将军。元康四年（前 62 年），安世病，上疏归侯，乞骸骨。……至秋薨。天子赠因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8]张安世墓园的发掘已证实史料记载的准确性。

墓园北、东、西三面 12 座墓葬的主人又是张安世的哪一代子孙呢？我们首先根据史料梳理下张安世的家族谱系。

汉景帝时期，张汤的父亲为“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秩四百石，经过张汤直到东汉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张吉“卒，无子，国除”，共经历三朝十代，“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9]。我们将采用更直观的形式，把张安世家族西汉至东汉时期的族系建立起来，如下（图二）。



图二　张世安家族谱系

张安世的父亲张汤，于景帝、武帝间，依靠精通律令文书和对皇帝的忠诚官至御史大夫，“无尺寸之功，起于刀笔吏，陛下幸至位三公，无以塞责。……遂自杀”[10]。《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二年（前 115 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2002 年 4 ~ 10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发掘清理了西汉中期御史大夫张汤墓（编号 M20）[11]。张汤墓亦位于少陵原上，杜城南 3 千米处，张安世家族墓地西 6 千米处。

故从以上的资料中可知，在死亡时间上和张安世家族墓地时代一致的只有五代人——张安世夫妇，（子）张千秋、张延寿，（孙）张勃，（曾孙）张临，（玄孙）张放。

整个墓地规模较大的墓葬共有四组，除了 M8、M25，还有 M01、M02，M1、M2，M3、M4 三组墓葬，均为某一代列侯和夫人的异穴合葬。其中 M01、M02 位于墓园的北部，M1、M2，M3、M4 位于墓园的东部。诸侯王、列侯是仅次于天子的，故他们的墓葬及一些附属设施尽量去仿效天子的陵墓。例如，西汉帝陵的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帝陵以东，有少量的在帝陵以北，距离东司马门越近的陪葬墓主人地位越高[12]。如若按照这个标准，则陵园东部的 M1、M2，M3、M4 墓葬的地位明显要高于陵园北部

的 M01、M02，同时 M1、M2，M3、M4 作为祔葬墓更靠近墓园主墓（M8、M25），而 M01、M02 则距离墓园主墓稍远，这些反映了墓园东部 4 座墓葬墓主与墓园主墓墓主的血缘关系更加密切，北部的 2 座墓葬墓主与墓园主墓墓主的血缘关系稍远。

我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来分析，M4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积石、积炭墓，墓室内填细沙、石，细沙、石之下亦有棚木朽痕。其主椁室的做法亦如 M8 椁室。在椁室内出土 1 件印有“长乐未央”的龟形印章。可知，M4 墓葬规模和等级仅次于 M8，且 M8 的陪葬坑 K1 发现 1 件印有“护军都尉”的铜质龟形印章。据《汉旧仪》载：“诸侯王印，黄金骆驼纽，文曰‘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13] 故 M4 的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官秩较高的列侯。《汉书·张汤传》云：“延寿为为光禄勋，领宿卫臣。……（安世）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以为北地太守，……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安世）薨。子延寿嗣。……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薨，谥曰爱侯。”，光禄勋原秦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14]。同时 M4 的椁室里发现了“长乐未央”的印章。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M4 的墓主人可能为张安世的次子——爱侯张延寿。

M3 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墓，墓室内填细沙。细沙之下有棚木朽痕，棚木之下发现棺椁构件的朽木板，耳室保存完整，有陶器 13、铁戈 1 件及朽皮铠甲和麻织品。其墓葬规模明显小于及随葬品明显少于 M4。从耳室出土的皮铠甲可知，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高级军吏。据《汉书·张汤传》载：“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友明击乌桓。还，谒大将军霍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军事，画地成图，无所忘矣”，“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15]，因此我们认为 M3 的墓主人可能为张安世的长子——中郎将张千秋。

我们推测 M2 的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墓，墓室内积沙、积石、积炭。依据墓葬规模较大及与墓园核心主墓之间距离较近。墓主也是一位等级较高的列侯且与 M8 有较为密切血缘关系。据《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的兄长，张贺“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贺有一子早死，无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其封贺弟子侍中关内侯彭祖为阳都侯。”依秦汉时期二十军功爵位制，可知，“十九级关内侯，二十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颜师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16]。“其人（彭祖）谨敕，无所亏损，神爵三年（前 59 年）为其小妻所毒薨，国除”[17]。综合以上信息，我们认为 M2 的墓主人应该是张安世的三子——阳都侯张彭祖，其在张安世去世后三年埋入该墓地，M1 应该为张彭祖夫人墓葬。

至于 M01 推测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土圹积沙、积石、积炭墓。墓葬规模比较大，应该为某一代列侯墓。纵观整个张安世家族，生活在宣帝至王莽时代除了张安世的三个儿子之外，还有（孙）张勃、（曾孙）张临、（玄孙）张放三代人。

张勃，“延寿，薨……，子勃嗣，为散骑谏大夫。元帝初即位，勃举太官献丞陈汤。汤有罪，勃坐削户二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后汤立功西域，世以勃为人知”[18]。

张临，“勃，薨……子临嗣。临亦谦俭……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临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19]。

张放，“(成帝)鸿嘉中……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常从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左迁放为北地都尉。数月，复征入侍中。太后以放为言，出放为天水属国都尉。……居虽余，征放归第视母公主疾。数月，主有瘳，出放为河东都尉。后复征放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两千石。岁余，丞相方进复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赐钱五百万，遣就国。数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20]。

结合以上史料可知，张临谦俭，死后财物分给自己的宗族故人，实行薄葬。张放虽独得成帝的喜爱，无奈被太后、丞相认为是奸佞小人，成帝不得已把其遣送其封国，数月，成帝崩，因思慕成帝哭泣而死。其葬地应该在封国内，不会埋入凤栖塬张安世家族墓地内。死后葬封地，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有此做法，如战国秦相魏冉“复益封陶”，《史记索隐》：陶即定陶也，王劭按：定陶见有魏冉冢[21]。亦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2009年在江苏盱眙县大云山发现江都王刘非陵园[22]。《汉书·武五子传》：“其(汉宣帝)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2011年在江西南昌发现海昏侯刘贺陵园[23]。

故张安世家族墓地中的M01的墓主人为张勃的可能性最大，其官至散骑谏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张勃死后谥缪侯。M01的墓葬的规模与生前的社会地位相匹配，故M01的墓主人可能为张安世的孙子——缪侯张勃。M02可能为其夫人墓或有血缘关系的晚辈、同辈兄弟之间的合葬。

三、对墓地内合葬礼俗、墓位排列及墓园附属建筑的认识

对于墓地中出现的合葬墓如M8、M25，M1、M2，这两组墓葬每组墓葬形制一致，墓葬方向也一致，时代相近且二者之间的距离较近，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子墓”[24]，这种关系的墓葬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夫妻合葬关系。

合葬墓在埋葬方式上有异坟异穴合葬、同坟异穴合葬、同坟同穴异室合葬、同穴异棺合葬等[25]。张安世家族墓地墓葬合葬类型有同坟异穴合葬(M8、M25，M1、M2)，主要形式为两两一组的“对子墓”左右分布，还有同坟同穴合葬(M9)，这两种形式的合葬多为夫妻关系。例如，《诗经·王风·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话强调夫妻同穴合葬的合法性。从总体上分析张安世家族不同时代的家族成员合葬同葬一墓地，则构成了一种同茔异穴合葬的形式。合葬位置关系的变化是社会不断发展、家族观念不断

被加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社会思想意识不断强调的是“宗族”观念，在人际关系上如《礼记·礼运篇》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政权上强调的是一种血缘政治关系。在这种制度下，死者依照宗法制，同一宗族成员聚族而葬，形成一种“族坟墓”，是《诗经·小雅》中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公有制的具体表现。到了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使黔首自实其田也”[26]。此时国家才允许土地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思想意识强调的是“家庭”观念，人际关系上亦如《礼记·礼运篇》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政权开始强调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关系。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后汉文化的主要新特点之一就是家族墓地的兴起[27]，死者依照家庭经济实力，以家庭为单位自由选择墓地，同一个家庭成员聚族而葬，形成家族墓地。

至于张安世家族墓地中墓葬的排列形式，韩国河先生认为广大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家族墓排列形式大约脱胎于族坟制中“长辈居前”的排列方式，经过了父子两代相背或左右聚葬的格局，最后在东汉晚期形成了依次排列的模式[28]。同时我们认为西安地区西汉时期中小型家族墓地中墓葬的排列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长辈居前，晚辈居后；二是以早期墓葬为核心左右相聚，又可分为同期墓葬和前后延续墓葬；三是父子两代相背，两墓相背不仅包括了单座墓葬之间的相背也包括“对子墓”之间的相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家族墓地中墓位的排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要根据地形、地势不断地进行调整。由此可见，张安世家族墓地中墓位的排列形式主要是第二种，即以早期墓葬为核心，晚期墓葬左右相聚。

关于墓园及附属建筑的规模，早在西汉早期就已经有相关律例规定。例如，2006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葬律》载：“彻侯衣衾毋过盈棺，衣衾敛束。荒所用次也。其杀：小敛用一特牛，棺、开各一大牢，祖一特牛，遣一大牢。……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围阙，垣四陬为罘罳。”[29]

此《葬律》的记录的葬俗制度应该是早于武帝时期。《葬律》的记载列侯的茔地“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我们按照一尺等于23厘米（汉尺）计算，可知列侯墓园的规模东西长103.5、南北宽96.6米，祠堂边长13.8米，而张安世家族墓园东西长195、南北宽159米，祠堂边长19米。对比可知张安世家族墓园远超《葬律》的定制。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从西汉早期到中期后段，政府对列侯墓园大小的法律规定已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体现了一个王朝财力较大发展[30]。另一方面从史料中可知“(安世薨）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其中的“将作”是秦代的将作少府，主要“掌治宫室”。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将作大将，“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31]。由此可知，张安世陵园为皇家建筑队建造，应该是完全按照当时的丧葬礼制来进行，不存在僭越一说。

对于家族墓地中的界域标识，不同的阶层是有差别的。诸侯王的墓地界域主要是夯墙。例如，海昏侯刘贺陵园的墙基和墙体均为夯筑[32]；江都王刘非陵园四面筑陵墙，地表尚有长约 150 米的墙体保存较好，其余三面陵墙大多剩余夯土墙体[33]。列候、豪强地主的家族墓地以隍壕为界域。例如，张安世家族墓地中的壕沟位于核心墓葬和祠堂的四周，这些壕沟彼此互不相连，深 2 ~ 3 米，长宽则不同。南、北壕沟长 70 余米，其中南壕沟宽 20 米，东、西壕沟则为 20 余米。又如，阳陵陪葬墓墓园内的家族墓地均以隍壕分隔，其中东西向隍壕 22 条，南北向隍壕百余条。这些隍壕把陪葬墓园分成 16 排 107 座，致使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34]。庶族地主及一般庶民百姓的家族墓地则以树木为标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般庶族家族墓地内没有发现壕沟的原因。秦汉时期在墓地栽植树木已蔚然成风。《艺文类聚》卷八八引《东观汉记》："李恂遭父母丧，六年躬自负土树柏，常住冢下。"[35]诗云："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36]又如东汉末年的仲长统所言："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识其坟。"[37]可见，在墓葬周围及墓地内栽植树木的主要是作为墓地的标识，以便于识其坟。

四、余　论

家族墓地的形成是家庭内部成员自我认同的一种体现。对于家族墓地中的家庭成员合葬形式不是共时的，它们之间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演变过程。张安世家族墓地中埋葬者张安世家族的五代人，反映出张氏家族在西汉宣帝至新莽时期 80 多年，人口繁衍较盛。据研究西汉时期人口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来岁[38]，那么我们取中间值三十岁。平均寿命越短，意味着死亡率越高。假设前者为 N，后者为 R，二者的关系可表示为：$R=1/N$，$N=30$，故 $R=3.3\%$，所以西汉时期人口死亡率（R）为 3.3%[39]。要计算日常人口数，要先知道墓地的使用年限。张安世家族墓地从宣帝元康四年（前 62 年）"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40]，一直到新莽时期（23 年），共 85 年，墓地共埋葬 15 人[41]。由此我们可推算出墓地日常人口数保持在 5 人左右[42]。我们可以说这个日常人口数是高于当时社会水平的，这也反映了西汉中后期以后由于内外安定，农业丰收，人口的增加，虽然在西汉后期也有多次大的自然灾害且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但是由于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及人口增长的惯性，到哀帝时"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43]。这也说明了贵族阶层由于其处于社会的高层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容易受到战争、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繁衍速度较快。《汉书 · 平帝纪》载："元始五年诏曰：'唯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

在墓葬分布形式上，是以张安世夫妇（M8、M25）为核心的主墓，所有祔葬墓的墓向都朝向张安世（M8）的大墓，即晚辈墓葬的墓向均指向长辈的墓葬，以长辈为核心分布其四周。祔葬墓以夫妻、长辈与晚辈或同辈兄弟异穴合葬为主，形成了以早期墓

葬为核心，晚期墓葬左右相聚的形式。第一代祖先的“独立墓园”开始形成，并有属于自己阶层墓域界限——壕沟，后代子孙以早期墓葬为中心集中归葬于壕沟周围，组成了按照一定的次序埋葬而形成的墓葬群。家族墓地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不仅直接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而且还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

张安世家族墓地规模较大，遗迹复杂，功能完善，除了主墓外，还有附属的祠堂、陪葬坑、壕沟、道路、排水道及为数众多的子孙陪葬墓。张氏家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家业世承，利害与共，死后则长眠在族人共同的墓地中享受子孙按时的祭祀[44]，这样的生活形态延续数千年。

注　释

[1] 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塬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J］．考古与文物．2009（5）：111，112.

b. 张仲立，丁岩，朱艳玲．西汉大将军的家族墓园［J］．中国文化遗产．2011（6）：82～91.

[2] 同［1］b：83.

[3] 同［1］b：88.

[4] 同［1］a.

[5] 同［1］a.

[6] 同［1］a.

[7]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156.

[8]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 （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其载：“张安世昭帝元凤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

[10] 同［8］.

[11] a.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4（6）：22～28.

b. 张翔宇先生认为，西北政法学院长安校区发掘的有张汤印章的西汉墓，墓主人张汤并不是汉武帝年间的御史大夫张汤，二者只是同姓名而已。张翔宇．西汉“张汤”墓相关问题探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26.

[12]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210.

[13] （汉）卫宏．汉旧仪（附补遗）［M］． 孙星衍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 （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 同［14］.

[16] 同［14］.

[17]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 同［8］.
［19］ 同［8］.
［20］ 同［8］.
［2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 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J］．考古．2012（7）：53 ~ 59.
［2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J］．考古．2016，（7）：45 ~ 62.
［24］ 在山西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中出现 6 组 12 座呈“对子墓”形式分布的，简报指出此葬俗为夫妻关系，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 269、270 号东周墓［J］．考古学报．1974（2）：83，84.
［25］ 同［7］：223.
［26］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7］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A］．古史的考古学探索［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86.
［28］ 同［7］：257.
［29］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睡虎地 M77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4）：31，37.《葬律》见彩版一五左起 5，9 简。
［30］ 刘瑞．海昏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J］．南方文物，2016（3）：56.
［31］ 同［14］.
［32］ 同［23］.
［33］ 同［22］.
［34］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41.
［35］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515.
［36］ （梁）萧统．文选·卷二九·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7］ （梁）萧统．文选·卷十六·潘安仁怀旧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注引仲长统昌言.
［38］ 葛剑雄先生认为，西汉时期人口平均寿命估计不过三十来岁，见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另据高大伦先生推测汉代人口平均寿命略低于 34 岁。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J］．历史研究，1998（5）：115.
［39］ 人口计算公式参考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A］．仰韶文化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48 ~ 261.
［40］ 同［14］.
［41］ 墓地中共有墓葬 14 座，其中单人葬的墓葬共有 13 座，只有 M9 为夫妻合葬。
［42］ 用埋葬人口数（15）除以墓地延续时间（85）得出平均每年死亡人数（0.18），后再除以人口死亡率（3.3%）。即 15 ÷ 85=0.18，0.18 ÷ 3.3%=5。
［43］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4］ 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A］．家族与社会［C］．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88，89.

Research on the Zhang Anshi Family Cemetery in Xi’an

Liu Han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Zhang Anshi family cemetery found in Fengqiyuan,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Xi’an. Five generations, including Zhang Anshi, are buried in the cemetery. The tomb owners a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the grav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unearthed grave good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urial customs in the Zhang Anshi family cemetery, it can be seen husbands and wives were placed in the same burial cave. The family members are buried in the same place but in different chambers. Early tombs form the core of the cemetery, to which late tombs are added, while the scale and specifications of buildings in the cemetery are in line with the regulations at the time. As a material carrier, family cemeteries not only directly reflect funeral customs, but also reflects social organization at the time. Members of the Zhang family lived as a group, benefiting and sharing. After their death, they shared a common cemetery and enjoyed sacrifices from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is form of life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Keywords: Xi’an Fengqiyuan; Zhang Anshi; Family cemetery; Funeral custom

嘉勉与笼络——论朝鲜、蒙古及俄罗斯境内出土汉代“乘舆”铭漆器及其性质

卢　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871）

内容摘要：天子所用“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汉代漆器上的“乘舆”铭文，表明这些漆器应是皇室宫廷用器。“乘舆”铭漆器在朝鲜、蒙古境内出土，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朝鲜及中国贵州、甘肃等汉代边境地区发现的“乘舆”漆器，是汉朝中央对边郡官员特别的赏赐与嘉勉。蒙古、俄罗斯匈奴贵族墓中随葬的“乘舆”漆器，是汉代贡纳体系的物证，体现了汉廷对匈奴的怀柔与笼络。从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地发现的“乘舆”漆器中，我们可以管窥汉朝边疆经营与对外关系的策略与政治手段。

关键词：“乘舆”漆器；朝鲜；边郡；匈奴；赏赐

1916年，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人在朝鲜平壤附近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时，在石岩里九号墓中发现了2件有“乘舆”铭的汉代漆器。其后十几年，在朝鲜平壤一带的汉墓中，经考古发掘及私人盗掘发现的汉代“乘舆”铭漆器有30余件。大约同时期，俄罗斯学者与蒙古学者在蒙古乌兰巴托市以北100千米的诺彦乌拉山谷发掘了一批匈奴时代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批游牧文化特色的木器、马具、毛织物以及来自汉朝的铜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其中，在个别漆器上也有“乘舆”铭文[1]。

东汉蔡邕《独断》中记，汉天子“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2]。因此，这些“乘舆”铭的漆器，显然应是汉皇室宫廷御用之器。何以天子所用的“乘舆”之器会在遥远的朝鲜、蒙古境内出土，学界也有不少讨论。对于朝鲜出土“乘舆”漆器的来源，此前学者争议较多。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通过贸易流通到达朝鲜的[3]，有些学者则认为这些御用漆器在朝鲜的发现，显然是来自皇帝的赏赐[4]。对于蒙古出土的“乘舆”漆器的来源，学界意见较为统一，基本认为是来自汉廷赠送的礼物[5]。

要讨论朝鲜、蒙古境内出土的这批“乘舆”漆器，特别是朝鲜出土的“乘舆”漆器的性质，需要结合目前国内发现的其他“乘舆”漆器，从其出土的特殊墓葬背景出发，才能真正理清这批漆器的性质。而从这些“乘舆”漆器中，我们也可以管窥汉王朝边疆

经营与对外关系的策略。

一、中央的嘉勉：汉代边郡墓葬中发现的“乘舆”漆器

（一）朝鲜境内汉代墓葬中发现的汉代“乘舆”漆器

自 1916 年，日本学者关野贞等人在朝鲜平壤附近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并在石岩里九号墓中发现汉代“乘舆”漆器起，日本学者在朝鲜平壤一带的汉墓中共发现了 10 余件有明确出土单位的汉代“乘舆”铭漆器（表一）[6]。

表一　朝鲜出土汉代“乘舆”铭漆器

出土墓葬	器物类型	纪年	铭文
石岩里 M194	盘	永始元年（前 16 年）	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汧画纻黄釦饭{槃}，容一斗，髹工壶，上工壶，铜釦黄涂工甲，画工恭，汧工之，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䁂，掾谭，守令史通主
	盘	永始元年（前 16 年）	永始元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汧画纻黄釦饭槃，容一斗，髹工广，上工广，铜釦黄涂工政，画工年，汧工威，清工东，造工林造，护工卒史安，长孝，丞䁂，掾谭，守令史通主
	耳杯	元始三年（3 年）	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汧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丰，髹工赣，上工谭，铜耳黄涂工充，画工谭，汧工戎，清工政，造工宜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宽主
	扁壶	阳朔二年（前 23 年）	阳朔二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汧画木黄釦榼，容二斗，素工广，髹工严，上工贵，铜釦黄涂工勋，画工长，汧工尊，清工博，造工同造，护工卒史成，长□，丞为，掾熹，佐宜王主
	耳杯	始建国五年（13 年）	□□国五年。子同郡工官。造乘舆髹汧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髹工丰，上工讵，黄耳工立，画工敖，汧工威，清工昌，造工成，护工史辅，宰首，守丞□，掾忠，史仓，掌大尹播，威德子□□□
石岩里 M201	耳杯	元始四年（4 年）	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纻鬶棓，容二升，髹工玄，上工护，画工武，造工仁造，护工卒史惮，长亲，丞冯，掾史，守令史万主
石岩里 M9	盘	居摄三年（8 年）	居耶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汧画纻……，造工弘造，护工卒史严，长……
	盘	居摄三年（8 年）	居耶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汧画纻黄釦果槃，髹工广，上工广，铜釦黄涂工充，画工广，汧工丰，清工平，造工宜造，护工卒史章，长良，守丞巨，掾亲，守令史严主

续表

出土墓葬	器物类型	纪年	铭文
乐浪王盱墓（石岩里 M205）	耳杯	建武廿一年（45 年）	建武廿一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泪木侠纻杯，容二升二合，素工伯，髹工鱼，上工广，泪工合，造工隆造，护工卒史凡，长匡，丞鲔，掾恂，令史郎主
	耳杯	建武廿八年（52 年）	建武廿八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侠纻量（？）二升二合羹棓，素工回，髹工吴，沚工文，泪工廷，造工忠，护工卒史旱，长汜，丞庚，掾翕，令史茂主
贞柏里 M200	耳杯	建武三十年（54 年）	建武三十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容二升二合，素工□，髹工右，沚工寿，泪工都，造工□造，护工卒史凡，长匡，守丞长，掾恂，令史应（？）主
	耳杯	永平十一年（68 年）	永平十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侠纻量一升八合棓，素工武，髹工戎，沚工翕，泪工当，造工代，护工掾封，长丰，丞嵩，掾羽，令史强主
梧野里 M21	耳杯	永平十四年（71 年）	永平十四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侠纻容（？）一升八合棓，素工寿，沚工封，髹工常，泪工长，造工原，护工掾顺，长周（？），守丞惟，掾羽，令史方主

除表一所列有明确“乘舆”铭文的漆器外，朝鲜境内还出土了多件由“考工”“供工”所造的漆器（表二）。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可知，“考工”原名“考工室”，是少府属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考工”[7]。“考工”“供工”都是设立在都城内的官营作坊，其产品供皇室宫廷使用[8]。

表二　朝鲜出土汉代“考工”“供工”造漆器

出土墓葬	器物类型	纪年	铭文
贞柏里 M17	耳杯	永光元年（前 43 年）	永光元年，考工工赐[9]，□□□，啬夫憙主，右丞裁（？），令蜀省
	耳杯	永光元年（前 43 年）	永光元年供工，髹画工贺，泪工□，涂工……，宝（？），令建省
石岩里 M194	盒	绥和元年（前 8 年）	绥和元年，供工工彭造，掾临主，守右丞何，守令凤省
石岩里 M201	盘	居摄三年（8 年）	髹泪画纻银涂釦斗槃，居摄三年，考工工虞造，守令史昔，掾赏主，守右丞月，守令孟省
	盘	居摄三年（8 年）	髹泪画纻铜银涂扣饭槃，容一斗，居摄三年……守令史并，掾庆主，右丞□，令就省
	杯	居摄三年（8 年）	□铜银涂耳杯，容二升，居摄三年，供工工服造，守令史并……令就省

（二）中国境内汉代边郡墓葬中发现的“乘舆”漆器

中国境内出土汉代“乘舆”铭漆器的墓葬较多，其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可分为截

然不同的两类。第一类，墓葬等级较高，随葬品丰富，墓主人身份多与诸侯王、列侯有关，包括湖南永州鹞子岭 M2，墓主人为泉陵侯夫人；江苏邗江宝女墩 M104，墓主人与广陵国王室有密切关系；邗江姚庄 M102，其墓主人可能为广陵国中高级属官；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墓，墓中出土玉衣残片，因此推测其墓主身份等级也应很高[10]。这些墓主，因其自身身份等级及与皇室、诸侯王较密切的关系，拥有来自皇室赏赐的“乘舆”漆器并不为奇。

而第二类墓葬，其墓中出土随葬品的种类、数量都远不如第一类墓葬丰富，其墓葬等级在整个汉墓等级中绝非高等级墓葬，但在当地发掘的汉式墓葬中又属等级较高者。同时，这几座墓葬皆位于属汉代边境地区的贵州、甘肃等地。何以这类墓葬中有“乘舆”铭漆器出土，这也是下文将着重讨论的问题。

1. 贵州清镇汉墓出土“乘舆”漆器

贵州地区秦汉时期的墓葬，多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土著民族墓葬，但在清镇、平坝、安顺一带，发现了较多与中原地区汉墓形制相同的汉式墓葬。在清镇地区的四座汉墓中，出土了“乘舆”漆器（表三）[11]。

表三　贵州清镇汉墓出土“乘舆”漆器

出土墓葬	器物类型	纪年	铭文
1958 年贵州清镇 M13	盘	元始三年（3 年）	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羽画木黄耳棓……工豊、髹工建、上工尝、铜耳黄涂工武、画工典、羽工万、清工政、造工□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竟主
1958 年贵州清镇 M15	耳杯	元始三年（3 年）	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泪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泪工平，清工�，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1958 年贵州清镇 M17	耳杯	元始三年（3 年）	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泪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髹工隆，上工孙，铜耳黄涂工惠，画工□，泪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
1959 年贵州清镇 M56	盘	元始四年（4 年）	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泪画纻黄釦饭槃，容一升，髹工则，上工良，铜釦黄涂工伟，画工谊，泪工平，清工郎造，护工卒史恽，长亲，丞冯，掾忠，守令史万主

2. 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绥和元年（前 8 年）“乘舆”漆器[12]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 M62 中，也出土了 2 件由“考工”制作的“乘舆”漆器，铭文如下：

乘舆髹泪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籥，绥和元年考工工并造，泪工丰，护臣

彭，佐臣诩（？），啬夫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望（？）省。

以上，无论是朝鲜地区，还是中国贵州、甘肃等地出土“乘舆”漆器的墓葬，在汉墓中等级都不高，其墓主人身份显然也与皇族、列侯无关。因此，对于这些墓葬中出土“乘舆”漆器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显然不是来自天子的赏赐，而是商品买卖的结果[13]。但若仔细分析材料，会发现“商品买卖”这样的解释并不合理。首先，蜀郡、广汉郡工官的“乘舆”供御漆器以及少府属官“考工”“供工”生产的漆器，都是一种专供生产，不能作为一般商品进入市场买卖[14]；其次，朝鲜地区出土“乘舆”铭及“考工”“供工”铭漆器数量很大，墓葬很多，且漆器制作的年代跨度有百余年（最早者前43年，最晚的为71年），若以“购买”解释这批漆器的来源，则远在朝鲜边地的居民，需要能够长期、稳定、大量地购买四川地区工官作坊生产或是中央作坊生产的供御漆器，显然这并不合理。

我们认为，想要理清朝鲜和中国贵州、甘肃地区汉墓中发现的“乘舆”漆器的性质，必须要明白这些墓葬特殊的背景。

西汉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攻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了汉朝郡县制统治范围，此后的420余年间，以平壤为中心的西北朝鲜地区长期处于汉朝中央政权的郡县制管辖之下。而经过日本学者20世纪初对平壤附近遗址、墓葬的调查，已经可以确定，今平壤一带，应就是汉代乐浪郡郡治所在。王培新在《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中将乐浪地区汉墓分为三级[15]。通过比对可以得知，出土“乘舆”铭及“考工”、“供工”铭漆器的墓葬，尽管在整个汉代墓葬等级序列中仅为中小贵族等级墓葬，但在乐浪地区皆为乐浪汉墓中最高等级的墓葬。由墓中出土的印章可知，这些墓葬的墓主身份应是乐浪郡县内的官吏，如石岩里M205出土“五官掾王盱印”，表明墓主是郡的属吏五官掾；与出土“乘舆”漆器墓葬等级规模相当的贞柏里127号墓出土“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表明墓主是乐浪郡的掾官。在汉代，郡县最高长官一般由中央派遣，而郡县的属吏则一般由本地人士出任，而这些人本身通常就是当地的豪族大姓，乐浪郡的情况也是如此[16]。

同样，汉武帝时，因向贵州地区的夜郎等国开拓道路，特设犍为、武陵、牂牁等郡并施加军事压力，以征服南越、滇国并远通身毒。其中，牂牁郡治就在今贵州安顺、清镇、平坝一带。贵州清镇发现的汉文化墓葬，是牂牁郡县内官吏与居民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乘舆”漆器的墓葬，作为当地汉式墓葬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其墓主身份应是当地郡县属吏（同时也是本地豪族）。

甘肃武威，两汉时属武威郡，原是匈奴休屠王之地，汉武帝太初四年置郡，是西北地区重要的边郡之一。从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看，武威磨咀子M62墓葬，其墓主身份应也是武威郡县的官吏。

综上，朝鲜及中国贵州、甘肃地区出土“乘舆”漆器的墓葬具有相同的特征：第

一，这些墓葬均位于乐浪郡、牂牁郡、武威郡这些汉代边境地区的郡县内，这些边郡地处边境，并与土著少数民族杂处，其地理位置及政治作用对汉王朝的意义，与一般郡县有异；第二，这些墓葬的墓主身份皆为郡县属吏，同时亦为本地豪族，他们对当地政治秩序的维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我们认为，“乘舆”漆器出土于这类性质的墓葬中，绝非巧合，也并不是商品买卖的结果。这些“乘舆”漆器，应是来自于中央的直接赏赐。这种赏赐与对一般皇室贵族的赏赐不同，是中央对边郡地区特殊的赏赐，是对这些边郡属吏（同时也是当时豪姓大族）的一种嘉勉。中央通过将供御的漆器赏赐给这些边郡官吏，表现了对边郡官吏的重视，加强了与边郡的联系，有利于这些边郡地区统治的稳定。

二、帝国的礼物：蒙古、俄罗斯境内匈奴贵族墓葬中发现的“乘舆”漆器

目前蒙古、俄罗斯境内发现的“乘舆”漆器，共出土于三处匈奴贵族墓地中。由于这些漆器的详细材料大多零散发表于发掘简报、论文与图录中，下文先对这几批漆器材料进行介绍与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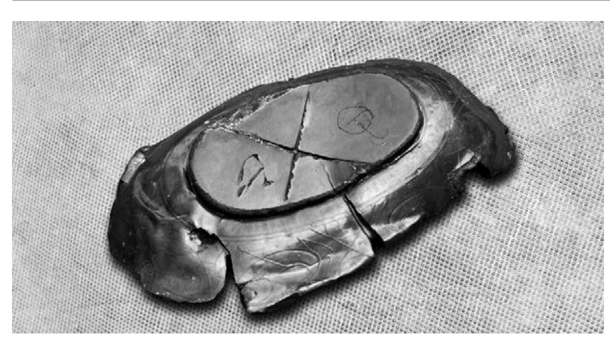
（一）诺彦乌拉墓群中出土的“乘舆”漆器[17]

目前，蒙古国境内匈奴墓葬中发现的汉代“乘舆”铭漆器，主要发现于诺彦乌拉墓群。1912 年，俄国矿业勘探技术人员巴勒洛德在诺彦乌拉山谷寻找金矿时，发现并盗掘了楚鲁姆台谷口的一座坟冢，成为诺彦乌拉匈奴墓地发现的开端。1924 ~ 1925 年，苏联考古学家、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西藏考察团在此地进行大量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苏楚克台、楚鲁姆台和古德日台三处墓地共发现了 212 座匈奴时期墓葬，发掘了 8 座带墓道的大墓和 4 座小墓。1927 年，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姆科夫发掘了苏楚克台谷口的 M5 和另一座“西姆科夫”墓（即 M1）。1954 ~ 1957 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带领的考古队，再次对诺彦乌拉山谷的墓葬群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工作。2006 年，俄罗斯－蒙古联合考古队在诺彦乌拉再次发掘了一座带墓道的中型墓苏楚克台 M20。2009 年，俄罗斯－蒙古联合考古队又发掘了苏楚克台 M31。

在历次对诺彦乌拉匈奴墓群的发掘中，共出土汉代“乘舆”铭漆器三件，此外，还出土两件无“乘舆”铭，但可证明与汉代皇室宫廷有直接关系的漆器。

1.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 出土“元延四年”（前 9 年）耳杯[18]

2006 年发现于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木胎，内腹髹红漆，外腹髹褐色漆，其上朱漆绘对鸟纹，双耳有铜釦。两耳已从器身分离，器身部分残断（图一）。器底近圈足




图一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 出土“元延四年”耳杯

处针刻铭文 46 字（其中重文 1）：

乘舆髹汧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元延四年考工工通缮，汧工宪，守佐臣文，啬夫臣勋，掾臣文臣，右丞臣光，令臣谭省[19]。

此外，器底处有刻划符号。

由铭文可知，这件漆器，是汉成帝元延四年（前 9 年），由设立在都城的“考工”所造供御的漆器。

2.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31 出土“元延四年”（前 9 年）耳杯

2009 年发现于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31。木胎，内腹髹红漆，外腹髹黑漆，其上朱绘对鸟纹，双耳有铜釦，器身已残（图二）。器底近圈足处针刻铭文 54 字（其中重文 1）：

乘舆髹汧画木黄耳一升十六籥棓，元延四年考工工相造、汧工宪画，护臣隆，守佐臣文，啬夫臣勋，令史臣□，掾臣文主，右丞臣光，令臣□省。



图二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31 出土“元延四年”耳杯

由铭文可知，这件漆器，是汉成帝元延四年（前 9 年）“考工”所造供御的漆器。这件漆器与 M20 出土的漆器，为同一年在同一作坊所作，而其中汧工亦为同一人，即“宪”。各级负责监管的官员，也基本相同。

3. 诺彦乌拉楚鲁姆台“西姆科夫”墓（M1）出土的“建平五年”（前 2 年）耳杯

1927 年发现于诺彦乌拉楚鲁姆台“西姆科夫”墓（即 M1）[20]。木胎，内腹髹红漆，外腹髹黑漆，其上朱漆绘对鸟纹，双耳上有鎏金铜釦，器身已残断（图三）[21]。




图三　诺彦乌拉楚鲁姆台“西姆科夫”墓出土“建平五年”耳杯

圈足上针刻铭文 69 个字：

> 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汧画木黄耳棓，容一升十六籥，素工尊，髹工褒，上工寿，铜耳黄涂工宗，画工□，汧工丰，清工白，造工□造，护工卒史巡，守长克，丞骏，掾丰，守令史严主。

由铭文可知，这件漆器，是汉哀帝建平五年（前 2 年）蜀郡西工所造供御的漆器。蜀郡西工与广汉郡工官，皆为中央设在四川的工官，以生产漆器，特别是有金银铜釦的漆器为主[22]。值得注意的是，汉哀帝建平纪年只有四年，第五年已改号为“元寿”，所以此件漆器的纪年有误。虽然纪年有误，但从器物形制、纹饰、铭文格式、书体等方面看，这件漆器都应为一件工官造漆器无疑。使用建平五年纪年的原因我们无法确定，推测可能是工官作坊提前制作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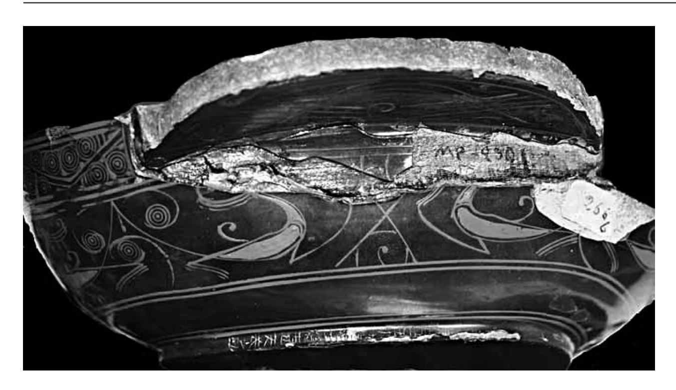
4.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6 出土“建平五年”（前 2 年）耳杯

发现于 1924 ~ 1925 年科兹洛夫等人发掘的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6 中。木胎，内髹红漆，外腹髹黑漆，其上绘线条纤细的对鸟纹，双耳有鎏金铜釦，器身略残（图四）[23]。器底圈足外圈有刻铭 17 字：

> 建平五年九月，工王潭经，画工获，啬夫武省。

器底正中朱漆“上林”二字。

有学者认为，这件漆器铭文中有许多细节，都不符合工官、“考工”漆器铭文的标准格式。第一，一般工官漆器铭文中，记录时间时，只出现年，而不出现月；第二，一般





图四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6 出土“建平五年”耳杯

工官漆器铭文中，只记录工匠的姓（或私名），而不记录全名；第三，铭文中年号有错误，建平第五年已改年号，不应再出现建平五年的年号，因此，这件器物的铭文可能铭文并不是汉朝工匠刻的，而是别地工匠模仿汉朝工匠习惯制作而成[24]，或是漆器是私人作坊为官府制作[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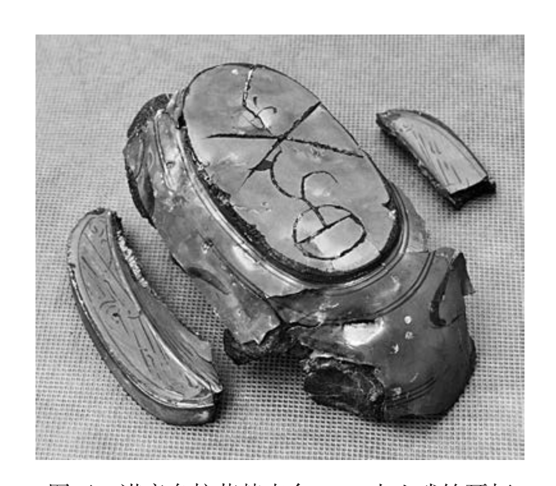
无论铭文格式规范与否，都不可否认，此件漆器曾经为皇室宫廷之器。此时期漆器上的漆书文字，通常表示器物的拥有者或使用地点。因此，尽管漆器的刻铭中，并无“乘舆”二字，但从器底朱漆的“上林”二字可以得知，此件耳杯原来应是长安上林苑宫殿使用的器物。耳杯刻铭的格式，确实与工官、“考工”“供工”制作的漆器铭文不同，但铭文中出现的“啬夫”一职，是官府作坊中负责管理的小吏，因此，推测此耳杯可能是其他官府作坊生产的产品。而其中出现的年号错误，恰与诺彦乌拉楚鲁姆台 M1 所出蜀郡西工造乘舆耳杯、湖南永州鹞子岭 M2 所出广汉郡工官造乘舆漆盘上出现的年号错误一致，显然也不能将其认为是私人作坊制作的结果。

5.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 出土耳杯[26]

与另一件铭文保存完整的“元延四年”耳杯同出于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 中。木胎，外腹髹黑褐色漆，其上黑褐色漆绘对鸟纹，双耳有铜釦（图五）。由于器身残破，器底近圈足处的针刻铭文仅残存 14 字：

……掾臣孝主，守右丞臣忠，守令臣画省。

虽然因铭文残存，无法获知此件器物为何处工官所作，但从记录监管官员的官秩、



图五　诺彦乌拉苏楚克台 M20 出土残铭耳杯

私名的辞例看，这显然也是四川工官或设在都城的“考工”“供工”制作的供宫廷使用的器物。由于此器与同墓所出的考工造耳杯（图一）皆为元延四年造，但监管官员上至令，下至掾皆姓名不同，推测此件器物可能并非由“考工”所造，而从官员中存在右丞一职可知，亦非蜀郡、广汉郡工官所造，推测应是“供工”的产品。

（二）高勒毛都Ⅰ号墓地出土“永始元年”（前16年）漆盘[27]

高勒毛都Ⅰ号墓地位于蒙古后杭爱省东北部呼尼河流域，也是一处著名的匈奴墓地。墓地中有三座带墓道的大型贵族墓葬，其中M20中出土了一件有铭漆盘残片，由于漆盘保存较差，铭文仅残存31字，其中重文1字（图六）：



图六　高勒毛都Ⅰ号墓地出土“永始元年”漆盘铭文局部

……黄釦尺五寸旋，永始元年供工工武造，护臣敬……掾臣昌主右丞臣□守令臣并省。

由铭文可知，这件漆盘，是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供工”所造漆器。虽然此件铭文有缺，但从以往发现的其他有铭漆器判断，铭文句首应有“乘舆”二字。

（三）查拉姆墓地M7出土漆盒[28]

查拉姆墓地，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内查拉姆谷，是一处匈奴贵族墓地。其中大型墓葬M7中出土了一件有铭漆盒残片，由于漆盒保存较差，铭文仅残存26字，其中重文1字（图七）：

……年考工工赏造，啬夫臣康，掾臣安主，右丞臣……令臣……护工卒史臣尊省。

由铭文可知，这件漆盒由“考工”所作。虽然铭文有缺，但可以推测，铭文句首应与其他几件漆器一样，有“乘舆”二字。

诺彦乌拉墓群、高勒毛都Ⅰ号墓地以及查拉姆墓地，都是匈奴帝国晚期贵族精英墓地中等级较高的墓地，特别是诺彦乌拉苏楚克台M20及查拉姆墓地M7，根据其墓中随葬朱轮安车推测，其墓主应是地位非常高的匈奴贵族，很可能是皇族家族

成员——匈奴单于或地位很高的王[29]。而以上“乘舆”供御漆器（及无“乘舆”铭文但可知为汉朝宫廷使用的漆器）无一例外，皆发现于这些大型匈奴贵族墓葬中，并非偶然。这些漆器，是通过汉朝对匈奴单于的赏赐来到匈奴所在地区的，是匈奴被纳入汉朝贡纳体系之中的真实物证。



图七　查拉姆墓地 M7 出土有铭漆盒残片局部

汉宣帝甘露元年（前 53 年），呼韩邪单于听取左伊秩訾王的建议，决定称臣入朝事汉，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也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甘露三年（前 51 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朝汉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并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30]。至此，匈奴正式被纳入汉帝国的贡纳体系中[31]。

此后，匈奴单于多次入长安朝见，每次汉朝皇帝都给予单于大量的赏赐[32]。

（1）黄龙元年（前 49 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2）竟宁元年（前 33 年），汉朝对匈奴的赏赐，“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3）河平四年（前 25 年），单于入朝朝见，汉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

（4）元寿二年（前 1 年），乌珠留若鞮单于来朝，宿于上林苑，皇帝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它如河平时”；后来又“厚赏赐焉”。

从文献可知，汉廷赐予匈奴的物产，从食物、冠带衣裳、丝织品、日用器具到马车、黄金等，无所不有，其中虽未明确提及漆器，但作为宫廷所用的器物，特别是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盛食器，赏赐给单于也是合理的。而当这些赏赐品到达匈奴后，显而易见，许多被分给了匈奴统治阶层的显贵们。因此，我们得以在匈奴高等级贵族墓中，看到这些来自汉朝的供御漆器。它们与来自汉王朝的马车、铜器、玉器、丝织品等，组成了匈奴贵族精英墓葬中最常见的身份标识物[33]。

在汉朝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中，汉王朝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但这样数量庞大的赏赐，其政治上的必要性远大于经济上的消耗。汉朝的官员也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扬雄在建平四年（前 3 年）劝谏汉哀帝接受匈奴单于朝见请求的上疏中言：“日逐、呼韩邪携国归化，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

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34]

正如扬雄所言，这些零星发现于匈奴贵族墓葬中的“乘舆”漆器，就如其他来自汉庭的礼物一样，饱含了汉朝对匈奴的怀柔笼络之意。

天子或中央的赏赐行为，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这种通过物品传达政治意义的策略，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汉朝通过对边郡官吏的赏赐，中央与边境的联系得到了巩固。而通过对匈奴的赏赐，达到了笼络与怀柔的目的，将其牢牢控制在以汉朝为中心的贡纳体系中。朝鲜、蒙古、俄罗斯及境内贵州、甘肃等地出土的“乘舆”漆器，正是汉朝这种政治手段最直接的物证。

注　释

[1] 20世纪20～30年代，朝鲜、蒙古出土的汉代有铭漆器，梅原末治曾将其汇集出版，见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M］．京都：桑名文星堂，1943：6～51.

[2] a.（汉）蔡邕．独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

b.（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96. 文中据孙奭《律音义》引补蔡邕《独断》内容为“天子车马衣服器盛百物曰乘舆”，与今本《独断》略异，但其大意一致。

[3] a．陈直．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1957（2）：1～20．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02. 陈直认为，朝鲜汉墓中出土的蜀郡工官生产的“乘舆”漆器，是蜀郡工官生产出的剩余部分，然后以高价出售的，朝鲜汉墓中的这批漆器，是购买所得。

b. 高炜．汉代漆器的发现与研究［A］．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476. 文中也认为这些“乘舆”之器，有相当一部分应是进奉皇室后的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卖出的。

c. 宋治民．汉代手工业［M］．成都：巴蜀书社，1992：72.

[4] a. 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19.

b. 白云翔．汉代“蜀郡西工造”的考古学论述［J］．四川文物，2014（6）：39～51.

[5] 持此观点的学者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如余英时著．汉代贸易与扩张［M］．邬文玲，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1.

[6] a. 同［1］.

b. 榧本社人，町田章．汉代纪年铭漆器聚成［A］．乐浪汉墓（第一册）［C］．奈良：乐浪汉墓刊行会，1974：96～122. 本文只讨论有“乘舆”铭且有明确出土单位的漆器，盗掘所得漆器，因缺少出土背景信息，暂不列入表中，也不进行讨论，表二中统计的“考工”“供工”制造漆器亦然。朝鲜境内汉墓中出土的漆器，部分由于保存原因，铭文有残，但从漆器形制以及残存铭文中记录的工匠名、官吏名来看，可能也是“乘舆”漆器，但因缺少确切铭文，本文亦

暂不列入。

c. 本文涉及的漆器铭文释文，除特别指明外，主要参考丁唯涵．战国秦汉漆木器文字汇编［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一五·百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3581.“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制作漆器应属于考工所作“杂工”中的一类，西汉时期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目前考古发现汉代考工所作漆器数量较多。

［8］有关“考工”“供工”生产漆器的研究，如工官性质、生产、管理官秩等内容，参看［4］a：190 ~ 194.

［9］前人多将此篇铭文中的“考工”释为“右工”，参见：

a. 同［1］：8.

b. 同［6］b：97.

c. 同［6］c：439.

但通过对铭文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考工”中“考”字的第一横刻在了上一字“年”字字末，使得“年”字最后多了一横，而“考”字少了一横，因此很容易将“考工”误释为“右工”，实际铭文应为“考工”无误，也有学者认为此处应为“考工”，参见［4］a：166.

［10］a.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州市芝山区文物管理所．湖南永州市鹞子岭二号西汉墓［J］．考古，2001（4）：45 ~ 62.

b.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J］． 文物，1991（10）：39 ~ 61.

c. 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姚庄 102 号汉墓［J］． 考古，2000（4）：50 ~ 65.

d. 开封市文物管理处．河南杞县许村岗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 考古，2000（1）：38 ~ 44.

［1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59（1）：85 ~ 103.

［12］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2（12）：9 ~ 21.

［13］a. 同［3］.

b. 罗二虎．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J］． 四川文物，2001（2）：49 ~ 52. 文中并未直接言明清镇汉墓出土的乘舆漆器是商品买卖的结果，但认为它们是四川地区直接输入的，也暗示着应是购买而来。

［14］同［4］b.

［15］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6.

［16］a. 同［13］b.

b. 同［15］：99.

［17］诺彦乌拉墓群中出土的有铭漆器材料，主要参见 A N Chistyakova. Lacquer Cup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Noin Ula, Mongolia): An Analysis of Inscriptions [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1 (39/4): 83-89. 但铭文释文的意见，未参考此篇文章。

［18］A N Chistyakova.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Lacquer Cup from Noin Ula Mound 20 (Mongolia) [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9 (37/3): 59-68.

［19］ 原释文将“汧工”释为“涓工”，本文同意洪石、丁唯涵、任攀等学者的意见，应释为“汧工”，以下皆从，参见：

a.［4］a：181～183.

b.［6］c.

c. 任攀.《东汉元和二年“蜀郡西工造”鎏金银铜舟》补正——兼说“汧”字［A］.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33～642.

［20］ 在许多报告中，将此件耳杯的出土单位记为诺彦乌拉 M5 或 M6，是错误的。此件耳杯应出土于 M1，参见［17］.

［21］ Eregzen, Gelegdory.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M]. Ulaanbaatar: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85.

［22］ 有关蜀郡、广汉郡工官生产漆器的研究，已非常详细，包括工官性质、设立时间、生产流程等各方面内容，参看［4］a：170～189.

［23］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Chinese Lacquerware from Noyon uul: Some Problems of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J]. *The Silk Road*, 2009 (7): 31-41.

［24］ 同［17］.

［25］ 同［23］.

［26］ 同［18］.

［27］ a. 同［21］：184.

b. Yeruul-Erdene Chimiddorj, Ikue Otani. The Chinese Inscription on the Lacquerware Unearthed from Tomb 20, Gol Mod Ⅰ Site, Mongolia [J]. *The Silk Road*, 2015 (13): 104-108. 铭文释文亦参考本文。

［28］ a. Sergei S Miniaev, L M Sakharovskaia. Investigation of a Xiongnu Royal Tomb Complex in the Tsaraam Valley Part 2: The Inventory of Barrow No.7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Site [J]. *The Silk Road*, 2007 (5): 44-56.

b.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A Chinese Inscription from a Xiongnu Elite Barrow in the Tsaraam Cemetery [J]. *The Silk Road*, 2007 (5): 56-58.

［29］ 单月英. 匈奴考古学文化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207.

［30］（东汉）班固.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798.

［31］ 有关匈奴与汉朝之间的贡纳关系的研究，详见［5］：39～59.

［32］ 同［30］：3798，3803，3808，3817.

［33］ 同［29］：184.

［34］ 同［30］：3814.

Research on Han Dynasty “Chengyu”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North Korea and Mongolia

Lu Yi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chengyu” inscriptions indicate belonging to the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Chengyu” inscriptions on lacquerwares indicate that these lacquerwares belonged to the emperor or the royal family of Han Dynasty. Lacquerwares with the “chengyu” inscriptions that were founde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Mongolia have special political meaning. Lacquerware with “chengyu” inscriptions foun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re a kind of awar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officials on duty in frontier areas to encourage them. Lacquerware found in the Xiongnu elite tombs in Mongolia were gifts from Han Dynasty to the Xiongnu and their ruler, the Shanyu, to strenght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Xiongnu and the Han Dynasty. Lacquerware with “chengyu” inscriptions foun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Mongolia, illustrate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frontier management and diplomacy under the Han Dynasty.

Keywords: Lacquerwares with “chengyu” inscriptions; Korean Peninsula; Frontier areas; Xiongnu; Reward

试论与春捺钵有关的几类遗存*

孟庆旭[1]　武　松[2]

（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130033；2.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长春，130012）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为与春捺钵活动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文章将遗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分布于湖沼岸边的大量土台遗迹，典型的遗址为乾安县花敖泡东南岸的后鸣字区遗址，应该是春捺钵活动中渔猎行为遗存；第二类为大型城址，典型遗存为白城市城四家子城址，应该是春捺钵活动的重要经济后勤保障基地；第三类为大规模的离宫式建筑遗址，典型的为洮南市河夹信子遗址。应该是春捺钵活动中的驻跸之地。这三类遗址性质特殊，经过调查发掘，应该与春捺钵活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春捺钵；遗址；建筑址

"捺钵"一词，根据傅乐焕先生的考证，应为"行营""行帐"之意，而四时捺钵则是辽代特有的政治制度，辽代皇帝通过四时巡游来管理国土、安抚边境，其中春捺钵主要处理辽国东北部的政务及女真等部落的事务，这在辽代中后期的政治活动中尤为重要。

近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吉林省中西部地区的辽金遗存展开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本文就此对其中与辽代春捺钵有关的遗存进行简单讨论。

经近年调查与发掘的考古遗存，推测与辽代春捺钵有关的遗存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分布于湖沼岸边的由大量的夯垫土台群组成的遗址，遗址中的土台出土遗物很少，此类遗存可能是春捺钵活动的渔猎营地。第二类遗存是可提供经济与军事力量支持春捺钵活动的大型城址。第三类是处于河湖岸边的大规模宫殿式建筑址，此类建筑址可为春捺钵活动提供驻跸之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伊通河、饮马河及西流松花江流域辽金城址发掘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9CKG020。

一、第一类遗存

春捺钵史料中着墨最多的是一系列渔猎行为，其中不乏“头鱼宴”“头鹅宴”这样详细的描写。与此有关的遗存在近年的调查发掘中发现较多，主要分布于乾安县花敖泡及查干湖岸边，其中花敖泡东南岸后鸣字区发现土台 900 多座，“高度多在 1.5 ~ 2.5 米，大型土台子的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1]。查干湖沿岸的遗址群主要分布于西南岸，可分为腾字区遗址、藏字区遗址和地字区遗址，调查显示“查干湖西南岸 3 处遗址土台的总数量超过 1000 座”[2]。

通过发掘显示，这些土台都是由人工夯垫而成，其上多数都没有人工建筑的痕迹，推断当时生活设施为帐篷类建筑。“花敖泡湖周围是盐碱地草甸草原，资源有限，草原植被很脆弱，不能承载成千上万的人马长期生活，所以遗址所在地只能是‘轮牧’式的季节性营地”[3]。普通牧民的季节性营地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且简陋，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建筑防潮用的土台，而春捺钵这一大规模渔猎行为则会产生此类遗存。

无独有偶，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和开鲁县的交界，也分布着这样大规模的人工夯垫的土台群。被命名为阿都乌素辽代遗址群，经李鹏先生通过遥感技术和地面田野调查分析，判定为与辽代冬捺钵活动有关的遗址，并认为“‘阿都乌素辽代遗址群’就是‘中会川’”[4]。

目前发现的此类遗存皆位于较大的湖泊岸边，方便捺钵活动中的渔猎活动。在捺钵活动的春季，湖岸环境湿冷，这些遗址存在大规模的人工夯垫的土台基，起到了一定的防潮作用。同时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显示，遗址区内遗物稀少，说明当时春捺钵活动的主要人群并未在此长期生活。

二、第二类遗存

春捺钵活动不仅是单纯的渔猎娱乐，它还是“辽代皇帝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重大活动，也是辽国监管、笼络北方诸部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辽国政治体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那么，春捺钵中的诸多政治经济活动必然要依托于更大规模的遗址，吉林省西部处于春捺钵活动范围内的大型辽金城址主要有白城市洮北区的城四家子古城、松原市前郭县的塔虎城以及松原市宁江区境内的伯都古城。

2000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塔虎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城内出土绝大多数遗物为金代遗物，城址主要使用时间为金代，“可以确定塔虎城为金代肇州”[6]。因此，塔虎城与辽代春捺钵活动无关。

2013 ~ 2016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四家子城址进行了连续 4 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通过发掘，在城内建筑倒塌堆积中“发现了‘大安八年’‘大安九年’等带

有确切纪年的墨书文字”[7]。同时在城内还发掘了陶窑，通过调查，还发现了冶铁、骨器、金银器、玉器、琉璃器制作等相关遗迹线索。在城外发现了大型的砖瓦窑以及规模巨大的城外居民区。

对城内的调查显示，城内存在大量的高等级建筑，这些建筑倒塌废弃后在城内风化掩埋成大量的土包，土包上散布着大量的砖瓦等遗物。观察发现，这些土包排列有序，可以清楚地看出原来的建筑格局，通过统计，城内存在着 11 处拥有三四重建筑的大型建筑址。以城址西侧北部的三号建筑群为例，三号建筑群由从北向南依次排列的 1、2、3、4 号夯土台基构成，其中在 3、4 号台基之间西侧，存在着南北排列的 5、6 号夯土台基，东侧存在着南北排列的 7、8 号台基。3、4、5、6、7、8 号台基围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式院落结构，与其后部的 1、2 号台基组成一个多重院落遗址。其中 3 号台基规模最大，应该是这组建筑群的核心建筑。

三号建筑群北部为规模略小的二号建筑群，南部为规模与之相当的四号建筑群，四号建筑群南部有一处建筑群，部分被叠压于现代村落下。此四处建筑群南北向排列，连同其西侧的同样南北排列的三处大型建筑址占据了整个城址西部，面积达到城址面积的 1/4，形成了城址西部的高等级建筑区。

城内南部正中，则是城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址，地表遗留的土包也是规模最大的，其现存土包形状略呈十字形，最高处高于城内平均海拔约 8 米，其主体部分南北长 500 余米，东西宽 400 余米，在其主体两侧，还存在多个左右对称的小型建筑址。该区域内，地表有大量的砖瓦建筑构件以及高级的瓷器。可见，以该土包为核心存在一个大规模高等级的建筑区，且城址的四座城门连线交汇于该建筑区中心，说明该建筑区为城内核心建筑，从其规模看，应该是一处大型的辽代宫殿式建筑。

根据彭善国、宋德辉、赵里萌等先生的考证，城四家子城址为辽代的长春州[8]，那么上文中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应当即是文献中所记载的长春宫。据高福顺等先生的统计研究表明，在辽代晚期，辽代皇帝举行捺钵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上京之东北的长春州春捺钵游猎区域”[9]。由此可见，城四家子城址内高等级建筑及各类手工业遗存可为春捺钵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城四家子城址是春捺钵活动中的重要节点。

2017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对伯都古城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在城内发现了大型夯土台基式建筑遗存，并采集到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根据调查，“推测伯都古城应为辽代宁江州，金初之后即废弃”[10]。《松漠纪闻》记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11] 说明辽代春捺钵活动曾涉及伯都古城。

三、第三类遗存

春捺钵活动除了渔猎营地和提供经济军事支撑的大型州城之外，应该还有日常行程

中的驻跸之地，在近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类遗存可能与此有关。

洮南市二龙乡有河夹信子遗址，遗址北邻洮儿河，该遗址未发现城墙迹象，地表可见大型台基建筑倒塌后形成的土包，根据土包的排列分布可判断存在两组大型建筑群，第一组为南北排列的三处台基建筑构成，整个建筑群南北跨度约 150 米。这组建筑内出土了大量的砖瓦残片，并出土大型的花岗岩柱础，其中部分柱础还雕刻了精美的覆莲式花纹，推测应存在宫殿式的建筑。第二组建筑群位于第一组的西南，由南北排列的两处台基建筑构成，整个建筑群南北跨度约 100 米，这组建筑内发现了砖铺火炕的遗迹现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片，此组建筑应该与生活有关。地表遗物显示该建筑址的主要使用年代为辽代。

此处遗存位于洮儿河岸边，周边并无大型辽金时期的遗址，且处于辽代春捺钵活动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判断，河夹信子遗址应该是辽代的大型离宫，是春捺钵活动行程中辽代皇帝的一处驻跸之地。

农安县万顺乡有土城子城址，2017 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林大学对城址进行了调查，调查采集到辽代平折沿陶片及金代瓷片，确定城址使用年代为辽金时期。城址周长 1432 米[12]，规模较小，但在城址南部发现了大规模台基式建筑遗存，此类遗存占据城址面积一半以上，地表可见大量砖瓦类建筑遗存。由此可判断城址内存在着高等级建筑，且建筑面积与城址规模不相符，城址有可能是专为该组建筑而建的离宫式的宫城。

城址西南即为以波罗泡为主的湖沼群，此区域同样处于春捺钵活动的地域范围之内。且春捺钵活动之后，辽帝一行需南下辽河流域，开始夏捺钵活动。此区域是其必经之地。故而，农安万顺土城子城址有可能与春捺钵活动有关，是一处驻跸休整之所。

金代“循辽人故事，春水秋山，四时捺钵”，2017 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村的一处金代城址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一座周长约 1500 米的金代皇室行宫遗址，其城内发现建筑台基 28 座，可组合出数个大型建筑群，其中 1、2、3 号台基组成的建筑群跨度在 100 米左右，与河夹信子第一组建筑群相当。太子城出土了大量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以及带“尚食局”字样的精美白瓷。发掘者认为“太子城是龙关镇一带唯一一处金代中后期有宫廷性质的城址，故太子城有可能即《金史》中记载金章宗驻夏的泰和宫”[13]。

可见此类离宫遗存有着鲜明的特点，所处位置均位于古代重要的交通线上，周围地理环境优越。同时存在着大规模的台基式建筑群，并且建筑群成组出现，遗留的建筑构件或遗物等级高，周围无相应的大型普通遗址。

上述与春捺钵活动有关的考古遗存，皆存在着规模大、等级高等特点，乾安县后鸣字区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较少且等级不高，这和遗址形成的特殊性有关，此类渔猎行动的营地并非是以辽帝为首的捺钵人群长期驻扎的地方，短期的渔猎行为很难产生高等级的遗物。相反长期驻扎于此的应该是少量的管理维护人员，因此，留下的遗存多是少量普通的遗物。

春捺钵活动有长期性和不固定性等特点，如仅以辽道宗为例，其在位 46 年，其中 45

年都有捺钵活动的记录，捺钵活动地点有 27 处之多。因此，捺钵活动会留下大量的考古遗存。本文所述仅仅为冰山一角，更多的与春捺钵有关的遗存有待考古发现和学者论证。

注　释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乾安县文物管理所．乾安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调查简报［J］．边疆考古研究，2016（2）：87.

[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查干湖西南岸春捺钵遗址 2016 年调查简报［J］．地域文化研究，2018（1）：118.

[3] 冯恩学，武松．吉林乾安县辽金春捺钵遗址群后鸣字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J］．考古，2017（6）：42.

[4] 李鹏．“中会川”考——“阿都乌素辽代遗址群”初步调查与研究［J］．边疆考古研究，2017（2）：293.

[5] 吴敬，冯恩学等．吉林省乾安县查干湖西南岸春捺钵遗址群调查简报［J］．边疆考古研究，2015（2）：90.

[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郭塔虎城——2000 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82.

[7] 梁会丽，张迪等．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建筑台基发掘简报［J］．文物，2016（9）：54.

[8] a. 彭善国．吉林前郭塔虎城为金代肇州新证［J］．社会科学战线，2015（10）：122，129.
b. 宋德辉．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J］．北方文物，2009（2）：92～95.
c. 赵里萌．鸭子河泊考［J］．边疆考古研究，2017（1）：221～235.

[9] 高福顺，梁维．辽代诸帝春捺钵地略考［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3）：1～10.

[1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松原市伯都古城的调查——兼论宁江州的位置［J］．边疆考古研究，待刊.

[11] 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 松漠纪闻［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26.

[12] 农安县文物志中记载周长 1560 米，本文数据系调查重新测绘取得。

[13] 黄信．河北崇礼太子城发现一处金代行宫遗址［N］． 中国文物报，2017-12-15（8）.

On Several Kinds of Ruins Related to the Spring Nabo

Meng Qingxu　Wu Song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ities of the Spring Nabo.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ruin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represented by the numerous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s distributed on the shores of lakes. A typical site is Houmingzi, on the south bank of Hua’aopao in Qian’an County. Here, one finds the remains of fishing and hunting activities of the Spring Nabo. The second category are large urban sites, such as the Chengsijiazi site in Baicheng City, which w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and logistics base for the Spring Nabo. The third category are the large-scale palace-style architectural sites, such as Hejiaxinzi in Taonan City. These three types of ruins are of a special nature and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ring Nabo activities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Keywords: Spring Nabo; Ruins; Architectural Foundations

辽代耶律仁先家族研究

姜洪军[1]　张振军[2]　杨旭东[3]

（1. 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北票，122100；2. 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122000；
3. 岫岩满族博物馆，鞍山，114300）

内容摘要：辽代皇族耶律仁先家族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村东北约 1 千米的莲花山南麓。1983 年 5～9 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耶律仁先家族墓地进行勘探，共探出墓葬 14 座，并对其中的 3 座进行了发掘，所发掘均为砖室墓。因早期多次被盗，仅出土石砚、玉带饰及墓志 3 合。其中耶律仁先汉文、契丹小字墓志各一合，其子耶律庆嗣汉文墓志一合。本文对三合墓志进行了考证，梳理了耶律仁先的先祖及世系、生平与事略，并考证了墓志的撰写者赵孝严。

关键词：辽代；耶律仁先；墓志；家族

一、耶律仁先家族墓地的发现及家族研究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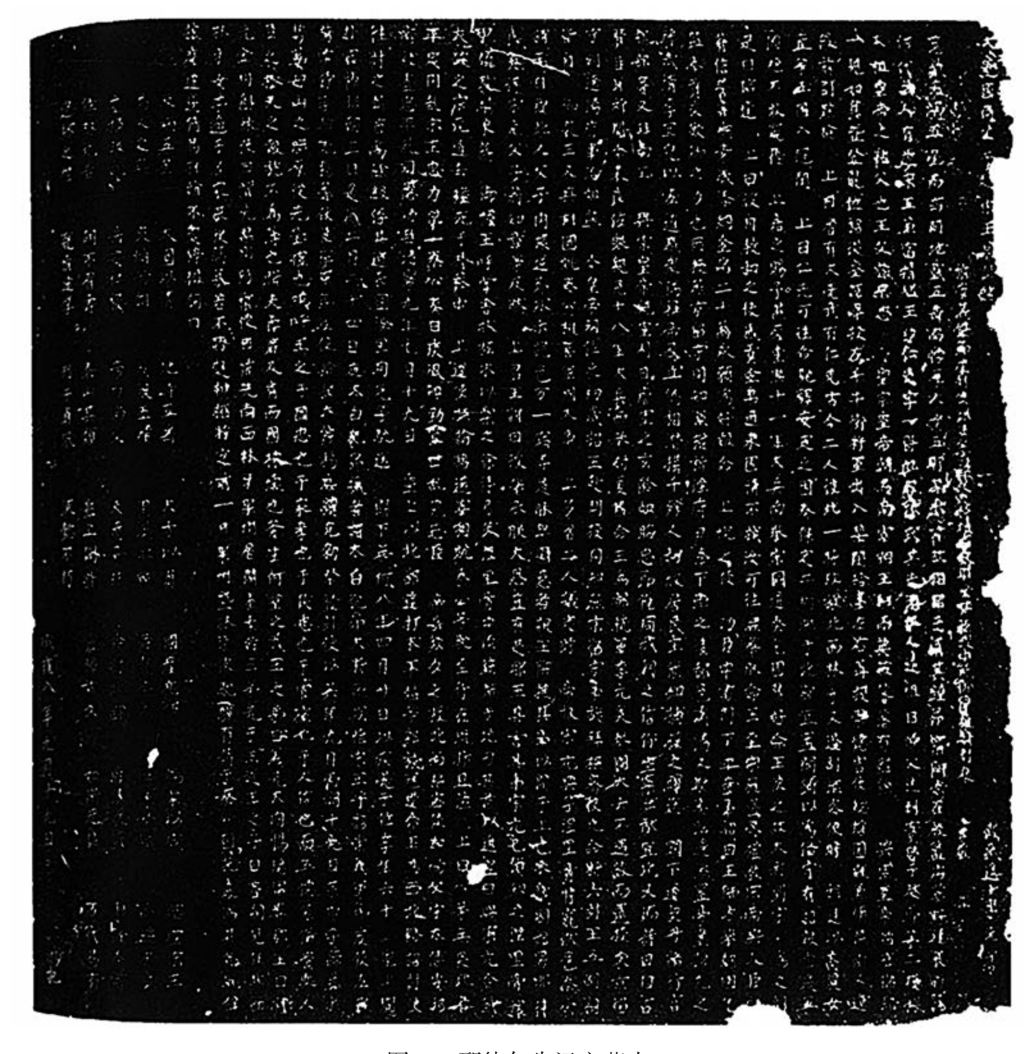
辽代皇族耶律仁先家族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小塔子乡莲花山村东北约 1 千米的莲花山南麓。莲花山据《耶律智先墓志》记载，辽代名称葛蒌姥山，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呈椅子背形的山峦，东南地势开阔平坦，山谷东南正对远处的阜新市清河门区境内的一座山峰。此地形是辽代契丹贵族家族墓地理想的地理环境。墓园保存较好，垣墙犹在，现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图一）。耶律仁先家族墓地，曾于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1959 年及 1962 年先后三次被盗，耶律仁先汉文墓志文即由当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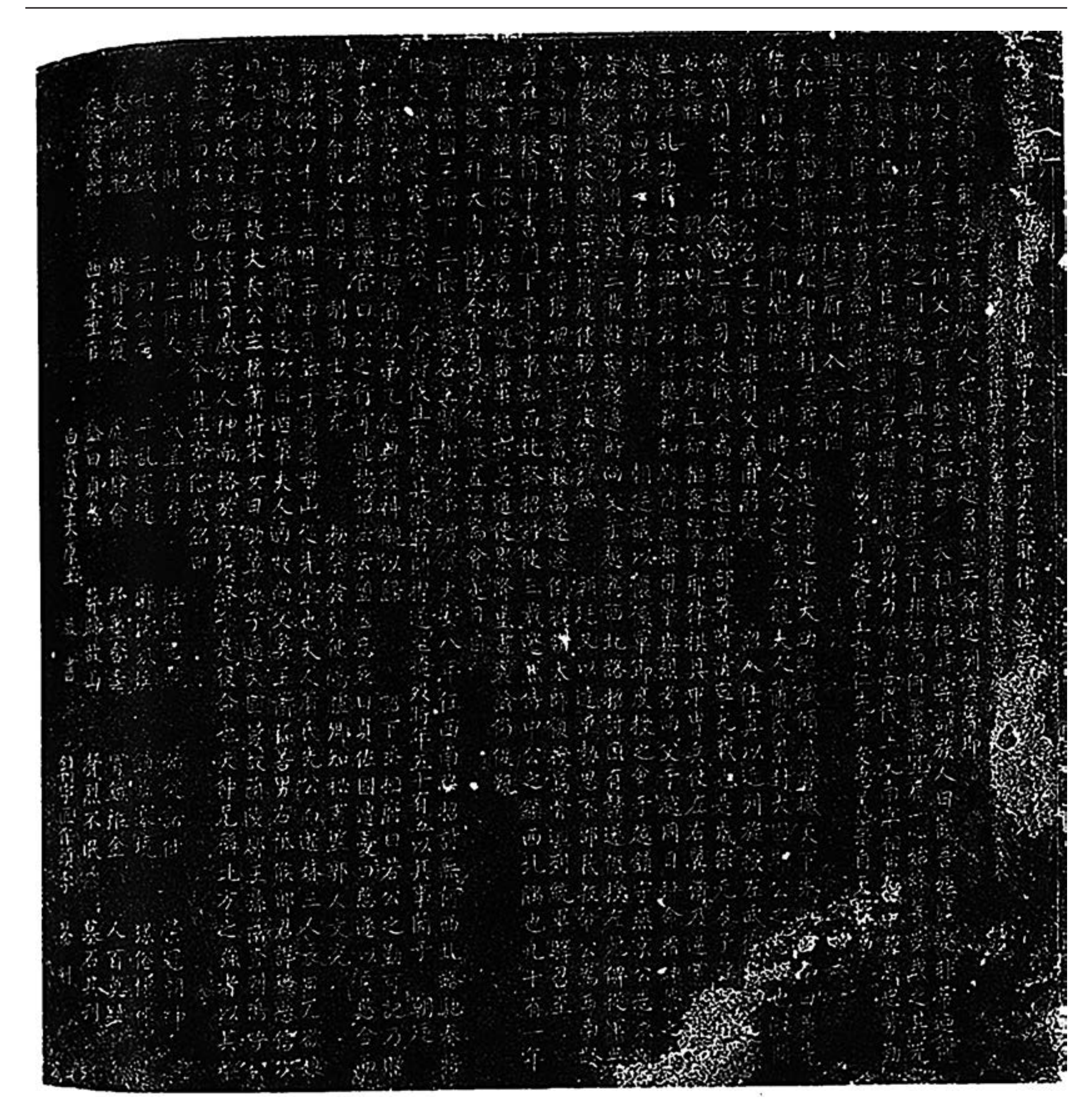
图一　耶律仁先家族墓地鸟瞰

民手抄后流传于世，陈述先生辑校的《全辽文》首次发表了手抄的耶律仁先汉文志文[1]。1983 年 5 ~ 9 月，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耶律仁先家族墓地进行勘探，共探出墓葬 14 座，并对其中的 3 座进行了发掘，所发掘均为砖室墓。墓室由八角形主室、甬道和两个六角形耳室组成，并有仿木建筑斗拱、屋檐、鸱吻等。有柏木护墙。内壁绘壁画，内容有契丹髡发武士、飞鹤、流云、山石、树木等，墓因早期多次被盗，仅出土石砚、玉带饰及墓志 3 合。其中耶律仁先汉文、契丹小字墓志各一合（图二），其子耶律庆嗣汉文墓志一合（图三）。

耶律仁先墓志盖内的契丹小字墓志尤其重要，有 5100 余字，这是迄今为止，出土契丹小字文字最多的辽代墓志[2]，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关注。1998 年 8 月，又清理发掘了耶律仁先四弟耶律智先墓，亦为砖筑，其形制与耶律仁先、耶律庆嗣墓相同，并出土汉文墓志和契丹小字墓志各一合[3]。



图二　耶律仁先汉文墓志



图三　耶律庆嗣汉文墓志

《辽宁碑志》一书首次发表了耶律智先汉文墓志[4]。契丹小字墓志则首次在《民族语文》发表[5]。自从耶律仁先、耶律智先契丹小字墓志发现以后，学术界就契丹小字的解读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6]。将契丹小字的识读考释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但对汉文墓志，迄今的研究不多。耶律仁先是辽代皇族著名儒将，辽朝兴、道两朝的栋梁重臣。精通兵法韬略，是文武兼备的政治家，曾六次命将，五次封王，并为尚父、于越，是十次封号的功臣。今在耶律仁先、耶律智先、耶律庆嗣三方汉文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并借鉴参考学者对契丹小字墓志的研究成果，对耶律仁先的先祖、家世及事略等作一些研究，以求教正。

二、耶律仁先的先祖及世系

耶律仁先《辽史》有传[7]:“字幼邻，小字查剌，孟父房之后，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据《耶律仁先墓志》记载:“王讳仁先，字一得。”[8]这是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关于耶律仁先的远祖，在其子《耶律庆嗣墓志》记载颇详:“远祖于越蜀国王讳述列实鲁，即太祖大圣天皇帝之伯父也。”[9]另据《辽史·皇子表》记载:“玄祖四子。释鲁，字述澜，第三，重熙中，追封为隋国王、于越。”[10]知实鲁即释鲁，其王号当以蜀国王为是，蜀大于隋。又《皇子表》称:“释鲁，子滑哥，其后即三父房之仲父。”与《耶律仁先墓志》所记相合，可知《耶律仁先传》及《辽史·皇族表》将耶律仁先系于孟父房之后是错误的。

据《耶律庆嗣墓志》记载:“王父南宰相兼侍中讳思忠。”可知思忠即瑰引，一为汉名，一为契丹名。《辽史·皇族表》以瑰引为耶律仁先祖父也是错误的。耶律仁先之父耶律思忠（瑰引),《辽史》无传，但在《辽史·圣宗纪》中，太平九年（1029年）六月戊子朔则记有以耶律思忠等人“充贺宋两宫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11]疑即耶律仁先之父。因为年代，姓名均相吻合，可知作为辽国外交使臣，耶律思忠曾经出使北宋。另据《耶律庆嗣墓志》记载:“先与四弟曰义先、礼先、智先、信先，人物门第，伟冠一时，时人号之为五龙。”可知耶律仁先兄弟五人，取仁、义、礼、智、信为名。其中义先[12]、信先[13],《辽史》皆有传。智先有墓志出土，唯有礼先不见史书记载，仅墓志一见，可补史缺。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士依据对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及耶律智先墓志的研究成果[14]，列出自懿祖直至耶律仁先十世世系表，是目前所见为学术界认可的有关耶律仁先家族世系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耶律仁先的家世

耶律仁先之父为耶律瑰引，汉名耶律思忠是无异议的。关于耶律仁先之母的姓氏，学术界曾有过不同意见。据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记载，耶律仁先母亲名为“燕哥”别胥，乃剌奚可汗帐之留熙督军之女。汉文《耶律智先墓志》亦记有:“母别胥萧氏，仪则纯备，风丽钟郝。仁懿皇后以梓衣申赠，保姊妹之爱。”[15]而在北京西山灵光寺中，有一通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耶律仁先妻郑氏建千佛塔露盘题记》上刻:“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16]其中的尚父令公丞相大王当指耶律仁先，而燕国太夫人郑氏，陈述先生认为是耶律仁先之妻[17]。向南先生认为郑氏应是耶律仁先的母亲，是汉人，并与郑弘节关系密切[18]。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士认为郑氏或许是燕王瑰引的次室，并非耶律仁先的生母[19]。最近有学者撰文对上述诸说提出质疑，认为郑氏的身份目前不可考，耶律仁先的生母是兴宗仁

懿皇后萧氏的同胞姐妹，都是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女[20]，系淳钦皇后弟萧阿古只的后裔子孙[21]，并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令人信服，我亦赞同此说。

耶律仁先仅有一子，汉名耶律庆嗣，契丹名挞不也，字胡独堇，《辽史》有传[22]，附其父《耶律仁先传》之后。据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所记，耶律庆嗣之妻福留姐乃果哥驸马之女。据《挞不也传》记载："挞不也少谨愿，后为族嫠婆所惑，出其妻，终以无子。"于是耶律仁先一支的血脉没有延续下来。据《耶律庆嗣墓志》记载："妹三人，长曰兀欲娘子，适大长公主孙曾达；次曰迪辇夫人，适故尚父奚王萧善男之子，右祗侯郎君详稳忠信；次曰乙信娘子，适大长公主孙萧特末。"可知耶律仁先有女三人，并各适名家。其中长女兀欲娘子所适的萧普达，《辽史》有传[23]，是辽朝中期圣、兴两朝威震边关的一代名将。他与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所记"曾孙二人，长曰蒲打"是同一人[24]，应是大长公主的曾孙，《耶律庆嗣墓志》记载有误，萧普达为契丹名，汉名萧闛，有墓志出土："公讳闛，字蒲打里，姓萧氏。"[25]可知普达、蒲打、蒲打里、萧闛为同一人。与《萧闛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26]，骨欲迷已即《耶律庆嗣墓志》所记的兀欲娘子，即耶律仁先长女。据《耶律庆嗣墓志》记载："耶律仁先三女 次曰乙信娘子，适大长公主孙萧特末。"萧特末为契丹名，汉名萧阐，是萧闛的二弟，有墓志出土："妻曰漆水耶律氏，故西北路都招讨，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上柱国、尚父、于越，晋王仁先第三女。"[27]耶律义先，《辽史》有传，但未记契丹名字。据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记载，耶律义先契丹名字为涅睦衮，而本传所记"(重熙)二十一年，拜惕隐进王富春"与汉文《耶律仁先墓志》所记"大内惕隐，富春郡王"相一致。另据《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记载："故大内惕隐，平王宗睦之犹女。"[28]据盖之庸先生考证，志文中提到的宗睦，应是耶律义先又一汉文名字。耶律宗睦，名见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重熙十三年（1044年），"遣林牙彰圣节度使耶律宗睦如宋，告讨夏州入归，以庆历五年正月丙子至"[29]。此与封爵"平王"之事均可补史缺。耶律礼先，《辽史》无传，汉文《耶律仁先墓志》记载耶律礼先曾任"金州团练使"，但《辽史》及《契丹国志》里均无金州之名。最近有学者考证在辽代墓志上曾七见金州之名，可知辽代确有金州，归属辽中京道管辖，故址应在辽宁北票市五间房镇土城西街村土城子古城址[30]，可暂备一说。

耶律智先，《辽史》无传。汉文《辨集胜事碑》载，耶律仁先一族功德名簿中有："尚父大王，乙里兔，北里宣徽相公防御太尉。"[31]其中的防御太尉与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通篇称墓主人作"太尉"，以及汉文《耶律智先墓志》："累官果州防御使"，汉文《耶律仁先墓志》的"果州防御使"相吻合。据汉文《耶律智先墓志》记载，耶律智先先后娶了五位夫人，其中的第三任夫人乙你割娘子，据《梁国太妃墓志》记载："女二人，长即顺宗贞顺皇后，次适仁先晋王之弟智先防御。"[32]即梁国太妃的次女。

耶律信先，《辽史》有传，因为其父瑰引与辽兴宗为刺血友，自幼长在皇宫之中。契丹名为涅睦衮。另据《萧兴言墓志》记载："女曰为女娘子，适横帐于越大王弟涅鲁

姑，林牙腊夫人男详隐挞不也。”[33]萧兴言，《辽史外戚表》作讹都斡，乃《辽史》有传的萧图玉之子双古之子[34]。《辨集胜事碑》载耶律仁先一族功德名簿中有林牙太师、东哥娘子、腊夫人、胡都夫人[35]。即指耶律信先及三位夫人。

又据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及《耶律智先墓志》记载，耶律仁先有姐妹五人，其姓名及所适夫婿是：

（1）长曰兴哥夫人，适迭刺奚可汉帐之可汗奴大师。

（2）次曰礼节夫人，适斡鲁朵之福留太师。

（3）次曰冬哥娘子，适迭刺奚可汗帐之定光奴。

（4）次曰涅睦衮别胥，适国舅小翁帐述列术里者宰相。

（5）次曰杨节夫人，适国舅夷离华帐胡睹堇迪里钵太师。

其中礼节夫人所适的斡鲁朵之福留太师即萧福留，有契丹小字墓志出土。最近有学者论及，义县清河门二号辽墓出土的契丹小字残墓志[36]，经解读研究，墓主人即礼节夫人所适斡鲁朵之福留太师即萧福留[37]。而涅睦衮别胥所适国舅小翁帐述列术里者宰相，此人即是《辽史》中有传的萧术哲：“萧术哲，字石鲁豫，孝穆弟高九之子。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卒，追王晋、宋、梁三国。”[38]而据《梁国太妃墓志》记载：“妃之长兄曰仁先者。”[39]可知梁国太妃乃耶律仁先的四妹，乃嫁皇舅讳留引，兰陵郡王之子知微，后历任北宰相，封宋国王。”由此可知留引乃萧孝穆之弟萧孝诚的契丹名字，小字高九。萧知微是萧孝诚第三字，小名术者，又作术哲。即萧知微为汉名，萧术哲为契丹名字。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累封秦、宋、梁等三国太妃”。契丹夫人之封从夫从子。此正与《辽史·萧术哲传》“追王晋、宋、梁三国”之封相符，将秦作晋。

四、耶律仁先的生平与事略

据汉文《耶律仁先墓志》记载，耶律仁先“(咸雍）八年四月廿日，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这与《辽史·道宗纪》：咸雍八年“五月壬年，晋王仁先薨”的记载相一致，只是月份不同，可能有阴历与阳历之区别。道宗咸雍八年为 1072 年，古人皆年龄以虚岁计，由此上推，耶律仁先的生年应为开泰二年（1013 年）[40]，而非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 年）[41]。

耶律仁先作为皇族子弟，年轻时即与当太子的兴宗皇帝耶律宗真过从甚密，一见如故。兴宗皇帝登基后，即景福六年（1031 年），耶律仁先 19 岁时，即被授左千牛卫将军，从此走上仕途，效忠朝廷，历兴、道两朝凡四十余年，一生所历官职较多。另据汉文《耶律仁先墓志》所记，耶律仁先“凡命将六，封王五，制词皆自御制。”其中的“封王五”，据闫万章先生考证[42]，当指耶律仁先于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 年）始封宋王；重熙二十三年（1054 年）封吴王；道宗清宁二年（1056 年）封郑王；清宁四年（1058 年）封宋王，《辽史》作“隋王”，九年封许王。在道宗清宁九年（1063 年）平定宗元之乱以后，耶律仁先

于清宁九年（1063 年）十月又封宋王，后改封辽王。咸雍元年（1065 年），改封晋王。耶律仁先曾先后三次被封为宋王，实属罕见，这在辽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耶律仁先作为精通兵法韬略的一代帅才，兴、道两朝的朝廷重臣，皇族的重要成员，曾参与决策兴、道两朝的军国大事，深得兴宗、道宗两位皇帝的信任与器重，权倾朝野。耶律仁先一生仕途顺畅，为官数十载，功勋卓著。在其一生所参与的辽朝军国大事尤以兴宗朝与刘六符使宋奉誓书签和约、道宗朝参与平叛耶律宗元父子之乱两件事较为突出，值得详述。其余事从略。

辽朝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 年），耶律仁先与刘六符一起出使北宋奉誓书签和约。刘六符，《辽史》[43]《契丹国志》均有传[44]，是辽朝中期著名外交家。其家族墓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于 2007 年 1 ~ 5 月在此发掘两座大型辽墓，其中 M1 为刘六符与四位夫人的合葬墓[45]。

耶律仁先与刘六符这次使宋的目的是索要后晋石敬瑭时代瀛、英二州所辖十县地（即今河北省河间、任丘地区）。这十县地由石敬瑭先割让给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来后周世宗柴荣又从辽国手里夺回。北宋取代后周后，十县地归北宋管辖。辽朝圣宗时曾多次要求北宋归还当年后晋石敬瑭割让的二州十县地，但北宋始终不肯归还，辽兴宗重熙年间，辽朝以此为借口时大举进攻北宋。因此才有重熙十一年（1042 年）刘六符两次使宋并和耶律仁先一起赴宋奉誓书签和约的外交使命。这次耶律仁先与刘六符的外交使命完成得很圆满，达到了辽朝预期的目的。最后两国签订和约，罢兵，以北宋在以前澶渊之盟基础上，每年向辽朝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达成和约，握手言和，重归于好。自此以后，辽宋两国岁岁遣使，交聘庆吊，再没有发生大的事件和冲突，直至终辽之世。

耶律宗元，《辽史》有传[46]，作重元，误。为辽圣宗次子兴宗皇太弟。道宗即位，册为皇太叔，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权倾朝野。其子涅里骨，《辽史》有传[47]，作涅鲁古，误。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 年）七月，耶律宗元父子趁道宗在太子山秋猎捺钵之机，聚集四百余人攻打道宗行官，发动叛乱。《耶律仁先墓志》对耶律仁先平定耶律宗元父子之乱有十分详细的记载。耶律仁先因为平乱有功被道宗称为“平定内乱，宋王忠力第一”。与耶律仁先同时辅佐道宗治国的、时任北府宰相的姚景行（《辽史》有传）[48]，当时对道宗说：“疾风知劲草，乱世见忠臣。”这是对耶律仁先平叛耶律宗元之乱的公允评价，与史书的记载皆相吻合。

五、关于墓志撰者赵孝严

汉文《耶律仁先墓志》撰者赵孝严，虽然《辽史》无传，但在《辽史·道宗纪》里五见其名[49]。赵孝严卒于道宗寿昌六年（1100 年），是道宗朝有名的文人才子，曾为许多名人撰写墓志。除耶律仁先外，还有咸雍八年（1072 年）的《耶律宗愿墓志》[50]，大安三年（1087 年）的《皇弟秦越国王耶律弘世墓志》[51]，大安九年（1093

年）的《萧公妻耶律氏墓志》[52]，大安十年（1094 年）的《耶律智先墓志》[53]，大安十年（1094 年）的《耶律庆嗣墓志》[54]，寿昌三年（1097 年）的《张公恕妻陈氏墓志》等[55]。赵孝严曾先后为耶律仁先、耶律智先、耶律庆嗣三人撰写墓志，可知与耶律仁先家族关系过从甚密。另从其撰写的《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抄引文》一文分析[56]，赵孝严还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对佛学造诣颇深。

注　释

［1］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耶律仁先墓志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冯永谦，韩宝兴．发掘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的收获［J］．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4（1）.

［3］ 陈金梅．辽宁北票发现辽耶律智先墓［N］．中国文物报，1999-6-30.

［4］ 王晶辰．北票耶律智先墓志铭［A］．辽宁碑志（下编）［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5］ 赵志伟等．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J］．民族语文，2001（3）.

［6］ a. 韩宝兴．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考释［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1）.

b. 即实．乣邻墓志释读述略［J］．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4）.

c. 闫万章．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J］．辽海文物学刊，1992（2）.

d. 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四探［A］．第三十五届世界阿尔泰学会会议记录［C］．台北：台北联合报国学文献馆，1993：附录一.

e. 丰田五郎．耶律仁先墓志所见的契丹小字官名．肖爱民译．北方民族新论.

f. 吴英喆．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补释［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5）.

g.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语言文字研究［M］．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

［7］（元）脱脱等．辽史·卷九六·耶律仁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同［1］.

［9］ 向南．耶律庆嗣墓志［A］．辽代石刻文编［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0］（元）脱脱等．辽史·卷六四·皇子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元）脱脱等．辽史·卷一七·圣宗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元）脱脱等．辽史·卷九·耶律义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元）脱脱等．辽史·卷九·耶律信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同［6］g.

［15］ 同［4］.

［16］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耶律仁先妻郑氏建千佛塔露盘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同［16］.

［18］ 向南．千佛塔露盘题记考［A］．北京辽金文物研究［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19］ 同［6］g.

［20］　宋丹丹，王孝华．辨《耶律仁先母亲是汉人》说［A］．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
［21］　脱脱等．辽史·卷九六·萧孝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脱脱等．辽史·卷九六·挞不也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　脱脱等．辽史·卷九二·萧普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4］　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J］．考古，1962（8）.
［25］　盖之庸．萧闛墓志［A］．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26］　盖之庸．萧闛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A］．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27］　盖之庸．萧闾墓志［A］．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28］　同［26］.
［29］　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0］　李宇峰．辽代金州考［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31］　盖之庸．辨集胜事碑［A］．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32］　向南，李宇峰．梁国太妃墓志［A］．辽代石刻文续编［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33］　盖之庸．萧兴言墓志［A］．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34］　脱脱等．辽史·卷九三·萧图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5］　同［31］.
［36］　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4（2）.
［37］　同［6］g.
［38］　脱脱等．辽史·卷九一·萧术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9］　同［32］.
［40］　闫万章．北票出土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铭》考释［J］．辽海文物学刊，1992（2）.
［41］　同［6］g.
［42］　同［40］.
［43］　脱脱等．辽史·卷八六·刘六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4］　脱脱等．契丹国志·第十八卷·刘六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六十年［J］．北京文博，2009（3）.
［46］　脱脱等．辽史·卷一一二·耶律重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7］　脱脱等．辽史·卷一一二·涅鲁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8］　脱脱等．辽史·卷九六·姚景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9］《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大安)二年春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寿昌)元年六月已巳，以权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冬十月癸未，以参知政事王师儒为枢密副使，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为参知政事。”又“(寿昌)五年十二月甲子，以参知政事赵孝严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寿昌)六年五月乙酉汉人行宫都部署赵孝严薨。”注：其中的第2条与第4条为重出。
［50］盖之庸. 耶律宗愿墓志［A］. 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51］盖之庸. 皇弟秦越国王耶律弘世墓志［A］. 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增订本)［C］.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52］向南，李宇峰. 萧公妻耶律氏墓志［A］. 辽代石刻文续编［C］.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53］王晶辰. 北票耶律智先墓志铭［A］. 辽宁碑志［C］.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54］向南. 耶律庆嗣墓志［A］. 辽代石刻文编［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55］齐伟. 辽代张公恕妻陈氏墓志铭［A］. 苏州文博论丛［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56］陈述. 全辽文·卷九·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A Study on the Yelvrenxian Family in the Liao Dynasty

Jiang Hongjun　Zhang Zhenjun　Yang Xudong

Abstract: The Yelvrenxian family cemetery, a branch of the Liao Dynasty royal family, is located at the south foot of Lianhua Mountain. From May to September 1983,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Museum explored the Yelvrenxian family cemetery and discovered 14 tombs in total. Three of them were excavated, all of which were brick tombs. Due to the looting, very few artifacts remained: only one inkstone, one jade belt ornament and three epitaphs. Among the epitaphs, one was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a second one in Khitan minor characters-the epitaph of Yelvrenxian, and the third one in Chinese characters - the epitaph of his son Yelvqing. This article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sorts out the ancestors, lineage, life and events of Yelvrenxian, and investigates the author of the epitaph, Zhao Xiaoyan.

Keywords: Liao dynasty; Yelvrenxian; Epitaph; Family cemetery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源流考证

戴　亮　侯申光

（辽宁省喀左县博物馆，喀左，122300）

内容摘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部族，其祖先是来自于“森林中百姓”的兀良哈人，是成吉思汗的重臣千户长者勒蔑（又叫济拉玛）的后裔。他们最初的生活方式是以森林狩猎为主，形成了北方民族与生俱来的那种勇猛精神和豪放性格。他们无论是在蒙元铁骑东征西讨中，还是在明初燕王与建文帝的皇权争斗中，以及清军统一漠北并同朱明王朝的战斗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受到几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授土封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经历千年的历史进程，最终以兀良哈人为主体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人民在美丽富饶的大凌河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民俗文化。

关键词：蒙古族；喀喇沁；兀良哈；喀喇沁左翼

一、前　　言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部族。其祖先是来自于“森林中百姓”的兀良哈人，是成吉思汗的重臣千户长者勒蔑的后裔。他们最初的生活方式是以森林狩猎为主，形成了北方民族与生俱来的那种勇猛精神和豪放性格。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无论在哪个时期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发挥着急先锋的特殊作用，涌现了如者勒蔑、也孙贴额、不花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为本部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推动了本部不断前进的历史年轮。

现在，我不揣固陋就喀喇沁左翼蒙古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望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二、统一的蒙古族的形成

（一）蒙古族的起源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建立

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魏书·失韦传》（失韦又写作室韦）中有孝静帝武定二年（544 年），北室韦始遣使“献其方物”[1]的记载。《隋书·室韦传》中亦有“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2]的记载。蒙古是室韦的一支，《旧唐书》中称作“蒙古室韦”[3]，《新唐书》称作“蒙兀”“蒙瓦”[4]，它是“蒙古”的同名异译。到了宋辽金时期，史籍中还有萌古、朦骨、蒙古里、萌古斯、盲骨子、萌骨等称谓，而“蒙古”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引《亡辽录》：“又如沙漠之北，则置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乌隗部族衙，卢沟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镇摄鞑靼、蒙古、迪烈诸国。”[5]自此之后“蒙古”一词作为族名开始广泛传播。

（二）蒙古族各部的统一

12 世纪，蒙古诸部为争夺权势和经济利益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人们渴望和平与统一，铁木真顺应发展趋势，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在者勒篾、速不台、哲别、忽必来及其诸弟、诸子等一批人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完成了蒙古各部的统一大业，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1206 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部落议事大会）上，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正式建立大蒙古汗国。以此为核心，将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落统一在一个汗权之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从此，“蒙古”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了民族的名称，蒙古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兀良哈部族的起源与发展

蒙古族按其生活方式和经济情况可以分为两大部落：即森林狩猎部落及草原畜牧部落。兀良哈又称乌梁海、乌梁汉、乌梁罕、斡朗改、兀良孩、兀良罕等，均是蒙古语不同时期、不同史籍中对兀良哈部人不同译名，意为“林中百姓”。

兀良哈人最早活动在额尔古涅－昆，即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到 8 世纪时迁移到斡难河、克鲁伦河和土剌河三河源头的不儿罕山一带，与兀良哈部同时迁到这一带的还有成吉思汗先祖所在的乞颜等部，兀良哈部与他们保持密切来往。兀良哈部族的者勒篾在成吉思汗统一大业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他被封为第九位千户那颜（即千夫长）。

元朝覆灭后，明朝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蒙古地区及边境设置许多羁縻卫所，让他们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明朝在塔儿河流域（元朝的

泰宁路）设泰宁卫、嫩江和福余河流域设福余卫、屈裂儿河上游和朵颜山一带设朵颜卫，使之各领所部，以安畜牧，统称“兀良哈三卫”。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明朝发生了皇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挟持宁王朱权，借兀良哈三卫骑兵三千作为“靖难军”骨干，南下夺取皇位，朱棣继位后，为答谢从战有功的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决定把大宁卫（今承德、平泉、建昌县及老哈河流域）一带赐给他们，后来逐渐南移来到长城外驻牧。明中后期兀良哈部和喀喇沁部又进行了一次大融合，形成新的喀喇沁部。

四、喀喇沁部与喀喇沁左、中、右三旗演变

（一）喀喇沁部的形成与迁徙

喀喇沁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部落。喀喇沁又被称为“哈刺嗔”“哈刺陈”等，汉语译为“守护者、保卫者”。其先祖的驻牧地是中亚的乌古斯人所在地区，后来迁到了阿姆河以南。13世纪初被蒙古军征服来到蒙古草原，其精锐被编入怯薛军。元朝灭亡后哈剌赤军及其家属变为15世纪后的喀喇沁部，仍住牧于岭北行省的青海地区，直到孛来太师去世后被卫拉特部诺颜亦不刺迁入鄂尔多斯境内。达延汗诸子时期，喀喇沁部在巴雅思哈勒的率领下迁到大同驻牧。16世纪上半叶，左翼察哈尔部南下并控制了朵颜兀良哈人的北方诸部，右翼的俺答汗和巴雅思哈勒汗也开始向南进入南部兀良哈地区，从喜峰口、张家口、独石口边外，直到大沙窝的西南部和开平一带都成了喀喇沁部的驻牧地。喀喇沁部的巴雅思哈勒汗即为喀喇沁万户。兀良哈的贵族（诸塔布囊）是喀喇沁万户统治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与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后裔）世代通婚，联姻不断，这一时期的兀良哈贵族都有自己的牧地和属民。

（二）清代喀喇沁部的衰落和兀良哈为主体的喀喇沁三旗的形成

1627年，蒙古最后的大汗林丹汗率军征讨喀喇沁万户，永谢布和阿速特二部战败，部众溃散，喀喇沁“黄金家族”所拥有的人口被杀所剩无几。原属部朵颜兀良哈的塔布囊苏布地害怕遭到林丹汗的报复，遂率喀喇沁部投靠了后金皇太极，行青牛白马之誓。皇太极出兵相助苏布地，在西拉沐沦河边，突袭林丹汗营地，林丹汗败走青海，皇太极诏封苏布地仍驻牧喀喇沁故地，赐号为“都固棱”。“天聪二年（1628年）塔布囊苏布地偕色楞等举部归诚，编为左右翼二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又增设扎萨克一旗，凡三旗。”[6]自此，喀喇沁部一分为三，分别是：喀喇沁右旗、喀喇沁左旗和喀喇沁中旗，与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同属卓索图盟，卓索图盟又受清廷理藩院管辖。

五、喀喇沁左翼旗的形成与发展

（一）喀喇沁左翼旗形成

喀喇沁左翼旗兀良哈氏的先祖本为明朝朵颜卫左都督和通的长子革儿孛罗第三子脱力，他亦称图鲁巴图尔，因不是嫡长子，未能继承其祖父朵颜卫左都督之职，但因其骁勇善战，明朝封他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其地位仅次于都督，脱力的第九子伯牙尔为都指挥佥事，二人分别是喀喇沁老部长巴雅思哈勒和第二任顺义王辛爱黄台吉的岳丈，因此，在喀喇沁部中兀良哈人有着很高的地位，其曾孙色楞更是智勇双全，与后金结盟后，东征西讨战功显赫。这一时期，色楞有丁（可参战人数）达 656 人，部众可达 3000 余人。喀喇沁部解体后，清廷选派兀良哈人出任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时，色楞便成为不二人选（图一）。



图一　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印和堂官印

据清代《承德府志》记载："左翼旗在建昌县南境，东至锦州府边门，界西至平泉州，界南至永平府边墙，界北至右翼旗。"[7] 长 230 里[①]，宽 170 里（包括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建昌县及凌源市的一部分），全旗共有 53 个佐领。

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治所最初设在官大海，第二任札萨克奇达特时期迁于公营子（今喀左县南公营子镇西村）。喀喇沁左翼旗札萨克为世袭制，赏功罚罪，从第一任色楞起到最后一位札萨克默尔赓额止，共计 20 任札萨克，1943 年札萨克制结束，这种制度存在了 308 年。

清代设置这种既是行政机构，又是军事组织的旗盟制，实现对蒙古地区的管辖。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由于中原地区经济增长、人口膨胀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开始

① 1 里 =500 米。

有汉族群众到关外地区，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并超过了蒙古族人口。清政府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设置建昌县，实行县旗并立的属人管理方式——蒙汉分治，蒙古族人口归旗管辖，汉族人口归县管辖，管辖地域和人口虽时有变迁，但这种管理方式一直延续到 1947 年 12 月（表一）。

表一　喀喇沁左翼旗历任札萨克世袭表

札萨克姓名	世袭序次	任职时间	公元纪年	任职年限
色楞	1	天聪九年至顺治十四年	1635 ~ 1657 年	22 年
奇达特	2	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五年	1657 ~ 1666 年	9 年
乌特巴拉	3	康熙六年至康熙三十年	1667 ~ 1691 年	24 年
善巴拉什	4	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六年	1691 ~ 1717 年	26 年
僧衮扎布	5	康熙五十六年至乾隆七年	1717 ~ 1742 年	25 年
瑚图灵阿	6	乾隆七年至乾隆四十四年	1742 ~ 1779 年	37 年
济克济特扎布	7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五年	1779 ~ 1780 年	1 年
札拉丰阿	8	乾隆四十五年至乾隆四十八年	1780 ~ 1783 年	3 年
丹巴多尔济	9	乾隆四十八年至乾隆五十六年	1783 ~ 1791 年	8 年
喇特纳言尔弟	10	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十八年	1791 ~ 1813 年	22 年
托恩多	11	嘉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二年	1813 ~ 1817 年	4 年
克星额	12	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一年	1818 ~ 1831 年	13 年
德木斋扎布	13	道光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六年	1831 ~ 1846 年	15 年
布里湃巴拉	14	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元年	1847 ~ 1851 年	4 年
乌凌阿	15	咸丰二年至光绪元年	1852 ~ 1875 年	23 年
熙凌阿	16	光绪二年至光绪十年	1876 ~ 1884 年	8 年
索特旺	17	光绪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	1885 ~ 1895 年	10 年
巴特玛鄂特萨尔	18	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三年	1896 ~ 1897 年	1 年
熙凌阿	19	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七年	1897 ~ 1918 年	21 年
默尔赓额	20	民国八年至民国三十二年	1919 ~ 1943 年	24 年
总计	20 任（19 人）		308 年	

（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成立与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光复，蒙汉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自治运动使原有的旗制面临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蒙汉人民走向了新生。1947 年 12 月，建立了蒙汉合治的旗政府，共辖公营子、老爷庙、大城子、后坟、白塔子五个努图克（区），属热东地委管辖，隶热河省。1956 年 1 月，撤销热河省，喀喇沁左旗划归辽宁省管辖。“1957 年 10 月，国务院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喀喇沁左旗的建制撤销，1958

年 4 月 1 日，正式建立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1959 年 1 月，隶朝阳地区（朝阳市）管辖”[8]，形成了西北与建平县毗邻，东北与朝阳县接壤，东与朝阳县、建昌县相连，西与凌源市接界，南与建昌县、凌源市为邻的地域范围，总面积为 2238 平方千米。现辖 20 个乡镇、3 个街道办事处和 2 个工业园区，县城所在地位于大城子街道。全县总人口 43 万人，有汉、蒙、满、回、朝鲜、壮、彝族等 23 个民族，少数民族中以蒙古族为多，共 9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1%。全县有 10 个蒙古族聚居乡镇（场）、41 个蒙古族聚居村。

六、结　　语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是以者勒蔑后裔为主的兀良哈人，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封地由北向东、向南经过几度迁徙。他们在元、明时期逐水草而居，管理着本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事务，而到了清朝时清廷为了有效控制蒙古诸部和分化各部之间关系，以军政合一的旗制形式逐渐把他们固定在自己的领地内，最终在大凌河上游流域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鞑靼、瓦剌、土默特、察哈尔、喀喇沁等其他蒙古族各部进行了内部融合，又经过与满、汉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各种密切接触和交流，经济形式也随着地理环境变迁和气候等其他自然因素的影响，发生了渐进性的重要转变。由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类型过渡到以草原游牧经济类型为主导，转变为少量农业经济为畜牧经济补充，再转变到以畜牧业为辅、农业经济为主导。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某些变化，无形中在社会生活上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世代相传又独具特色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民风民俗，形成了如今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

注　　释

[1]（北齐）魏收. 魏书·失韦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1.
[2]（唐）魏征. 隋书·室韦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82，1883.
[3]（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6～5358.
[4]（宋）欧阳修，宋祁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176，6177.
[5]（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台北：台湾大化书局，1979：199.
[6] 承德府志·卷二十六·藩卫［M］.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本，1906：10.
[7] 同［6］.
[8]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志［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9，50.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Left Kara-Qin

Dai liang　Hou Shenguang

Abstract: The Left Kara-Qin is a Mongolian trib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ir ancestor was Lemie, a key minister of Genghis Khan also known as Zirama, from the “people in the forest” of the Wu Liangha group. Their initial way of life was dominated by hunting in the forest, and they were reputed to be brave, bold and free-willed, all characters inherent to the northern nations. Under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ampaigns led by the Yuan Dynasty, as well as in the strife led by the King of Yan and Emperor Jianwen of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during the unification campaings by the Qing army, the Kara-Qin were praised for ther military worth by rulers of the highest rank.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Mongolian group of the Left of Kara-Qin, together with the main body of the Wu Liangha, settled down in the beautiful and fertile Dalinghe river valley, and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folk culture.

Keywords: Mongolian; Kara-qin; Wu Liangha; Left Kara-qin

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边城御虏图说》研究*

尚　珩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09）

内容摘要：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内《边城御虏图说》成图于万历五年，现为残本，仅 1 册，描绘了真保镇长城南部的倒马关路参将、龙固关路参将分管的茨沟营、龙泉关、鹞子崖、十八盘、固关所辖边墙隘口共计 116 座。根据《边城御虏图说》描绘、记述的内容，结合其他史料，综合判断该《边城御虏图说》实为万历元年汪道昆议修空心敌台竣工，巡按御史或汪道昆本人阅视边防后向皇帝进呈的"图本"。《边城御虏图说》中明确了长城敌台的修建年代，不仅与传世文献、现存碑刻相印证。亦可与现存敌台比对，确定现存敌台的明时称谓、守御隘口名称，特别是确立了敌台建筑形制的年代标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长城；真保镇；《边城御虏图说》；空心敌台

巡按御史是明廷对地方实施有效控制的重要依仗，对明代地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巡按御史"代天巡狩"——代表明中央政府巡驻地方，负责对所属地方实施全面的监察，对地方社会影响极大。

自明朝建立后，北部边防问题始终是关乎明廷盛衰的关键性问题，因此，明廷沿北部边境设置了一系列军镇。明中期以后，随着地方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腐败，明廷更加想通过巡按御史直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地方军事中，巡按御史既有纪功之监察职责，又肩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军事安全的重任。到了明后期，还有军事指挥的实际职责，"各边巡按、巡关御史皆有兵马之责"[1]，其拥有军事调度和指挥权是显而易见的。

巡关御史，是巡按御史制度中的一部分。"巡关。宣德七年（1432 年）令：居庸关直抵龙泉关一带、山海关直抵古北口一带，每年各差监察御史一员，请敕前去。公同各该分守、守备等项内外官员巡视关口，点闸军士，整饬器械，操演武艺，并受理守关人等一应词讼，就彼发落。"[2]"巡关御史设自正德中，一年期满，造册、画图呈进。"[3]

* 本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长城资源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18ZDA223）资助。

其任期 1 年，满日复命，回朝时需将“巡视”成果上呈皇帝。其中，绘制舆图便是“巡视”工作和成果的一部分。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时任巡按西关御史的王士翘，在实地考察和收集典实、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完成《西关志》便是其具体体现。

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的《边城御虏图说》（以下简称《图说》）亦是巡关御史阅视边防后绘制的舆图。鉴于学界一直未有介绍者，本文尝试考察其内容、技法以及所反映的长城防御体系情况，以俟广博者鉴定。

一、成图背景

土木之变后，随着明北部边疆防线的全面收缩，明廷开始在京畿周边加强长城防御体系建设。“紫荆、倒马关、白羊口俱系控临边境险要所在。”[4]太行山地区跃升为要冲之地。于是，明廷在太行山地区加强卫所建设，设紫荆、倒马二守御千户所[5]。同时，修建山口防御设施。

弘治、正德朝时，晋北沿边侵扰吃紧，“云中、应、朔之区时时备虏”[6]。随着大同极边地区战事紧张，太行山地区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兵部以边报方急，请敕襄城伯李鄌领兵往督紫荆、倒马、龙泉三关”[7]，明廷设置三关提督。正德年间，“升分守蓟州马兰谷、右参将都指挥使韩玉为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分守保定地方”[8]在保定设置副总兵，提升本地军事规格。调兵遣将的同时，加强防御设施的修筑，到嘉靖初年，“兵部奏居庸、紫荆、倒马三关修筑墩堡、城楼、墙壕凡九百有奇，都御史李瓒所经略也”[9]。

嘉靖中期，特别是嘉靖十五至三十一年（1536 ~ 1552 年），蒙古诸部对明廷北疆的侵扰达到高峰，实所谓“至嘉靖则无岁不蹂践为战场”[10]。在吉囊时代（1534 ~ 1541 年）、俺答时代（1542 ~ 1570 年）随着蒙古各部逐渐统一，实力大增，向明朝发动了前所未有的频繁侵扰，并将侵扰活动推向最高潮[11]。庚戌之变后，为防止蒙古俺答部的军队再次进入太行山区，明廷在保定加强防御设施建设的同时，最终设置镇守总兵官，提高保定军事规格和地位。“以都指挥佥事杨时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节制紫荆等关主客官兵”[12]，嘉靖二十二年（1543）“改分守保定副总兵为镇守，增设龙泉、故关参将一员”[13]。但此时的总兵官旋设旋罢，并非常设之位。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升宣府参将欧阳安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保定”[14]，真保镇正式建立[15]。其辖区范围“东北起沿河口，西南至数道岩，延袤一千三百余里，计隘口二百九十余处”[16]。与山西外三关、顺天府一起，组成明廷边疆防线的最后一道内边防线。“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尽境约八百里；又转南而东，为保定之界，历龙泉、倒马、紫荆之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至沿河口，约一千七十余里；又东北为顺天之界，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约一千八百余里，共二千五十余里，皆峻山

层岗，险在内者也，所谓内边也。”[17]

“俺答封贡”的实现，隆庆五年（1571 年）之后，侵扰活动基本结束，此后近 20 年间没有大的侵扰。[18]隆庆议和的初衷是“内修守备，外示羁縻”。处于“内边”的真保镇并未停止建设，“孙丕扬……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19]。反而一度掀起修边高潮。

二、内容与绘法

《图说》（Hollis Number：008131353）原无题名，汉和图书馆据其内容而命名之[20]。未注绘者，纸本经折装彩绘军事地图。《图说》底色发黄，保存较好，局部有破损，折痕处有开裂现象。地图版式宽大，凡 58 折，每折 47 厘米 ×25 厘米。从内容看，图中无比例尺，绘制者以从长城内侧空中俯视长城外的视角绘制，但未标方向，也没有方向标。《图说》有硬纸面的封面和封底，但是封面未贴图题。《图说》并未采用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图中不同的物采用形象化的各种符号来表示，介于写实与符号之间，体现了传统舆图的实用性。

《图说》每一折的内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为“说”的内容，每开行数因描述内容详略不同而不等，满行 19 字。文字为手写楷体，而非刻本印刷，字迹清秀、工整。文字上下两边缘各有一条墨线分割线。下半部为“图”的内容。但与标准“图说体”边防志书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陕西四镇图说》《三关图说》相较，《图说》中的“说”并未单独成篇，而是更趋同于“图注”形式。《图说》描绘的内容是位于今晋冀两省交接太行山上的明真保镇长城南部的倒马关路参将、龙固关路参将分管的茨沟营、龙泉关、鹞子崖、十八盘、固关所辖边墙隘口。描绘了这一地区的山脉、河流、长城墙体、关口、实心墩台、空心敌台、城堡等丰富的内容，表现出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

地图绘制精细，山峦皆以国画技法绘出，长城蜿蜒曲折，分布其间。长城防御设施是本图所反映的重点，描绘细致。长城采用形象符号表示，墙体、实心墩台、关口绘制较为简单，为墨线白描法绘制。墩台上插红色旗杆及黄面红边的三角形旗帜。营堡的绘制注重其平面形制、布局和与周边地形关系，营堡内点缀房屋建筑。营堡、关口旁配有贴红文字注明名称，空心敌台是《图说》反映的重点，绘制最为精细，条石基础部分为墨线白描，上部砖砌发券台身部分为青蓝色，门窗为红色，台顶四周绘制垛口，顶部中央绘制望厅，并有旗杆、旗帜。

《图说》亦有错绘之处，如茨字十六号台、茨字十七号台与吴王口的相对位置关系。《图说》中两台分列吴王口两侧（图一）。但根据实地调查，两台均位于吴王口东北方的山谷中。自东北—西南依次为茨字十七号台（吴王口村 2 号敌台，编号：

130624352101170018）、茨字十六号台（吴王口 1 号敌台，编号：130624352101170017）、吴王口。



图一　吴王口与茨字十七号台位置图

三、绘制年代与作者

《图说》的绘制作者、年代图中虽未标明，但我们从其内容、绘制特点并结合传世文献、出土石刻文献的记载，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图说》中文字所记述的时间多为明万历元年、三年、四年、五年。故《图说》所绘时间应为万历五年（1577 年）或之后。

（2）《图说》所绘内容与现存其他长城舆图相较，如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五年前后绘制的《延绥东路地理图本》、国家图书馆藏《三关图说》等明代边防舆图相比。《图说》未绘制边内道路，边外蒙古部落、入侵地点等信息，仅为边防设施部署。与国家博物馆藏的《明长城蓟镇图》这一修边施工图纸相较，其边防建设信息又过于简略。《图说》现为一册足本，所绘内容划分并非按照真保镇所设置的路、营等军事辖区、单位划分。本册仅选取了倒马关路、龙固关路的部分内容。

从《图说》“说”的文字表述内容的字里行间上看，其记述内容以各个关口为单元分述，如竹帛口：

竹帛口，嘉靖三拾三年建立，低小边城贰百柒拾丈陆尺。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贰拾贰号、贰拾三号、贰拾肆号、贰拾伍号、贰拾陆号、贰拾柒号、贰拾捌号、贰拾玖号、三拾号、三拾壹号、三拾贰号、三拾三号、三拾肆号台拾三座。至三年，题奉钦限用大石增修上等墙伍拾丈壹尺，高贰丈伍尺。创修中等墙壹百陆拾贰丈伍尺，高贰丈。增修下等墙伍拾捌丈，高壹丈伍尺。共墙贰百柒拾丈陆尺。守口茨沟营主兵陆拾伍名，设守口官壹员住守，月粮前已开载，防秋客兵壹百伍拾伍名，在阜平县仓，本、折兼支。东至鵰鹄沟，西至撅水平，南至茨沟营，北至平刑关，极冲，外通平刑关贰拾里，向无虏犯，今有台墙，堪以御虏。

具体内容包括关口修建沿革及近年修缮情况、防御建筑设施形制、防区四至、兵力部署、钱粮情况，而无边外蒙古部落分布、入侵路线、战守方略、道路距离等实际作战所需内容。显示出重我方，轻敌方；重客观建筑设施、实际钱粮兵马，轻战略形势、攻防需求的特点。

由此我们认为，《图说》并非出自边镇一线将领之手，亦非实战用图，且《图说》原由多册组成，今仅存一册。

（3）空心敌台是《图说》中所描绘的重点。敌台绘制精美，文字叙述详尽。真保镇修建空心敌台，肇始于隆庆六年九月。“壬子，命协理京营兵部左侍即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遴，兵部右侍郎吴百朋、汪道昆阅视边务。”[21]阅视结束后，汪道昆于万历元年提议创建空心敌台。

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合咨阅视侍郎汪道昆、总督侍郎刘应节、巡抚都御史孙丕扬、督行镇守参将兵备等官，将紫荆、倒马、浮图峪、马水口、插箭岭等处一带边关，于诸口通虏去处，酌量冲缓，各议增设空心敌台若干座……题奉圣旨：“筑台守险，系防边要务，都依拟行。”……亲视台工规制，……井陉副使刘世昌督同同知魏学思东至黑石口起西至茨沟营止。踏勘倒马关参将所辖各边台工，重复较勘。今定马水口下应建台五十五座，紫荆关下二百一十座，倒马关下九十一座……如或以程期尚远，大约工以四年为期……亦照蓟镇新例，每防计军五百分筑一台……限于万历四年完工……夫墙非台则无庇护，台非墙则无依……紫荆关应拆修一千一百八十八丈七尺，应增修一百丈；……俟毕台工，听巡抚另议修筑……[22]

修边作为朝廷大事，亦见于《明实录》中。

丁巳，兵部覆阅视侍郎汪道昆奏经略京西诸关，以固畿辅事。永、保定等

关口，应建敌台三百五十六座，每座计工费二百二十两，主、客兵春、秋二防，每五百名完台二座，期以四年告成。其浑河南岸应行。昌、易二路亦各建一台，有坚固不如式者，责令各官从新赔筑[23]。

建造工程由保定巡抚的孙丕扬实施。“孙丕扬……万历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按行关隘，增置敌楼三百余所，筑边墙万余丈。”[24]需要注意的是，《阅视侍郎汪道昆创筑空心敌台疏略》中明确指出空心敌台的选址在“诸口通虏去处，酌量冲缓，各议增设空心敌台若干座”。这与《图说》上所绘空心敌台多位于山口处一致。此外，敌台修建结束后，便由巡抚主持“拆修”“增修”边墙，与《图说》中上部“说”的文字内容相符，如下：

牛邦口，嘉靖叁拾捌年建立，低小边城捌拾贰丈柒尺，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拾捌号、拾玖号、贰拾号、贰拾壹号台肆座。至叁年题奉钦限用大石增修上等墙壹拾贰丈肆尺，高贰丈伍尺。创修下等墙柒拾丈柒尺，因曲取直，改中等墙肆拾陆丈陆尺，高贰丈，下等墙陆尺，高壹丈伍尺。茨沟营主兵贰拾名住守。月粮前已开载。防秋客兵陆拾伍名，在阜平县仓本、折兼支。本营千总官带管，东至叁楼子，西至茨沟营，南至鱼儿刨，北至小牛邦口，极冲，外通叁楼子拾里，向无虏犯，今有台、墙，堪以御虏。

“说”中记述牛邦口的边墙原为“低小边城捌拾贰丈柒尺”，万历元年修完 4 座敌台后，三年“题奉钦限用大石增修上等墙壹拾贰丈肆尺，高贰丈伍尺”。即在原旧墙基础上增修。《四镇三关志》《明史》所记述的内容与《图说》中内容一致。

（4）由于巡按御史可代表皇帝的特殊身份，在嘉、万以后越来越为朝廷所倚重，地方诸多事物往往交巡按御史承办，有集诸差于巡按的趋势。从而使得巡按御史的职责不固定，御史在巡按工作中除履行监察本职责外，还承担一定的军事、行政职责，如巡关、清军等差事，甚至最终合并于巡按御史差事中。“各边巡按、巡关御史皆有兵马之责”[25]，其兼有率军和决策权，以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亦说明了巡按御史在地方军事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巡关。宣德七年令：居庸关直抵龙泉关一带、山海关直抵古北口一带，每年各差监察御史一员，请敕前去。公同各该分守、守备等项内外官员巡视关口，点闸军士，整饬器械，操演武艺，并受理守关人等一应词讼，就彼发落。”[26]“巡关”自然包括修边工程结束后，朝廷派御史前往阅视。

首先，修边工程结束后，朝廷主动派遣御史前往阅视。

上从其言，令如法修筑，必图经久，工完仍遣御史阅视[27]。

其次，边防大臣在修边工程结束后，通常会申请派遣御史阅视。

> 守中又奏：喜峰口、潮河川修城建楼工完。计用银一万三千两余，具远出边塞采取木、石修完。乞行巡按、巡关御史查明官匠人等功次，奏请升赏[28]。
>
> “总督尚书杨博等，于大同右卫东路牛心山等处，筑大、小土堡九座，墩台九十二座，接连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浚大壕二道，各长十八里，告成。请命御史阅视[29]。

由于牛帮口系“极冲”之地。按照万历元年汪道昆所议，当属优先修建空心敌台的山口。与《图说》中记载“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拾捌号、拾玖号、贰拾号、贰拾壹号台肆座”相较，两者一致。今山西牛帮口“茨字二十一号台”内尚存当年阅视碑：

> 万历二年秋，阅视蓟、辽、保定边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歙县汪道昆；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杨兆膚施杨兆；巡抚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富平孙丕扬；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屯留暴孟奇；整饬井陉等处兵备，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安丘辛应乾；镇守保定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延绥傅津；分守龙固关地方参将延绥赵应时；真定府管倒马、龙固关通判单县侯服周；监工新乐县丞灵丘孟师孔；都察院委官、定州卫原任守备杨国卿；管工委官定州卫领操百户李麒、马朝喜鼎建[30]。

说明台工完毕后第二年进行了阅视，亦说明即使仅仅是阶段性、局部性的完工，仍需阅视。阅视活动多少有些朝廷“验收”的味道。该阅视碑的发现也亦说明御史在阅视过程中，需当地有关文武官员陪同，且阅视完毕后刊刻石碑。

御史在阅视活动中，需对阅视内容进行造册、画图，并成为御史阅视工作制度、内容和成果之一，期满回朝时进呈皇帝。

> ……守中又将修筑城池、楼橹制围屏三座，绘图进上。复绘轴进东宫，并请楼名。上曰：修筑工程，例应巡按御史阅视、画图进呈，今造作围屏画轴渎进，非体也。姑令所司收贮，楼名听有司自立[31]。
>
> 累朝以来，凡有阙敝，即加修筑后，又专设东、西关巡关御史二员，每岁阅视，满日造册，奏缴[32]。
>
> 庚申，阅视蓟、辽、保定左副都御史郜光先，绘各边形胜图进览。留之[33]。

由于阅视工作内容自身特点：“一年期满，造册、画图呈进。”[34] 御史所提交的

“图说”自然和一线边防大臣绘制的舆图、编纂的图说不同。《图说》上部的“说”为字体清秀的手写体文字便是例证。

汪道昆的创筑空心敌台计划“限于万历四年完工”按照前文所述的制度和案例的要求，竣工之后朝廷需派遣御史前往阅视。《图说》绘制于修边工程竣工的第二年，即万历五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图说》实为万历元年汪道昆《阅视侍郎汪道昆创筑空心敌台疏略》中提议在真保镇创修空心敌台这一修边工程竣工，朝廷派遣巡按御史阅视之后，回朝复命时所提交的“图说”。其作者应为阅视的巡按御史，亦或是汪道昆本人。

四、《图说》所见真保镇长城防御体系

现存真保镇长城边镇志书主要有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的《西关志》和万历五年（1577 年）的《四镇三关志》。《图说》为残本，描绘的内容仅为真保镇长城南部的倒马关路参将、龙固关路参将分管的茨沟营、龙泉关、鹞子崖、十八盘、固关所辖边墙隘口，共计 116 座。在叙述隘口时，《图说》并非按照绘图顺序叙述，而是按照隘口的大小主次，先说较大的隘口，后说较小的隘口，主要、较大的隘口通常有空心敌台，较小、次要的隘口或有实心墩台或仅有墙体，差异明显，为我们判别该隘口的“冲”“缓”提供了依据。在描述各隘口沿革、长城修建、守御体系、粮草饷银、四至、冲缓、道里等方面，《图说》内容十分丰富，较其他两书更为详实。最后，《图说》为我们研究真保镇长城防御体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首先，在记述隘口名称、统帅体系时，《西关志》《四镇三关志》《图说》所记述内容存在异同之处。具体如表一。

表一　《西关志》《四镇三关志》《图说》所记内容异同

序号	《图说》		《四镇三关志》		《西关志》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1	下竿岭口	上竿岭守口官	下竿岭口	茨沟下	下竿岭口	吴王口管总官
2	青羊沟口		青羊沟口		青羊沟口	
3	西古道口		无	无	无	无
4	艾叶岭口		艾叶岭口	茨沟下	艾叶岭口	吴王口管总官
5	上竿岭口		上竿岭口		上竿岭口	
6	低安沟口		无	无	无	无
7	郓麻阝岭口	吴王口管总官	无	无	无	无
8	过道沟口		过道沟口	茨沟下	过道沟口	吴王口管总官
9	吴王口		吴王口		吴王口	

续表

<table>
<tr><th rowspan="2">序号</th><th colspan="2">《图说》</th><th colspan="2">《四镇三关志》</th><th colspan="2">《西关志》</th></tr>
<tr><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r>
<tr><td>10</td><td>济岭儿口</td><td rowspan="7">吴王口管总官</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11</td><td>深盘安口</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12</td><td>鱼儿创口</td><td>鱼儿创口</td><td rowspan="3">茨沟下</td><td>鱼儿创口</td><td rowspan="3">吴王口管总官</td></tr>
<tr><td>13</td><td>陡岭儿口</td><td>陡岭儿口</td><td>陡岭儿口</td></tr>
<tr><td>14</td><td>鎗峰石口</td><td>鎗峰岭口</td><td>鎗峰石口</td></tr>
<tr><td>15</td><td>园子沟</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16</td><td>夹耳安口</td><td>无</td><td>无</td><td>夹耳庵口</td><td>吴王口管总官</td></tr>
<tr><td>17</td><td>茨沟营</td><td>参将</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18</td><td>小牛邦口</td><td>茨沟营参将</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19</td><td>牛邦口</td><td>茨沟营千总官</td><td>牛邦口</td><td>茨沟下</td><td>无</td><td>无</td></tr>
<tr><td>20</td><td>鹚鸪沟口</td><td rowspan="2">竹帛口守口官</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1</td><td>竹帛口</td><td>竹帛口</td><td>茨沟下</td><td>无</td><td>无</td></tr>
<tr><td>22</td><td>撅水平</td><td rowspan="2">茨沟营</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3</td><td>羊圈岭</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4</td><td>茨沟岭</td><td>茨沟营中军官</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5</td><td>扒背石</td><td>茨沟营</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6</td><td>黄石堂口</td><td rowspan="4">黄石堂口守口官</td><td>黄石堂口</td><td>茨沟下</td><td>无</td><td>无</td></tr>
<tr><td>27</td><td>黄土沟月城</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28</td><td>高石堂口</td><td>高堂石口</td><td>茨沟下</td><td>高石堂口</td><td>吴王口管总官</td></tr>
<tr><td>29</td><td>歪头山</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30</td><td>羊马楼口</td><td rowspan="2">羊马楼口守口官</td><td>养马楼口</td><td rowspan="2">茨沟下</td><td>养马楼口</td><td rowspan="2">吴王口管总官</td></tr>
<tr><td>31</td><td>龙窝口</td><td>龙窝沟口</td><td>龙窝沟口</td></tr>
<tr><td>32</td><td>陡撞沟口</td><td rowspan="2">陡撞沟口守口官</td><td>陡撞沟口</td><td rowspan="6">龙泉关下</td><td>陡撞沟口</td><td rowspan="6">龙泉关把总、管总官</td></tr>
<tr><td>33</td><td>胡家庄口</td><td>胡家庄口</td><td>胡家庄口</td></tr>
<tr><td>34</td><td>石湖沟口</td><td rowspan="4">龙泉关巡捕官</td><td>石胡沟口</td><td>石湖沟口</td></tr>
<tr><td>35</td><td>龙八沟口</td><td>龙八沟口</td><td>龙八沟口</td></tr>
<tr><td>36</td><td>黑崖沟口</td><td>黑崖沟口</td><td>黑崖沟口</td></tr>
<tr><td>37</td><td>旛竿岭口</td><td>旗杆岭口</td><td>旛杆岭口</td></tr>
<tr><td>38</td><td>长城岭口</td><td rowspan="3">长城岭口守口官</td><td>无</td><td>无</td><td>无</td><td>无</td></tr>
<tr><td>39</td><td>旧路岭口</td><td>旧路沟口</td><td rowspan="3">龙泉关下</td><td>旧路岭口</td><td rowspan="3">龙泉关把总、管总官</td></tr>
<tr><td>40</td><td>盘道岭口</td><td>盘道岭口</td><td>盘道岭口</td></tr>
<tr><td>41</td><td>龙泉关</td><td>龙泉关把总、巡捕官</td><td>龙泉关</td><td>龙泉关上城下龙泉关</td></tr>
</table>

续表

序号	《图说》		《四镇三关志》		《西关志》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42	胡八沟口	龙泉关巡捕官	胡八沟口	龙泉关下	胡八沟口	龙泉关把总、管总官
43	新路沟口		新路沟口		新路沟口	
44	各畧沟口		各畧沟口		各畧沟口	
45	青竿岭口	青竿岭口守口官	青竿岭口		青竿岭口	
46	阳和门口		阳和门口		阳和门口	
47	三关子口	龙泉关巡捕官	三关子口		三关子口	
48	白草沟口	白草沟口守口官	白草沟	鹞子崖下	白草沟口	鹞子崖管总官
49	孤榆树口	合河口守口官	孤榆树口		孤榆树口	
50	合河口		无	无	无	无
51	车孤驼口		车孤驼口	鹞子崖下	车孤驼口	鹞子崖管总官
52	沙岭口		沙门岭口		沙门岭口	
53	鹞子崖口		无	无	鹞子崖口	
54	陡岭口		陡岭口	鹞子崖下	陡岭口	
55	桑园沟口	桑园沟口守口官	桑园沟口		桑园沟口	
56	方西沟口		方西沟口		方西沟口	
57	牛圈沟口		牛圈沟口		牛圈沟口	
58	石槽沟口	北黑山口守口官	石槽沟口		石槽沟口	
59	北黑山口		北黑山口		北黑山口	
60	黄土脑口		黄土碯石		黄土脑口	
61	津水崖口	碓窝口守口官	津水崖		津水崖口	
62	白羊平口		白羊平口		白羊平口	
63	碓窝口		碓窝口		碓窝口	
64	红沙崖口		红纱口		红沙崖口	
65	宋家峪口	恶石口守口官	宋家峪口	十八盘下	宋家峪口	十八盘管总官
66	青阳沟口		青阳沟口		青阳沟口	
67	恶石口		恶石口		恶石口	
68	杨家窜口		无	无	无	无
69	寨门口		寨门口	十八盘下	寨门口	十八盘管总官
70	马圈沟口		马圈口		马圈口	
71	各料沟口	南黑山口守口官	各料沟口		各料沟口	
72	瓦岔沟口		瓦盆沟口		瓦岔沟口	
73	南黑山口		南黑山口		南黑山口	
74	六岭口		六岭口		六岭口	
75	驳龙回口		无	无	无	无

续表

序号	《图说》		《四镇三关志》		《西关志》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名称	统帅体系
76	菩萨崖口	十八盘口守口官	菩崖口	十八盘下	菩萨崖口	十八盘管总官
77	十八盘口		十八盘口		十八盘口	
78	青阳沟口		无	无	无	无
79	小黄安口		小黄庵口	十八盘下	小黄安口	十八盘管总官
80	平闯沟口	黄安岭口守口官	平闯沟口		平闯沟口	
81	井子峪口		井子峪口		井子峪口	
82	黄安岭口		黄庵岭口		黄庵岭口	
83	摘水口		滴水口		摘水口	
84	清风岭口		清风岭口		清风岭口	
85	潬潬水口		潬潬水口		潬潬水口	
86	柳儿沟口	达滴崖口守口官	无	无	无	无
87	达滴崖口		达滴崖口	故关下	达滴崖口	故关新城把总、管总官
88	武功口		武功口		武功口	
89	横河槽口		横河漕口		横河槽口	
90	险岩崖口		险岩崖口		险岩崖口	
91	牛道岭口		牛道岭口		牛道岭口	
92	猢狲窑口	娘子关守口官	猢狲窑口		猢狲窑口	
93	醉汉峪口		醉汉峪口		醉汉峪口	
94	龙黄沟口		无	无	黄龙沟口	
95	驴桥岭口		驴桥沟口	故关下	驴桥岭口	
96	娘子关口		娘子关口		娘子关	
97	嘉峪沟口		嘉峪沟口		嘉峪沟口	
98	旧固关	固关新城	旧堡		故关旧城	
99	固关新城口	固关新城把总、管总官	故关新城口		无	无
100	白灰沟口	固关新城	无	无	无	无
101	泉水头口	泉水头口守口官	泉水头口	故关下	泉水头口	故关新城把总、管总官
102	磨石崖口		磨石崖口		磨石崖口	
103	苇箔岭口		苇箔岭口		苇箔岭口	
104	苍岩道口		苍岩道口		苍岩岭口	
105	孤撮岭口		孤撮岭口		孤撮岭口	
106	青草峪口		青草峪口		青草峪口	

续表

<table>
<tr><th rowspan="2">序号</th><th colspan="2">《图说》</th><th colspan="2">《四镇三关志》</th><th colspan="2">《西关志》</th></tr>
<tr><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h>名称</th><th>统帅体系</th></tr>
<tr><td>107</td><td>白城口</td><td rowspan="10">黄沙岭口守口官</td><td>白城口</td><td rowspan="10">故关下</td><td>白城口</td><td rowspan="10">故关新城把总、管总官</td></tr>
<tr><td>108</td><td>黄沙岭口</td><td>黄沙岭口</td><td>黄沙岭口</td></tr>
<tr><td>109</td><td>庙儿崖口</td><td>庙儿崖口</td><td>庙儿崖口</td></tr>
<tr><td>110</td><td>叚里口</td><td>叚里口</td><td>叚里口</td></tr>
<tr><td>111</td><td>后沟口</td><td>后沟口</td><td>后沟口</td></tr>
<tr><td>112</td><td>虎寨沟口</td><td>虎寨沟口</td><td>虎寨沟口</td></tr>
<tr><td>113</td><td>泥凳子口</td><td>泥凳子口</td><td>泥凳子口</td></tr>
<tr><td>114</td><td>松树脑口</td><td>松树碯口</td><td>松树碯口</td></tr>
<tr><td>115</td><td>不秃岭口</td><td>不秃岭口</td><td>不秃岭口</td></tr>
<tr><td>116</td><td>石榴嘴口</td><td>石榴嘴口</td><td>石榴嘴</td></tr>
</table>

《图说》中记载各隘口的统帅层级相对于《四镇三关志》《西关志》来说多一层级指挥体系，为认识上述防区内的组织形式提供了新的线索。从表一可以看出，《图说》中一些隘口在《四镇三关志》和《西关志》中失载。其原因我们推测是在志书编纂过程中遗漏或防御体系发生变化。同时在《四镇三关志》和《西关志》记载隘口中，亦有《图说》中失载者，具体如表二。

其失载的原因，我们推测该《图说》体现的是万历元年至万历四年修边竣工图，因此这期间未修关隘则不体现在该《图说》中。

表二　《四镇三关志》《西关志》所记隘口在《图说》中失载者

<table>
<tr><th colspan="2">《四镇三关志》</th><th colspan="2">《西关志》</th></tr>
<tr><td rowspan="7">茨沟下</td><td>黍查口</td><td rowspan="7">吴王口管总官所辖</td><td>黍查口</td></tr>
<tr><td>门罕岭口</td><td>门罕岭口</td></tr>
<tr><td>香炉石口</td><td>香炉石口</td></tr>
<tr><td>夹儿庵口</td><td></td></tr>
<tr><td>杨洪口</td><td>杨洪口</td></tr>
<tr><td>火炭沟口</td><td>火炭沟口</td></tr>
<tr><td>古道沟口</td><td>古道沟口</td></tr>
<tr><td rowspan="6">龙泉关下</td><td>下龙泉关</td><td rowspan="6">龙泉关把总、管总官所辖</td><td></td></tr>
<tr><td>印钞石口</td><td>印钞石口</td></tr>
<tr><td>黄土坡口</td><td>黄土坡口</td></tr>
<tr><td>炕儿沟口</td><td>炕儿沟口</td></tr>
<tr><td>八荅庵口</td><td>八荅庵口</td></tr>
<tr><td>窜道沟口</td><td>窜道沟口</td></tr>
</t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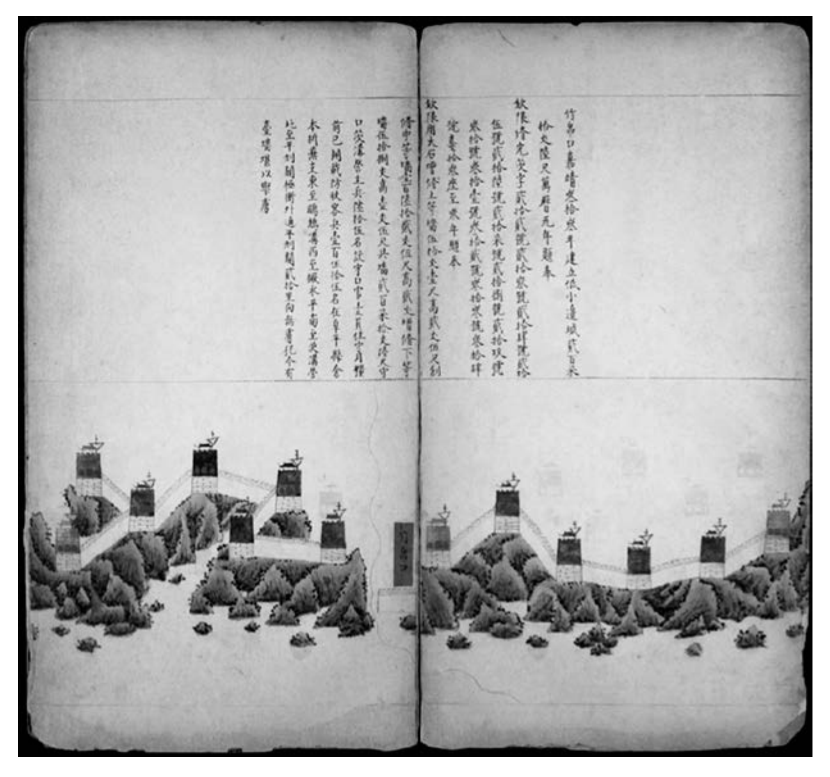
续表

《四镇三关志》		《西关志》	
鹞子崖下	神堂岭口	鹞子崖口管总官所辖	神堂岭口
	白羊口		白羊平口
	石盆沟口		石盆沟口
	古道沟口		古道沟口
	柴树园口		柴树园口
	贺驴沟口		贺驴沟口
	道庵岭口		道安岭口
	鲍子沟口		鲍子沟口
			方西沟口
十八盘下	米业沟口	十八盘口管总官所辖	米业沟口
	赵家寨口		赵家寨口
	油瓮沟口		油瓮沟口
故关下	龙门关口	固关新城把总、管总官所辖	
	小十八盘口		小十八盘口
	朱会沟口		朱会沟口
	大石板口		大石板口
	短岭儿口		短岭儿口
	险岩崖口		
	杀羊磳石口		杀羊磳口
	老婆窑口		老婆窑口
	鸽子岭口		
	谷家崖口		

其次，四百年来，真保镇辖区边关隘口所处地形、地貌虽较为稳定，但与蓟、昌二镇相比，名称多已失传。纵然《三关志》《四镇三关志》中记述了隘口的绝对位置和彼此间位置关系，但囿于志书编纂和详略等自身缺陷所限，仍难以考证其今日地望。而《图说》提供了最直接的判定依据，如竹帛口、小牛帮口。

竹帛口，今地图中未见此地名，同治《阜平县志》中《县境图》标注竹帛口位于韩家庄和钟耳寺之间，如今，在山西忻州繁峙县韩庄村与钟耳寺村之间确有长城遗迹，即竹帛口长城（编号：140924382102170004）。长城墙体上修建有空心敌台 13 座，其中四座尚存匾额，其编号自北向南依此为"茨字贰拾陆号台""茨字贰拾伍号台""茨字贰拾肆号台""茨字贰拾叁号台"。《图说》中竹帛口条记述："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贰拾贰号、贰拾叁号、贰拾肆号、贰拾伍号、贰拾陆号、贰拾柒号、贰拾捌号、贰拾玖号、叁拾号、叁拾壹号、叁拾贰号、叁拾叁号、叁拾肆号台拾叁座。"（图二）其所绘之图与韩庄村现存长城遗迹分布图一致。因此，可以断定韩庄村即明代茨沟营辖竹帛口所在地，现存敌台修建于万历元年。从文献学的意义考察，明代舆图的史料价值优于清代方志。

小牛帮口，在《四镇三关志》和《西关志》中均失载。依地名推测，其当位于牛帮口附近。现牛帮口位于山西忻州灵丘县，隘口东南侧有一条无名山谷与之并列，谷口处



图二　竹帛口位置图

尚存一座空心敌台和一段长城墙体，台匾额尚存，即“茨字拾捌号台”。山谷内风景优美，常年流水不绝，入山谷经花塔村东南行，可达竹帛口—茨沟营—吴王口所在山谷。《图说》“牛帮口”条“说”中记述“牛邦口，嘉靖叁拾捌年建立，低小边城捌拾贰丈柒尺，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拾捌号、拾玖号、贰拾号、贰拾壹号台肆座。……本口附近小牛邦口次冲，万历叁年题奉钦限用大石创修上等墙叁丈伍尺，高贰丈伍尺……”。“图”中将茨字拾捌号台绘于小牛帮口处（图三），与今长城形势相符。因此，可以断定牛帮口东南侧的山谷即为文献失载、当地失传的小牛帮口。

明人修建空心敌台后均将其命名，以便标示。其命名规则格式多为敌台所属营堡 + 编号。如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延绥东路地理图本》中所绘敌台旁皆贴红签，上写台名，黄埔川堡所辖则命为“黄字”，清水营辖则命为“清字”。真保镇所辖敌台亦如此。大部分匾额或遗失或字迹漫漶。仅少部分敌台的匾额尚存。且《西关志》《四镇三关志》文献记载各城堡所辖敌台数量缺失，因此无法依据现存敌台匾额，结合文献记载，推断遗失匾额敌台的明代称谓。例如，茨沟营所辖敌台，现存“茨字”系列敌台尚存匾额者仅13座（茨字2、3、6、9、14、16、17、18、20、21、24、25、26号台）。由于敌台总量未知，故无法推测其编号。《图说》“茨沟营”条“说”中记述“……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叁拾陆号、叁拾柒号台贰座，改设参将壹员。万历肆年新建堡城一座……”。“图”中将两座敌台绘于茨沟营城墙上（图四）。茨沟营格局图与今茨



图三　牛帮口与小牛帮口位置图



图四　茨沟营位置图

沟营现存一致。今茨沟营城墙上遗存南、北 2 座空心敌台，即茨沟营南敌台（编号：140924352101170016）、茨沟营北敌台（编号：140924352101170015），南侧者已彻底坍塌，北侧者仅存一面墙体，匾额风化，字迹漫漶。通过比对《图说》可知，二敌台为“茨字叁拾陆号”和“茨字叁拾柒号”台，且茨字系列敌台最大编号为 37 号。我们便可据此推算其他无匾额、匾额漫漶的茨字系列敌台的编号，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所守御的隘口名称。例如，河北保定阜平县木家沟村西南山谷两侧有两座敌台，一座匾额丢失，一座匾额风化，字迹漫漶，依据已知匾额编号，我们可以推算其为“茨字拾肆号台”“茨字拾伍号台”。依据《图说》记载，敌台修建于万历元年，二年阅视立碑，至今碑刻尚存台内。敌台所守御的山口，即为“青羊沟口”（图五）。



图五　青羊沟口位置图

五、结　　语

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内的《图说》成图于万历五年（1577 年），现为残本。仅存的 1 册描绘、记述了真保镇长城南部的倒马关路参将、龙固关路参将分管的茨沟营、龙泉关、鹞子崖、十八盘、固关所辖边墙隘口，共计 116 座。根据《图说》描绘、记述的内容，结合其他史料，综合判断该《图说》实为万历元年汪道昆议修空心敌台竣工，巡按御史或汪道昆本人阅视边防后向皇帝进呈的“图本”。

《图说》中明确了长城敌台的修建年代，不仅与传世文献、现存碑刻相互印证。亦可与现存敌台比对，确定现存敌台的明代称谓、守御隘口名称，特别是确立了敌台建筑形制的年代标尺，具有重要意义。较《西关志》《四镇三关志》而言，内容更加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明代之军事舆图传世甚稀，存此吉光片羽，甚为宝惜。

注　释

[1] （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32·驷政［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921．

[2]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之二百十·奏请点差·巡关［M］．万历刻本．

[3] （清）麻兆庆著，姜纬堂校理．昌平外志校理·《新志》拾遗记·卷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62．

[4]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七·景泰元年冬十月戊戌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194．

[5] （明）陈文等．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景泰元年五月乙巳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985．

[6] （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A］．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383．

[7] （明）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三·弘治十三年六月戊子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939．

[8] （明）李宏等．明武宗实录·卷三·弘治十八年七月乙酉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89．

[9]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庚午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2．

[10] （明）王士琦．三云筹组考·卷1·安攘考［A］．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383．

[11] 刘景纯．宣德至万历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间分布与地域变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2）．

[12]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三·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卯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220．

[13]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一·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344，5345．

[14] （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五·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寅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084．

[15] 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一·建置考·真保镇建置·沿革》载："嘉靖二十九年，设总兵，镇守三关，为真保镇云。"同书卷之八《职官考·真保镇职官·武阶》又载："三十二年改镇守总兵官。"

[16] a.（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二·隆庆六年六月戊寅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62：54.

b. 刘效祖《四镇三关志 · 卷二 · 形势考 · 真保镇形势 · 疆域》载：“东自紫荆关沿河口连昌镇镇边城界，西抵固关鹿路口接山西平定州界，延袤七百八十里。”

［17］（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三二〇 · 嘉靖二十六年二月辛丑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947，5948．

［18］同［11］.

［19］（清）张廷玉等．明史 · 卷二百二十四 · 孙丕扬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5900．

［20］详见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http: //library.harvard.edu/）。该图本封面手写有“T3034/3422”字样，为红色笔迹书写。第 1 页有“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8 1961”黑色戳印记。说明该图册为 1961 年入藏汉和图书馆。右下角钤朱文长方印“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印”

［21］（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 · 卷五 · 隆庆六年九月壬子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03．

［22］（明）刘效祖撰，彭勇、崔继来校注．四镇三关志校注 · 卷七 · 制疏考 · 真保镇制疏 · 题奏 · 阅视侍郎汪道昆创筑空心敌台疏略［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463，465．

［23］（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 · 卷十六 · 万历元年八月丁巳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80．

［24］同［19］.

［25］同［1］.

［26］同［2］.

［27］（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二四六 · 嘉靖二十年二月丙子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944．

［28］（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二五五 · 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120．

［29］（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四六二 ·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丁丑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797，7798．

［30］高凤山．三晋石刻大全 · 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24．

［31］（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二五五 · 嘉靖二十年十一月己丑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120．

［32］（明）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 · 卷四四六 ·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602．

［33］（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 · 卷五二 · 万历四年七月庚申条［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234．

［34］同［3］．162．

A Study on the “Map of the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边城御虏图说) kept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Shang Heng

Abstrac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possesses a map dating back to the 5th year of the Wanli era under the Ming Dynasty (1587). The document is incomplete, only one of its volume is left. The map-or “picture book”-depicts the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in Zhenbao district, including the Daoma pass, the Longgu pass and the camps the latter supervised - the Cigou camp, the Longquan guan, the Yaozi cliff, Shiba pan, Gu pass - with a total of 116 seats under their juridi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described in the document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appears that the map was the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emperor by Wang Daokun when h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defense system by building a hollow type of watchtower on the Great Wall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nli era (1582). The dat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tchtower is stated in the document, confirmed by both transmitted texts and inscriptions on stele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terminology in use under the Ming Dynasty when referring to defensive structures and to follow the chr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specific architectural form.

Keywords: Great Wall; Zhenbao town; Tushuo; Hollow watchtower

西　顶　庙

——广仁宫历史沿革及庙会考略*

袁碧荣

（首都图书馆，北京，100021）

内容摘要：西顶庙，又称西顶碧霞元君庙，为老北京城“五顶”之一，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万历皇帝及其生母孝定皇后共同捐资修建。清康熙年间，西顶庙改名为广仁宫。明清时期，因许多香客前来朝顶进香，西顶庙庙会很是兴盛。民国时期，受时局的影响，西顶庙庙貌衰败，庙会也逐渐衰落。

关键词：西顶；广仁宫；历史；庙会

老北京的民间信仰有关帝信仰、碧霞元君信仰、土地神信仰、城隍信仰等，碧霞元君信仰在北京影响较大。明清两朝，国家对碧霞元君的崇拜，使得北京地区老百姓的碧霞元君信仰在全国显得尤为突出。北京的碧霞元君信仰主要体现在三山五顶。三山主要指石景山的天台山、门头沟的妙峰山、平谷的丫髻山，这三座山上都有庙宇，供奉碧霞元君天仙圣母娘娘。五顶是指五座祀祭碧霞元君的庙宇，是东顶、西顶、南顶、北顶、中顶。“万寿寺弯腰——顶上见”，“顶上见”说的就是五顶之一的西顶，坐落在海淀区曙光街道蓝靛厂。蓝靛厂位于海淀区的腹地，北邻颐和园，南临板井路，东临昆玉河（旧名长河），西面是巍峨的西山群峰。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地势低洼，百泉涌流，适合植物的生长，隶属于宫廷的织染局便派人在此种植蓼蓝、山蓝和松蓝等植物，待成熟后取去枝叶发酵后制成蓝靛，作为染布的原料，蓝靛厂因此而得名。本文主要探讨西顶庙的历史沿革及其庙会发展。

一、西顶庙历史沿革

西顶庙，俗称“西顶”，初名“护国洪慈宫”，又称“广仁宫”。“长河麦庄桥之西为

---

*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地区碑拓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LSB014）。

长春桥，度桥为广仁宫，供碧霞元君，旧名护国洪慈宫，康熙十一年（1672 年）改今名。正殿恭悬圣祖仁皇帝御书额曰‘金阙宣慈’，皇上书额曰‘坤元广毓’，联曰‘蕃滋遍锡寰区福，长养宏敷雨露恩’，殿前恭立。”[1]

1. 明代的护国洪慈宫

西顶，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明神宗的生母孝定皇后和明神宗捐钱修建，明神宗赐名为“洪慈宫”。据《敕赐护国洪慈宫碑记》记载：“万历戊申（1608 年）岁，……孝定皇后在慈宁宫闻之为出金钱佐之费，圣神宗显皇帝亦有给赐，且命内宫监太监马辉督其工，于是前殿后寝以至廊庑门墙次第肇举矣。”[2] 万历朝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今上戊申年，内臣辈建西顶庙于内府内织染局。”[3]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支持过广仁宫的重建。天启二年（1622 年），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到蓝靛厂视察厂务时，到庙里瞻拜，发现寺庙已经废弛，喟然长叹，于是与司礼监的太监王体乾等人商议重修，得到了司礼监及乾清宫内许多太监的资助。司礼监秉笔太监涂文辅、乾清宫管事太监谢晋、乾清宫管掌内织染局印务太监齐良臣等人都捐出钱财，大规模修缮扩建娘娘庙，在寺庙的西侧修建了几十间精舍，作为皇帝派到这里来的宦官的住所，并购买了价值 2000 两的土地作为供养庙中道士之用。这次修建历时两年，天启四年（1624 年）完工。“在其四周壁缭以周垣，为正门者一，钟鼓楼者二，道经阁东西各十楹，法坛十级，碧落千寻，金榜璇题‘千云耀日’，门之左右表以卓楔，又为精舍数十连，于其西偏，今为北院，以待钦遣中贵十人者之所居，别买民田若干亩，为值二千有奇，以供诸道士六时焚修焉。”[4] 经过这次修建，西顶庙初具规模。新增山门、钟楼、鼓楼、藏经阁、法坛、精舍等。

2. 清代的广仁宫

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康熙皇帝再次到西顶庙进香时，御赐西顶庙为“广仁宫”，并《御制西顶广仁宫碑》盛赞碧霞元君的灵验，歌颂碧霞元君在御灾捍患方面的功德。“京城西直门外有旧建碧霞元君宫，地近西山之麓，直今西苑之西南，所谓万泉庄者，固郊畿一胜景也，元君，初号天妃，宋宣和间，始着灵异，厥后，御灾捍患，奇迹彰下，迄元明代加封号成□，而后祠观尤盛，郛郭之间，五顶环列，西顶其一也，岁时既久，陈迹都荒，碑碣犹存，榱桷弗整，其谓妥神何，岁在戊子，发内帑命有司鸠工重葺之，阅一载而落成，冻栋宇穹然，殿寝秩然，丹雘灿然，瞻拜其下者虔肃有加焉。朕于万几之暇亦往展礼，仰祝圣母之厘，俯介生民之祉，以祈纯嘏，以巩皇图，颜其额曰‘广仁宫’。”[5]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康熙皇帝六旬万寿盛典，两淮商人联合黄山僧众在西顶广仁宫建经坛，庆祝万寿盛典。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康熙帝到西顶庙进香，目睹娘娘庙的残败，下旨重修。皇宫里有人赞助了西顶的修缮并重新命名，此后西顶成为太监和旗人圣会活跃的一个中心。五阿哥和硕恒亲王胤祺敕书了满汉碑文。国子监生内

官学徐珽、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撰写碑文记载了这次重修的具体情况，“西顶向为洞府仙区，建有琳宫，久作颓垣废寺，众意方思改葺，宸衷早念重修，特布纶音守成规而弗失因，捐内帑期即事而增辉，乃命周官董其役，乃求郢匠施其能，榱桷摧残，忽而梅梁……是以巍峨庙貌廓雄构矣”[6]。康熙拜谒了此庙，为寺庙镶了金边绿瓦，御赐七块匾额。正殿恭悬其御书额曰“金阙宣慈”。前坊楔内额曰“泰岳同瞻”，外额曰“坤贞普育”。东西左右建木枋各一座，左枋内额曰“安贞福地”，外额曰“弘育仙都”；右枋内额曰“资元真境”，外额曰“怀保春台”，皆圣祖御书。

此外，康熙皇帝还御赐珠冠、袍幡、御书天仙玉女经卷等物给广仁宫。后来，清代的女词人顾太清到此进香时作诗《广仁宫敬瞻圣祖御书天仙玉女经恭记》一首，歌颂此事，“阶左穹碑白日曛，西郊初礼碧霞君，仁皇御笔书真诰，开卷金光见宝文”[7]。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也来广仁宫进香，并留御制《广仁宫瞻礼诗》，“碧霞自昔号天仙，圣母当年每致虔，闻典忽教两岁阅。摅诚未可此时捐，娑罗树古玉阶护，阆苑鹤归金简传，靡不宗神祈厚泽，颙带萝雨渥干田”。

《水曹清暇录》记载，乾隆中后期，西顶的住持为释实济，号莲筏，江苏某县人。“西顶住持释实济，号莲筏，江苏某县人。通禅悦工诗，曾见其和文衡山落花诗十篇。”[8]

道光皇帝下旨每年给予西顶充足的香火钱，安排皇室的人照看西顶，每次去拜谒之后还都赏赐和尚[9]。《清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咸丰皇帝曾到西顶庙拈香。光绪初年，西顶庙毁于火灾，只剩下菜圃，菜圃有两水车。每年，内务府奏请派遣大臣到广仁宫等地拈香。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皇帝重修行宫，并菜圃而圈入矣。

3. 民国时期的西顶

1931年，《西郊区西顶广仁宫僧人元起登记庙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记载，光绪年间西顶庙的住持为觉先，觉先病故后，由元起担任住持。元起十二岁时就进入娘娘庙修行[10]。

1936年，北平市社会局第一次寺庙总登记时对广仁宫的庙名、坐落地点、建立年代、公建或私建、庙产状况、管理、使用状况及庙内法物予以登记，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广仁宫，坐落西郊蓝靛厂十七号，建于明天启年，属公建。不动产土地本庙十二亩，房屋一百三十六间；附属土地十八亩，房屋十三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供佛。庙内法物有铜、泥像一千二百九十位，礼器七十三件，法器五件，经一部，另有石碑三十八座，松树六十四棵，槐树十二棵，樗栎树两棵，水井一眼。”[11]

抗战后西顶庙逐渐萧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庙址一度为工厂和疗养院占用。2003年，海淀区人大代表王越去蓝靛厂听取选民意见时意外获知，西顶庙所在的五金厂将在2004年2月前后迁出以修建地下停车场，有人提议拆掉古庙。王越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座明代古庙在布局中沿用的还是宋代的格局，前殿与中殿有廊庑相通，呈

工字形，这种建筑形式目前在北京庙宇中已经十分少见。出于对文物的关心，王越向有关部门呼吁加强对西顶庙的保护，避免因周边地区的拆迁受到损坏。2004 年他将古庙的有关资料带进海淀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团，希望能够以代表议案的形式来保护“西顶”。他的建议得到了人大代表的赞同。目前，修葺一新的西顶庙已经对外开放。

二、西顶的布局

西顶庙坐北朝南，有山门、前殿、工字殿、后殿及藏经楼，殿宇多为硬山调大脊式，绿琉璃瓦顶，黄琉璃瓦剪边，富丽堂皇，壮丽恢宏。

山门有青石拱门洞 3 个，中门前檐石匾镌“敕建广仁宫”，两侧为八字墙。中门东西两边各有一座牌楼，路南为戏楼。山门后为山门殿，供奉马、赵、温、刘四神将，《燕京岁时记》记载：“山门中四大天王像，神气如生，狰狞可畏。座下八鬼怪，尤觉骇人。凡携小儿者多掩其目而过之。庙有七十二司神，皆绘画，非塑像也。”[12]

山门殿后殿即是正殿，正殿内供奉了九位圣母娘娘，其中已知的八位分别是：正中为天仙娘娘、子孙娘娘、眼光娘娘，左龛为催生娘娘、送生娘娘、乳母娘娘，右龛则是瘢疹娘娘、痘疹娘娘等神。正殿平面呈“工”字，前为正殿，后为寝宫，中以长廊相连接。这种建筑形式在北京的诸多寺庙宫观中较为罕见。

后殿为藏经楼，中间原有垂花门相隔，藏经阁上供奉玉宇金天昊穹玉皇大帝，在楼下供奉关帝。整个西顶规模宏大，殿宇众多，为北京各顶之最。1947 年，痴呆对当时西顶庙的布局进行了仔细的描述：“庙内重门，为马赵温刘四神将，各尊神之顶上檐间，皆附以小型立额，上镌尊神圣号，此为本庙之特色也。内则为丹墀月台，上为正殿，中祀优攘九位圣母娘娘，正中为天仙，子孙，眼光，左龛为催生，送生，乳母，右龛则瘢疹，痘疹等神，本庙大殿亦为工字型，而前殿后寝宫，中以长廊联系之，惟规模则远逊于故宫之文华、武英，且本庙之娘娘像，悉为青铜所铸（按前时蓝靛厂，本属织染局），当年本庙之富庶可以想见，而殿后中前，有法身较小之娘娘像一尊，其面内向，而锈蚀斑剥，其苍翠欲滴，较其他各神为尤甚，神后之围屏，髹漆亦剥落过半，然此究为神不知也，正殿四周，群房绵亘，则为冥府七十二司，其一切较诸东岳庙则不及远甚，其各司之尊神鬼使大都坍塌倒坏，东西配亭，败坏尤甚，其庭院虽广，无非蔓草荒烟，则本庙除庙会外，人迹罕到，可知也矣，至极北有大殿三楹，建筑虽宏，然装修皆无，中祀太乙救苦天尊，及东岳大帝仁圣天齐，再后为小后宰门一，门内两旁为护法金甲神，金身甲胄，分持斧钺长枪，其法身较山门内尊神尤为高大，惟门顶渗漏过甚，致神像为雨水所冲，色落泥流，而毁败殊甚，内有小院落，建崇阁，为后阁藏经楼，上祀玉宇金天昊穹玉皇上帝，楼下为护国佑民，忠义仁勇，伏魔协天，关圣大帝，而院有大铁花瓶一对，高可五六尺，上贴纸条书‘妇女在右方’，询诸当地人，始知冬季尝为粥厂云……”[13]

三、西顶庙的庙会

每年四月初一至四月十八，西顶开庙半个月，山门内有四大天王像，神气如生，狰狞可畏，庙内有七十二司神像。

1. 庙会创始

自明代建庙以来，西顶庙香火旺盛。崇祯年间西顶庙就有庙会，吸引来自不同地区的香客。“粤西顶所由来，实创自神宗时。始厥告成以后，庇佑一方灵感肆应，每岁四月初一日至十八日，四方善信顶礼者扶老携幼而来，殆肩相磨，踵相接也。但地傍西山，多崇山峻岭，而道老又少旅舍，至此者既老于跋涉，又苦于饿渴焉。”[14]

2. 开庙时间

西顶庙每年四月初一到十八开庙会，与京西妙峰山庙会的时间大体相同。因此，大部分前往妙峰山进香的人回来时，会到西顶庙进香。康熙初年，“每岁四月初一日迄十八日，四方善信顶礼者扶老携幼而来，殆肩相磨，踵相接也”[15]。

3. 庙会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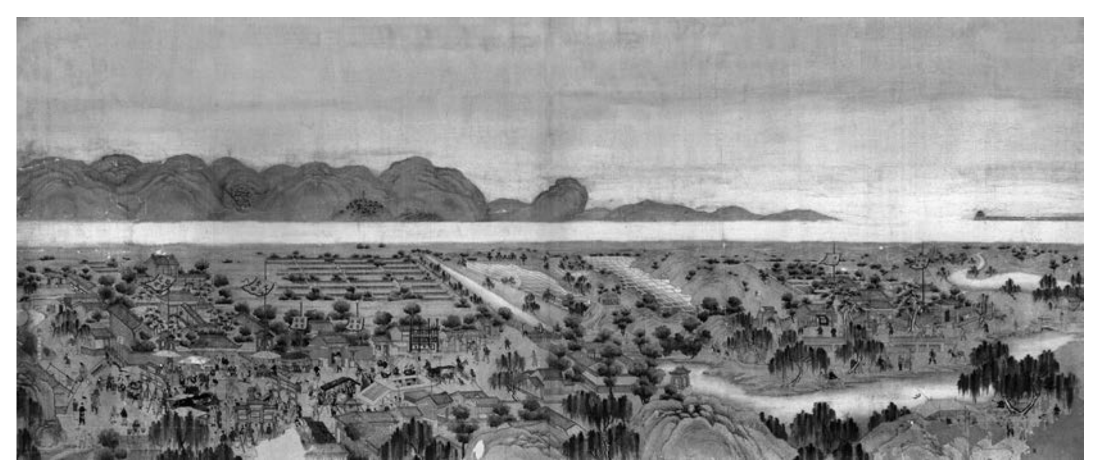
西顶庙会出现在明末，清代达到极盛。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始建西顶庙于此。其地素洼下，时都中有狂人倡为进土之说。凡男女不论贵贱，筐担车运，或囊盛马驮，络绎如织。甚而室女艳妇，藉此机会以恣游观，坐二人小轿，而怀中抱土一袋，随进香纸以徼福焉，可笑也。”[16]

清朝政府对西顶庙会十分重视，由于西顶离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都很近，清代帝王经常到这里亲自祭祀。每逢四月，香火特盛。清代官派大臣前来拈香，其他各顶没有。“每开庙时特派大臣拈香，与丫髻山同，他处无之。”[17]越来越多的香会几乎每年都来进香，进香者来自京城内外各个区域。

从进香的香会所立的石刻来看，清代西顶的庙会规模确实不小，康熙四年（1665 年）《西顶施茶碑》记载，西顶庙会居于五顶之首，康熙年间的西顶香火很旺盛，许多的善男信女千里迢迢，不畏山高路远来给碧霞元君进香上供。“西顶距神京十五里许，接玉泉、凤凰诸山，其形势之耸秀，香刹之崔巍，实甲于诸顶。……庇佑一方，灵感肆应……迨丙申春，善士众等岁岁捐资，在于圣母懿前上供，进香演戏，兼之往来善人煮以清茗，啖以果实，计其所费若干缗。数载以来，憩息者如法云凑而甘棠着咏，啜茗者如雨露施而膏泽均沾，敢曰‘传施济众’，亦曰‘良缘普渡’，少有所补云尔。”[18]

道光年间《西顶过会图》为我们提供了清代广仁宫庙会的盛况。西顶广仁宫，长河之上，朱桥横卧，桥身书写“长椿桥”三字，庙前、赶会的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庙门

左右写有“叩天”“祈雨”四个大字，门内两旗杆高高耸立，十分壮观。进门为钟鼓二楼，再往里为庙宇数间。庙外东、西、南各有牌楼一座，分别写有“慈云”“普护”“三界圣境”等字样。牌楼下面有男女老少许多赶庙会的人。广仁宫东面为立马关帝庙，西面有火器营营房；左右相对面店铺林立，花样繁多。广仁宫前，花会云集。各种杂耍前来，舞狮会正在进行（图一）。



图一 《西顶过会图》
（清无名氏绘，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庙会上，长河边，店铺内，有人购买食物，有人在观看演出，有人低声耳语，有的握手告别，人群中还有提笼架鸟的、闻鼻烟的，还有抽水烟袋的，这些活动场面让人如同身临其境。“雨过初晴少风尘，西顶沿路景致新。四天王像真可畏，柳阴深处憩游人。”子鸿的这首《竹枝词》反映了庙会时西顶热闹的场面。

民国年间，北京的民间信仰仍以碧霞元君信仰为最，但是西顶的庙会几乎与其他供奉碧霞元君的顶一样。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京师香会之盛，以碧霞元君为最。庙祀极多，而著名者七：一在西直门外高梁桥，曰天仙庙，俗传四月八日神降，倾城妇女往乞灵佑；一在左安门外弘仁桥；一在东直门外，曰东顶；一在长春闸西，曰西顶；一在永定门外，曰南顶；一在安定门外，曰北顶；一在右安门外草桥，曰中顶。……每岁之四月朔至十八日，为元君诞辰。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盛。惟南顶于五月朔始开庙，至十八日，都人献戏进供，悬灯赛愿，朝拜恐后。”[19]

北京郊区、天津、香河等地香客从妙峰山朝顶回来后，大都照例往西顶赶会。民国后西顶庙会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景象，“进了西顶庙的大街，见那上庙的人们实在不甚踊跃，冷清清见不出一点庙会的样子……”[20]

1930年庙会前，为了减少庙会期间案件的发生，西顶庙的住持绪英请求公安机关在庙会期间派兵弹压，得到了批准：“今西郊区署，呈报蓝靛厂广仁宫僧人绪英等报开庙会请饬警弹压情形由呈悉查该庙会历年举办有案，本届仍拟开放庙会十五应准援案举

行，除饬保安队协助照料，并分函军事机关派兵协同弹压外合行指令转饬知照届时并由署加派长警妥为照料，以维持秩序，此令。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十七日。”[21]

1946年，庙会期间，到妙峰山进香的文武香会大都照例到西顶庙进香，翰林院五虎棍与某开路圣会发生了矛盾：“在西顶大香道上因为‘跳墙’关系，始而由双方前引开‘嚼’，理论无效，既乃以‘合合音’的‘话条子’开始用武开‘鞭’。这一幕纠纷与冲突，其了结方案与江南城隍庙之守备口观音寺，及唐将玫两秧歌之一切，无独有偶也。”[22]这些香会组织在朝庙之际互相竞技，争强斗胜，这对民间花会的发展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图二）。



图二　妙峰山进香图中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 香会组织

香会有着悠久的历史，香会发展到宋元时期，被定名为社火，形成了民间自发性的结社组织，更加正规，为以后的香会发展和形成，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组织形式的基础，自此香会组织基本定型。到了明代就被正式定名为“香会”，并开始兴盛起来。到了清代由于朝廷的重视，香会的发展达到最盛时期。

北京的下层民众，通过为碧霞元君进香这一信仰活动，建立了香会，制定了行香走会的制度。传统香会组织有文会和武会之分，文会以为香客提供义务服务、为寺庙贡献器物为主要活动内容，武会则通过表演朝顶酬神的方式表达信仰。到西顶庙进香的香会组织主要有二顶进香圣会、如意圣会、香灯圣会等。

早在明崇祯九年（1636 年），灵济宫南太仆寺街撒枝胡同的圣会就到西顶庙进香，并立碑纪念。“京都顺天府宛大二县各城各坊巷居住总管会首……立”，后列正、副会首、众会首及会众的题名。碑侧为“圣会在中城灵济宫南太仆寺街撒枝胡同总管香头等立”字样。可见这种香会组织是在进香过程中形成的社区性香会联盟，选出总管会首可能就居住在撒枝胡同[23]。

顺治九年（1652 年）至顺治十一年（1654 年），德胜门以南的三圣庵圣会连续三年都到西顶庙进香，并立碑纪念：“今诚心进香三年圆满，恭同合会老幼弟子共发诚念，建立石碑刻众善姓名，永垂万古。”[24]

康熙九年（1670 年）《西顶娘娘进香会碑》题名会首中有“工部他吃哈番加一级信官伽蓝保”，碑侧题：“京都北城鼓楼西各旗地方等处正会首信官□□等仝立”。鼓楼西属于正黄旗地界。该会照例于每年四月中旬“虔备冠袍、带履、金银、贡器等项钱粮进献”给碧霞元君圣母，上祈椿黄之庆，下延兰桂之芬[25]。同时还有由“京都定府大街龙头井众善”组织的香会。

“二顶进香圣会”，曾分别在西顶庙和东岳庙立碑，因此“二顶”是指东岳庙和西顶，这个香会是由西华门四牌楼一带的会众组成的进香组织，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 年），会首张全华，率会众 600 多人，连续三年到西顶进香[26]。

由“西直门里西官园口”一带满汉旗民成立的香会，西官园口在朝天宫北。该会成立于康熙十四年（1675 年），会众例于元君诞辰（四月十八日）进香，“阅二十七年而不倦”，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刻碑纪念。碑阴题名“信官”“信士”中，多为旗人，已婚妇女约占半数。

康熙十七年（1678 年），由阜成门里朝天宫三条胡同仕宦满汉军民组成的香灯圣会，每年的四月十二日都要到广仁宫进香，在进香九年之时，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德，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西顶庙的住持海秀为之立碑。“阜成门里朝天宫三条胡同仕宦满汉军民，每岁（四月）十二日奉香瞻拜，九载功圆，例应镌石以志。”[27] 这个由满汉旗民组成的香灯圣会，成立于康熙初年，“……士善等敬仰其灵叨沾福庇，历有年，所

随分捐资以成香灯一会，迄今二十余载矣。夫是会也，每逢岁之丰收，量捐资之多寡，至孟夏之日，男女不下三五百。所谓神其有灵，敬报者多也”[28]。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三月，正阳门外各城坊巷组织子孙进香圣会，会首刘昌，从碑文来看，当时西顶庙的住持仍为海秀[29]。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西直门里南扒儿胡同弥罗庵香会到西顶朝顶进香的，会首王宁庆[30]。西直门里西官园口坐香圣会，会首为曹国相。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的《曹国相善会碑》记载来看，此香会应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前后，在碧霞元君诞辰日来进香，“阅二十七年而不倦”的曹国相创立的善会，从居住地区看，则应是旗人的香会组织；从题名来看，有奴才、药师保、祖兴茂、三达子、鄂纳海、色勒、黑达子、索住、观音保这样的旗人姓名，但是碑文中开头便说“曹子国相，燕之清门庶人也。世居城西，尤好崇信佛教”，似乎又应是老北京的汉人。碑阴题名有“信官”二十二人，“信士”近九十人，“信官女”近一百八十人[31]。

由阜城关外六道口一带军民组成的如意圣会，成立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近三百会众中，妇女占半数以上。“以故朝礼者、争先贡献者恐后岁必恭庆络绎不绝，兹有阜成门外六道口一带军民人等颂圣母之宏慈，伸愚衷之虔诚，敬起如意圣会，酬答神明，垂恩同为乐输，岁以为常。今三年圆满……”[32]雍正三年（1725年）庙会期间，阜成门朝天宫内蒲桃园众善人照例到广仁宫进香[33]。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政府在蓝靛厂设八旗外火器营，与西顶庙近在咫尺，营中官兵及眷属进香尤为便利。旗人得硕亭竹枝词《草珠一串》：“欲游西顶顺长河，一路楼台点缀多。万寿寺前需驻马，此中山子甚嵯峨。”[34]

由此可见，清代的西顶庙，是旗民进香还愿、赶庙游乐的理想去处，香火历久不衰。

注　释

［1］（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6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45．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M］．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补修本．

［4］同［2］．

［5］同［2］：164．

［6］同［2］：153．

［7］（清）顾太清，奕绘．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92．

［8］（清）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一［M］．清乾隆五十七年汪氏飞鸿堂刻本，1792．

［9］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M］．新北：稻香出版社，2014：262．

［10］西郊区西顶广仁宫僧人元起登记庙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附寺庙登记表）（档案号：J002-008-00651），北京市档案馆藏。

［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501．

［12］（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62．
［13］痴呆．西顶庙［J］．一四七画报，1946，4（2）：12．
［14］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2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2．
［15］同［14］．
［16］（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M］．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17］（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62．
［18］同［14］．
［19］（清）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17．
［20］熨．广仁宫一瞥——旧京庙会写真［N］，北平日报，1930-5-14（8）．
［21］公安：命令：训令：令西郊区署：呈报蓝靛厂广仁宫僧人绪英等报开庙会请饬警弹压情形由［J］，市政公报，1930（42）：16．
［22］同［13］．
［23］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1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62．
［24］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5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25．
［25］同［14］：151～153．
［26］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3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14～115．
［27］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4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3，94．
［28］同［27］：108．
［29］同［27］：121～123．
［30］同［27］：12～14．
［31］同［2］：6～8．
［32］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7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51．
［33］徐自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68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33．
［34］杨米人．清代北京竹枝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53．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Xiding Temple and the Temple Fair at Guangren Palace

Yuan Birong

Abstract: Xiding Temple, also known as Xiding Bixia Yuanjun Temple, is among the five most famous temples of ancient Beijing City. Xiding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36th year of the Wanli era. The construction was funded By Emperor Wanli and his consort Queen Mother Xiao.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under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renamed Guangren Palace. A fair flourished in Xiding Temple und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any pilgrim association came to visit the site. In modern times, the temple entered a phase of decline and temple fairs ceased to be.

Keywords: Xiding Temple; Guangren Palace; History; Temple Fair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的早期陶器：来自洪格尔卡遗址的新材料*

娜塔莉娅·策德诺娃[1]　达里玛·安德列娃[2]　沃尔夫冈·泽奇[3] 著
张　倩[4] 译

（1.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教学和藏学研究所考古实验室，乌兰乌德；2.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普通与实验生物学研究所，乌兰乌德；3. 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土壤科学与土壤地理研究所，拜罗伊特；4.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位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洪格尔卡遗址的最新成果。新的 AMS 测年数据显示该遗址为晚更新世时期，并出土了早期陶器。从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的物质材料来看，陶器类型和石器技术证明该遗址处于从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时期。此外，我们将该遗址与贝加尔湖地区出土早期陶器的其他遗址进行了比较。并对热解碳、磷、总有机碳、钾、镁和稳定同位素 $\delta^{15}N$ 等元素进行生物地球化学分析，以了解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

关键词：早期陶器；洪格尔卡遗址；贝加尔湖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技术；生物地球化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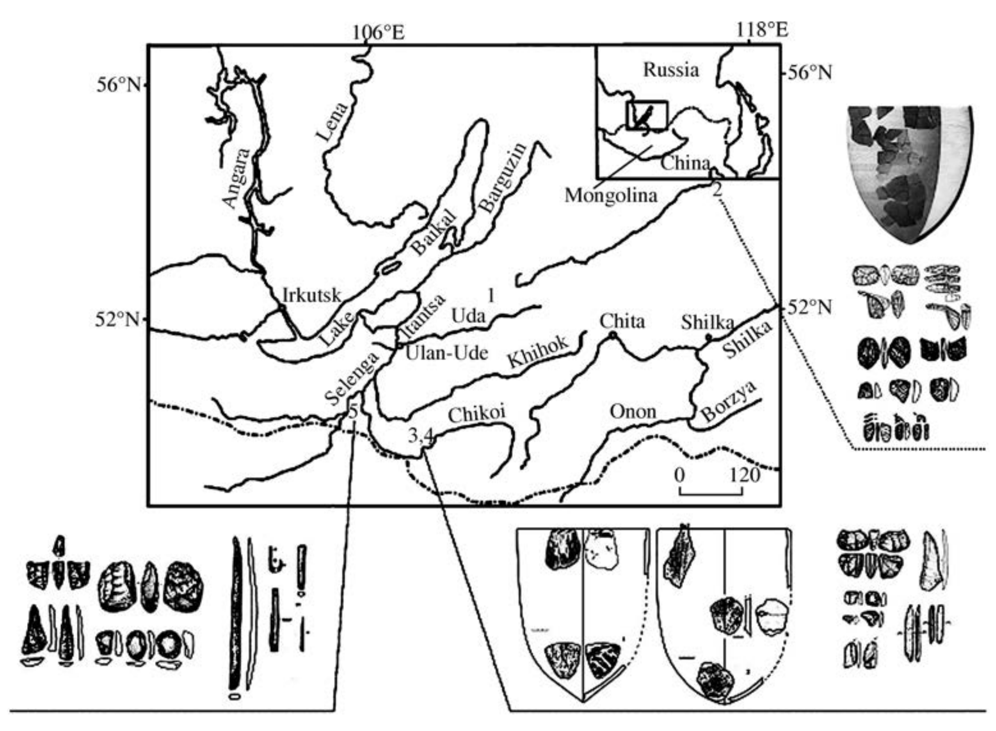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本、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湖地区发现了晚更新世时期的陶器，这使得陶器的出现、分布等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1]。在上述地区陶器生产已经出现的背景下，学界一般认为陶器在狩猎采集社会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18000 年左右，北半球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冰川，而东亚的狩猎采集者已经能够制作陶罐[2]。迄今学界仍在讨论陶器到底是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核心区最早出现，并不断向西一直传播到欧洲，还是几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巨大的区域内各自独立

* 原文发表于 Elsevier，第 441 卷，B 部分，2017 年 6 月 20 日，第 81 ~ 90 页。原文链接为：http://dx.doi.org/10.1016/j.quaint.2017.01.035。

地发明了陶器[3]。在对该问题的争论中，早期陶器出现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尤其重要。

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是欧亚大陆为数不多的在晚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之间已经使用陶器的地区之一。如图一所示，在 Ust’-Karenga XII（7），Studenoye 1（7-9），Ust’-Menza 1（5-8），以及 Ust’-Khyakhta 3 地区[4]已经发现了早期陶器，年代约为公元前 12000 ~ 前 11000 年。下面我们将对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的新材料进行介绍。



图一　贝加尔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图

1. 洪格尔卡遗址　2. Ust’-Karenga XII

3、4. Studenoye 1，Ust’-Menza 1　5. Ust’-Khyakhta 3

二、材料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我们在洪格尔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材料为基础，并结合已发表的贝加尔湖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他遗址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此外，本文介绍了洪格尔卡遗址与早期陶器、石器的制作，并对比了贝加尔湖地区同时期其他遗址的材料。

本文列出了最新的测年数据，并且这些数据来自于不同的放射性碳测年实验室。

为进行生物地球化学分析，我们选择了一个典型遗物集中分布的探沟，在其一侧剖面，分别从 0 ~ 5、5 ~ 12、12 ~ 30、30 ~ 45、45 ~ 60 厘米深度的地层内采集了混合土壤样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该地层剖面与 Anthrosols[5] 相似。为了对比研

究，我们从相似的地形环境中选择了两个遗物较少的土壤剖面：一个是距离发掘区约 50 米远，与 Anthrosols 相似的地形与地层剖面；另一个是约 400 米远，深约 50 厘米[6]，每隔 10 厘米采样一次。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并过筛（筛子的规格<2 毫米）。用 Conflow Ⅲ接口将 EURO EA 元素分析仪（意大利 EuroVector，德国 Hekatech）与同位素质谱仪（简称 IRMS，德国不来梅 Thermo Scientific 公司生产，型号为 Finnigan Delta V Advantage）连接起来，并测量总有机碳（简称 TOC）和稳定同位素 $\delta^{15}N$。稳定同位素 $\delta^{15}N$ 的测量精度为 0.3‰。为了萃取 P、K、Mg，我们将 21 毫升的 HCI 和 7 毫升的 HNO_3 加入到 3 克冷冻干燥的土壤中，提取 16 小时。然后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分析样品。通过测量苯多羧酸（BPCAs）来测定热解碳（黑碳，简称 BC）的含量及结构，该方法由 Glaser 等[7]使用过，Brodowski 等[8]改进过。BPCAs 通过 GC / FID 检测仪、HP 5 色谱柱进行分离和定量[9]。

三、研究结果

（一）洪格尔卡遗址：描述

洪格尔卡遗址位于西贝加尔湖东北部 Bol’shoe Eravnoe 湖北岸（图二），地处高于实际水位 6 米的 Bol’shoe Yeravnoe 湖北岸缓坡梯田上。目前，该遗址已被草覆盖，并定期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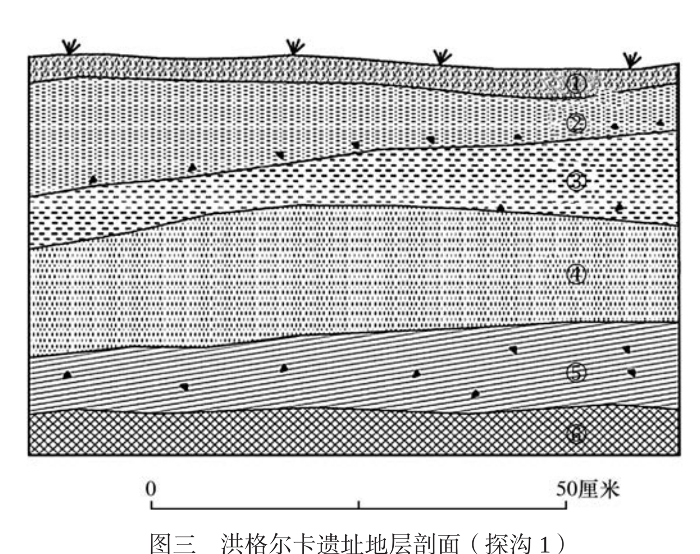


图二　洪格尔卡遗址景观图

该遗址的调查、发掘和材料描述由 N. Tsydenova 负责。在自然层位第 4 层即文化层第 2 层发现了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关的考古材料。表一和图三详细介绍了发掘的地层情况。

表一　地层情况

地层	地层包含物	厚度 / 米
1	砂土，黑色，富含有机质	0.05
2	黑栗色砂土。该层上部厚且结块，偶尔呈粉末状。它不同于有大量小块岩石碎片的下部，并通过一层岩石碎片与其下部分开	0.15 ~ 0.25
3	砂土，且颜色较深，棕黑色，岩石碎片更少	0.15 ~ 0.25
4	砂土，浅棕色，结构比上层松散，并填充大块岩石	0.15 ~ 0.25
5	砾石层，黄色，在北壁和南壁覆盖岩母质	0.10 ~ 0.15
6	岩母质	>0.10



图三　洪格尔卡遗址地层剖面（探沟 1）

文化层第 2 层共出土 1603 件遗物和 20 件残余的骨碎片。

1. 石器

该文化层的石制品包含一件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石制品包括石核和毛坯等，可划分为不同类型。石核共计 29 件。

（1）楔形细石核：19 件（图四，1、2、4）。

（2）微棱柱状（锥形）石核：9 件（图四，3）。

（3）棱柱状石核：1 件。

毛坯和技术性剥片也证明了存在石核剥片技术。

毛坯：15 件。

（1）双面粗糙打制的不同的楔形毛坯：14 件（图四，5、6）。

（2）正面打制毛坯：1 件。

技术性剥片：19 件。直接打击台面上剥落的石片 15 件（包括长的“平板状”的剥片 6 件）（图四，7、8）；预制剥片 4 件。

石核、毛坯和技术性剥片使我们能够复原石核剥片过程。该阶段在预制台面上双面粗糙打制，形成楔形石核毛坯。从侧面、正面修整出打击台面。尽管石核剥片技术与双面涌别石器制作传统相似，但未发现削片。

发现的细石叶和小石叶（宽度为 0.9 ~ 1.2 厘米）是被嵌入到复合工具上来使用，若细石叶和小石叶不直，则被废弃。细石叶不经第二次修整便直接使用可以说是传统特征。在 116 件样品中仅有 12 件经过修整，其他 104 件有使用痕迹，但未发现明显的修整痕迹（图四，28）。旧石器时代晚期复合工具亦是如此[10]。

由石叶毛坯制成的其他工具数量也较少，仅有 47 件，均较小，最大的一件长约 7 厘米（图四，29）。修整石叶、石片制成的石刀 11 件，仅使用毛坯修整而成的石刀 36 件。

由石叶毛坯制成的工具中有 2 件小型石叶，它们正面和背面均经过垂直陡状微修理。

需要指出的是，有 3 件钻，毛坯为细石叶和石片。

有趣的是，雕刻器共有 17 件，依据风格、形制、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三种。

（1）以细石叶和小石叶为毛坯制成的横刃雕刻器共 3 件（图四，19）。

（2）以石叶和石片为毛坯制成的雕刻器小片（1.5 ~ 2 厘米）共 8 件（图四，13 ~ 18），包括 6 件横刃雕刻器、1 件双面修理雕刻器。

（3）以中等大小石叶、石片（2 ~ 2.5 厘米）为毛坯制成的横刃雕刻器共 3 件，以较大石叶、石片（2.5 ~ 4 厘米）为毛坯制成的横刃雕刻器共 3 件（图四，20 ~ 23）。其中 2 件是混合工具，一端是刮削器，另一端是雕刻器（图四，23）。

值得注意的是，其有 12 件雕刻器的刃缘在近端。

此外，还出土了 9 件雕刻器小片（图四，11、12）。

在洪格尔卡遗址中仅有 6 件手斧，均为断片，大小不一（图四，9、10）。很明显，在洪格尔卡遗址发现的石核原形不同于涌别石器的叶形传统。

另一组工具是刮削器，共计 33 件。下面我们将其分为 3 种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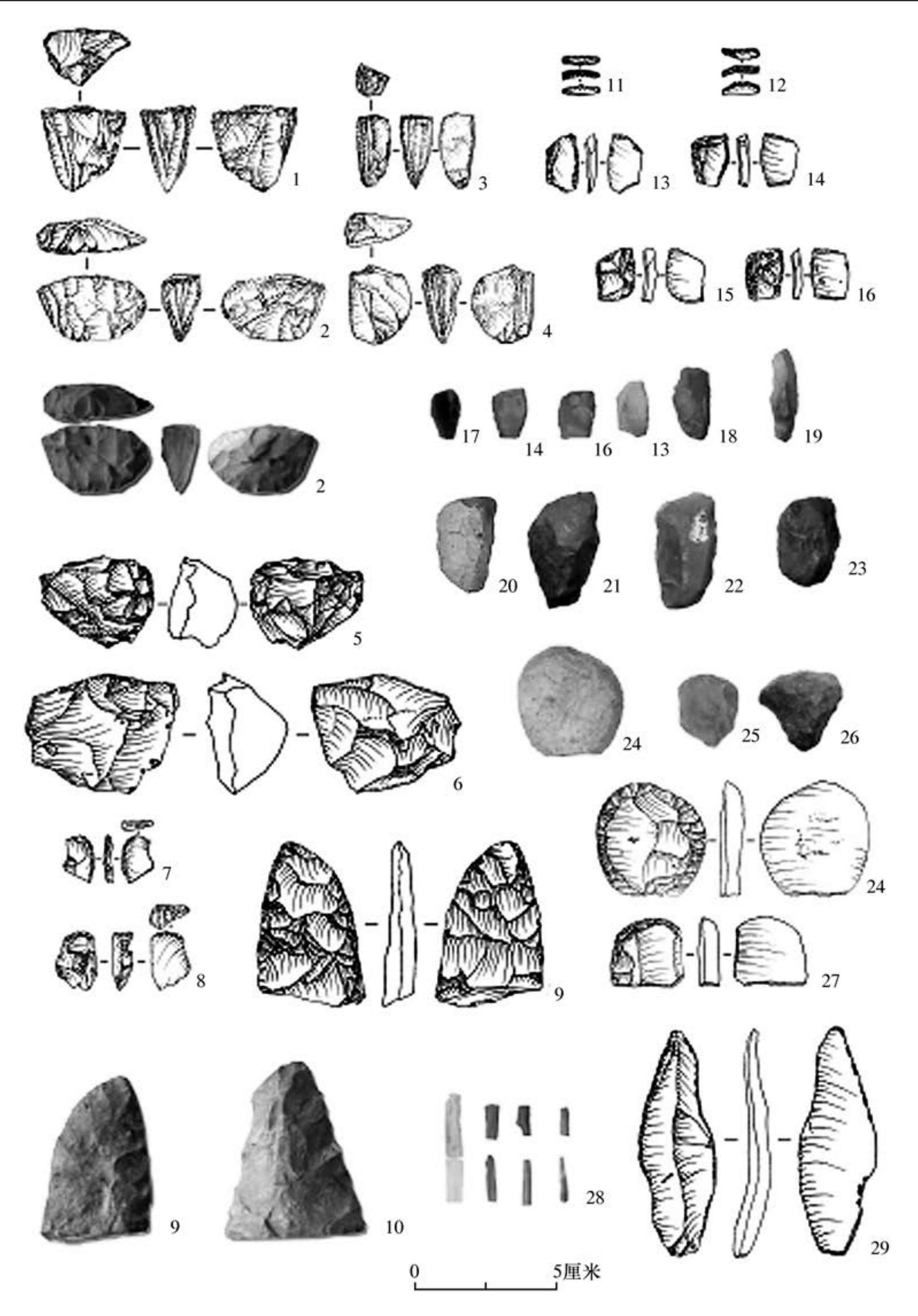
（1）用石叶、石片制成的端刮器，共 11 件（图四，25 ~ 27）。

（2）用石叶、石片制成的边刮器，共 19 件。

（3）用石片制成的圆形端刮器，共 3 件（图四，24）。

由此可知，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的刮削器类型多样，它们常用石片作为毛坯，仅有一些端刮器和圆形端刮器使用了特制的石片。

此外，还有一些直接成型的石片工具，未经第二次修理，这些石片被用作刮削器、



图四　洪格尔卡遗址（第 2 层石器）

1、2、4. 楔形细石核　3. 微棱柱状（锥形）石核　5、6. 楔形毛坯　7、8. 剥片　9、10. 手斧　11～18. 雕刻器小片　19～23. 横刃雕刻器　24～27. 端刮器　28. 修整痕迹不明显的样品　29. 石叶毛坯制成的最大工具

石刀，共计 22 件。

另一组工具是石刃，共 7 件，以石叶为毛坯，并在侧面微修理出凹槽。

扁平工具共 1 件，中等大小，呈狭长状，较短，在两端进行半陡状修理。

另外，还出土了 9 件砾石，有些有使用痕迹，有些无使用痕迹。其中有 1 件呈狭长形，两端可见碎屑状磨痕。

没有修理和使用痕迹的石片、薄片和遗物共计 1167 件，其中 96 件细石叶和小石叶呈不规则形状，因此，直接被废弃。

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物的原始特征（旧石器时代）之一是石料以燧石为主，占比达到 69.8%，此外，碧玉占 24.3%，玉髓占 5.2%，其他如页岩、石英岩、水晶共占 0.7%。

2. 陶器

洪格尔卡遗址不仅出土了石器，同时还出土了陶片，证明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陶片呈褐色，表面粗糙，夹杂沙子和植物，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陶器不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陶器器壁更薄、表面更光滑。

根据陶片的厚度和纹饰，我们将 91 片陶片进行描述和分组。

（1）素面薄壁陶器（厚 0.4 ~ 0.5 厘米），仅有 1 片口沿上有均匀刻花纹并装饰浅刻花纹（图五，2）。



图五　洪格尔卡遗址（第 2 层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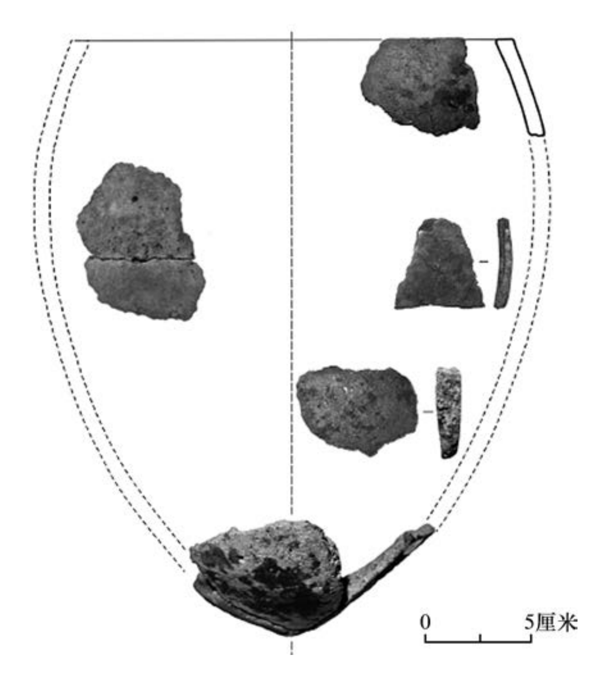
1. 素面且厚度平均陶器　2. 素面薄壁陶器　3、5、6. 压印绳纹且厚度平均陶器

4. 压印绳纹薄壁陶器　7. 压印篦纹且厚度平均陶器

（2）压印绳纹的薄壁陶器（厚 0.4 ~ 0.5 厘米）（图五，4）。一些陶片含有食物外壳，说明其并非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3）压印绳纹、厚度平均的陶器（厚 0.6 ~ 0.7 厘米）（图五，3、5、6）。

（4）大部分陶片素面，厚度平均（图五，1；图六），其中有 1 片口沿上有均匀刻花纹，另 1 片呈厚尖底。



图六　洪格尔卡遗址第 2 层出土的陶片及复原图

（5）压印篦纹、厚度平均的陶片（图五，7），该纹饰可能由绳子制成。

至于陶器成型技术，由于陶片数量较少、陶片较小，因此很难辨别。仅可识别一些制陶技术特征，其一是双层特征，如图五、图六所示，这可能是重叠粘贴黏土泥条或拼接形成。仅有一块陶片证明其由泥条（？）制成。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无法确定使用了哪种方法来制陶。

（二）放射性碳测年

以下为最新测年数据（表二，图七）：

（1）距今（6180 ± 50）年（Poz-68594）和距今（11155 ± 50）年（AAR-21437）样品均来自于保存在陶片上的烧焦的食物外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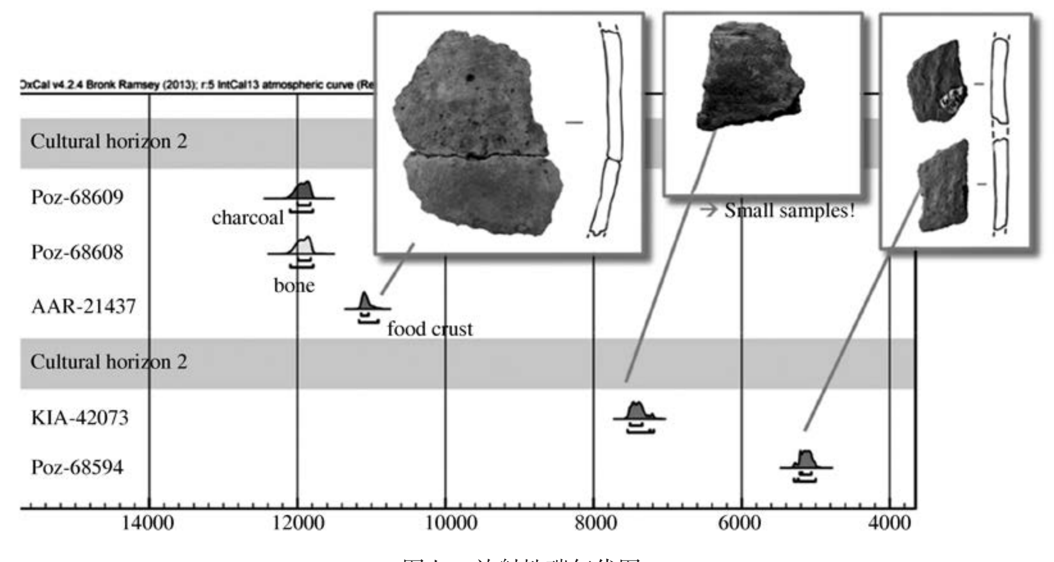
（2）距今（12020 ± 60）年（Poz-68609）样品为炭。

（3）距今（12010 ± 60）年（Poz-68608）样品为碎骨。

表二　洪格尔卡遗址第 2 层样品放射性碳测年数据

（已使用 OxCal v4.2.3 [11]、IntCal 13 大气曲线 [12] 进行校准）

遗址	实验室编码	单位	材料	^{14}C 年代公元前	δ ^{13}C（dual-inlet）	δ ^{13}C（CF-CN）	δ ^{15}N（CF-CN）	C：N 比率（TCD）	校准年代（概率为 95.4%）	备注
洪格尔卡	Poz-68608	探沟 1 第 2 层	骨头碎片	12010 ± 60	—	—	—	—	12036-11786BCE	样本小：0.4 毫克炭
	Poz-68609	探沟 1 第 2 层	炭	12020 ± 60	—	—	—	—	12101-11792BCE	—
	AAR-21437	探沟 1 第 2 层原编码 254255	陶片烧焦的外壁	11155 ± 50	−26.11	−25.68	—	69.611	11169-10905BCE	—
	KIA 42073	探沟 1 第 2 层	陶片烧焦的外壁	8345 ± 66	−25.08	—	—	—	7541-7188BCE	样本小：0.7 毫克炭
	Poz-68594	探沟 1 第 2 层编码 62？ 152	陶片烧焦的内壁	6180 ± 50	—	—	—	—	5292-4999BCE	样本小：0.12 毫克炭



图七　放射性碳年代图

此前，在文化层第 2 层发现 1 件素面陶片，根据其保存的食物外壳进行放射性碳测年，其年代约为公元前（8345 ± 66）年（KIA-42073），该数据已发表 [13]。

（三）生物地球化学分析表明人际互动

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介绍生物地球化学分析的一些初步结果，详细报告会在另一篇文章中呈现。

经生物地球化学分析，洪格尔卡遗址部分地层遗物丰富是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例如，从第 1 层到第 4 层富含遗物的剖面，随着热解碳含量增加，总有机碳的含量从每千克 355 克减到 223 克，而在遗物较少的控制剖面中，总有机碳含量只可检测到每千克 194-95 克和 149-94 克[14]。苯聚羧基酸的比例亦较为有趣[15]。在遗物丰富的土壤中检测到 B3CA / B6CA 比率仅为 0.11 ~ 0.2，而在相应的对照土壤中比率增加到 0.44，表明人类活动导致土壤中由火引发的热解碳羧基化含量更高。此外，在遗物丰富的地层中，磷含量（王水提取物）也更高（每千克土壤高达 3.5 克），而相应的对照剖面含量较少（每千克土壤小于 1.28 克）。众所周知，磷和热解碳是衡量人类活动对土壤影响的指标。总有机碳含量（简称 TOC），是有机质输入量指标，在遗物丰富的剖面中，其含量从 5.87%（第 1 层）下降到 1.1%（第 4 层），而在两个对照剖面中，总有机碳含量随着土壤深度从 4.9% 降至 0.62%、从 2.48% 降至 0.61%，表明人类活动对其影响较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另一个最有可能表明淡水鱼消耗量的指标是土壤有机质中稳定同位素 $\delta^{15}N$ 含量的增加。在遗物丰富的剖面中，检测到的含量高达 15.15‰，而在对照剖面中稳定同位素 $\delta^{15}N$ 含量最高分别为 12.26‰ 和 8.88‰。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遗物丰富的地层往往包含较高的 K（高达 4%）和 Mg（高达 0.23%）含量，最可能的原因是因频繁地烹饪和加热燃烧导致灰烬的输入。在两个对照剖面中 K 的最大值分别是 1.6% 和 0.8%，Mg 的最大值分别是 0.9% 和 0.5%。

四、讨　　论

（一）年　　代

目前我们获得的年代数据说明了解决年代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

（1）我们研究的区域是洪积层堆积，因此，可以假设由于遗物丰富的地层发生挤压，从而导致遗物的水平移动。冬季土壤的深度冻结也可能会扰乱骨骼和陶器所在的原始地层。但土壤质地相同并不一定都是水平位移造成的。此外，在最底层的文化层发现了烧火痕迹、炭灰、其周围有小块煤、烧骨碎片，表明该遗址遗物的水平移动并不严重。另外，洪格尔卡遗址探方及探沟内地层中的沉积物与邻近地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该遗址的文化层并没有被扰乱。

（2）一般来说，遗址出土的石器与陶器所用材料往往具有一致性。如果基于少量特殊样品进行测年，可能会由于样品不纯而影响整个遗址的年代判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绝大多数遗存来纠正年代。例如，一个样品（KIA42073）的年代是 8345 年± 66 年，需要指出的是其年代可能较早；而根据一些陶片上残存的烧焦的食物外壳（Poz-68594）进行测年，年代是 6180 年± 50 年。此外，这些年代较晚的陶片上的绳纹也与新石器时代

早期不同。它们由较粗的绳子制成，也更平滑，这使得很难确定其年代。也许这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些绳纹类似于第 2 层较厚陶片上光滑的绳纹。尽管发现绳纹的地层没有明显的移动痕迹，但我们并不能排除生物导致的晚期绳纹陶片的垂直移动。

而所测的 11155 年 ± 50（AAR-21437）年，该年代数据受到淡水水库影响，特别是在新的 Anthrosol 所测的数据背景下（表二），众所周知，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在数个世纪内形成。

总之，更多的测年数据对于我们判断遗址的年代是很有必要的。

（二）与贝加尔湖地区其他晚更新世—全新世过渡期的遗址比较

为了探究贝加尔湖地区特别是洪格尔卡遗址陶器的起源，我们将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周边遗址进行了比较研究，如 Ust'-Karenga、Studenoye 1（7-9）、Ust'-Menza 1（5-8）和 Ust'-Khyakhta 3[16]。

1. 石器组合

洪格尔卡遗址与上述周边遗址出土的石器相似。毛坯制作、楔形石核、细石叶、横刃雕刻器、手斧、石叶端刮器以及其他工具均使用两面器技术制成[17]。

尽管 Ust'-Karenga Ⅻ遗址（第 7 层）的陶器比上述其他遗址的陶器更进步，但石核却更原始，为涌别石器传统[18]。

另一个问题在于学界对 Studenoye 石器工业废弃石片技术的理解不同。M.V.Konstantinov 结合 Studenoye 1-2、Ust'-Menza 1-2、Altan 和一些其他遗址的石器命名了 Studenoye 文化，指出该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以楔形石核为特征，但并未详细介绍石核剥片技术。他还指出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均为打制技术[19]。然而，后来他和同事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 Studenoye 2、Ust'-Menza1 和 2 最底层的文化层证明了从早期阶段（约距今 18000 ~ 14000 年）的 Togesita-like 细石叶传统向其后阶段（约距今 12000 ~ 9500 年）的两面器技术及比较相似的 Selenga 工业传统发展[20]。

根据 M.V.Konstantinov 在其书中公布的[21] Studenoye 1 遗址中与最早的陶器共存的细石核，我们可以看出该阶段已经出现了在小砾石上进行双面修理、预制台面的技术。这种技术未见于涌别石器技术传统，却和洪格尔卡遗址中的预制细石核技术相似。

在 Studenoe 1 和 Ust'-Menza 1 出土的遗物中，有少量的石叶制成的尖状器与 Ust'-Kyakhta 类型中碎石片制成的尖状器相似[22]。然而，该遗址没有一件与 Studenoe、Ust'-Menza 相似的石器[23]，两面器数量也很少。Studenoye 1（第 7 层）发现了一件双面加工的全新世早期手斧，呈长圆形状[24]。Studenoye 1（第 17 层）和 Ust'-Menza 1（第 14 层）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的双面加工的手斧数量也较少[25]。

对于 Ust'-Kyakhta 3 遗址第 1 层出现的陶片是否与晚更新世沉积物相关，目前学

界仍看法不一。这些陶片也仅以简报形式发表[26]，且未见两面器。大多数工具都由石叶毛坯制成：修理石叶、细石叶、端刮器、剥片等。这与 Selenga 单面加工石器的传统相似[27]。

将洪格尔卡遗址中出土的雕刻器与 V.I.Tashak 称之为 Selenga 传统的横刃、双横刃雕刻器进行比较非常有趣。所有的 Selenga 传统的雕刻器均由石叶制成，通常在远端进行修理，横断面呈圆形。Selenga 雕刻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工具做得更薄的技术[28]，在洪格尔卡遗址未发现相同技术的石器。洪格尔卡遗址中的横刃雕刻器与 Ust'-Karenga 的雕刻器更为相似。

在 Ust'-Kyakhta 3 单面加工石器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位于色楞格河流域的 Kibalino1、2 出土的器物。Kibalino 1 的器物组合特征是楔形石核与原始陶器共存，其所在地层土质为深色、较薄、夹杂白色黄土沉积物。该遗址由 L.G.Ivashina 发现于 1977 年[29]。

2. 陶器

陶器专家 O.V.Yanshina 最早发现了 Studenoe 1（第 8、9 层）、Ust'-Menza 1（第 8 层）和 Ust'-Karenga 出土陶器之间的相似之处[30]。她认为前两个遗址的陶器源于同一个文化传统，并将其与 Ust'-Karenga 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在陶器的技术和风格方面存在以下相似性：①器形简单，呈弧形尖底；②一些陶片外壁饰有绳纹或垂直篦纹；③ Ust'-Karenga 的一些陶片和 Studenoye（9G 层）的一片陶片内壁上饰平行篦纹；④剩余的陶片在内外壁均饰篦纹；⑤陶胎中夹杂矿物和植物。然而，由于 Studenoye 1 和 Ust'-Menza 1 中发现的一些陶片，特征不明显，因此根据陶片复原其制作技术较难。仅有各别陶片在接合处断裂，这些接合处的边缘往往呈水平状。研究人员表明，这些陶器使用粘贴泥条或拼接的方法制成，并且和 Ust'-Karenga 的陶片相比，Chikoi 的陶片看起来更原始，这些差异反映了陶器的地域特征[31]。Ust'-Karenga 的陶器使用传统制陶技术制成，纹饰多样，引人注目，可以清楚地看到泥条的多次拼合[32]。Ust'-Karenga 遗址负责人认为该遗址的制陶技术为黏土泥条盘筑法，这从拼接处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一些陶器特别是近底部由两层泥片制成，因此，可以得知，在陶器表面粗糙的地方会附加一层泥片，以使器表更加平滑[33]。

洪格尔卡遗址出土的陶片特征并不明显，但也有独特性，而且更类似于 Ust'-Karenga 文化或 Studenoye 1（第 8、9 层）、Ust'-Menza 1（第 8 层）的陶器，同时它们之间也有区别。第一，器形简单的尖底器相似。第二，陶胎中都夹杂矿物和植物。其中一件陶器饰有之字形篦纹，但纹饰模糊。洪格尔卡遗址第 2 层出土的一些陶器使用双层泥片和泥条拼接制成。陶器成型技术与 Ust'-Karenga 类似，主要区别在于在洪格尔卡遗址发现的陶器多为素面，且器表更光滑。一些陶器外壁饰轻微的纹饰，可能是由粗松的绳子扭压形成。这也证明了贝加尔湖地区饰绳纹或轻微纹饰的早期陶器具有相似性。

在南贝加尔湖地区另一个晚更新世遗址 Ust'-Kyakhta 3（第 1 层）中，仅有少数陶

器材料被识别并发表[34]。根据发表的文字资料来看，陶片较薄，深褐色，素面，略有光泽，卷沿，陶胎中夹杂沙子、鸵鸟蛋壳碎片。其中，在 Ust’-Karenga 和远东地区发现的内壁饰平行线纹的陶器，其年代可能更早。由于陶器图片资料未发表，因此无法得到确定的结论。

五、结　　语

洪格尔卡遗址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出土了石器和早期陶器，年代为公元前 12000 ~ 前 11000 年的前全新世，为研究贝加尔湖地区在该阶段使用的陶器增添了新的材料。

后续我们将延伸放射性碳测年序列，并开展其他方面的研究（重建古气候、古经济、人类活动土壤等）。仍需进一步发掘该遗址，并调查该地区同时期或更早阶段与之类似的考古材料。

贝加尔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石器组合往往相似，包括楔形石核、细石叶、端刮器、横刃雕刻器，且发现了陶器。然而，石核与石器制作技术多样。由于公开发表的详细资料较少，目前的研究很难向前推进。

很显然，各遗址间的距离决定了他们的地域性，而相似之处可能源于旧石器时代。尽管有很多不同，但各遗址间的地域交错使得他们有着相似的传统[35]。例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Studenoye 1、2 和 Ust’-Menza 1、2 遗址的石器可能存在这样的“混合”，具有双面和单面（Selenga）传统的特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与 Selenga 类型单面石器共存的早期陶器的出现、特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 Kibalino 1、2 遗址进行调查十分有意义。

为进行深入研究，还需将贝加尔湖地区与远东地区的材料进行跨区域比较（阿穆尔河地区、日本、中国北方等），以便解释以下问题：陶器到底是伴随着广泛范围内新技术、新文化的出现而产生，亦或是旧的文化体系吸收了陶器。

附记：感谢德国哈雷－维滕贝格大学的 Bruno Glaser 教授进行生物地球化学的分析。感谢 H. Piezonka 博士对样本绝对年代的分析。特别感谢 H. Sato 教授和 K. Morisaki 两位编辑的约稿。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注　　释

［1］ a. Derevianko A P, Medvedev V Ye. *Issledovaniye Poseleniya Gasya (Predvaritel’nie Resultati, 1980) (Study of the Gasya Settlement (Preliminary Results, 1980))* [M]. Novosibirsk: AE SB RAS, 1993: 109 (in Russian).

b. Elisabetta B, Wu X, Yuan J, et al. Radiocarbon dating of charcoal and bone collagen associated

with early pottery at Yuchanyan Cave, Hunan Province, China [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09, 106 (24): 9595-9600.

c. Peter J, Marek Z. *Ceramics before Farming: the Dispersal 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 Eurasian Hunter-Gatherers* [M].Walnut Creek: Left Coast Press, Inc, 2009: 1-589.

d. Wu X, Zhang C, Paul G, et al.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J]. *Science*, 2012, 336: 1696-1700.

e. Sato H, Izuho M, Morisaki K. Human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J]. *Quat. Int*, 2011, 237: 93-102.

f. Hommel P. The Emergence of Ceramics Among Hunter-gatherers in Nothern Eurasia [A]. *The Neolithic Ceramics of the Upper Vitim Basin, Nothern Transbaikal, Siberia* [D].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nited Kingdom, 2012.

g. Shewkomud I Y, Yanshina O V. *Nachalo Neolita V Priamurye: Poselenie Goncharka-1 (The Beginning of Neolithic in the Low Amur River Basin: Goncharka-1 Site)* [M]. St.-Peterburg: MAE RAS, 2012: 270 (in Russian).

h. Kuzmin Y V. The origins of pottery in East Asia: updated analysis (the 2015 state-of-the-art) [J]. *Doc. Praehist*, 2015, XLII: 1-11.

i. Peter J, Kevin G, Peter H, et al. Modelling the diffusion of pottery technologies across afroeurasia: emerging insights and future research questions [J]. *Antiquity*, 2016, 90 (351): 590-603.

［2］ a. 同［1］b.

b. 同［1］d.

［3］ a. Gibbs K, Jordan P. Bridging the boreal forest siberian archaeology and emergence 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of Northern Euroasia [J]. *Sibirica* , 2013, 12 (1): 1-38.

b. 同［1］d.

［4］ a. Jull A J T, Boorr J S, Derevianko A P, et al. Radiouglerodnaya chronologiya perekhoda ot paleolita k neolitu v Priamurye (Dal’niy Vostok Rossii) (The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the Paleolithic e Neolithic transition in Priamur’e (Russian Far East) [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ovremennie Problem Evrasiiskogo Paleolitovedeniya” (The Modern Problems of Eurasian Paleolithic Studies)* [C]. Novosibirsk, 2001: 140-142 (in Russian).

b.Razgildeeva I I, Kunikita D, Yanshina O V. Novyie dannyie o vozraste drevneyshikh keramicheskikh kompleksov Zapadnogo Zabaykaliya (New data about age of the earliest ceramic complexes of West Transbaikal area) [A]. *Stratigraphiya, Paleoekologiya, Kyltury (Eurasia in the Cenozoic. Stratigraphy, Palaeoecology, Cultures)* [L]. Irkutsk.ISU, 2013: 168-178 (in Russian).

c. Hommel P, Day P M, Jordan P, et al. Homogeneity, variability and mobility: technological choices and the context of neolithic pottery production in the upper vitim basin [A]. *Drevnie Kul'tury Mongolii I Bajkal’skoj Sibiri IV, vol. 1* [C]. Chita: ZabGU Press, 2013: 220-227.

[5] WRB. *World Reference Base for Soil Resources 2014. FAO, World Soil Resources Reports* [R].2015: 106.

[6] 同［5］.

[7] Glaser B, Haumaier L, Guggenberger G, et al. Black carbon in soils: the use of benzene polycarboxylic acids as specific markers [J]. *Org. Geochem*., 1998, 29 (4): 811-819.

[8] Brodowski S, Rodionov A, Haumaier L, et al. Revised black carbon assessment using benzene polycarboxylic acids [J]. *Org. Geochem*., 2005, 36 (9): 1299-1310.

[9] Kappenberg A, Bl € asing M, Lehndorff E, et al. Black carbon assessment using benzene polycarboxylic acids: limitations for organic-rich matrices [J]. *Org. Geochem*., 2016, 94: 47-51.

[10] a. Konstantinov M V. *Kamennyi Vek Vostochnogo Regiona Baikalskoy Azii (Stone Age of the Eastern Part of Baikal Asia)* [M]. Ulan-UdeeChi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of BSC SB RAS, Chita State Pedagogical Institute, 1994 (In Russian).

b. Tashak V I. Klinovidnie nukleusy Zapadnogo Zabaikaliya v pozdnem Paleolite i Mesolite (Wedge-shaped cores of West Transbaikal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Mesolithic ages) [A]. *Kamennii vek Yujnoi Sibiri i Mongolii: teoreticheskie problem i novie otkritiya (Stone age of Southern Siberia and Mongolia: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new discoveries)* [M]. Ulan-Ude, 2000: 59-73 (in Russian).

[11] Christopher B R. Bayesian analysis of radiocarbon dates [J]. *Radiocarbon*, 2009, 51 (2): 337-360.

[12] Reimer P J, Bard E, Bayliss A, et al. IntCal13 and Marine13 radiocarbon age calibration curves 0-50, 000 years cal BP [J] . *Radiocarbon*, 2013, 55 (4): 1869-1887.

[13] Hartz S, Kostyleva E, Piezonka H, et al. Hunter-gatherer pottery and charred residue dating: new results on early ceramics in the north Eurasian forest zone [J].Proceedings of the 6th Radiocarbon and Archaeology Symposium, Held in Paphos, Cyprus, 10-15 April 2011.Tucson (Arizona, USA), *Radiocarbon*, 2012, 54 (3-4): 1033-1048.

[14] a. 同［7］.

b. 同［8］.

[15] a. Glaser B, Knorr K-N. Isotopic evidence for condensed aromatics from nonpyrogenic sources in soils-implications from current methods for quantifying soil black carbon [J]. *Rapid Commun. Mass Spectrom*., 2008, 22 (7): 935-942.

b. 同［9］.

[16] a. 同［10］a.

b. Aseev I V. *Yugo-vostochnaya Sibir' V Epohu Kamnya I Metalla (South-eastern Siberia in the Stone and Metal Epoch)* [M]. Novosibirsk: IAE SB RAS, 2003: 208 (in Russian).

c. Vetrov V M. Archeologia Vitimskogo plato: ust'-karengskaya cultura (13, 000-5, 000 l.n.) (archaeology of Vitim plateau: ust'-karengskaya culture (13, 000-5, 000 years ago)) [A]. *Actual'nie Voprosi Archaeologii Sibiri I Dal'nego Vostoka (The Topical Issues of Archaeology of Siberia and Far East)* [M]. Ussuriysk: USPU, 2012: 173-187 (in Russian).

d. 同［4］b.

e. 同［1］f.

f. Tsydenova N, Piezonka H.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initial neolithic in the Baikal region: tech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tone industries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5, 355: 101-113.

［17］ a. 同［10］a.

b. Vetrov V M. Reztsi i nukleusy Ust'-Karengskoi archeologicheskoj culturi (Burins and cores of Ust'-Karengskaya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 *Baikal'skaya Sibir' v drevnosti (Baikalian Siberia in antiquity)* [M]. Irkutsk, 1995: 30-44 (in Russian).

［18］ 同［17］b.

［19］ 同［10］a.

［20］ a. Razgildeeva I I. Planigraphiya shestiochajnogo komplexa poseleniya Studenoye-2 (Planigraphy of the complex with 6 hearths of the Studenoye-2 settlement) [A]. *Drevnee Zabakalye: CulturaI Priroda (Ancient Transbaikal: Culture and Nature)* [M]. Chita, 2009: 37-50 (in Russian).

b. Moroz P V. *Kamennye industrii rubezha plejstotsena I golotsena Zapadnogo Zabaikaliya (lithic industries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 early Holocene boundary in Western Transbaikal)* [M]. Chita: ZabSU, 2014: 182 (in Russian).

［21］ 同［10］a: 图五 2, 1.

［22］ a. Tashak V I. *Paleoliticheskie I mesoliticheskie pamyatniki ust'-kyakhty (the paleolithic and mesolithic sites of ust'-kyakhta)* [M]. Ulan-Ude, 2005: 130 (in Russian).

b. 同［20］b.

［23］ 同［10］a.

［24］ 同［10］a.

［25］ a. 同［10］a.

b. 同［10］b.

［26］ 同［16］b.

［27］ Pavlenok G D. Microplastinchatoe rassheplenie v pred- I rannegolocenovih industriyah Zapadnogo Zabaikaliya [po materialam stoyanki Ust'-Kyakhta 3 (Microblade debitage of the pre- and Early Holocene industries of Western Transbaikalia (materials of the Ust'-Kyakhta 3 site)] [A]. *Trudi IV (XX) Vserossiskogo Archaeologicheskogo S'ezda V Kazani* [*Proceedings of the IVth (XX) All-russian Archaeological Congress*] [M]. Kazan', 2014: 109-113 (in Russian).

［28］ 同［22］a.

［29］ Ivashina L G. O rannem neolite Zapadnogo Zabaikaliya (about the early neolithic of West Transbaikal) [A]. *Culturi I Pamyatniki Epohi Kamnya I Rannego Metalla Zabaikaliya (Cultures and Sites of the Stone and Early Metal Epochs of Transbaikal)* [M]. Novosibirsk: Nauka, 1993: 81-88 (in

Russian).

［30］ 同［3］b.

［31］ 同［4］b.

［32］ 同［4］b.

［33］ 同［16］c.

［34］ 同［16］b.

［35］ 同［16］f.

参考文献

Cohen D J. The advent and spread of early pottery in East Asia: new dates and new considerations for the world's earliest ceramic vessels [J]. *J.Austronesian, Stud*., 2013, 4 (2): 55-92.

Early Pottery in Transbaikal Siberia: New data from Krasnaya Gorka

Natalia Tsydenova Darima Andreeva Wolfgang Zech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s new results of the Krasnaya Gorka site located in Transbaikal Siberia. New AMS dates from this site now attest to a Late Pleistocene occupation phase with early pottery. The evidence from this site enable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ttery types and of lithic technology as two main parts of material culture at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on the materials of Krasnaya Gorka. On a wider scale, the complex is compared with other sites with early ceramics in Transbaikal. Some biogeochemical proxies like pyrogenic carbon, phosphorus, total organic carbon, potassium, magnesium and the stable isotope 15N were analyzed to get an idea about the intensity of human occupation.

Keywords: Early pottery; Krasnaya Gorka; Transbaikal Siberia; Late Pleistocene; Early Neolithic; Lithic technology; Biogeochemical proxies

蒙古中部地区赫列克苏尔遗存的研究成果

Ж. 冈图勒嘎[1]著　特尔巴依尔[2]译

（1.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乌兰巴托；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作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它的年代、功能、起源、族属等一系列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所做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也不够全面。最近几年围绕赫列克苏尔本身和与它相关遗存进行了不少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本文主要以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苏木地区北塔米尔河流域地区所研究的赫列克苏尔资料为背景与其他地区赫列克苏尔遗存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键词：蒙古中部；赫列克苏尔遗存；青铜晚期；类型学

一、前　　言

赫列克苏尔是蒙古国境内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形制独特的积石遗存，它由中心石堆、方形或圆形石围及石围外侧大小不一的附属积石祭祀坛等遗存组成。由于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外部形制复杂多变，到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该遗存分布于俄罗斯阿尔泰、图瓦、布里亚特南部，蒙古国西部、北部、东部、中部等广大区域[1]，而蒙古国中部地区的赫列克苏尔遗存一般与鹿石、方形石板墓等遗存共存，且一处墓地共存现象较多见[2]。例如，北塔米尔河谷、哈奴河谷吉尔嘎楞阿木、乌什格尼奥吾尔（Уушгийн өвөр）等大型积石遗存。本文主要以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河、北塔米尔河流域地区发现的赫列克苏尔遗存为主要材料，与其他地区发现的赫列克苏尔遗存进行比较研究。

蒙古国不同地区对赫列克苏尔的叫法不一，如蒙古国西部称之为黑勒格森吾尔遗存（Хялгасан-үүр）、克尔克孜胡尔遗存（Киргиз-хүүр），中部称之为赫列克苏尔遗存（Хэрэгсүүр）等[3]，这些名称都包含了真假难辨的神话故事。19世纪末期，到蒙古国调查的外国学者，首次以当地牧民所说的赫列克苏尔（хиргисүүр）一词来记录了该遗存，并解释为该词可能是克尔克孜＋吾尔（хиргис+үүр）或克尔克孜＋胡尔（хиргис+хүүр）两词组合而来[4]。例如，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П. 帕力奥德（Пеллиот）

1944年发表在《通报》第37期上的*Le terme*“*Kereksur*”一文中首次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赫列克苏尔（хэрэгсүүр）一词[5]。考古学家乌·额尔登巴图（У.Эрдэнэбат）认为根据赫列克苏尔（хиргисүүр）一词的结构，很有可能从霍力格+斯［хориг+с（复数）+үүр（房屋）］二词组合演变而来，意为“安葬死者的居所”[6]。该遗存的名称认为是与公元9世纪在蒙古中西部地区游牧的吉利吉斯（又称纥里迄斯）人群的名字有关，实际上这个名称与吉利吉斯人群没有任何关系，此类遗存是比它早一千多年的青铜时代遗存[7]，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南部及蒙古国中部、北部、西部地区进行的研究成果可以证实这一点。由于该遗存的积石和规模较大，加之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信息量甚少等，学者在该遗存的年代、功能、起源和族属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赫列克苏尔遗存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80年代，很多学者也发表过研究综述，因此本文没必要再赘述。H.H.波塔尼[8]（Потанин）、B.B.拉姆斯特[9]（Рамстед）、格拉诺[10]（Гранө）等学者早年在蒙古国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很多形制不同的赫列克苏尔遗存，并发表于众后引起考古学家们的关注。蒙古国地区赫列克苏尔遗存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两类，蒙古学者首次着手研究分布在自己国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遗存始于1942年。当年赫·普尔莱（Х.Пэрлээ）先生在中央省阿吾达尔苏木胡特尼高勒阿吾达尔乌拉（Хүйтний голын Авдар ууланд）发掘了几座墓葬和赫列克苏尔。此外，还调查了分布于特宾陶鲁盖（Төвийн толгой）、色如尼高勒（Сэрүүний гол）谷地的墓葬和赫列克苏尔，并对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地表形制首次进行了简单梳理和分类[11]。

之前的学者由于人力、物力、时间和经济等多种工作条件的限制，没有详细统计过赫列克苏尔遗存的数量，总体以墓葬或赫列克苏尔等来记述的情况较多见。虽然对赫列克苏尔的认识和分类，目前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最近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对赫列克苏尔遗存信息的积累、认识的丰富，能够按照各类型进行详细统计，建立起统一的信息体系。即2012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在18个省区96个苏木三大区内共派出119组野外调查队，共计发现9000座历史文化遗存，其中1002座为赫列克苏尔遗存[12]。

赫列克苏尔遗存之所以发掘的少，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 赫列克苏尔遗存石堆规模较大，发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支持。

② 出土遗物少（考古发掘获取的信息量甚少）[13]等。

不过近几年来由于考古发掘项目的增多，对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发掘也多了起来。例如，布尔干省胡塔格－温都尔苏木艾格河比图根查干（Булганы Хутаг-Өндөр，Битүүгийн цагаан）、布尔干陶鲁盖（Бурхан толгой）、达尔罕乌拉（Дархан уул）、浩勒托斯特努塔格（Холтост нуга）、额木根特浩术（Эмгэнт хошуу）[14][15]，库布苏古尔省布仁托格托赫乌什格尼奥吾尔（Хөвсгөлийн Бүрэнтогтох，Уушгийн өвөр）[16][17]，科布多省孟克海尔很苏木地区哈尔戈壁（Ховдын Мөнххайрхан，Хар говь）[18]，库布苏古尔省布仁托格托赫苏木地区哈布根次乌兰乌拉（Хөвсгөлийн Бүрэнтогтох，Чавганцын улаан уул）、萨勒黑腾哈尔哈德（Салхитын хар хад）、巴彦乌吉尔（Баян-Үзүүр）[19]，戈壁－阿尔泰泰西

尔苏木地区乌兰博木（Говь-Алтайн Тайшир，Улаанбоом）[20]，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朝克图苏木地区巴格嘎加尔伊恩乔鲁（Дундговийн Дэлгэрцогт，Бага газрын чулуу）[21]，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苏木地区北塔米尔河流域（Архангайн Их Тамир，Хойд Тамирын）[22]，扎布汗省都尔布勒金苏木地区巴彦艾热格乌拉[23]等地区进行过发掘与研究。

二、赫列克苏尔的形制结构

赫列克苏尔通常为中心堆砌圆形石堆、方形或圆形石围，石围外侧还附带椭圆形石堆和圆形石圈等两种祭祀遗存。大部分中心石堆虽然未见石圈，但有些有祭祀的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带有石圈。

根据赫列克苏尔的功能和形制进行分类研究的学者有 X. 普尔莱（X. Пэрлээ）[24]、Л. Р. 克兹洛夫（Л. Р. Кызласов）[25]、В. Д. 库巴列夫（В. Д. Кубарев）[26]、Ю. С. 胡德亚克夫（Ю. С. Худяков）[27]、А. Э. 诺夫格罗多娃（Э. А. Новгородова）[28] А. Д. 策比克塔罗夫（А. Д. Цыбиктаров）[29]、В. В. 沃尔克夫（В. В. Волков）[30]、Ж. 玛盖（Ж. Магай）[31] Ж. 沃莱特（Ж.Врайт）[32] Д.Г. 萨维诺夫（Д. Г. Савинов）[33]、Ц. 特尔巴图（Ц. Төрбат）[34]等。

① 中心石堆外侧有圆形石围（19 座赫列克苏尔）。

② 中心石堆外侧有圆形石围，石堆和石围之间平铺石块进行连接（1 座赫列克苏尔）。

③ 中心石堆外侧有圆形石围，石围四角有石碑（1 座赫列克苏尔）。

④ 中心石堆外侧有长方形或正方形石围（3 座赫列克苏尔）。

⑤ 中心石堆外侧有长方形或正方形石围，石围四角有圆形石堆（5 座赫列克苏尔）。

⑥ 中心石堆外侧有长方形或正方形石围，石围四角有圆形石堆，石堆和石围之间平铺石块进行连接（5 座赫列克苏尔）等[35]（图一）。

特尔巴图等学者认为蒙古国西部地区的赫列克苏尔还包括以下几点：

① 中心石堆。

② 放射线或道路。

③ 石围（圆形或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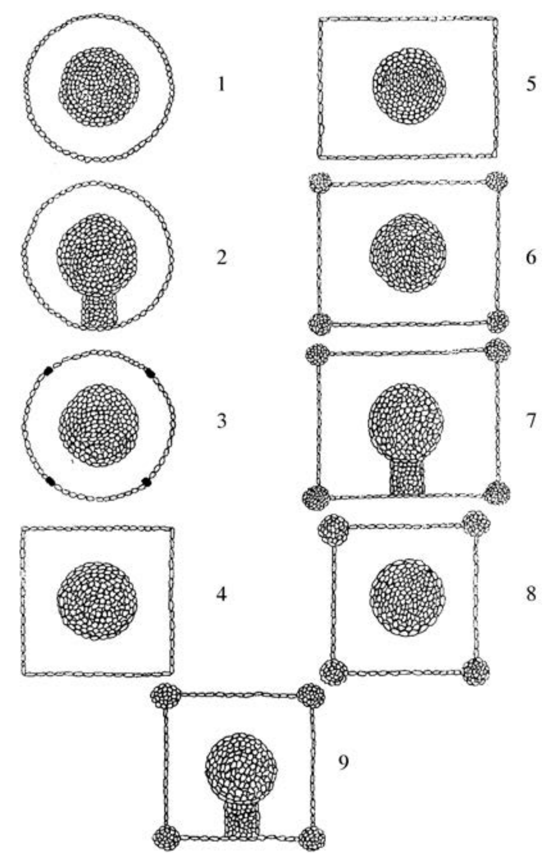
④ 附属建筑。

⑤ 八块石头组成的附属建筑。

⑥ 鹿石。

⑦ 用石头平铺而成的道路等[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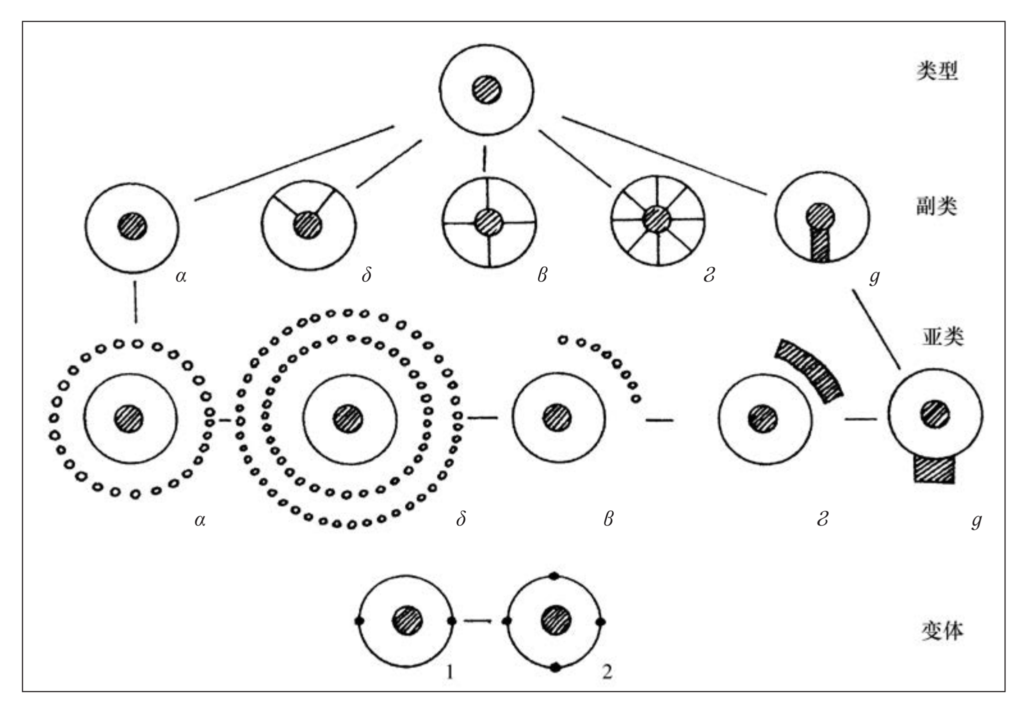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Д. Г. 萨维诺夫（Д. Г. Савинов）等学者依据石围的形状把赫列克苏尔遗存分为圆形和方形。圆形石围的赫列克苏尔基本上又可分为 5 种，这 5 种类型又可以分出 5 个亚类，这里有 2 种变化。方形石围的赫列克苏尔基本亦可分为 5 种，5 种类型又可分为 6 个亚类，这里共有 8 种变化[37]（图二）。但由于赫列克苏尔的类型比较多，到目前为止未能研究出完整的分类。根据最近几年我们所积累的信息，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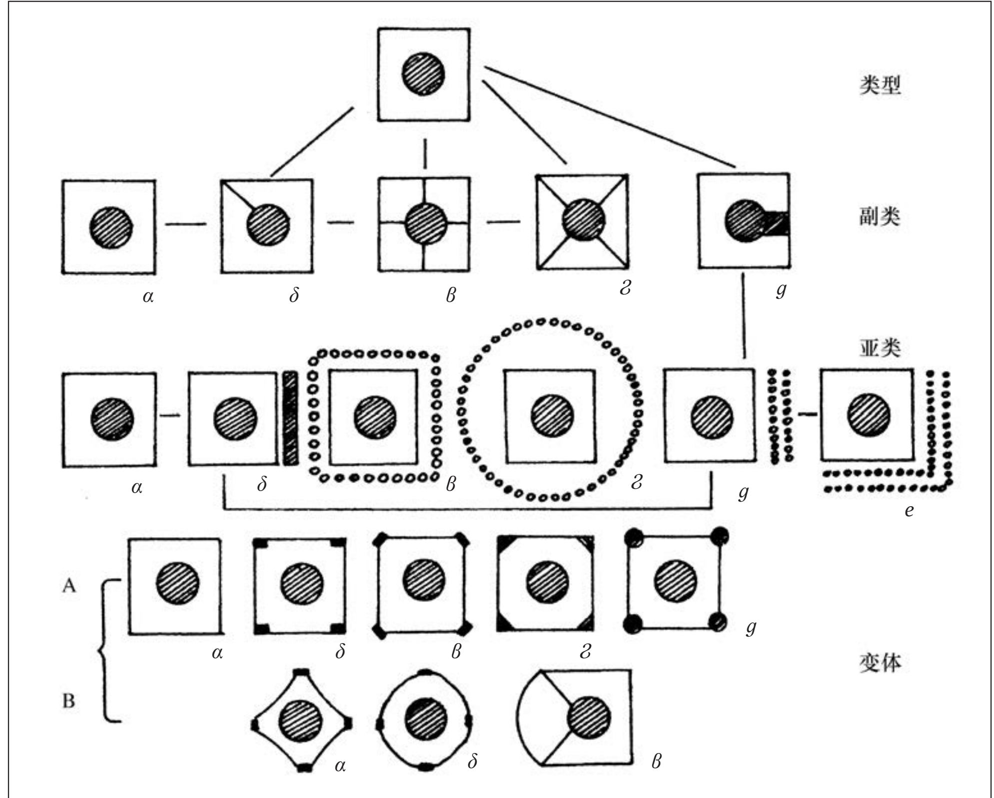


图一　布里亚特南部及蒙古国中、北部已发掘的各类形制的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地表建筑图
（摘自策比可塔罗夫 A. Д.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文化［M］. 乌兰乌德：布里亚特国立大学，1998：图 78）

根据石围的特点可分为无石围、方形石围和圆形石围三种，根据功能基本上分为墓葬和祭祀两种。祭祀遗址根据地表特征可分为石堆祭祀址和石圈祭祀址（图三）。①无石围赫列克苏尔由中心石堆、外带石堆和石圈祭祀址组成，也有平铺石块围绕石堆呈圆形或方形的现象，外侧无祭祀遗址。②方形赫列克苏尔由中心石堆、方形石围、外带两种祭祀址组成，石围有单环或双环，有的外侧不带祭祀址，有的只带一种祭祀址。③圆形赫列克苏尔由中心石堆、圆形石围、外带两种祭祀址组成，石围有单环或双环，有的外侧不带祭祀址，有的只带一种祭祀址。

方形和圆形赫列克苏尔之间的共性是都有石堆、石围、圆形石堆和石圈、放射线或平铺的道路、石围东、北部的方形石构遗存、鹿石等建筑。圆形石堆建筑一般在中心石堆的东侧，但石圈建筑围绕石堆始终把石堆和石围连接，而放射线、十字形或辐射线式分布在石堆或石围之间，条数为 1 ~ 10。石围东或北侧的方形石堆，长度约与石围长度相同，鹿石通常立于赫列克苏尔的东、西、北边，有时出土于石堆或石围墓建筑中，如巴彦乌列盖青格勒苏木查干阿斯嘎圆形赫列克苏尔的东侧由东北向西南排列的 100 通立石里有 13 通为鹿石（图四）。中心石堆直径大小不一，小的 5 ~ 10 米，但多数为 10 ~ 15





图二　圆形和方形赫列克苏尔的分类示意图

（摘自Д．Г．萨迪克夫，С．乌仁特古斯．赫列克苏尔遗存的类型学探究［A］．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国家与游牧民族发展史学术论文集［C］．巴尔瑙尔市，2007：图1，2）

赫列克苏尔基本类型	主建筑	石围	附属建筑	
			石围内	石围外
	中心石堆	两种祭祀址		
		(1) 单环 (2) 双环 (3) 2至4角 (4) 2至4角有立石	(1) 圆形石堆和石圈建筑 (2) 辐射线状建筑 (3) 道路 (4) 鹿石	(1) 圆形石堆和石圈建筑 (2) 方形祭祀址 (3) 鹿石

图三　赫列克苏尔的组成部分与附属遗存分析图



图四　查干阿斯嘎鹿石与赫列克苏尔

（摘自 Ц．特尔巴图，Д．巴雅尔，Д．策本道尔吉等．蒙古阿尔泰地区考古遗存 -1：巴彦乌列盖省［M］．乌兰巴托，2009：297）

米，高 1 ~ 2 米[38]。

无石围赫列克苏尔遗存当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科布多省达日维苏木地区苏泰海尔很北部坡地上，因取石造成石堆中部微向内凹。6 座圆形石堆墓在石堆外侧 50 ~ 100 米外环绕分布（？）。我们发掘了南部由西向东排列的三座墓，石堆直径 60 米，高 5 ~ 6 米，但随葬品全部腐蚀[39]（图五）。

但中国新疆阿尔泰地区青河县三道海子的地方发现的 60 座赫列克苏尔，其中最大的有几通鹿石。该赫列克苏尔有两道圆形石围，连接内外石围的是四条用石块平铺而成的条状放射线或路。外侧石围直径约 290 米，石围宽 3 ~ 5 米，中心石堆直径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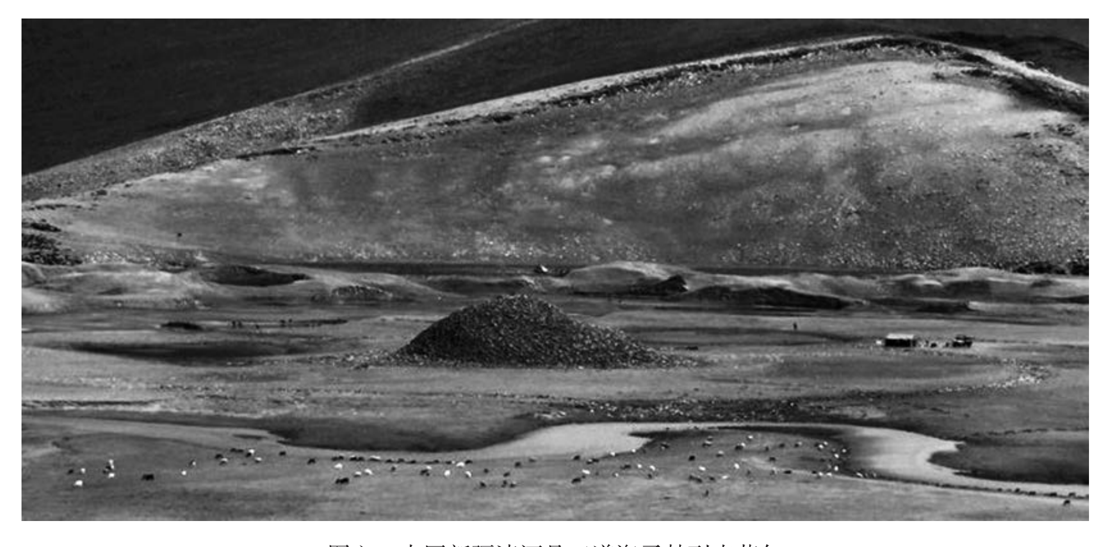


图五　扎嘎林赫列克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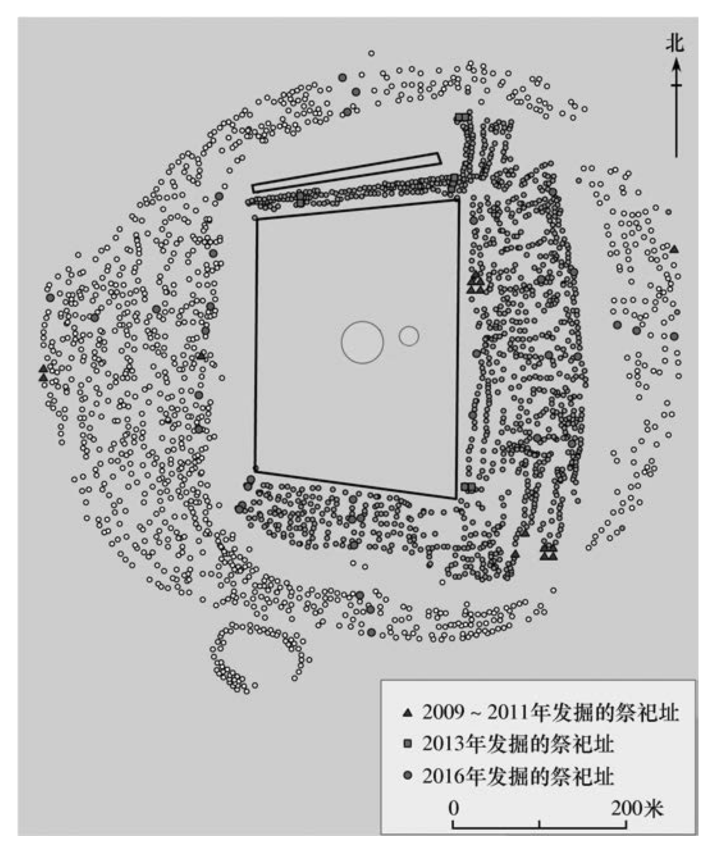
（H. 巴雅尔库提供）

米，高约 15 米[40]（图六）。

带石围的赫列克苏尔遗存中较大的位于中央省哈努河谷乌尔图布拉格、北塔米尔河流域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等。乌尔图布拉格方形赫列克苏尔（方形石围）388 米 ×410 米，中心石堆直径 26、高约 4.9 米，石围外侧带有 1750 座石堆和石圈祭祀址[41]，而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的方形石围 159 米 ×198 米，中心石堆直径约 25、高约 4 米，石围外侧带 2000 座左右的石堆和石圈祭祀址[42]（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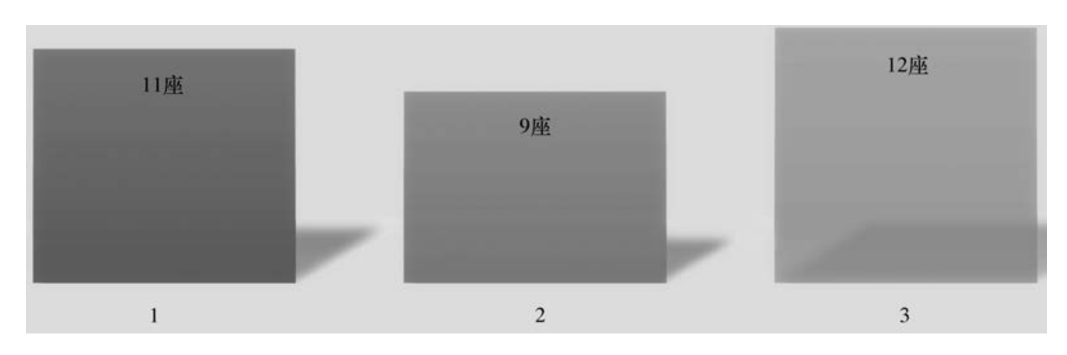
图六　中国新疆清河县三道海子赫列克苏尔



图七　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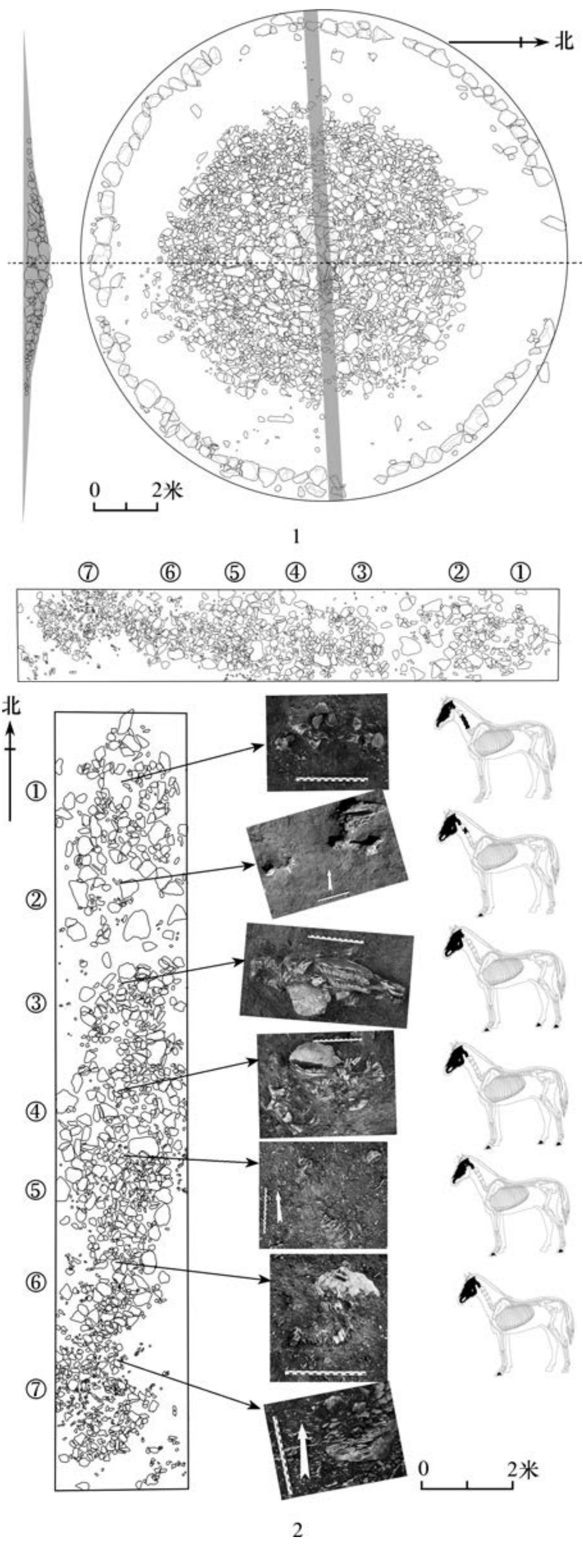
三、丧葬习俗

根据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功能可分为墓葬和祭祀两种，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仍分不清哪种类型为墓葬，哪种类型为祭祀址[43]。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一处大型的赫列克苏尔既有丧葬功能也有祭祀功能，如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中发掘出的墓葬和祭祀遗址（图八，1、2）。



图八　方形、圆形和无石堆赫列克苏尔发现丧葬遗迹数量对比表

1. 方形　2. 圆形　3. 无石围



图九　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

1. 10 号赫列克苏尔平、剖面图；2. 10 号赫列克苏尔祭祀址出土马骨

俄罗斯布里亚特考古学者 А. Д. 策比克塔尔沃夫（А. Д. Цыбиктаров）梳理了分布在布里亚特南部、蒙古国中部和北部的 22 处遗存中已发掘的 40 座赫列克苏尔遗存。其中 20 座中出土人骨遗骸，9 座仰身直肢、1 座侧身屈肢；8 座头朝西、3 座头朝西北；12 座在原地表上安葬、3 座在 15～20 厘米的浅坑中安葬；11 座中心石堆下发现用巨石板侧立栽入地面围成的石棺[44]。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赫列克苏尔的丧葬习俗，我们也梳理了最近几年发掘的材料，即已发掘 66 座赫列克苏尔遗存，同时还有与这些赫列克苏尔遗存相关其他遗存 96 座（表二）。其中 32 座发现丧葬的痕迹、11 座为方形赫列克苏尔、9 座为圆形赫列克苏尔、12 座为无石围赫列克苏尔（图九）。石堆下有石棺的 23 座、无石棺 9 座、离地表深 10～195 厘米深处发现人骨的有 24 座；墓主人头向西的 12 座，西北向的 9 座、北向的 1 座、东北向的 2 座、方向不详的 6 座。丧葬习俗而言，墓主头向有西、西北、北、东北等，葬式为仰身直肢或左右侧直肢，有双手相扣放置腹部、一只手放置腰部或下肢微屈等现象。

2012 年我们发掘了位于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苏木地区巴彦察汗河谷西侧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山梁上的圆形赫列克苏尔。该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下发现 172 厘米 ×324 厘米的椭圆形石棺，石棺高度约 48 厘米，从石棺中出土腐蚀严重的人骨，葬式为仰身直肢，头朝西。除人骨左脚胫骨边发现

一件木质器具残片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品（图八，1、2）。

2013 年发掘的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苏木地区查次陶鲁盖西南部一座方形赫列克苏尔的中心石堆下发现在原地表上西北向垒起的石棺（200 厘米 ×330 厘米），石棺内人骨保存极差，未发现随葬品。但是清理中心石堆时出土了 1 件带纹饰的陶片（图一〇）。这些赫列克苏尔的丧葬习俗与蒙古其他地区赫列克苏尔葬俗一致（见后文）。



图一〇　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查干陶鲁盖 123 号赫列克苏尔平、剖面图

四、祭祀址的形制

赫列克苏尔一般有两种形制的祭祀址，即石堆和石圈祭祀址。除此之外也有不带祭祀遗址单独存在的现象。石堆祭祀址多数分布在赫列克苏尔的东侧，其余的在北侧和

南侧环形分布。石圈祭祀址多分布在赫列克苏尔的西侧，其余的围绕赫列克苏尔分布（图七）。对祭祀址所做的 ^{14}C 测定的年代表明，这些祭祀址不是同一年建成（表一）。

表一　北塔米尔河流域 01、10 号赫列克苏尔遗存及附属祭祀址遗址的 ^{14}C 年代表

OxCal v4.3.2 Bronk Ramsoy (2017); r;5 Intcal 13 atmosohenc cvrve (reimer et al 2013)

Phase Ritual structures of B10 khirgisuur

R_Date Circle_start

R_Date Circle_end

R_Date Mound_start

R_Date Mound_end

Phase Ritual structures and funeral of KTS01 khirgisuur

R_Date Mound_st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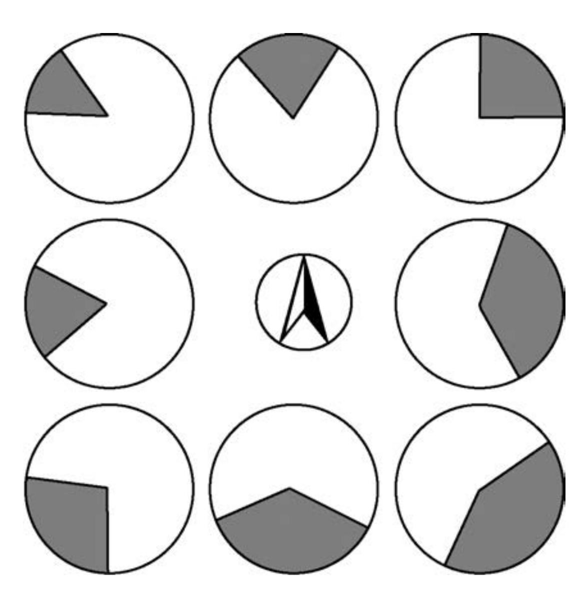
R_Date Mound_end

R_Date Human_bone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Calibrated date (calB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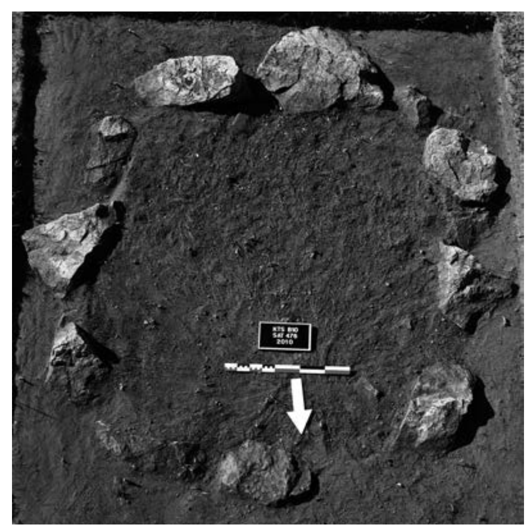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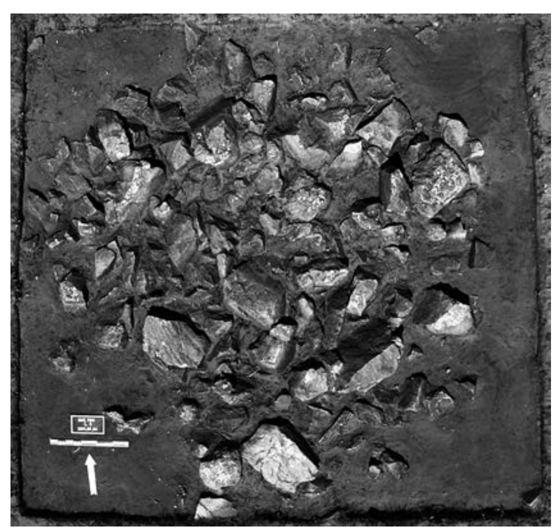
分布在艾格高勒（河）流域有祭祀址的赫列克苏尔，根据祭祀址的分布特点进行区域分类。即南 40、东南 46、东 41、北 23、西 20、西北 16 座等分布。由此可以看出，分布在南、东、东南部的祭祀址数量较多[45]（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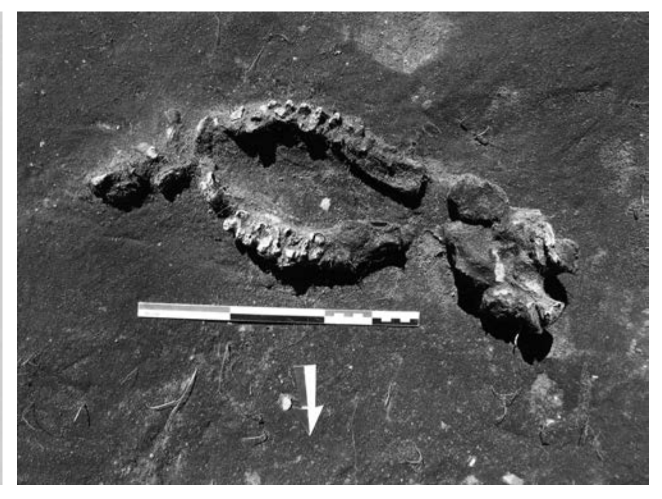


图一一　艾格河流域赫列克苏尔祭祀址分布图

（摘自 Joshua Saint Clair Wright.The Adoption of Pastoralism in North East Asia, Monu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giinGol Valley, Mongolia. (Dissertation) [D]. Cambrige:Harvard University. 2006:Fig. 6.22）

位于北泰米尔高勒（河）流域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周围的祭祀址 2000 多座，其中石圈祭祀址 950 座，石堆祭祀址 1110 座。在石堆祭祀址的南、东和北侧石圈祭祀址散落分布成弧形，但大多数石圈祭祀址分布在赫列克苏尔的西侧。石堆祭祀址直径各不相同，如北侧直径 145 ~ 250、南侧 160 ~ 300、东侧 140 ~ 280 厘米等，而石圈祭祀址直径大部分为 150 ~ 280 厘米。石堆祭祀址是用小型石块堆积而成，而石圈祭祀址却使用大块石头围成圆形石圈（图一二）。

图一二　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 10 号赫列克苏尔两种祭祀址及出土的烧骨残片与马骨图

2009 ~ 2013 年我们发掘了 10 号赫列克苏尔外侧的 24 座祭祀址，其中 4 座为石圈祭祀址，其余的 20 座为石堆祭祀址。这 4 座祭祀址分布在石围的西侧，编为 475、476、531、1162 号，其中 3 座石圈址（475、531、1162 号）中部离地面 6 ~ 15 厘米深，发现被烧过的骨残片和铁器残片，无法确定铁器残片与这座石圈祭祀址的关系。而石堆祭祀址中 2 座（532、800 号）出土陶器残片，其余的 18 座（354、389、397、415、416、

528、533、576、666、732、799、800、801、803、804、810、811、1023）石堆祭祀址离地表15～36厘米深处出土马头骨、颈椎骨、马蹄骨的组合（图一二、表二）。

表二　蒙古国发掘的带墓葬的赫列克苏尔遗存的葬俗比较表

序号	名称	编号	石围形制	棺具与尺寸/厘米	葬式	深度/厘米	随葬品	信息来源
1	扎布汗省托森青格勒	大	方形	西—东？	头向西，仰身直肢面朝南	—	动物骨	Коновалов, Наваан и др., 1995，47-58
		小	方形	西—东？	仰身直肢	—	动物骨	
2	布尔干省胡都克图－温都尔、艾格河流域、别勒赛根谷地、浩勒托斯地区	9	—	西—东 170×190	头向西，仰身直肢，右手放在胸部，左手与身体平行	154	—	Төрбат, Амартүвшин нар，2003，40
3	布尔干省达新齐林、哈尔布赫河右岸	—	—	—	头向西，仰身直肢	—	铜镜、家畜骨	Цэвээндорж, Баяр нар, 2002，101
4	科布多省莫斯特、哈尔戈壁	—	圆形	西—东 250×300	踝骨	—	5通鹿石、陶残片、石斧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Ковалев, 2007，35-50
5	布尔干省达新齐林、胡仁木图乌拉	1	方形	墓室尺寸西北—东南（86～98）×200	头向西北，仰身直肢，双手与身体平行	82	—	Энхтөр, Номгуунсүрэн нар，2007，12-35
		2	方形	墓室西北—东南（94～103）×236	头向西北，仰身直肢	21	—	
6	库布苏古尔省布仁托格托赫、巴彦乌珠尔、萨勒赫腾哈尔哈德、恰布根次乌兰乌拉	1	方形	墓室	头向西北，面朝北，双脚屈肢，东侧身屈肢	185	—	Амгалантөгс, Эрдэнэ нар，2007，106-130
		3	方形	墓室西北—东南	儿童头骨、右踝骨	48	—	
		4	—	—	脚关节骨	150	Малын яс	
		6	方形	西北—东南	头向西，侧身（左）直肢	48	—	
		8	方形	？	头向西，仰身直肢	60	—	
		16	方形	西—东 140×370	头向西，面朝北，手与身体平行	195	—	

续表

序号	名称	编号	石围形制	棺具与尺寸 / 厘米	葬式	深度 / 厘米	随葬品	信息来源
7	戈壁阿尔泰泰西尔、乌兰博木	1	—	西北—东南（30～72）×168	头向西北，面朝北，仰身直肢	187	—	Амартүвшин，Алдармөнх，2010，61-93
		2	圆形	西—东？	头向西，面朝南，仰身直肢	100	—	
		3	圆形	西—东（44～60）×200	因啮齿类动物扰乱，葬式不详	110	—	
		4	圆形	西—东 140×200	头向西，面朝南，侧身（右）直肢，双手放置在胸部，右手叠压左手	112	—	
		5	—	西—东 60×170	头向西，面朝南，侧身直肢（右），右手与身体平行，左手跨身放置在盆骨处与右手相连，右脚微曲，左脚直肢	130	—	Амартүвшин，Алдармөнх，2010，61-93
		6	—	西北—东南 120×200	头向西，仰身直肢，右手与身体平行，左右跨过身体于盆骨处与右手相连	140	—	
		9	—	БХ—ЗУ 110×240	头向西北，仰身直肢	50	羊骨、木头残片	
		12	圆形	圆形 150×290	头向西，面朝东，左手放置在左盆骨上	90	—	
		13	—	西北—东南 180×235	手指骨	55	—	
		15	—	西—东？	下颌骨	180	大型牲畜骨	
		20	方形	西北—东南	仰身直肢	40	—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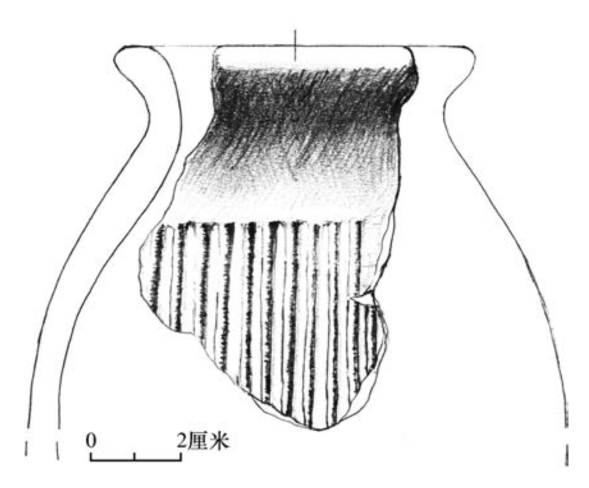
序号	名称	编号	石围形制	棺具与尺寸 / 厘米	葬式	深度 / 厘米	随葬品	信息来源
8	科布多省齐齐格、达尔维、阔谢特河、铁铁根达瓦、那仁乌拉	1	圆形	东北—西南 170×330	侧身（右）直肢，手臂往上弯曲	—	—	Амартүвшин，Эрдэнэ-Очир нар，2010
		7	半月形（圆形？）	—	扰乱严重三具人骨	—	牲畜骨骼、陶片、木头残片	
		110	圆形	北—南	面朝西，侧身（右）直肢右脚屈肢，左脚直肢	54	白灰色陶片、骨骼残片	
		114	—	东北—西南 200×300	头骨残片，臂、踝骨以及其他骨骼的残片	10	—	
9	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北塔米尔河流域、巴彦察汗谷地	KTSE 01	圆形	西—东 172×324	头向西，仰身直肢	—	铜镜、陶片、羊骨	Ерөөл-Эрдэнэ ба бус. 2012
10	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河、北塔米尔河流域、查次陶鲁盖	KTSA 123	方形	西北—东南（150～160）×278	头向西，仰身直肢	—	陶片、马头骨	Гантулга ба бус. 2013
11	扎布汗省都尔布勒金、巴彦艾拉格乌拉	BA 62	—	?	头向西北，面朝西南，仰身直肢	76	马骨	Гүнчинсүрэн ба бус. 2012
		BA 71	—	（60～82）×160	头向西北，仰身直肢	124	马骨	

虽然出土马骨保存不太好，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充足，但我们也获取了不少信息。例如，出土的马骨均为公马，年龄均为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六岁不等（表二）。除此之外，给我们提供了了解鹿石和赫列克苏尔之间关系的信息，即赫列克苏尔和鹿石周围的祭祀遗址从墓葬形制到丧葬习俗上完全一样。石圈祭祀址中出土被烧过的骨残片、木炭等信息给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人们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火和敬重火的重要证据[46]。

五、出土遗物

虽然赫列克苏尔遗存中出土遗物少之又少，但发掘过程中也出土了遗物。例如，布尔干省胡塔格－温都尔苏木浩勒托斯特努塔格赫列克苏尔中出土了铜戒指和陶片[47]；乌布苏

省布赫莫仁苏木地区巴依拉木西勒赫列克苏尔中出土了羊拐骨（羊距骨）、铁箭头、陶器、木器、铜烟管头、项链；布尔干省达西恩其楞苏木地区哈尔布赫高勒（河）右岸边的赫列克苏尔中心石堆出土了铜斧[48]；科布多省莫斯特苏木地区哈尔戈壁赫列克苏尔中出土了陶片、石斧[49]；中戈壁省巴嘎嘎加尔乔鲁2号赫列克苏尔出土了陶残片、铁渣、磨石、石纺轮、石臼残片[50]；科布多省齐齐格、达日维苏木地区那仁乌拉、铁铁根达瓦、胡谢腾高勒等地的赫列克苏尔中出土了陶片、陶器和铜件[51]，巴彦乌勒盖省青格勒苏木地区查干阿斯根赫列克苏尔出土了风干食物种子的石板残片等[52]遗物。我们发掘的3座赫列克苏尔中也出土了少量的遗物，即10号赫列克苏尔的532号祭祀址中出土了陶器残片（图一三），32号鹿石和北侧方形赫列克苏尔之间采集到铜马（图一四）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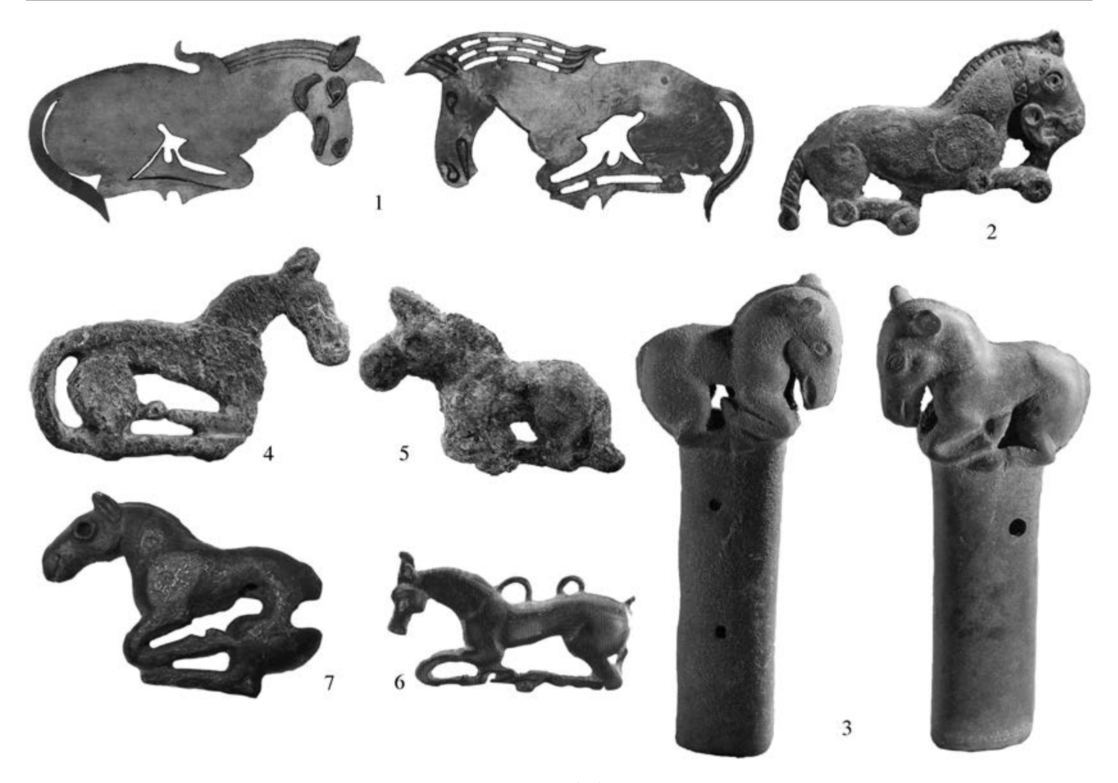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巴彦察汗谷地10号赫列克苏尔532号祭祀址出土陶罐残片复原图



图一四　后杭盖省伊赫塔米尔巴彦查干谷地铜马

铜马　以头部较大、鼻孔凸出、颈部粗壮、竖立的耳朵、整齐的鬃毛、肚子较细、蹄子紧窄等奔跑状铸成。长4.28、厚0.35、高1.6～1.9厘米，净重10克。反面有扣环，用于佩戴。扣环直径0.4、孔径0.31～0.81厘米。鬃毛分11、尾巴分9段（图一四）。肯特省兵德尔苏木地区阿斯嘎特1号方形石板墓也出土过与这相同的铜马，并与昌德曼墓葬中出土的铜马比较后，年代可定为公元前7世纪[53]。俄罗斯图瓦阿尔赞2号的5号墓（2号墓葬、5号墓葬）中出土过2件铜马[54]。而在中国鄂尔多斯、内蒙古地区也出土了不少类似的铜马，年代定为公元前8～前2世纪（春秋至西汉）[55][56]（图一五）。由此看来，这件铜马的年代可以定在公元前8～前7世纪（图一四）。

铜镜　直径7.66厘米 ×8.28厘米，边缘0.5、中心厚0.2～0.35厘米，净重116克。铜镜边缘残缺、镜面上的汉字不清晰。镜面上还饰8个虎或豹类动物。或许是佩戴方便，在铜镜上还有直径0.6毫米的小孔。



图一五　金与铜质马

1. 图瓦阿尔赞 2 号墓地 5 号墓出土金质马（摘自 Chugunov K, Parzinger H, Nagler A. Arzhan 2: la tombe d’un prince scythe en Sibérie du Sud [J]. Rapport préliminaire des fouillesrusso-allemandes de 2000-2002. *Arts Asiatiques*, 59：5-29） 2. 铜马（春秋早期，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图 168） 3. 马形权杖头（战国晚期，摘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北方民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图 229） 4～6. 鄂尔多斯、内蒙古发现的铜马（鄂尔多斯…2006：214、216、259） 7. 阿斯嘎特 1 号方形石板墓出土铜马（摘自额尔德尼巴特尔，2002：83，84）

六、人类学成果

我们在北塔米尔河流域发掘了 2 座赫列克苏尔（01、123 号），两座均发现了安葬的人骨。虽然人骨保存不是很理想，但我们也测绘出了一些关于体质人类学的信息。例如，01 号赫列克苏尔墓主为蒙古人种，高 141.3 厘米 ± 3.82 厘米，约 30 岁的男性，123 号赫列克苏尔墓主为成年男性，而且还检测出这些人的股骨头有轻微关节炎的症状（arthrose，ostéophytose）[57]。

七、年　代

关于赫列克苏尔的年代问题，目前学者的意见还未一致。例如，A. Д. 策比克塔

夫[58] Ю. С. 胡德亚科夫[59]、З. 巴图赛很[60]、Д. 额尔德尼巴特尔[61]等学者认为赫列克苏尔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晚期至斯基泰或与方形石板墓同时期。Г.И. 博罗夫卡（Боровка），А.П. 奥克拉尼科夫（Окладников）、И.И. 科力洛夫（Кириллов）等学者认为赫列克苏尔年代为中世纪早期或突厥时期[62]。

但通过近几年的研究显示，该遗存的年代应为青铜时代中期至晚期，^{14}C 测年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中戈壁省巴嘎嘎加尔乔鲁赫列克苏尔，它的祭祀址的年代显示为公元前 1440 ~ 前 1200 年[63]；库布苏古尔省查布干次乌兰乌拉、萨勒克依特哈尔哈德、巴彦 - 乌珠尔等地的遗存的年代显示为公元前 1420 ~ 前 818 年[64]；戈壁阿尔泰乌兰博木赫列克苏尔为公元前 1380 ~ 前 1110 年[65]；库布苏古尔省乌什根奥吾尔 1 号赫列克苏尔的祭祀址年代为公元前 1259 ~ 前 842 年[66]；科布多省哈尔戈壁赫列克苏尔为公元前 1200 ~ 前 750 年[67]；布尔干省艾格河浩勒托斯特努格 9 号赫列克苏尔的年代为公元前 1116 ~ 前 906 年[68]；前杭盖省胡吉尔特苏木地区阿日布朗根 4 号赫列克苏尔、11 号赫列克苏尔祭祀址的年代为公元前 1125 ~ 前 895 年，32 号祭祀址的年代为公元前 1120 ~ 前 970 年；2009 ~ 2016 年我们在北塔米尔河巴彦察汗谷地 10 号赫列克苏尔遗存的附属祭祀址中发掘了 60 座祭祀址，并对 90 件标本进行了 ^{14}C 测年。这些测年数据显示圆形石堆祭祀址年代早期可到公元前 1214 ~ 前 1037 年，晚期可到公元前 791 ~ 前 543 年，而石圈祭祀址年代显示早期为公元前 1193 ~ 前 1019 年，晚期为公元前 978 ~ 前 842 年（表一）。

八、结　　语

北塔米尔河流域特殊之处在于，分布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换句话说，蒙古国中部北塔米尔河流域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地。由于赫列克苏尔遗存规模较大、能提供的信息却少，关于它的年代、功能、渊源和族属等很多问题，学者一直存有争议。为了解决赫列克苏尔遗存的相关问题，我们对分布在北塔米尔河流域赫列克苏尔遗存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通过研究我们对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地表建筑有了一个总的分类，即方形石围、圆形石围、无石围等三种类型；外围祭祀遗址根据地表形制结构和祭祀的不同可分为：石堆祭祀址、石圈祭祀址。除此之外，从祭祀址所出土的马骨提取了 ^{14}C 标本进行测年，测年结果显示为公元前 1010 ~ 前 110 年，年代如此长久，明显一直有人在建造祭祀址来进行祭祀活动。

注　　释

[1]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М]. -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стр. 136, 137. - 288 с.

［2］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үүх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 I боть.

［3］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т. 126.

［4］ 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П Х.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 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т. 33.

［5］ Pelliot Paul. Le terme “Kereksur” [M].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44.Vol. 37, Livr. 3/4, pp. 114-124.

［6］ Эрдэнэбат У. Онгон таван толгой. Онгон нутгийн өв соёл [C]. Үзэсгэлэнгийн каталог.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1.т. 17, 18.

［7］ 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П Х.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 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т. 33.

［8］ Потанин Г Н. Очерк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Монголии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6.

［9］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т. 126.

［10］ Granö J G. Archaeologische Beobachtungen von meiner reise in Suedsibirien und der ordwest-Mongolei im jahre 1909[J]. Sonderabdruck aus dem journal de la Societe Finno-Ougrienne XXVIII. Helsingfors, 1912.

［11］ a. Пэрлээ Х. Төв аймгийн Авдарбаян сумын нутаг Хүйтний 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жлын тухай [J].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 №7,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42. т. 27, 28.

b. Пэрлээ Х.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өгүүллүүд. I, II боть[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1. т. 38-40.

［12］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Батдалай Б, Бөхчулуун Д.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вран хамгаалах хайгуул,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овч үр дүн [J]. 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 - 2012.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2.т. 100-113.

［13］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Монгол нутаг дахь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дурсгал[C]. The Ceremonial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Age, Bucheon, 2004. pp. 61-77.

［14］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15］ Төрбат Ц,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 сав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R].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т. 38-40, 49-52.

［16］ Erdenebaatar D, Galbadrakh B, Takahama Shu, Hayashi Toshio. Permanent Archaeological Joint Mongolian and Japanese Mission 2004 [R].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Mongolia, Newsletter on Steppe Archaeology. 2004.

［17］ Takahama Shu. Research of Ulaan Uushig I (Uushgiin Ovor) in Mongolia and newly acquired ^{14}C data [C].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й Сибири. Барнаул, 2010.стр. 126-131.

［18］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Ковалев А А.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бүс нутг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оёлууд [J]. 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Volume 3. No.1 (287) December, Ulaanbaatar, 2007: 35-50.

[19] 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 Эрдэнэ Б, Фрохлич Б, Хант Д. Умард мон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V, Fasc.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106-130.

[20]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Алдармөнх П. Улаанбоомын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дурсгал [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 Fasc. 4,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т. 61-93.

[21]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Жаргалан Б.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VII, Дундговь аймагт хийсэ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Бага газрын чулуу.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22] a.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Алдармөнх П, Цэнгэл М, Магай Ж, Гризо Ж Ж, Фабрис Л, Бушиеге Ж Ф, Рене Д, Клауде С, Яник М, Венжамин В, Етиенне Х, Анайс В, Амелие П.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08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R]. Rapport annuel mars 2008 - mars 2009 et projets campagne 2009. Monaco-Ulaanbaatar, pp. 109-133.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08.

b. -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Цэнгэл М, Магай Ж, Гризо Ж Ж, Рене Д, Клауде С, Яник М, Бенжамин В.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09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09.

c. -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Магай Ж, Клауде С.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10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0.

d. -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Магай Ж.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11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1.

e. -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Магай Ж.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12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2.

[23] Гүнчинсүрэн Б,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Гантулга Ж, Эрдэнэ Б, Дашдорж Б, Батдалай Б. Завхан айм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сумын нутаг дахь “Баян Айраг Эксплорэйшн” ХХК-ийн ашиглалтын талбайд хийсэ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2.

[24] Пэрлээ Х. Төв аймгийн Авдарбаян сумын нутаг Хүйтний 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жлын тухай[J].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 №7,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42. т. 27, 28.

[25] Кызласов Л Р.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M]. Москва, 1979.

[26] Кубарев В Д. Древние изваяния Алтая.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Табл. VI, X. 3.

[27] Худяков Ю 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 [J].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Монгол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7. стр. 136-162.

[28] Новгородова А Э. Древ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хрон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стории)[M]. Москва. 1989.

[29]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M]. -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стр. 138, 139. - 288 с.

[30] Волков В В. Оленние камни Монголии[M]. Москва, 2002.

[31] Magail J, Milcent P-Y, Munkhtulga R. Campagne archéologique 2006 et projets d’activités[C]. Monaco,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06.

[32] Joshua Saint Clair Wright. The Adoption of Pastoralism in North East Asia, Monu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giin Gol Valley, Mongolia. (Disserta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ge, Massachusetts May. 2006, 232.

[33] Савинов Д Г, Урантугс С. Опыт типологии херексуров[C]. Алтае-Саянская горная страна и история освоения ее кочевникам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Барнаул, 2007.стр. 142-144.

[34] 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П Х.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 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т. 36.

[35]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M]. -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стр. 138, 139. - 288 с.

[36] Төрбат Ц, Баяр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ярхүү Н, Идэрхангай Т, Жискар П Х.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 I: Баян-Өлгий айма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9. т. 36.

[37] Савинов Д Г, Урантугс С. Опыт типологии херексуров [C]. Алтае-Саянская горная страна и история освоения ее кочевникам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Барнаул, 2007. стр. 142-144.

[38]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Монгол нутаг дахь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дурсгал [C]. The Ceremonial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Age, Bucheon, 2004: 61-77.

[39] Баттулга Ц, Батсүх Д, Гантогтох Г.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түүх,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II төсл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тайлан. III хэсэг [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0. т. 42, 43.

[40] http://zhidao.baidu.com/.

[41]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Батболд Н. Архангай аймгийн Өндөр-Улаан сумын нутагт ажилласан Монгол-Америк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тайлан [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01. т. 4, 5.

[42]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Ч, Гантулга Ж, Магай Ж, Клауде С. Монгол-Монакогийн хамтар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10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0.

[43]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Монгол нутаг дахь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дурсгал[C]. The Ceremonial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Age, Bucheon, 2004: 64.

[44]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 [M]. -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тр. 1998.137-139. - 288 с.

[45] Joshua Saint Clair Wright. The Adoption of Pastoralism in North East Asia, Monu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giin Gol Valley, Mongolia. (Disserta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y. 2006. p. 241.

[46]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Монгол нутаг дахь хиргисүүрийн дурсгал [C]. The Ceremonial Archaeology in Prehistoric and Ancient Age, Bucheon, 2004: 66.

[47] Төрбат Ц,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 сав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R].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т. 26, 27, 38-40.

[48] Цэвээндорж Д., Баяр Д., Цэрэндагва Я., Очирхуяг Ц. Монголын археологи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т. 101.

[49]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Ковалев А.А.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бүс нутг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оёлууд[J]. 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Volume 3. No.1 (287) December, Ulaanbaatar, 2007: 35-50.

[50]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Жаргалан Б.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VII, Дундговь аймагт хийсэ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Бага газрын чулуу.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т. 163-166.

[51]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Очир Н, 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 Галдан Г. Ховд аймгийн Цэцэг, Дарви сумын нутаг дахь “Мон-Энко” ХХК-ний “Хөшөөтийн уурхай” ашиглалтын талбайд хийсэ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вран хамгаалах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айлан [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0.

[52] Төрбат Ц, Батсүх Д, Баярхүү Н. Монгол-Европын холбооны хамтарсан “Eurasiat” төсл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2011 о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C].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1.т. 8, 9.

[53]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т. 83-87.

[54] Chugunov K, Parzinger H, Nagler A. Arzhan 2: la tombe d’un prince scythe en Sibérie du Sud [J]. Rapport préliminaire des fouilles russo-allemandes de 2000-2002. Arts Asiatiques, 2004 (59): 5-29.

[55] Zhong guo qing tong qi quanji [M] -15. Bei fang minzu. Beijing, 1997.

[56] *Ordos Bronze Wares* [M]. Beijing, 2006.

[57] Rapport archéo-anthropologique des sépultures fouillées à tsatsiin ereg entre 2012 et 2013 [C]. Monaco-Ulaanbaatar, ШУА-ийн АХГБС., 2013.т. 6-17, 67-73.

[58]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M]- 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стр. 136-144. - 288 с.

[59] Худяков Ю С. Херексуры и оленные камни[J].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Монголи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7.стр. 136-162.

[60] Батсайхан З. Монголын хүрлийн үе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ын он цаг ба угсаатны үйл явц [J]. Studia Historica, Tom. XXIX, Fasc.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6.т. 43-53.

[61]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Монгол нутгийн дөрвөлжин булш, хиригсүүрийн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2. т. 130, 131.

[62] Төрбат Ц,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 сав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R].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т. 26, 27.

[63]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Жаргалан Б.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VII, Дундговь аймагт хийсэ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Бага газрын чулуу.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т. 163-166.

[64] Амгалантөгс Ц, Эрдэнэ Б, Фрохлич Б, Хант Д. Умард монголд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V, Fasc.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т. 106-130.

[65]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Алдармөнх П. Улаанбоомын хүрэл зэвсгийн үеийн дурсгал[J]. Studia Archaeologica, Tom. XXIX, Fasc. 4,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т. 61-93.

[66] Takahama Shu. Research of Ulaan Uushig I (Uushgiin Ovor) in Mongolia and newly acquired ^{14}C data [C]. Древ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Монголии и Байкальской Сибири. Барнаул, 2010. стр. 126-131.

[67]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Д, Ковалев А А. Монгол Алтайн бүс нутг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оёлууд [J]. 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Volume 3. No.1 (287) December, Ulaanbaatar, 2007: 35-50.

[68] Төрбат Ц., Амартүвшин Ч., Эрдэнэбат У. Эгийн гол сав дахь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уд [R].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т. 26, 27, 38-40.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Hereksur in Central Mongolia

J.Gantulga

Abstract: Scholar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ating, function, origin and clan involved in the late Bronze Age site of Hereksu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work wa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In recent years, many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round Hereksur itself.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ata collected at Hereksur in the Hoyt Tamir River Basin of the Ihtamir Sumu area in Hangai Province and data collected in other areas related to Hereksur.

Keywords: Central Mongolia; Hereksur; Late Bronze Age; Typology

新疆吐鲁番盆地交河墓地出土的木制品兼论与阿尔泰地区出土木制品的对比

A.V. 瓦连诺夫[1] 著　权乾坤[2]　张胤哲[3] 译

（1.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新西伯利亚；2.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长春，130012；
3.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内容摘要： 交河故城（亚尔镇）位于吐鲁番市西 10 千米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辖区地理位置上的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们对交河故城以北的一处墓地进行了发掘。总共出土了约 40 种木制品。包括箭头、箭筒、刀具、盒子、带扣、扣环、小雕像、餐具及其他种类的出土物。中国的考古学者认为该墓葬文化属于交河文化、吐鲁番文化。对于陶器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但是中国研究者所提出的文物年代只归属于汉代的观点引起了疑义。许多交河故城出土的木质品中，尤其是与兵器相关的木制品，骨制（角制）的马具的部件，以及马鞍部件与俄罗斯境内巴泽雷克文化的出土文物有直接相似性，这为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 4 世纪提供了较充分的证据。另一部分木质品与匈奴萨尔马特时期的遗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交河故城以北的墓葬属于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墓葬。

关键词： 新疆；交河故城；墓葬；木质品；年代测定

一、序　　言

研究人员在阿尔泰的墓葬发掘过程中经常会遇见木质遗存和木制品出土物。历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已经强调了研究这一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包括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木质构造定义，树木年代学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1]。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考古方法，特别是在邻近地区寻找可类比的出土物进行类比研究。

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俄罗斯境外离阿尔泰地区最近的，考古木质遗存保存较好的地点之一。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吸引了西伯利亚研究者的关注，但主要是寻找与巴泽雷克文化的相似点。事实上，新疆的古代木制品很有代表性，不仅在铁器时代早期

的遗址有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以及在匈奴－鲜卑－柔然时期和中世纪的文化中均有发现。问题是俄罗斯专家很难深入了解中国材料，中国学者对新疆的考古文物和出土文物的年代确定并非总是可靠的（正确的）。以交河故城（亚尔镇）以北的一处墓地发掘为例。

交河故城（亚尔镇）位于吐鲁番市西 10 千米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辖区地理位置上的中心。据中国史料记载，交河故城曾是汉朝 Цзюйши（jiu shi）的首都。20 世纪初，人们在交河地区就进行了零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大部分都是中世纪的出土物。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中日联合考古队在交河故城进行了发掘，考古发掘的成果已在中国的考古期刊上发表[2][3]。1993 ~ 1994 年的全部研究成果在 1998 年出版[4]。关于这些成果的信息也悉数用俄语出版[5][6]。

在交河故城发现了中世纪时期定居点及寺庙建筑群，同样在交河故城以北也发现了墓葬，这些都被认为是属于 Цзюйши（Гуши）的贵族和普通人群的聚居点。墓地并未完整揭露。发掘分为三个区域：两个比较大的圆形区域分别是墓葬 M16 和 M01，第三个区域长 48、宽 12 米，位于 M01 南部大约 100 米处。无论是大型墓葬，还是普通的平民墓葬都曾遭遇过盗掘，因此保留下来的随葬品特别少[7]。只有在少数墓葬中找到了残破的遗物。

二、交河故城出土的木制品

在交河故城以北的墓地共发现约 40 种木制品[8]。中国考古学者辨认出了箭、箭筒、刀、箱、扣、小雕像、餐具以及其他种类的文物[9]。根据这些出土物的分类，我们对它们进行如下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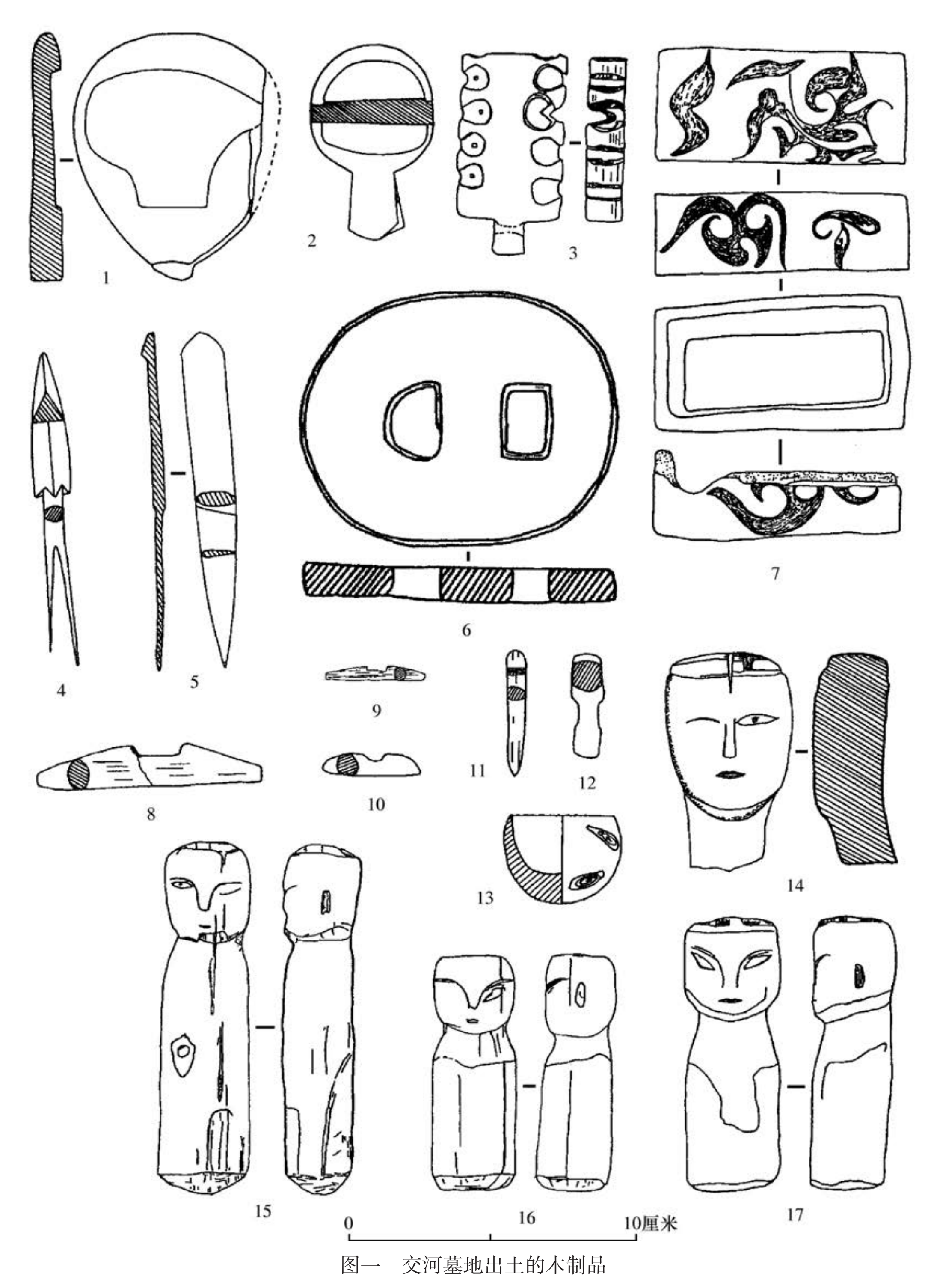
箭头　1 件。M27∶5，带有短羽的三角尖，叶柄圆形，中间到尾部呈黑色并分叉。（图一，4）。

箭柄　超过 10 个样本，保存完整的样本很少。横截面呈圆形，打磨光滑，直径约 1 厘米，箭柄尾部弦下有凹口。尾部前面区域有红色或黑色涂料。带有箭镞的箭 3 件。M21∶12，箭被毁坏，只保留了头部（图二，1）。

箭筒　3 个样本。M21∶13，受损的木框底座（图二，2）。在内侧有五六对直径为 0.4 厘米的孔，用于与皮革容器固定。漆成黑色油漆的凸边沿着外面延伸。下面是皮带的五个孔。长 73.5、宽 4.4 ~ 5.7 厘米。

盒子　2 件。分为二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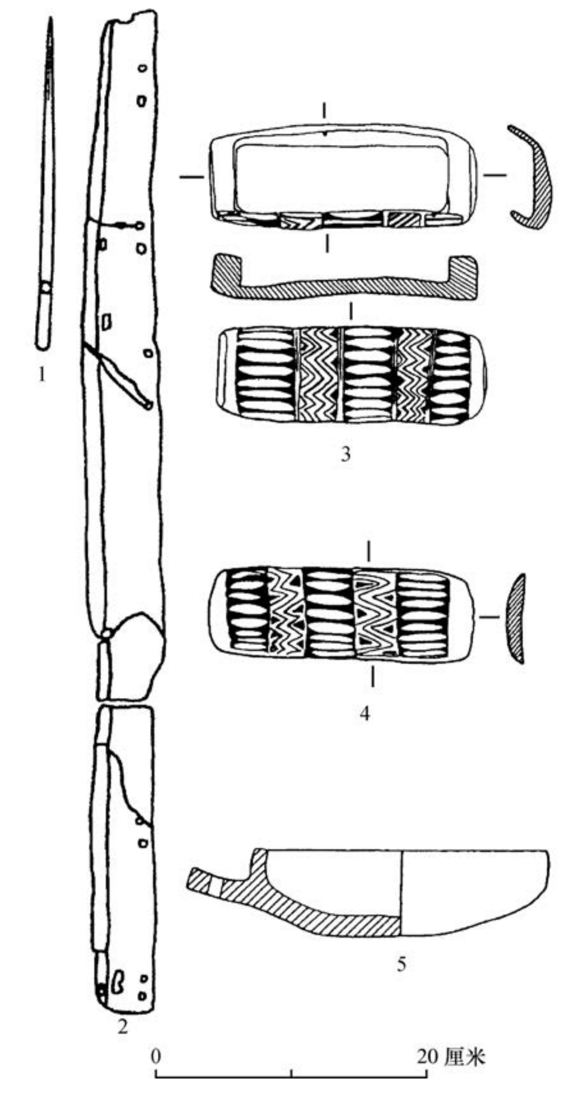
A 型　1 件。M16md∶4，在原件的横截面中，通过具有圆角的矩形截面可以看出它是椭圆形的。由于发现时已经被压碎，所以现在看起来很扁平，但其横截面的底部保留了树的原始圆形形状，两端都是直的（图二，3）。盒子的盖子是平的（图二，4）。盖子和外壳壁（图中不可见）两侧有 1 ~ 3 对孔，用于将两个部件固定在一起。在盖子和



图一　交河墓地出土的木制品

1. 出自 M16me　2. 出自 M01mj　3、6. 出自 M30　4. 出自 M27（殉葬有马的北坑）5. 出自 M01mg　7、13、14. 出自 M15　8、15 ~ 17. 出自 M10　9. 出自 M16mk　10. 出自 mk2　11 . 出自 M16k6　12 . 出自 M01mm

（采自 A.V. 瓦连诺维姆：《交河故城》，1998 年，57 页，图 44；58 页，图 45）



图二　交河墓地出图的木制品
1、2. 出自 M21　3、4. 出自 M16md　5. 出自 M01me
（采自 A.V. 瓦连诺维姆:《交河故城》, 1998 年，57 页，图 44）

盒的外表面上有一个细长菱形形状的图案。长度为 19.6、宽度为 7.6、高度为 3.2 厘米。

B 型　M15：1，盒盖呈矩形，破损，侧壁笔直，厚度不均匀，表面有图案（图一，7）。长 8.5、宽 4.5、高 2.9、壁厚 0.5 ~ 1 厘米。

杯　3 件。分为三型。B 型和 C 型比 A 型大 3 ~ 4 倍。

A 型　M15：5，直口，杯身弯曲，圆形底部，外表面经过抛光处理，保留了木质结构的痕迹。口径为 3.5、杯身最大直径为 3.9、高度为 3.05 厘米（图一，13）。

B 型　M26：1，口径为 12.7、底部直径为 10.2、杯体最大直径为 13.4、高度为 6.1 厘米。

C 型　M21：9，口径 9.7、底部直径 7.7、高度 3.2 厘米。

锥子　1 件。M01ma：10。

刀　2 件。分为二型。

A 型　M01mg：6，刀背弧形，刀片平直。手柄横截面呈椭圆形，末端有一个三角形边缘。手柄和刀片之间的边界清晰可见（图一，5）。长度为 11.7 厘米。

B 型　M01mm：1，长 11 厘米。

生火器　1 件。M30：2，其中一个短边是一个 1.1 厘米长的带圆孔的手柄。长 6.9、宽 3.6、厚 1.4 厘米（图一，3）。

扣　2 件。M30：3，扁椭圆形扣环，中间有两个相对的孔，分别为矩形和半圆形（图一，6）。长 10.4、最大宽 8.5、厚 1 厘米。M03：3，带扣的形状类似于 M30：3，只有中间的两个相对的孔是半圆形的。长 10.1、最大宽 7.8、厚 1 厘米。

锁扣　5 件，由圆木棍制成。分为三型。

A 型　1 件。M01mm：2，长 3.65 厘米（图一，12）。

B 型　3 件。M10：9，长度为 7.6 厘米（图一，8）。M16mk：4，长度为 3.35 厘米（图一，9）。mk2：1（图一，10）。

C 型　1 件。M16k6：1。在一端附近有一个环形槽，其中有两圈羊毛线，直径约为 0.1、长度为 4.4 厘米（图一，11）。

青铜框镜子　1 件。M01mj：5。手柄是尖的，镜子的一侧是磨削的，一个 0.1 厘米厚的青铜半圆形板，6.7 厘米长（图一，2），插入另一侧。

小雕像　4 件。M10：6，小雕像是用圆形的木头雕刻而成并漆成白色的，一双眼睛凸出，嘴上涂着猩红色的油漆（图三）。后脑勺为黑色，未见明显发型。长 9.4、直径约 3 厘米（图一，17）。M10：7，长 8、直径 1.85 厘米（图一，16）。M10：1，长度为 12.2、直径为 3 厘米（图一，15）。M15：4，小雕像由一块扁平的木头制成。刻一双眼睛，其中一只眼睛受损。眉毛细而光滑，鼻子扁平而长，嘴唇轮廓清晰，耳朵通过圆孔呈现。整个雕像都是白色的（图一，14）。长 7.5、厚 2.4 厘米。



图三　交河墓地 M10 出土的木质小雕像
（采自《新疆文物》1999 年，159 页）

饰品　6 件。中国考古学者分为三型，均为扇形或椭圆形，带把手。这些是相同的木制镜子，但没有青铜插入物。M16me：1，表面抛光，平整光滑，一端有破损的手柄。在前侧，平面上的凹槽显然雕刻在青铜插入板下方。保存部分的长度为 8.9、最大宽度为 6.5、厚度为 0.75 厘米（图一，1）。M16md：3，扇形产品的残片，表面光滑，一端有把手，前面有一个小风扇形状的青铜插件下面有一个凹槽。保存部分的长度为 9、最大宽度为 6.9 厘米。M30：4，残，呈规则椭圆形，中间凸出，一侧有手柄。长 13.8、最大宽 12.8、厚 1.2 厘米。

舀子　1 件。M01me：1，直口，小体，圆底，一侧有一个带孔的手柄。口径 21.8、高 6.7 厘米（图二，5）。

平底锅　1 个。M05：3，破碎，平坦的表面呈新月形，一侧直，形成圆拱，直口，小体，平底。长度为 31.1、最大宽度为 14.2、高度为 3.8 厘米。

豆　1 件。M21：10，破损，直口，小弯曲体，短柄，底座为喇叭形。口边缘有 0.6 厘米宽的凸边，口径 10.2、底部直径 8.55、高 6.4 厘米。

三、类比与断代

中国考古学者认为，交河墓地的文化是地方性的吐鲁番的文化，是 Цзюйши（jiu shi）人的贵族和平民所特有的。我们在对陶器的分析后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以汉代时间确定墓葬的年代值得商榷[10]。据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遗址的第一批

研究人员对邻近地区（主要是南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时代的材料认识不足。例如，他们发现了一种类别[11]——带有侧把手和青铜底座的木制镜子——他们称之为乒乓球拍形的物品，没有明确其用途，而且这些镜子都是破碎的，没有青铜底座都属于装饰品。与此同时，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中青铜镜的木制仿制品非常常见[12][13][14]。很多骨制（角制）的马具零件，特别是交河的马鞍装备在俄罗斯境内有直接可类比的器物，主要是巴泽雷克文化的遗址中的器物[15]。这可以将很多交河故城北部墓地的墓葬的年代定为公元前 4 世纪[16]。

来自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出土物之间的直接可类比的器物是出土于交河的箭筒木框架。在阿尔泰地区有非常相似的硬木条，这些硬木条上都有雕刻的花纹，或者红色的漆，长度为 53～75、宽 2.3～4.7 厘米，这些木条在墓坑乌兰德雷克Ⅰ、乌兰德雷克Ⅳ、塔尚塔 - Ⅰ，以及巴尔布加济 I№18 库尔干的 25 号墓葬均有发现。唯一的区别是阿尔泰地区出土的木板有 10 对孔，用于固定箭头的皮革容器，而在交河墓地只有五六对。应该强调的是，巴泽雷克和吐鲁番的箭筒在结构上与管状带有圆形雕刻木底的箭筒不同，圆形雕刻木底使其具有刚性，这种箭筒在阿尔泰亚洛曼Ⅱ遗址的柔然时期 31 号库尔干中被发现。与此同时，亚洛曼Ⅱ、巴泽雷克文化以及新疆的弓箭形木弓都非常相似[17][18][19]。尤斯特特Ⅰ库尔干 № 7 墓葬中以及亚洛曼Ⅱ库尔干 №60 a 墓葬中的木制刀具模型与交河墓地的出土物一样[20][21]。

至于在交河故城发现的生火设备，在巴泽雷克文化的遗存中并未发现与之相似的器物。在新疆发现的诸多木火镰中，最接近交河的样品是从 Субаши（su bai shi）的 3 个墓葬出土的，沿着长方形木板的长边有两排平行的孔，上面有一个带孔的手柄形状的上部，O.A. 米尔科的测年是“公元交界和公元一世纪”。O.A. 米季科认为，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相似的器具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斯基泰类型、匈奴类型、古突厥类型和古亚细亚类型[22]。根据他的汇报总结中的图形及举例，斯基泰类型中的生火设备（火镰）特点是下部较长部分的一侧有一排钻孔[23]，匈奴类型是沿着窄底木制部分的长边有两排平行的钻孔[24]。而突厥类型是半圆形或近似直角形的右下部有多个非平行钻孔[25]。由于在交河出土的两个椭圆形木制带扣中的一个，长约 10 厘米，带扣中心有 2 个相对的钻孔，和在 M30 中出土的一个火镰均应确定为鲜卑时期。

由于没有图或照片，很难说明在交河出土的木制餐具与阿尔泰—萨彦山区的样品的相似程度。如果只关注类别名称，那么碗、盘子、勺子都可以在巴泽雷克文化和亚洛曼Ⅱ遗址中被找到。相反的，木制盒子与巴泽雷克文化完全无关，然而，在亚洛曼Ⅱ遗址中的 №29、30、31 墓地中被发现[26][27]。的确，这些盒子的长度略长，而且偶尔也有宽度大于在交河遗址中发现的。

从交河遗址出土的一系列俑（小雕像）是独创的。汉代的随葬俑，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陶质的，都以这样一个事实为特征：他们用手、脚，有时还有性别的细节来区别

随葬人（仆人或奴隶）[28]。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并没有发现木俑，可能是由于当地土壤和气候的特殊性。但是在一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到 3 ~ 4 世纪的遗址中，发现了陶质或雪花石膏“雕像”，结构上类似于吐鲁番样品：一个短圆柱体，其中只有颈部和头部的脸部凸出显示[29]。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小俑是从中国西部（即新疆）юэчжами и усунями（yuan qi ra mu 和 wu su nia mi）引进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书面资料记录 Цзюйши（jiu shi）与 и усунями（wu su nia mi）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所以，公元前 68 年主要城市交河汉人被围困，它的统治者逃到了 усуням（wu su nia mi）[30]。此外，交河墓地 M01mj 的埋葬无疑可以追溯到匈奴—萨尔马特时期，在那里发现了骨制（角制）弓的残块、骨勺和从公元前 118 年开始铸造的汉代的五铢钱。

因此，我们证实了我们之前得出的结论，即交河故城（亚尔镇）北部的墓地埋葬具有不同的时间和多文化性质。分析这座遗址的各类木制品在大型土墩和普通坟墓中的分布，有助于澄清其文化和时间顺序。

注　释

[1] Тишкин А А. Деревянные находки из памятника Яломан-II на Алтае [J].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11. №6. С. 165-176.

[2] 杜根成．丝绸之路上的考古新发现［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3）：14 ~ 19.

[3] 羊毅勇．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 1 号台地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99（6）：18 ~ 25.

[4] 交河故城保护修缮办公室．交河故城 ——1993、1994 年度考古发掘报告［R］．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 Варенов А В, Шойдина О 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городищ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Турфанской впадин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скопок 1993-1994 годов) [А].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1999. Т. V. С. 312-316.

[6] Варенов А В, Шойдина О С. Могильник к северу от городищ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памятник гунн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Турфанской впадине [А].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0. Т. VI. С. 257-262.

[7] a.Варенов А В. Княжеские курганы скифо-са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могильнике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Синьцзяне [А]. Вестн. Новосиб. гос. ун-та [С]. Сер.: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0. Т. 9; вып. 7: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С. 68-79.

b.Варенов А В.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могильник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Синьцзяне [А].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С].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12. Т. 11; вып. 10: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С. 41-48.

[8] 同 [4].

[9] 同 [4].

[10] a.Варенов А В. Могильник к северу от городищ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Синьцзя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датирования е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изделий [A].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8. Т. XIV. С. 145-150.

b.Варенов А В. Могильник к северу от городищ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Синьцзя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его культурно-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атрибуции [A].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 ун-та [C]. Сер.: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09. Т. 8; вып. 4: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С. 27-31.

[11]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Уландрык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7. 304 с.

[12] 同 [11].

[13]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Юстыд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1. 192 с.

[14] Кубарев В Д. Курганы Сайлюнем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 224 с.

[15] Варенов А В, Бауло И А, Шульга П И. Костяные и роговые изделия могильника Цзяохэ (Яр-Хото) в Турфанской впадине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A].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09. Т. XV. С. 240-245.

[16] Шульга П И, Варенов А В. Материалы могильника Цзяохэ и проблема синхронизац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скиф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Саяно-Алтае и в Китае [A].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C].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АЭТ СО РАН, 2008. Т.XIV. С. 282-286.

[17] 同 [11].

[18] 同 [14].

[19] Тишкин А А, Мыльников В П. Деревянные изделия из кургана 31 памятника Яломан-II на Алтае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008. 1 (33). С. 93-102.

[20] 同 [13].

[21] 同 [1].

[22] Митько О А. Деревянные огневые приборы в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памятниках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A]. Вестн. Новосиб. гос. ун-та [C]. Сер.: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06. Т. 5; вып. 3: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С. 110-127.

[23] 同 [22].

[24] 同 [22].

[25] 同 [22].

[26] Мыльников В П, Тишкин А А. Футляры-хранилища для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у кочевников гунно-сармат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 Алтае [A].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5. Т. XXI. С. 341-345.

[27] Тишкин А А, Мыльников В П. Деревообработка на Алтае воIIв. дон.э. -Vв.н.э.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памятников Яломан-II и Бош-Туу-I) [М].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2016. 192 с.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Алтая. Вып. 2)

[28] Ибрагимова Р Р. Глиняные фигурки в погребениях эпохи Хань [А].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С].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д-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О РАН, 2013.Т. XIX. С. 198-201.

[29] Смагулов Е А. К изучению мелкой культовой пластики древне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М]. Восхождение к вершинам археологии: Сб. мат-лов междунар. науч. конф. Древние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Алматы, 2014. С. 548-577.

[30]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А].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 М.: Наука, 1988. 456 с.

Wooden Artifacts from the Jiaohe Cemetery in the Turfan Basin, Xinjiang, and Analogies Found in Altay

A. V. Varenov

Abstract: The ancient city of Jiaohe (Yar-Khoto) is located 10 km to the West from the modern city of Turfan in Xin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Chinese chronicles, in Han times Jiaohe was the capital of the Jushi (Gushi) kingdom. During the excavations led in 1993-1994 at the cemetery to the North of the ancient city, two big graves and more than 50 ordinary burials were excavated. Both big and small graves had been plundered; almost no grave good remained. Only some burials gave stray finds. The whole cemetery yielded about 40 wooden artifacts. Chinese archaeologists describe arrows, quivers, knives, wallet-storages, buckles, fasteners, statuettes, vessels and other categories.

They consider the culture of Jiaohe cemetery to be local, belonging to the nobility and common people of Jushi (Gushi). Our analysis of pottery found in Jiaohe burials supports such an opinion. But the attribution of all the graves to Han period is a matter of doubts. A lot of bone and/or antler horse harness equipment from Jiaohe, especially details of saddles have direct analogies in Russian Altai, in frozen tombs of Pazyryk culture, which are dated to the IV century B. C. Many wooden artifacts from Jiaohe also have analogies in Pazyryk culture: wooden models of mirrors with side handle, wooden ribs for soft leather quivers, wooden

models of knives. Turfan wooden vessels are not so well preserved compared to the ones in Pazyryk.

The wooden lighter from Jiaohe M30 burial has no counterparts in Pazyryk culture. Among numerous wooden lighters found in Xinjiang, the closest one to Jiaohe specimen is the item from M3 grave of Subashi (Subeixi) cemetery with two parallel rows of holes, five holes in each row. According to O. A. Mit'ko, in Siberia and Central Asia there existed three historical types of such devices: 1) "Scythian"-with one row of holes, 2) "Xiongnu"-with two rows of holes, 3) "Ancient Turkic"-with numerous holes not arranged in regular rows. Wooden wallet-storages like the ones from Jiaohe were also never met in Pazyryk culture, but are quite common for burrows of Yaloman II burial ground in Altai, which belongs to hunno-sarmatian time (I cent. B. C. -IV cent. A. D.). Flat oval wooden belt buckles, one of which was found M30 burial of Jiaohe cemetery together with wooden lighter, must also belong to that period.

Wooden statuettes from Jiaohe are quite original. They differ from Chinese Han time grave figurines, both wooden and clay, because the latter ones do always have hands and legs. No wooden statuettes were ever met in Altai. In Kazakhstan and Central Asia wood in archaeological sites is poorly preserved because of local climate and soils. But some of the Central Asian sites, which belong to the I century B. C. -IV century A. D. have yielded terracotta or alabaster "idols", closely resembling Jiaohe specimen: short cylinders with the neck and face just marked.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se statuettes were transferred from Western China (i. e. Xinjiang) by Yuezhi or Wusun tribes.

So we may assume that burials of Jiaohe cemetery belong to different periods in tim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grave goods among the graves of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can help us to determine more precisely their ethnic and cultural attribution.

Keywords: Xinjiang; Jiaohe; Grave; Wooden Artifacts; dating

匈奴贵族墓葬结构所受外来文化影响初探*

Г. 额热格金[1] 著　特尔巴依尔[2] 译
（1.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乌兰巴托；
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本文对匈奴贵族墓葬结构与邻近地区汉朝、朝鲜乐浪、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等墓葬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匈奴贵族墓葬的丧葬部分与巴泽雷克墓相近，墓坑结构与汉代贵族墓相似，而封堆不同与上述两个文化。作者认为该类型墓葬主要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墓葬类型。换句话说，墓坑内部丧葬部分相对较传统，而制作墓坑的方法以及墓坑结构出现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墓葬结构。

关键词：匈奴贵族墓；墓葬结构；文化影响；封堆结构；墓坑

分布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根据地表建筑大体可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其中方形石封堆，有带朝南开的墓道（甲字形）、墓室内有木椁和木棺等葬具、随葬遗物相对较多等特点，学界一般把这类匈奴墓葬称之为贵族墓葬。这些贵族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大多来自汉朝、墓葬结构也与中国发掘的汉代墓葬很相似等情况引起了大家极大关注。匈奴自冒顿单于时期开始进攻汉朝北部边境，汉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采取了和亲政策，并每年给匈奴赠送昂贵的物资，这一事情延续到武帝时期。武帝继位之后执行了反匈奴政策，从那时每年停止给匈奴赠送物资。公元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去汉朝寻求帮助之后，汉朝恢复了给匈奴赠送物资。从呼韩邪单于开始，赠送物资的性质变为援助物资。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援助物资的数量到了东汉时期翻了一番。从上述记载可以得出，汉朝从匈奴帝国建立初期至匈奴衰落一直没间断赠送物资。同时《史记》所记载的中行说所说的话中也可以了解到，汉朝的物品深受匈奴高层的喜爱[1]。这些信息说明匈奴贵族墓中出土的汉朝遗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匈奴贵族墓结构与汉朝墓相似的问题，只以匈奴与汉朝之间赠送物品的角度去解释是远远不够。任何民族的丧葬习俗都与该民族的生产方式、习俗及世界观等密不可分，

＊　原论文发表于《考古研究》2010 年第 10 辑，乌兰巴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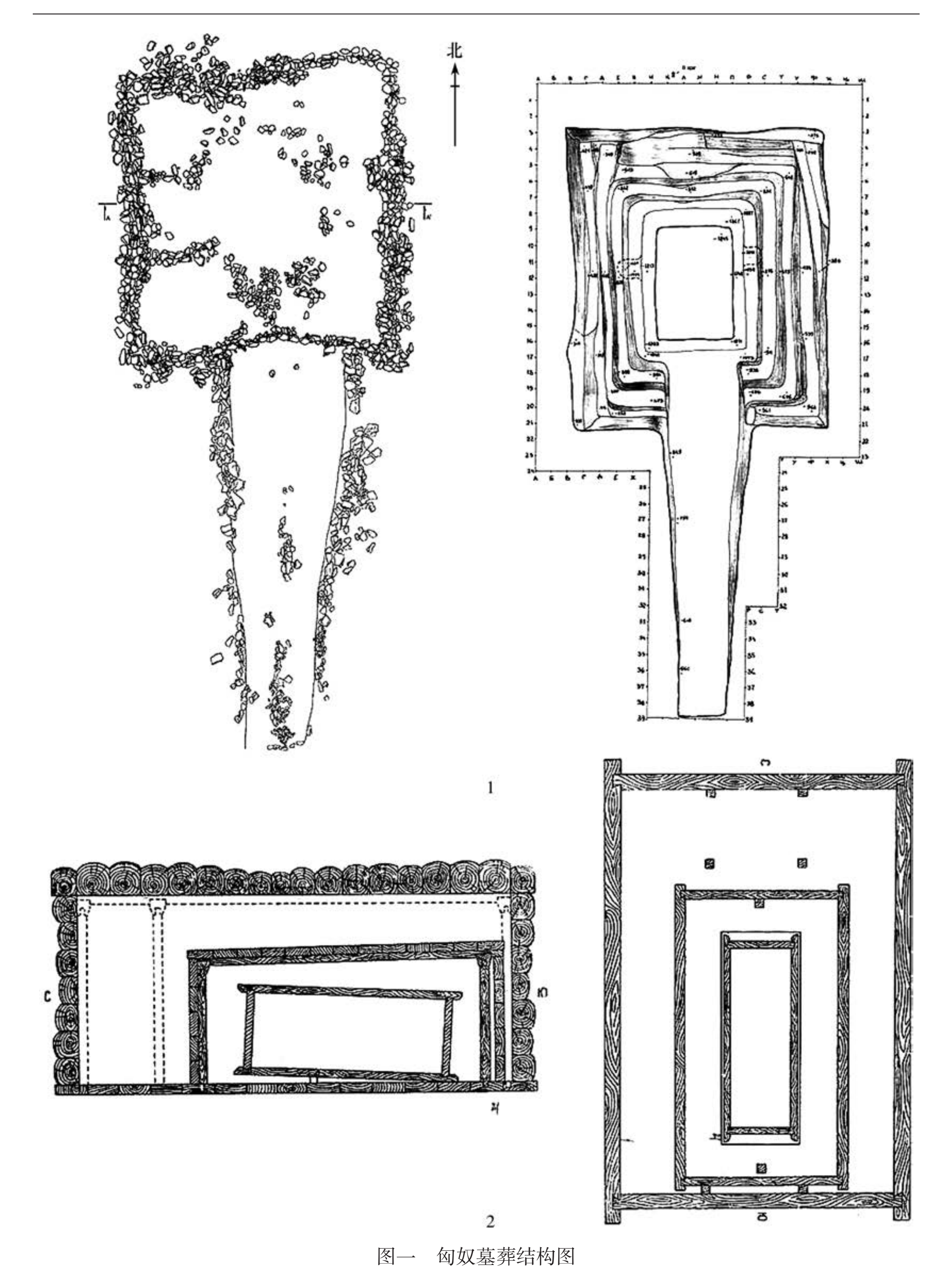
但外来文化的影响能改变墓葬结构是与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有关。发生这一变化可能与政治、经济方面完全依附于其他国家、文化方面受到强烈的影响以及人口迁徙等因素有关。而从匈奴历史来看，不提及南匈奴，我们无法观察到文化方面完全汉化的迹象。因此，分布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贵族墓葬不能归结为汉朝墓葬的复制版。但有些学者认为无法否认匈奴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目前有必要深入研究此问题，探明影响匈奴墓葬的外来文化。近几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匈奴贵族墓葬深受汉朝文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匈奴贵族墓葬作一个梳理和分析，分辨出匈奴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而探讨受外来文化的原因。

一、对匈奴贵族墓结构的认识

地表有墓道及方形石构封堆的大型墓葬通常称之为匈奴上层阶级贵族墓葬。据目前已知的此类墓葬有蒙古国中央省诺彦乌拉[2]、策勒别[3]，后杭盖省高勒毛都[4]、高勒毛都 2 号[5]，肯特省都日勒格那尔苏[6]、博尔布拉格阿木[7]，科布多省塔赫勒特浩图胡尔[8]，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地区与我国（蒙古国）接壤的伊勒门阿木[9]、查拉木[10]等墓地，最近几年，其中的一些墓葬也积极地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根据已发掘的情况看，这些墓葬内外结构方面较为一致，但墓葬大小不一，随葬器物的种类和质量也有差别。作者分辨出墓葬的大小与出土遗物不一致等情况，认为这些现象与墓主的社会地位和职位的高低有关[11]。值得注意的是匈奴贵族墓葬在结构特征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根据墓葬的建筑特点可分为地表石封堆和地下结构等两部分。

（1）地表石封堆：匈奴贵族墓葬在墓地表具有明显的石构封堆。封堆建筑可分为墓室上方地表主封堆建筑和往南延伸出的墓道上方石构建筑等两部分。主结构为方形，正方形石封堆墓墓道上方建筑由北向南变窄，平面呈梯形（图一，1）。主封堆和墓道封堆边用石块围砌 3 ~ 12 层，石墙的高度取决于墓葬的大小。例如，相对较小的都尔勒格纳尔苏 2 号[12]石墙砌 3 层，而较大的高勒毛都 1 号[13]墓石墙砌 12 层，随着封堆石围墙的增高，封堆中部土堆也增高，这一情况一般出现在 20 米以上的大墓。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1 号墓主封堆高 3.7 米，是目前已知墓葬中最高的。但有趣的是，像高勒毛都 20 号墓一样，有些墓葬主封堆和墓道地表建筑中有用石块建的东西走向的几段隔断[14]。对这一现象学者推测为防盗或者某种丧葬习俗有关等种种看法，但目前仍未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据已发掘情况，带墓道的方形主封堆长度小的 6 ~ 8、中等 10 ~ 20、大的 30 余米。除此之外，与高勒毛都 2 号墓地 1 号墓方形主封堆 26 米 × 42 米，墓道长 37.5 米一样尺寸的墓也有。

（2）地下结构：匈奴墓葬地下结构总体可分为墓室与丧葬等两部分。匈奴贵族墓葬墓坑比较深，最浅的墓葬为塔赫勒特浩图胡尔墓地 64 号（5.5 米）[15]，而诺彦乌拉墓地 20 号[16]最深（18.3 米）。造这么深的墓葬，安葬者必须进行周密、细致的设计。从



图一　匈奴墓葬结构图

1. 诺彦乌拉 20 号墓封堆与墓室平面图（引自 H. B. 帕拉斯玛克，E.C. 巴格达诺夫，Д. 策本道尔吉，H. 额尔登 - 傲其尔. 诺言乌拉 20 号墓墓葬形制研究. 欧亚草原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 蒙古国，2008.） 2. 诺彦乌拉 24 号木椁平、剖面图（引自 C.И. 鲁金科. 匈奴文化与诺亚乌拉墓地. 莫斯科 - 列宁格勒，1962.）

诺彦乌拉 20 号和 24 号墓、都日勒格那尔苏墓地 2 号墓情况看，安葬者挖墓坑时为方形，从地表往下缩小、梯形台阶式方法进行挖掘。例如，蒙古与韩国联合项目 2006 ~ 2007 年发掘的都日勒格那尔苏 2 号墓墓坑深 8 米，第一层 10 米 × 8 米，深 2 米；第二层 9 米 × 7 米，深 2 米；第三层 8 米 × 6 米，深 1.5 米；第四层 7 米 × 5 米，深 2.5 米；每层台阶宽 0.5 米，封堆石围墙沿墓坑边垒砌[17]，墓室南部有斜坡墓葬。墓道延伸至墓室的位置与木椁顶部处于同一平面，这给挖墓室时所挖的浮土搬运至墓外以及安葬时搬运葬具和其他遗物提供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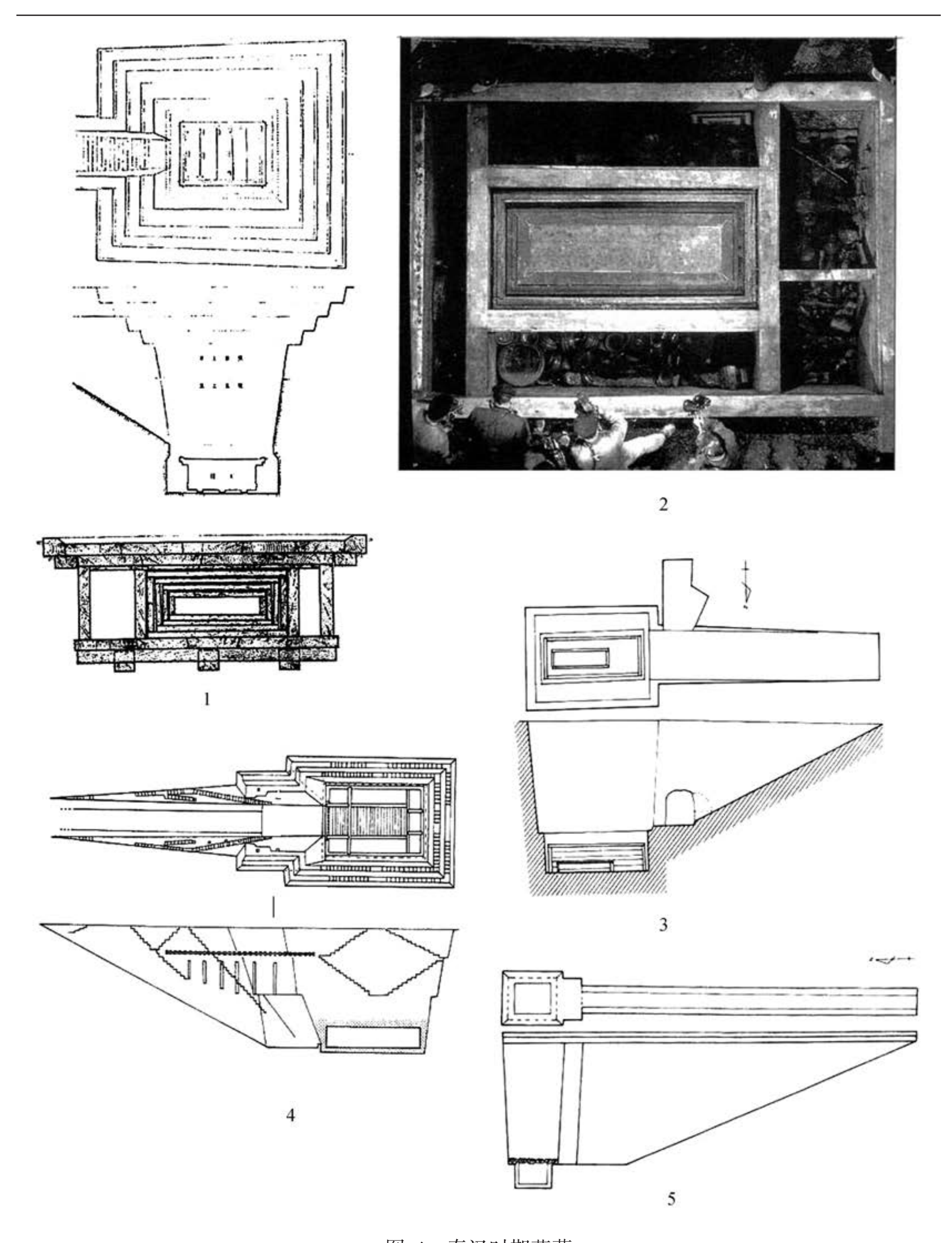
墓底用原木围成方形木椁，底部也平铺有原木，这种木椁分为单层和双层两种。其中单层除内侧木棺外，四壁用木板围成的方形木箱，尺寸相对较小。塔赫勒特浩图胡尔墓地 1、2[18]、64 号[19]，都日勒格那尔苏墓地 2 号墓等都发现了单层相对较小的木椁。塔赫勒特浩图胡尔墓地 64 号木椁尺寸为 2.6 米 × 1.2 米，都日勒格那尔苏墓地 2 号墓木椁尺寸为 3.6 米 × 1.9 米，塔赫勒特浩图胡尔墓地 1 号墓木椁尺寸为 4 米 × 1.8 米等。双层木椁为单层木棺外、木椁外侧再用原木围成双重木椁，同时用原木封顶（图一，2）。例如，诺彦乌拉 6 号墓外层木椁东壁和西壁长 5.34、北壁和南壁长 4 米，每边墙用 7 根大原木垒砌而成，高 1.98 米。外椁顶部用 20 根原木封盖。内椁长 3.3、宽 2.23、高 1.66 米，同时也单独封盖。因内椁紧靠外椁南壁，所以东、西和北侧空出了能够站人的空隙。这一空隙北侧宽 0.98、东侧和西侧宽 0.64 ~ 0.75 米[20]。双重椁一般出现在地表建筑长度大于 20 米的大型墓葬中，诺彦乌拉巴罗丁（Баллодын булш）墓[21]、高勒毛都 20 号墓[22]等墓葬的地表建筑长度大于 30、外椁木壁长 5 米，诺彦乌拉 24 号墓[23]外椁尺寸为 4.1 米 × 2.7 米，属于最小。

二、匈奴贵族墓葬与周边地区墓葬遗存

研究匈奴贵族墓葬的学者都曾提及与匈奴同期周边相似的墓葬遗存，如日本学者梅原（Sueji Umehara）在 1960 年研究诺彦乌拉墓葬的基础上提出匈奴贵族墓葬与汉代墓葬相似的看法[24]。俄罗斯学者 Н.В. 帕罗斯玛克（Полосьмак）2006 年在诺彦乌拉发掘一座墓葬之后认为墓葬地下结构是以汉代方法挖掘而成的，同时怀疑被俘的汉人可能参与过挖墓坑[25]。С.И. 鲁金科（Руденко）研究诺彦乌拉 1 号墓时认为木棺和有些遗物来自汉代，同时提出丧葬与巴泽雷克墓葬相似的看法[26]。С.В. 吉谢列夫（Киселев）、Л. А. 叶甫特尤霍瓦（Евтюхова）、Л.Р. 克孜洛索夫（Кызласов）、К.А. 阿克谢夫（Акишев）、П. Б. 科诺瓦洛夫（Коновалов）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匈奴贵族墓葬除巴泽雷克墓葬外，丧葬部分还与分布在阿尔泰地区的希别、别列勒、卡坦德、塔什提克等墓葬遗存相似[27]。作者曾与朝鲜平壤市附近发现的乐浪木椁墓与匈奴墓进行比较，证实了它们之间无相似之处的同时重点记录了墓葬结构演变时的时间重合现象[28]。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匈奴贵族墓葬的形制特征与周边地区古代墓葬具有某些相似因素，并且大部分学者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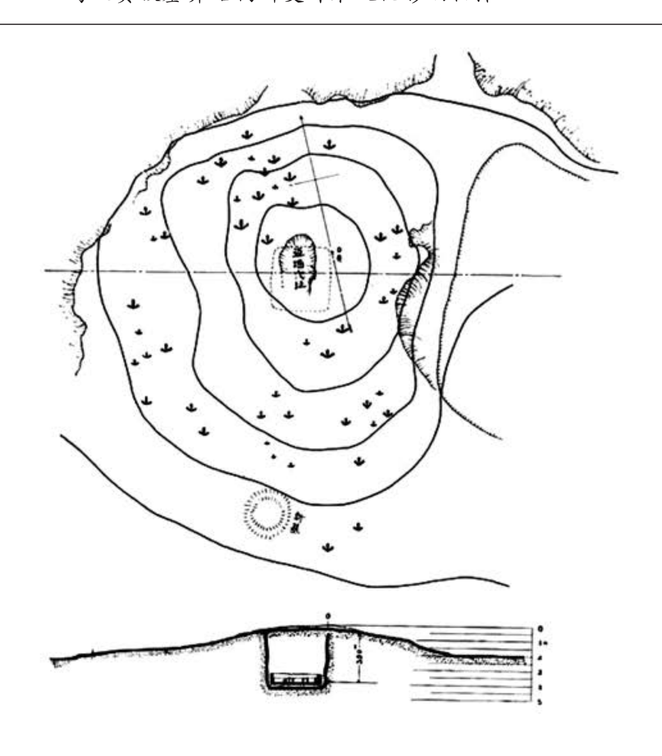
看到了相似性，从未进行过详细、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把匈奴贵族墓葬与汉朝墓葬、朝鲜北部乐浪木椁墓、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葬进行比较研究，分辨出它们之间文化的异同，相信这一研究，能够为辨别影响匈奴墓葬的外来文化因素提供不可或缺的信息。为了便于比较，将墓葬结构分为地表建筑和内部建筑等两种。根据上述分类法，匈奴贵族墓葬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丧葬和墓坑等两部分。其中丧葬部分为原木或大木条围成的单木椁与双重木椁。我们选取汉朝与乐浪墓以及巴泽雷克墓都有类似像木椁一样的木制结构进行比较。对于汉朝墓而言，葬具内部空间分为好几个隔断的情况与匈奴墓有区别。 例如，湖南省长沙市以东 2.5 千米处马王堆墓地 1 号墓椁室长 4.84、高 1.52 米，木椁中部有四层木棺，边框里放满随葬品[29]（图二，2）。根据出土随葬品可以看出，安葬者根据随葬不同性质的随葬品而进行制作木椁。

据黄晓飞的研究，木椁葬具最早兴起于商朝，兴盛于春秋。到了战国，木椁结构出现了改变，秦末汉初木椁内增加隔断，汉朝中期开始木椁内部出现隔断、门、窗等仿造宫殿的形制。公元前 1 世纪末汉朝葬具从封闭式演变为带门道的宫殿形制，墓室从木质演变为砖室，东汉时期普遍使用砖室墓[30]。汉朝墓葬中带隔断的葬具在公元前 2 世纪末基本定型，而匈奴贵族墓公元前 1 世纪末才开始建造，由此看来，它们之间直接或间接影响因素很少。朝鲜发现的乐浪墓外椁内侧一角制作内椁的方法与匈奴贵族墓葬较相似。但匈奴贵族墓双重木椁都是独立的，并各有木底，一般在外椁中部或沿一侧放置，而乐浪墓只有外椁有木底，同时外椁的某一壁向内用木板围成内椁。同时匈奴贵族墓葬只有一座木棺而乐浪墓有两座或两座以上，因此匈奴与乐浪在墓室结构、丧葬习俗上也有不小的差别[31]（图三，2）。与汉朝与乐浪木椁墓相比，分布在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墓的丧葬结构与匈奴墓葬的丧葬结构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巴泽雷克上层贵族墓巴泽雷克 1 号墓、图耶克提斯基 1 号墓[32]等墓都是深挖墓穴，原木制成双重木椁，木椁各自都有木底等情况与匈奴贵族墓高度相似（图四）。外木椁长 6、宽 4、高 2 米，木棺用金薄片修饰，木椁北侧随葬整匹马和马车等[33]。哈萨克斯坦发现的西别墓的深穴、双重木椁、随葬马、墓坑用石块和土层层填埋等情况与匈奴墓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木椁的放置方向不是南北而是东西。同上述一样，匈奴贵族墓葬的丧葬结构而言，明显与汉朝和乐浪木椁墓有着很大的区别，反而与巴泽雷克等分布在阿尔塔地区的游牧及半游牧民族制造的墓葬遗存非常相似，但墓葬结构及其挖掘墓坑的方法完全不同。匈奴墓是从地表向下台阶式挖掘而成，而且南部带有斜坡式墓道。而巴泽雷克等分布在阿尔泰地区的大型墓的墓坑是竖穴土坑、未见斜坡式墓道，墓坑最深 4 米，比起匈奴贵族墓葬而言相对较浅（图四）。比乐浪大的木椁墓的墓坑比匈奴墓较浅，也没挖掘成台阶式，但有些有斜坡墓道。反而汉墓，上述马王堆等西汉中期贵族墓从上往下台阶式挖掘而成深穴，南或某一方向开有斜坡墓道等情况与匈奴贵族非常相似（图二）。中国战国和秦朝时期贵族墓葬深穴、带墓道情况比较普遍，汉代初、中期墓葬也有类似情况，如陕西省山脚、湖北福山汉墓等斜坡式墓道、台阶式墓坑的墓[34]。诸如此类，匈奴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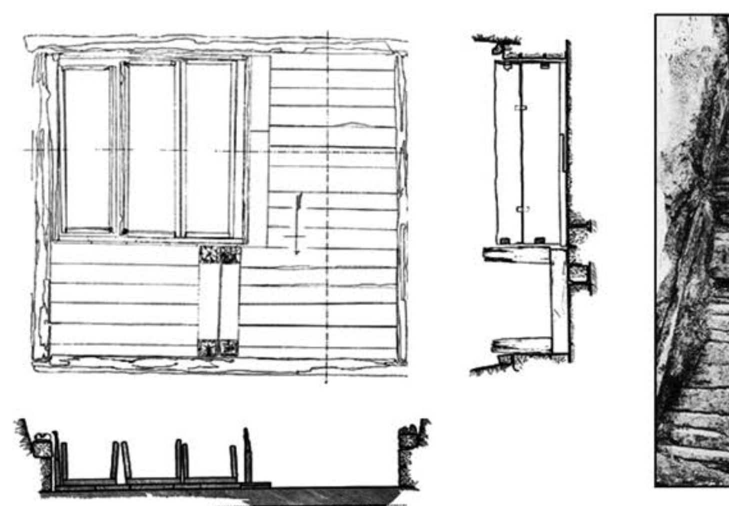


图二　秦汉时期墓葬

1. 马王堆 1 号墓墓室平、剖面图及椁室剖面图　2. 马王堆 1 号墓椁室平面图
3. 秦代砖室墓平、剖面图　4. 西安汉墓　5. 西安 33 号墓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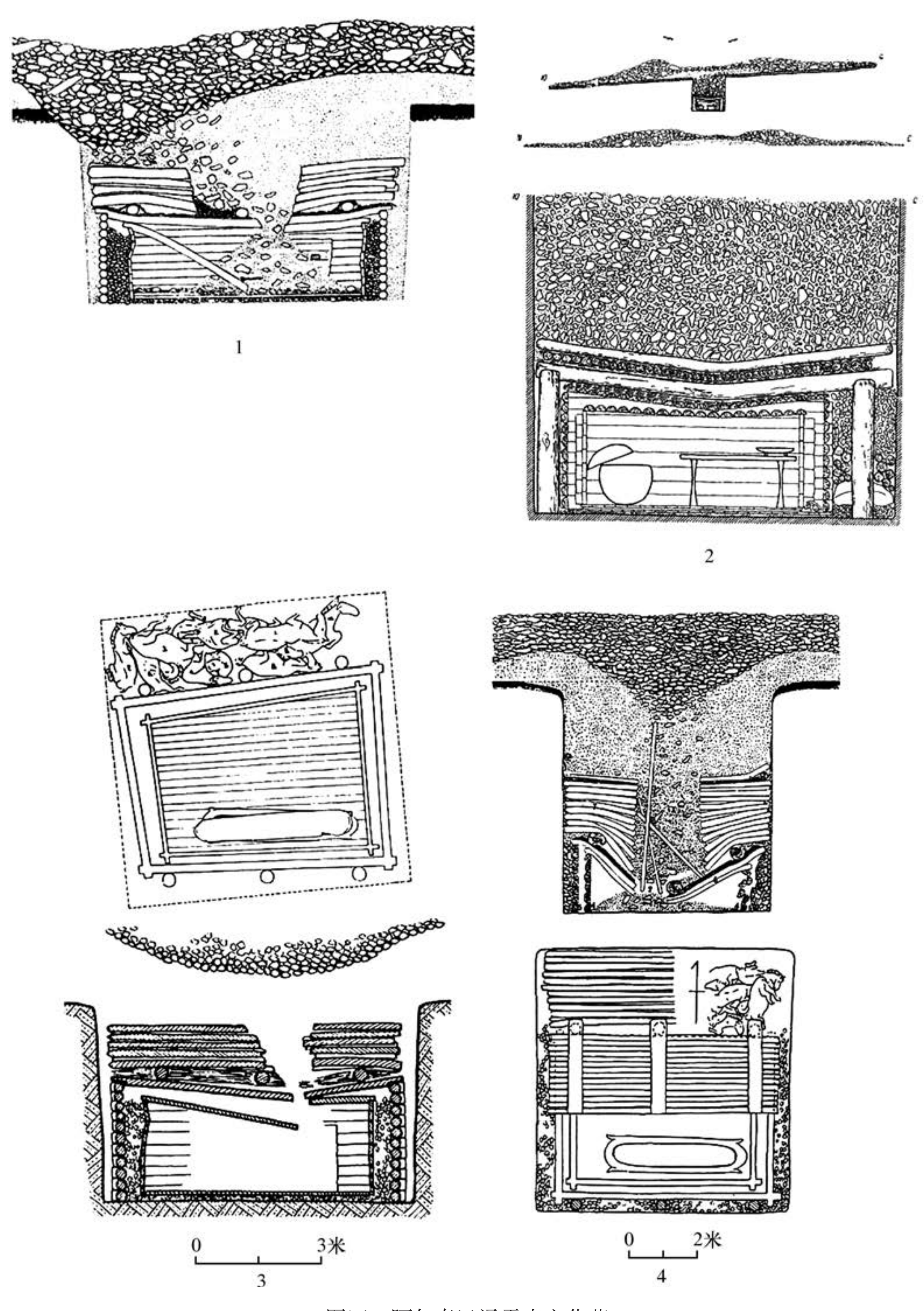




2

图三　乐浪木椁墓

1. 乐浪墓封堆平、剖面图　2. 乐浪木椁墓木椁平、剖面图



图四　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墓

1. 巴泽雷克 1 号墓　2. 图依克斯基库尔干　3. 巴泽雷克 3 号墓　4. 西别墓

（引自 П. Б. 科诺瓦洛夫．苏吉地区匈奴贵族墓葬．乌兰乌德，2008）

墓内部结构或墓坑以及葬具等某些方面与中国汉朝、朝鲜乐浪木椁墓、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墓有着相似之处，而地表封堆与上述各类墓都不同，如汉代墓葬地表具有高大的土堆封堆。该类土封堆初期或西汉时期为方形，到东汉时期逐渐演变成圆形。总而言之，此类墓坑地表堆砌土堆的习俗从春秋时期开始到了战国时期非常普遍。齐、燕、赵、魏、楚等国王公贵族墓都堆有高大的土封堆。秦始皇墓封堆长 350、高 70 米，方形之后的汉朝皇族也传承着墓葬地表堆砌高达封堆的习俗。西汉 11 位皇上的墓葬地表都堆砌有方形高大土堆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东汉时期墓葬地表封堆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封堆基础从方形演变为圆形，从而变成了土丘状[35]。出现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可能与实用和双重防御有关。汉朝墓与匈奴墓葬的区别还有一个特点为土封堆上种植树木，这类不同之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匈奴安葬人时地表不建造高大封堆和种植树木……”[36]。乐浪木椁墓与汉墓一样地表建高大的土封堆，这一点与匈奴墓不同。学者们也支持乐浪木椁墓在汉朝的影响下产生的观点[37]，因此地表建筑高大土封堆直接从汉朝传入乐浪木椁墓是有根据可寻的。分布在蒙古草原南部的中国与朝鲜地区的墓葬地表以土堆砌成高大的封堆（建造封堆的土是专门从其他地区搬运而来），而分布在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墓葬地表用石块堆砌成封堆的习俗。此类用石块堆砌封堆的现象从黑海一直到蒙古高原普遍存在，考古学以“库尔干”一词来命名这类墓葬。学界一般把地表堆砌石封堆的习俗推测为起源于公元前 3 千纪分布在高加索山脉麦阔坡文化，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墓葬地表均有石封堆。例如，巴泽雷克和图耶克提斯基墓圆形石封堆，直径 36 ~ 68 米[38]，阿克 - 阿拉哈 1 号墓[39]封堆直径 18 米。西别墓也有圆形石封堆，直径 45 米。根据阿克 - 阿拉哈墓的发掘，巴泽雷克墓葬在地表建造石封堆时先以墓坑为中心用石块围成圆形石圈，之后内部填满石块。这一点与匈奴墓完全不同。总体而言，阿尔泰地区墓葬地表有圆形石封堆，匈奴墓葬封堆为方形，方形石墙内侧填满土堆，这些土可能是挖墓坑时挖出的浮土，大多数墓葬都未见高大封堆，高出地面而且封堆边有石墙。因此，阿尔泰地区墓葬遗存的地表建筑形制以及建造方法都与匈奴贵族墓葬完全不同（请对比图一和图四）。据匈奴贵族墓葬结构与周边地区同期的汉朝、朝鲜乐浪及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葬进行了比较后，可知墓坑结构与汉朝墓相似，葬具却与巴泽雷克墓更接近，同时地表封堆方面与上述几个地区墓葬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匈奴墓虽然在某些方面受周边地区墓葬文化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它是没复制或受某一文化直接影响下产生。

三、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

最近几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收获了一批新的资料。通过已发掘墓葬的 ^{14}C 数据以及铜镜、漆器等遗物的年代，学者对匈奴贵族墓葬的年代范围界定为公元前 1 世纪末至公元 1 世纪[40]。依据上述年代，匈奴墓葬尤其是涉及上层阶级有关的带墓道的甲字

形大墓，约建于公元前后 100 ~ 150 年。

上述年代与汉文文献进行对照，可对影响匈奴贵族墓葬结构的条件及其主要因素作某种诠释。例如,《史记 · 匈奴列传》里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这是司马迁在公元前 145 ~ 前 85 年（公元前 2 世纪晚期至前 1 世纪初期）或更早时期对匈奴丧葬习俗的记载[41]。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测，带墓道的方形墓出现之前匈奴先民也是用木椁来安葬死者的习俗，而且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的毛庆沟、阿鲁柴登等“匈奴先民”墓葬中发现的棺等葬具再次证明这一点[42]。墓葬中使用棺椁进行安葬的习俗公元前 1 千纪初中期就普遍出现于游牧民族丧葬习俗中，乌布苏省乌兰固木市附近的昌德曼山发现的青铜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就是有力证据[43]。因此，匈奴贵族丧葬习俗与汉朝不同，反而与年代较早的巴泽雷克墓葬相似，这些相似的因素可证明，匈奴的丧葬习俗是传承了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非是受汉朝丧葬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而对于匈奴贵族墓的墓坑结构及其制作方法受汉朝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能不否认有些学者所揣测的墓坑是被俘的汉人挖的可能性[44]。但他们也注意到，为什么匈奴人在公元前后开始制作这种类型墓葬。

我们先看匈奴集团内部情况，根据汉文文献所记载，公元前 1 世纪中期，呼韩邪单于和称为郅支单于的兄弟开始争夺单于位，在单于权力争夺中呼韩邪单于大败，实力被削弱，逃脱至汉朝求助。得到汉朝帮助的呼韩邪单于把郅支单于赶到西部，夺取了匈奴驻地。也从此时开始匈奴和汉朝关系缓和，从汉地往北大量涌入珍贵物品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解释为随着传入匈奴地区的汉朝遗物的增多，墓葬里随葬遗物的数量发生了变化。但将此归结于影响墓葬形制尤其是墓坑结构的主要原因，应存在疑问。有趣的是朝鲜乐浪木椁墓的尺寸以及随葬遗物，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出现变化。乐浪当时处于汉朝的军事统辖范围，匈奴也同样在他们的统辖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乐浪和匈奴墓出现演变与汉朝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发生了王莽取代汉朝建立新政权事件，王莽时期对管辖范围内的附属国以及匈奴实行了新政策，使得很多附属国家和民族反对王莽的新政策。例如，匈奴又开始侵扰汉朝北部边境，王莽为了解除匈奴的侵扰筹备 30 万大军[45]，同时乐浪地区在王邹的带领下反对王莽新政策，与汉朝脱离了六年[46]。东汉建立之后光武帝格外注意与附属国的关系，为了缓和关系，向附属国贵族赠送大量物资，以及不惧吝啬地授予称号（《后汉书》中有详细记载）。这可能是从公元前后的匈奴与乐浪墓中出土大量汉朝遗物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原因无法改变墓葬结构。从上述信息可知，东汉初期对周边地区未能实行强有力的治理或该地区的统治机构崩溃，导致匈奴又开始侵扰汉朝北部边境以及乐浪君之乱的发生。东汉时期对边疆地区管理松散给边疆地区的部落首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又或许社会地位的升高影响了他们墓葬结构，匈奴和乐浪地区的上层贵族因为模仿汉朝贵族建造了高大的墓葬并随葬了大量的贵重遗物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以上述猜想来解释匈奴贵族墓葬结构突然出现变化是毋庸置疑，但匈奴墓葬的形制与台阶式挖掘的方法确实比较实用。文献

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信息，可以证实这一点。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用俄文翻译的汉文文献中记载到“乌桓人盗掘匈奴单于墓葬”等信息，发生这一事情的时间也比较明显，即公元前 76 年[47]。之后学者 Н. 伊西贾木茨（Ишжамц）比较详细地识读了此信息，即“乌桓人盗掘了位于阴山的头曼单于之前的单于墓葬”[48]。匈奴从公元前 2 世纪或汉武帝时期由于武帝的反击退回到漠北地区，乌桓、鲜卑等族群向西南迁徙至匈奴原驻地鄂尔多斯及其河套地区。这时期乌桓人群才有机会盗掘分布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单于墓。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如乌桓人盗掘匈奴墓是侮辱和践踏匈奴人，这种情况迫使匈奴人寻求防盗的办法。防盗最有效的办法有深挖墓穴、寻找沙地建造墓葬（大多数匈奴贵族墓安葬在沙地）等。鄂尔多斯发现的南匈奴墓葬中未发现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匈奴贵族墓一样的大型墓。由此推断，带墓道的大型墓是匈奴退回漠北之后建造的。与之前的方形石板墓比较而言，匈奴墓坑如此之深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在于防盗。挖掘如此之深的墓穴（诺彦乌拉 20 号墓深 18.3、高勒毛都 20 号墓深 17.5 米）较高的方法和技术。匈奴墓葬的墓坑是有经验和技术的技术人员精心挖掘而成，因此文献中所记载的那样，建造匈奴贵族墓葬首选人员就是被俘或融入匈奴的汉人。汉人墓葬传统中挖掘台阶式深穴墓坑时需墓道，因此建造匈奴中可能汉人也参与过。

现回顾一下，为什么匈奴贵族墓葬地表建与其他墓不同的石构封堆。诺彦乌拉、高勒毛都、都尔勒格那日苏、博尔布鲁根阿木等地区分布的贵族墓地很明显凸出地表，建凸字形石墙封堆。少数墓葬地表封堆石墙内部有石条隔断，而大多数墓葬封堆石墙内侧无石条，使得大多数墓葬封堆中向下凹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现象当然不是初建墓葬发生而是后期或盗墓者所为，而且墓葬封堆高出地面一点点，很明显用建造墓坑时挖出的浮土来填埋。因此，贵族墓葬的封堆基本可以称为石墙围城的土堆，同时前辈们把贵族墓葬的封堆称为“石墙”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根据发掘，我们了解到匈奴墓葬的石围或石墙是沿着墓坑边进行堆砌围成的，同时封堆的形制和大小与墓坑形制及大小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匈奴平民墓葬的圆形石封堆中部无石堆，一般学者认为与盗墓有关。但未被盗掘的墓葬封堆中部同样也没有石堆，因此这一现象与盗墓者无关，而建造墓葬时堆成圆环形封堆，封堆中部无石堆。根据已发掘的情况，平民墓葬的墓坑一般为椭圆形竖穴土坑，封堆沿着墓坑边围成[49]。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贵族墓葬与平民墓葬的地表封堆的制作方法比较相似，换句话说，带墓道的方形贵族墓和圆形平民墓以挖掘墓坑时挖出的浮土来填埋，地表石墙或石圈封堆也是沿墓坑边堆砌而成，而墓坑呈椭圆形和方形，方形墓坑有墓道，所以地表石堆也不同。因此，可以推测，匈奴贵族墓葬的地表建筑继承了传统，未被外来文化影响。

四、结　　语

匈奴贵族墓葬与同时期周边地区中国汉代、乐浪地区与阿尔泰巴泽雷克墓葬进行比

较研究后，可以得出墓葬结构方面与汉代墓葬相似，葬俗与阿尔泰巴泽雷克墓葬相近而地表封堆建筑却与上述三个地区的墓葬封堆相异的结论。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早期墓葬中也有木椁，因此不能把匈奴墓葬中用木椁葬具的习俗，认为是受巴泽雷克文化的影响，巴泽雷克与匈奴早期遗存的年代虽然相同，但墓中有木椁葬具是古代所有游牧民族的传统。

深挖墓穴及修建墓道的墓室结构在之前的游牧遗存中从未有过，只有在南方民族的遗存中才有这种结构的遗存。由此可见，匈奴贵族墓葬是利用汉代建筑方法建造的可能性最高。汉文文献及建造墓葬的时间可以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史记》有公元前 76 年乌桓人盗掘匈奴贵族墓葬的记载，同时分布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贵族墓葬的年代显示为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因此，建造如此深的墓葬，主要目的可能与防盗有关。鄂尔多斯发现的南匈奴墓葬中虽然有木椁，但墓穴没那么深，这些现象再次证明了我们的推测。贵族墓葬的封堆应该是随着内部结构的演变而出现。总之，匈奴贵族墓葬的结构特点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传统和外来文化融合的结果。

注　释

［1］ Г Сүхбаатар.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эртний өвө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0. т. 31.

［2］ a. Ц Доржсүрэн. Умард Хүннү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1.

b.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ские курганы [M].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62.

c.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Н Батболд, Н Эрдэнэ- Очир, М Цэнгэл. Ноён уулын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20-р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4, дэвтэр 20.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3］ Н Сэр-Оджав. Монгол-Унгарын хамтарсан эртний судлалы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лын тухай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 дэвтэр 3,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3.

［4］ Ч Ерөөл-Эрдэнэ, Ж Гантулга.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нэгэ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6, дэвтэр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8.

［5］ Bryan K. Miller, Francis Allard, Diimaajav Erdenebaatar, Christine Lee. A Xiongnu Tomb Complex: Excavations at Gol Mod 2 cemetery [J]. Mongolia(2002-2005). Mongo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2, Ulaanbaatar, 2006.

［6］ Г Эрэгзэн, Н Батболд, Д Базаргүр, П Алдармөнх, Жан Өнжон, Хуанбо Чансо. Дуурлиг нарсны Хүннү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о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7］ Мон-Сол төслийн 2002-2004 оны судалгааны үр дүн [R]. Сөүл, 2004.

［8］ a. Д Наваан. Хүннүгийн өв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9.

b. Ж Баярсайхан, Ц Эгиймаа. Тахилтын хотгорын 64-р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үр дүн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ои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9］ П Б Коновалов. Усыпальница хуннского князя в Суджи [M]. Улан-Удэ. 2008.

[10] С С Миняев, Л М Сахаровская. Элитний комплекс захоронений сюнну в пади Царам [J].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 1, Москва, 2007.

[11] 에렉젠 (Г. Эрэгзэн). 몽골 흉노 무덤 연구 (Монголын Хүннү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D].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Сөүлийн Үндэсний их сургууль, Докторын зэрэг горилсон бүтээл). 2009, 177. т.

[12] Г Эрэгзэн. Монголын Хүннү булшийг хэлбэрээр ангилах нь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4. Дэвтэр 16.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227.

[13] Д Эрдэнэбаатар, Ч Ерөөл-Эрдэнэ, Н Батболд, А Францсис, Б Миллер.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Түүхийн сэтгүүл, Боть 3, Дэвтэр 3. УБ, 2002 . т. 21.

[14] Ч Ерөөл-Эрдэнэ, Ж Гантулга.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нэгэ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6, дэвтэр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8, т. 150.

[15] Ж Баярсайхан, Ц Эгиймаа. Тахилтын хотгорын 64-р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үр дүн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ои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M]. Сөүл. 2008. т. 188.

[16]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Н Батболд, Н Эрдэнэ- Очир, М Цэнгэл. Ноён уулын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20-р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4, дэвтэр 20.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т. 290.

[17] Г Эрэгзэн, Н Батболд, Д Базаргүр, П Алдармөнх, Жан Өнжон, Хуанбо Чансо. Дуурлиг нарсны Хүннү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A].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о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т. 158.

[18] Д Наваан. Хүннүгийн өв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9.

[19] Ж Баярсайхан, Ц Эгиймаа. Тахилтын хотгорын 64-р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үр дүн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ои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M]. Сөүл. 2008.

[20]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ские курганы [M].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2, с. 19.

[21] a. Ц Доржсүрэн. Умард Хүннү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1.
b.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ские курганы [M].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62.

[22] Ч Ерөөл-Эрдэнэ, Ж Гантулга.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нэгэн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6, дэвтэр 9,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8.

[23] Ц Доржсүрэн. Умард Хүннү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1.

[24] Sueji Umehara. Studies of Noin-Ula finds in North Mongolia [M]. The Toyobunko. Tokyo1960, 19.

[25] 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Е С Богданов,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Н Эрдэнэ-Очир. Изучение погребального сооружения кургана 20 в Ноин-уле /Монголия/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 /34/, 2008. с. 85-87.

[26]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Хуннов и Ноинулские курганы [M].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2. с. 35.

[27] П Б Коновалов. Усыпальница хуннского князя в Суджи [M]. Улан-Удэ. 2008, 37-40. с.

[28] Г Эрэгзэн. Хүннү ба Наннаны булш. Талын эзэ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ио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т. 82.

[29] 辛勇旻 (Шин Юн мин). 漢代木槨墓研究 (Хангийн үеийн модон хашлагат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M]. 학연문화사 . 2000. т. 108.

［30］ Хуан Сяо фен. Хангийн булш ба Хүннүгийн соёл, талын ээз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и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т. 239-240.

［31］ Г Эрэгзэн. Хүннү ба Наннаны булш. Талын ээз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ио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т. 70.

［32］ П Б Коновалов. Усыпальница хуннского князя в Суджи [M]. Улан-Удэ, 2008, 38. с.

［33］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0. с. 98-101.

［34］ 黄晓芬 (Хуан Сяо фен). 한대의 무덤과 그 제사의 기원 (Хангийн булш ба тахилын үүсэл гарал) [J]. 학연문화사 . 2006. т. 87.

［35］ Хуан Сяо фен. Хангийн булш ба Хүннүгийн соёл, талын ээзнт гүрэн-Хүннү симпизимын эмхэтгэл [C]. Сөүл. 2008. т. 244.

［36］ Г Сүхбаатар.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эртний өвөг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0. т. 135.

［37］ The Ancient Culture of Nangnang [J].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2001.

［38］ С И Руденко. Культ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Алтая в 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M].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60. с. 96.

［39］ 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Всадники Укока. Инфолио-пресс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1. 44. с.

［40］ a. П Б Коновалов. Усыпальница хуннского князя в Суджи [M]. Улан-Удэ, 2008, с. 53, 54.

b. 에렉젠 (Г. Эрэгзэн). 몽골 흉노 무덤 연구 (Монголын Хүннү булшны судалгаа) [D].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Сөүлийн Үндэсний их сургууль, Докторын зэрэг горилсон бүтээл), 2009. т. 200

c. Ч Ерөөл-Эрдэнэ. Хүннүгийн язгууртны оршуулгын дурсгалын судалгаа (Гол модны оршуулгын дурсгалт газрын хэрэглэгдэхүүнээр) [D]. Докторын зэрэг горилсон бүтэ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т. 200.

［41］ Я Ганбаатар. Хүннүгийн түүх,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2008. т. 46.

［42］ Maoqinggou. Ein eisenzeitliches Graberfeld in der Ordos-Region (Innere Mongolei) [M]. KAVA, Bonn, 1992. 8.

［43］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Чандманы соёл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44］ Н В Полосьмак, Е С Богданов, Д Цэвээндорж, Н Эрдэнэ-Очир. Изучение погребального сооружения кургана 20 в Ноин-уле /Монголия/ [J].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2 /34/, 2008. т. 85-87.

［45］ Ц Доржсүрэн. Умард Хүннү [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1. т. 92.

［46］ 오영찬 (У Ён чан). 낙랑군 연구 (Наннаны тойр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M]. 사계절 , 2006. 159, 160.

［47］ Н Я Бичу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C]. Т. , I,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0. с. 79.

［48］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үүх [M]. Тэргүүн боть.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 т. 211.

［49］ Г Эрэгзэн. Монголын Хүннү булшийг хэлбэрээр ангилах нь [J].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лал. боть 24. Дэвтэр 16.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7, 231.

Exploring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of Xiongnu/Hun Noble Tombs

Eregzen Gelegdorj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lite burial structures of the Xiongnu and the Han Dynasty tombs in Lelang, Korea, and the tombs in Pazyryk, Altai. Elite tombs of the Xiongnu/Hun noble are similar to the Pazyryk tombs. While their structur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an noble tombs, the enclosure in Han Dynasty tomb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wo cultures mentioned abov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type of tomb is a new type of tomb based on the mutu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In other words, the internal part of the grave pit is relatively traditional, and the method of making the grave pit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grave pit have changed, and a new form of burial has emerged.

Keywords: Hun noble tombs; Tomb structure; Cultural influence; Sealing structure; Tomb pit

鄂尔浑省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奥德巴特尔[1]著　特尔巴依尔[2]译

（1. 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乌兰巴托；2.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介绍了在蒙古国中北部鄂尔浑省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的考古发掘情况。2014～2018 年在此墓地共发掘 16 座墓葬。根据墓葬出土遗物、丧葬习俗和 ^{14}C 测年数据等研究结果，初步认定该墓地为 1～4 世纪初期鲜卑人群有关。通过考古发掘该墓地与中国内蒙古地区鲜卑时期墓葬相似，同时与蒙古国发掘的匈奴墓葬及其出土遗物也有一定的相似因素。根据墓葬的地表建筑，地表建“凸”字形带有斜墓道的洞室墓为贵族墓，圆形石圈墓为平民墓葬，两种类型墓葬同时还保留了匈奴墓葬的一些形制特征。

关键词：蒙古国；鄂尔浑省；匈奴－鲜卑墓；内蒙古；鲜卑墓葬；贵族墓葬；带墓道的洞室墓；竖穴土坑竖洞室墓；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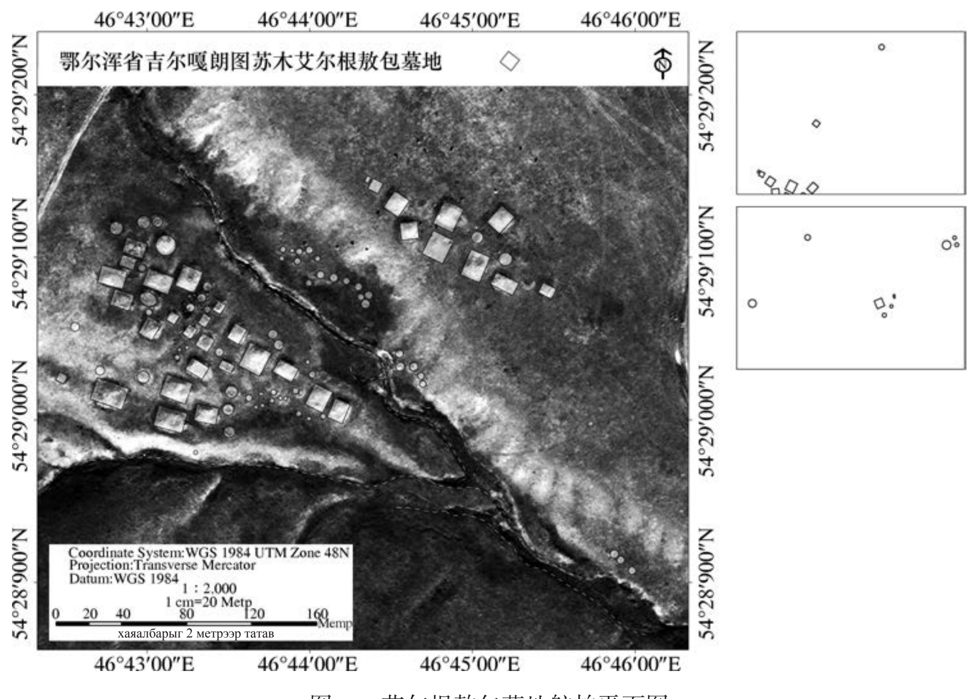
1 世纪晚期至 5 世纪初期鲜卑接替匈奴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中国北部等地区分布着他们的历史文化遗存。1930 年日本学者开始对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研究，自 20 世纪中期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北部地区鲜卑遗存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并收获了大量关于鲜卑人群丧葬习俗有关的实物资料[1]。中国学者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对鲜卑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了较成熟的见解，但这些研究成果仍然不能对鲜卑时期历史文化遗存的研究画上圆满的句号。

丧葬习俗的研究本身是探明墓主本身的基础性研究，这些材料反映的不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宗教、民族成分、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程度等方面的情况。探究北魏、拓跋、乌桓、慕容（Муюн）等鲜卑族群的文化、丧葬特

* 蒙古国物质文化普查队首次发现并进行记录时用墓葬北部最高山峰命名为“艾尔根高卓古尔”，其实当地牧民却命名为“艾尔根敖包”，因为墓地北部最高峰顶部有敖包，2018 年 7 月中国人民大学与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发掘时用当地牧民的名称把墓地名改为“艾尔根敖包墓地”。

点及其差异、游牧与定居、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其中汉文化的影响等问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

自 2014 年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蒙古国鄂尔浑省吉尔嘎楞图苏木艾尔根敖包[2]发现与鲜卑有关的墓葬遗存并考古发掘至今[3]（图一）。除上述遗存外，蒙古地区还发现鲜卑同期的其他遗存，如蒙古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Ч. 阿穆尔图布新（Амартүвшин）博士等考古学家在南戈壁省汗博格达苏木巴音巴格地区布兰托热木发掘了 1 座墓葬[4]、2015 ~ 2016 年 Ц. 特尔巴图（Төрбат）博士等在巴彦乌列盖省诺干淖尔苏木布尔古苏台高勒发掘的墓葬[5]、2017 年 Н. 巴图宝勒德（Батболд）博士在巴彦乌列盖省西博特海尔汗山发掘的墓葬的年代显示为鲜卑时期[6]等，这些遗存的考古发掘均为探究蒙古地区鲜卑时期葬俗的基础性工作。



图一 艾尔根敖包墓地航拍平面图

2014 ~ 2018 年艾尔根敖包墓地记录备案的共计 110 余座墓葬，其中发掘了 16 座墓葬。根据墓葬的地表建筑形制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带墓道的洞室大墓。这类墓葬可以说是属于贵族或富裕人的墓葬，地表用石块垒砌方形石墙，其中心填土形成土石混合封堆，墓道大多往东南开，也有东或东北开的现象。这类墓葬占整个墓地的 30%。

（2）圆形石圈墓。这类墓葬基本与匈奴平民墓葬类似。唯一区别于匈奴平民墓葬的是内部结构，其竖穴竖洞室或竖穴偏洞室。这类墓葬占整个墓地的 70%。

一、艾尔根敖包墓地墓葬建筑结构的特点

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与鲜卑有关的墓葬，反映地表建筑结构情况的材料很少，而且这些墓葬大多是耕种时发现的，因此地表没有显示明显的封堆建筑，反而相对小的墓葬地表有石封堆的情况较多见。因此，我认为鲜卑人不建造墓葬封堆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与分布地区的地质结构和是否有石块有关；第二，为了防盗；第三，与鲜卑人群的结构差异、墓葬形制的演变和历史发展的早晚关系有关。

通过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能够全面了解地表封堆结构的有利条件。大型墓葬的封堆外围建造防水环壕的情况相对于其他时期的墓葬来说是比较新颖的。与鲜卑墓葬时代较近的匈奴墓葬中不见防水设施，建造防水环壕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雨水进入洞室，未观察到地表建造方形石墙内填满封堆土时夯筑和顶部用石块覆盖的现象。2018年发掘的AГ40号墓葬方形石墙南墙中部向东南凸出的石构建筑，封堆平面整体呈凸字形[7]。这种形制的封堆与匈奴墓葬的封堆结构较相似可以判断为匈奴影响的结果，从未发掘的其他大型墓葬地表凸出的封堆情况看，这类墓葬受匈奴的影响较多。建造石墙时为了美观尽量选取方形石块或石块的平面朝外进行垒砌。根据死者的社会地位和职务建造大小不同的封堆、进入洞室的长墓道，墓道的方向不一致，大多朝向东南但也有东或东北向的现象。方向的不同与建造的年代的不同和鲜卑人群部落的异同有一定的关系。小型墓葬明显受匈奴影响比较大，艾尔根敖包墓地圆形石圈墓地表封堆而言与匈奴平民墓没什么差别。因此，有些学者提出过艾尔根敖包墓地大体为匈奴时期的看法[8]。

带墓道的墓的建造方式是在墓道尽头深挖洞室。墓道为直壁斜道，未建造台阶，洞室口处为墓道最深处。此处土质结构比较特殊主要以夹砂黏土为主，适合建造墓道和洞室，不易坍塌。洞室内部尺寸方面各不相同，由地表封堆建筑大小而定。大体为长方形，直壁弓形顶。目前发掘的墓葬中只有AГ07号墓的洞室为圆形，洞室口用大型石板封闭。

大多数墓葬早年被盗，洞室口的封门石向外坍塌破坏原貌，但AГ02号墓洞室口封门石用大型石板进行封闭，AГ89号墓洞室口用小石块垒砌两层进行封闭（图二）。艾尔根敖包墓地小型石圈墓墓室结构为竖穴土坑，但有些为竖穴偏洞室或竖穴竖洞室，这点与匈奴墓葬不同。匈奴墓葬中墓室内北侧或者人骨头顶部一般有小龛（小头箱）放置祭祀贡品，而艾尔根敖包墓地墓葬的特点是竖穴墓坑内直接挖出洞室进行安葬。此类洞室墓根据内部结构特点可分为以下三种。

（1）带墓道的竖洞室墓或竖穴竖洞室墓。带墓道的竖洞室为在墓道尽头挖出弓形顶长方形洞室；竖穴竖洞室为竖穴土坑一头挖出弓形顶长方形洞室。目前发掘的此类墓葬有AГ02（图三）、AГ11、AГ40、AГ89、AГ93号等墓。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此类墓葬的年代为鲜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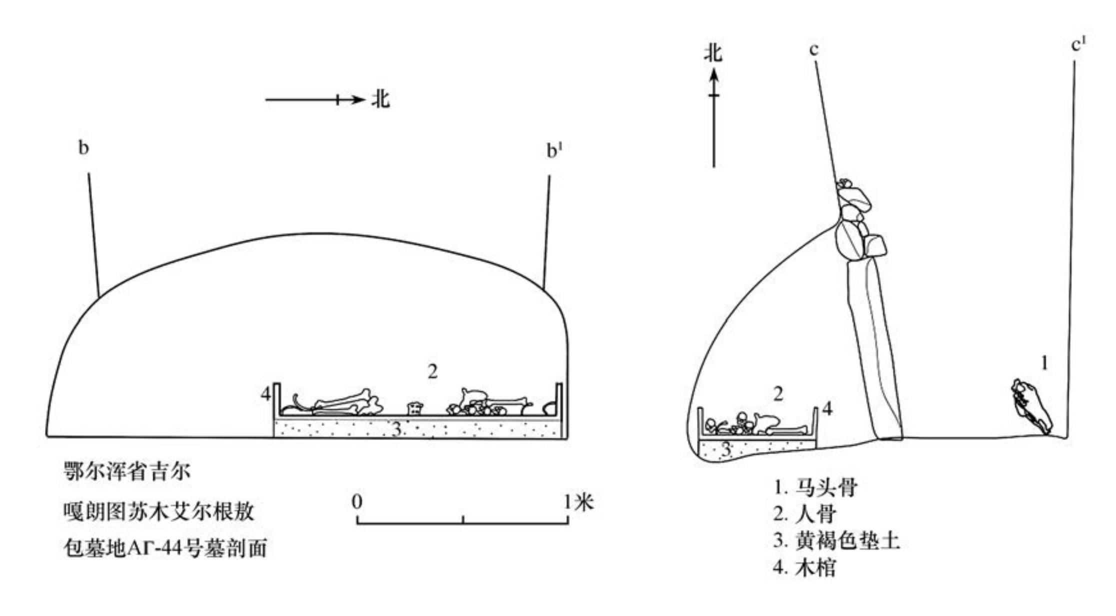


图二　AГ89 号墓洞室封门石



图三　AГ02 号墓洞室内木棺

（2）竖穴横洞室。挖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在长边侧壁挖出横洞室，此类墓葬继续可以分为横洞室和微横洞室等两种亚类。目前发掘的墓葬中 AГ44 号墓为横洞室墓（图四），而 AГ53 号墓为微横洞室墓（图五）。



图四　AГ44 号墓洞室剖面图



图五　AГ53 号墓偏室墓

（3）竖穴土坑。匈奴平民墓葬中挖出竖穴土坑，墓室内木棺具头部外侧挖出小龛放置贡品和祭祀品，艾尔根敖包墓地的竖穴土坑墓与此类墓一致。目前发现的墓葬中 AΓ01（图六）和 AΓ76 号墓为竖穴土坑墓。之所以制作方形洞室有利于洞室的空间可容纳多个个体，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鲜卑时期墓葬既有洞室墓也有不少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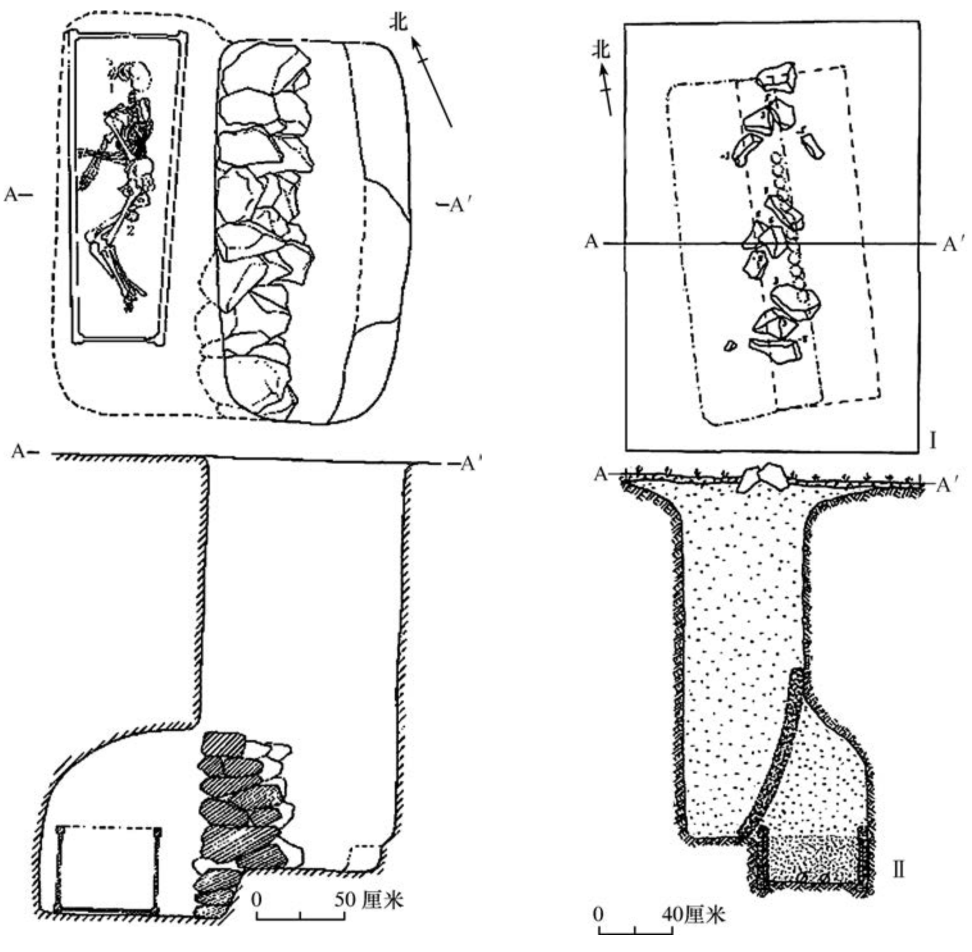


图六　AΓ01 号竖穴土坑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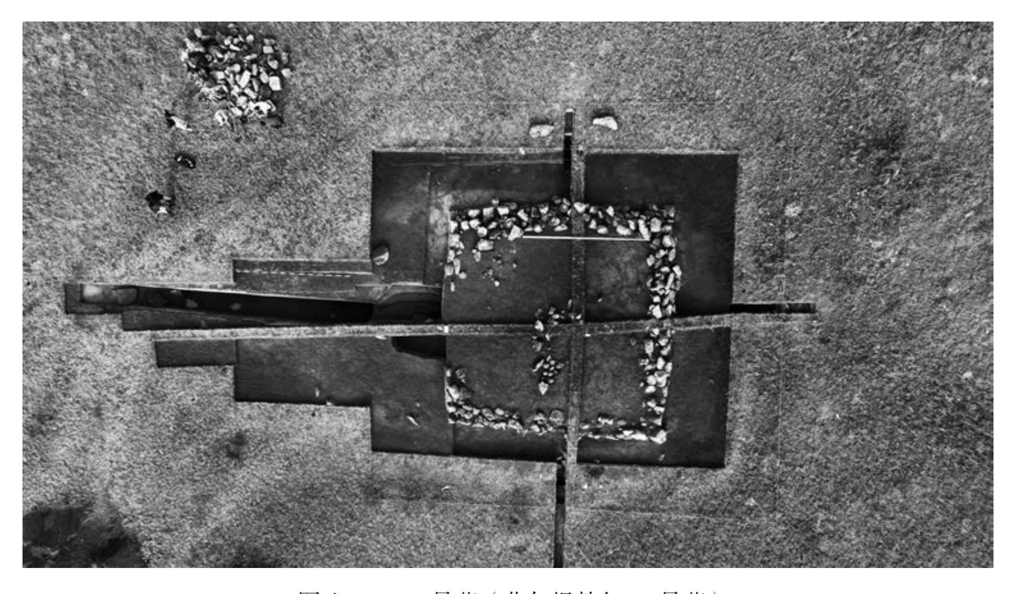
二、丧葬习俗

内蒙古地区发掘的大多数墓葬为仰身直肢，头朝北，此类现象在艾尔根敖包墓地占大多数，但少数也有西北或东北向的墓葬。墓葬中不分性别及年龄均有木棺具，墓室内安葬多具个体时也是各有各的棺具。目前发掘的 16 座墓葬中都发现了木棺及其残块，棺具大多为棺底或棺盖，但 AΓ44 号墓棺具没有棺底和棺盖，棺底平铺白色黏土。同时 AΓ07 号墓中的双棺中东侧棺具未见棺底。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 ZQM6 和 ZQM7 出土了两具精心修制的棺具（图七）[9]。ZQM7 的棺具棺底板头部和脚部都有木轮，管体上宽下窄，头端高阔前倾，足端低窄垂直。艾尔根敖包墓地出土棺具的头和足端只有 1 ~ 2 厘米的小差距，但也有很多相似性，同时棺具头端和足端的高度也有较小的差异。

艾尔根敖包墓地 AΓ86（图八 ~ 图一〇）和 AΓ89 号（图一一）墓的棺具用丝绸进行包裹。棺板之间凿出凹槽，以镶插而成，目前还未发现用铁钉固定的痕迹，侧板、棺底和棺盖板之间明显用银锭形明榫连接，同时据目前的情况，仅在 AΓ86 号洞室墓发现了木椁（图一二）和木棺。原墓木椁有木底和盖，可惜木盖早年被盗墓者破坏。内蒙古完工墓地发



图七　内蒙古察右旗七郎山墓地 ZQM16，俄罗斯赤塔州卓尔勒格 1 号墓地 41 号墓



图八　АГ86 号墓（艾尔根敖包 86 号墓）



图九　АГ86 号墓墓道



图一〇　АГ86 号墓洞室墓棺椁



图一一　AГ89 号墓洞室与木棺



图一二　AГ86 号墓木椁

掘的鲜卑墓葬中发现了双人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完工墓地 M1B 墓中发现 20 具人骨，拉布大林发掘的 24 座墓中单人葬 15 座、双人合葬 3 座、2 座为夫妻合葬墓[10]。艾尔根敖包墓地 2014～2018 年发掘的 16 座墓葬中共计发现 17 具个体，其中 9 座为单人葬，2 座为双人葬（AΓ07 号墓、AΓ53 号墓），1 座为 3 人合葬（AΓ11 号墓）（图一三、图一四）。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AΓ53 号墓中除了两具个体外还发现第三具人骨的下颌骨，最终解释为后进入墓葬的结论。理由是除了两具木棺和两具人骨外第三具人骨下颌骨外，未发现其他骨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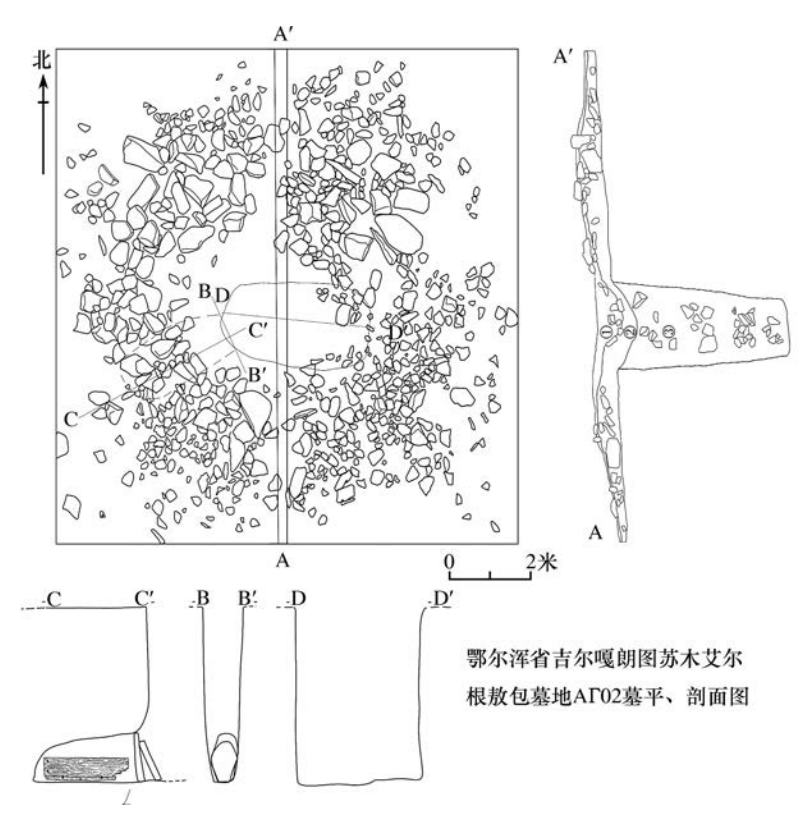
内蒙古地区发掘的拉布大林、扎赉淖尔、完工、孟根楚鲁墓地发掘的墓葬中有随葬牛、马和小型牲畜的现象，这些动物骨骼大多放置在死者的头部。艾尔根敖包墓地发掘的 AΓ02 号墓未被盗掘，根据发掘情况可知，洞室封门石外墓道东侧朝东北向放置马的头骨，墓室内人骨胸部左侧随葬陶器、小型动物骨骼和肋骨，说明早期拓跋鲜卑人群有用动物骨骼进行殉葬的习俗（图一五）。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一部分是专门随葬而放入墓室中，还有一些骨骼为当时安葬时进行祭祀活动时放入墓葬之中。有些学者认为墓葬中用动物骨骼的某些关节骨或蹄骨来代表整体动物的现象。根据随葬动物骨骼的情况，可以看出使用小型牲畜的拐骨进行随葬的现象普遍存在。艾尔根敖包墓地中 AΓ01 号墓发现的随葬动物骨骼的数量最多，70 件动物拐骨放置在儿童个体头部，其中有些拐骨有穿孔、把凹凸部分磨平以及雕刻纹饰等现象。内蒙古地区有的墓葬中有随葬狗的现象，而在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发掘中，清理 AΓ09 号墓表土时从盗墓坑中出土了一



图一三　AΓ11 号墓洞室



图一四　AΓ07 号墓墓室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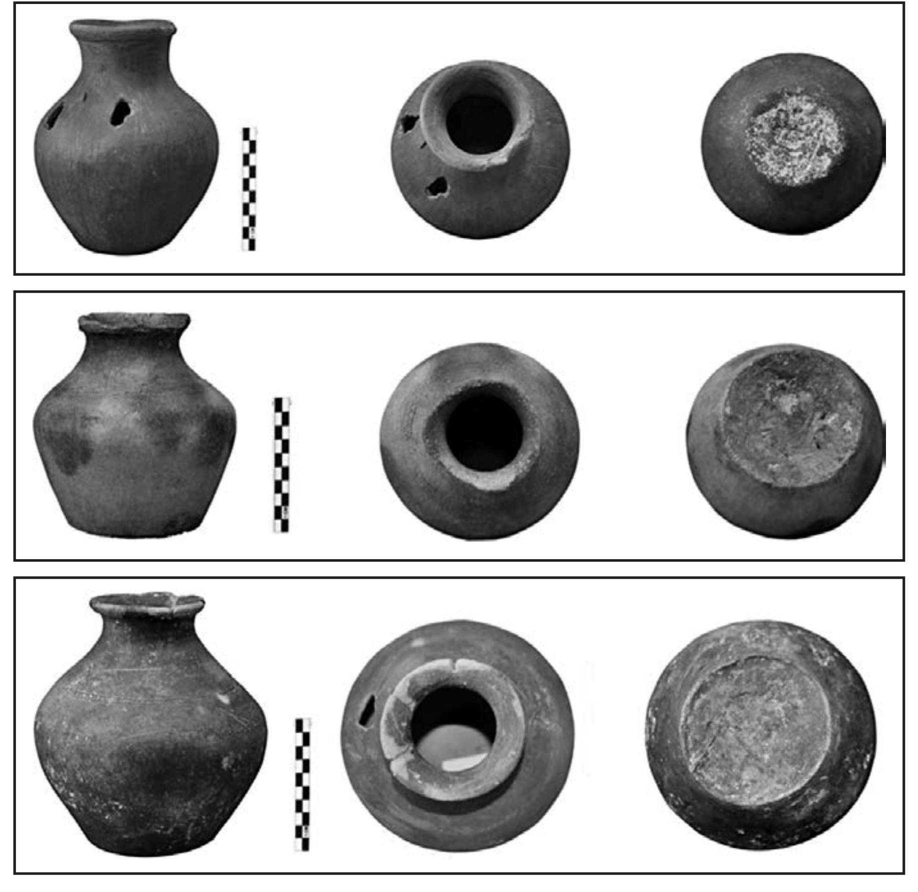
图一五　AΓ02 号墓平、剖面图

件狗下颌骨，除此之外目前还未发现其他墓葬随葬狗的现象。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鲜卑墓葬中除了安葬狗头骨外还随葬整体骨骼，还有一座墓葬中出土了几件狗骨。

艾尔根敖包墓地发掘的墓葬中随葬马骨的现象比较多见，根据汉文文献中记载“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11]，我们可以确定鲜卑人有随葬狗的习俗。 匈奴墓葬中用马骨进行祭祀的情况相比其他动物骨少，而艾尔根敖包墓地随葬马头骨、蹄骨及颈椎骨却比较普遍，又有随葬（AΓ86 号墓）整匹马骨的迹象。鲜卑墓葬中出土遗物比较丰富，种类繁多，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综合性考虑鲜卑部族的构成、相关年代的差距、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在此，不得不提代表他们主文化、丧葬习俗中固定随葬物，如桦树皮器、带扣、武器、陶器、装饰品、马具及木或陶质牛车、马、俑等。艾尔根敖包墓地 AΓ89 号墓出土了木质俑、马、牛车（图一六），陶器（图一七），漆器，箭镞，类似旗帜的木杆及丝绸遗物（图一八）。陶器形制和纹饰等方面与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极为接近。



图一六 AΓ89 号墓出土的木质牛车



图一七　AΓ89 号墓出土的陶器



图一八　AΓ89 号墓出土遗物

三、年代的研究

通过 ^{14}C 的测年结果显示，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年代为公元 1 ~ 3 世纪初期，这一年代基本与史书所记载的鲜卑时期相吻合。此处墓地是研究匈奴、鲜卑民族成分的非常重要的遗存，通过出土的遗存可以确定他们经营着畜牧业为主、少量的农业和手工业为辅的经济。圆形石堆墓从丧葬习俗和出土遗物看更接近匈奴传统。文献记载 100 万匈奴人自称鲜卑融入鲜卑人群中，分布在艾尔根敖包墓地的圆形石堆墓的墓主疑似为这群人。这些墓葬从地表建筑至内部结构甚至出土遗物与匈奴墓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墓葬遗存是自称鲜卑的那群匈奴人的遗存。内蒙古地区的双人或多人合葬的情况在艾尔根敖包墓地也有发现，目前蒙古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 ~ 公元 2 世纪初，在这一时间段大量建造了我们称之为贵族墓的带有墓道方形石封堆的大型墓。与这一时期（公元 1 世纪晚期）同期的鲜卑也开始建造大型墓葬。随着匈奴内部分歧、实力的削弱，鲜卑人群逐渐壮大起来，开始建造匈奴贵族墓一样的大型墓葬来显示自己的实力。虽然墓葬的地表和结构特征传承了匈奴墓葬的特点，但墓道和洞室结构来看，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鲜卑人群何时从何地来到蒙古中部艾尔根敖包地区、鲜卑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他们的墓葬习俗如何变化等问题正等待我们解答。通过我们的发掘和研究，艾尔根敖包墓地是从匈奴时期开始建造，与匈奴文化交融、交汇繁荣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包含着自己原始文化因素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

艾尔根敖包墓地的研究，对鲜卑丧葬习俗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意义，墓地 ^{14}C 测年数据显示，这处墓地的年代范围自匈奴政权瓦解至鲜卑汗国结束。该研究不仅对研究鲜卑丧葬习俗演变史、鲜卑贵族与平民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对鲜卑时期匈奴丧葬习俗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艾尔根敖包墓地发现的匈奴墓葬看，匈奴退出漠北后，剩余部分人群融入鲜卑之中，为之后的鲜卑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注　释

［1］ a. 江上波夫．内蒙古百灵庙砂凹地の古坟［A］．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篤［C］．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 年。

b. 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蒙古文翻译版）［M］．乌兰巴托，2016：256，257.

［2］ 同［1］。

［3］ a. Ц Одбаатар, С Энхболд, Б Анхбаяр, М Нямбат, Г Амгалантөгс, М Дэлгэрмаа, Д Нямсүрэн, Б Даваацэрэн.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 хэмээх газа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айлан [J]. Уб., 2014.

b. Ц Одбаатар, С Энхболд, Г Бүрэнтөгс, Б Даваацэрэн. 2015 онд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нутаг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авран хамгаалах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тайлан [J]. УБ., 2015.

c. Ц Одбаатар, Ц Эгиймаа. 2016 онд Орхон аймгийн Жаргалант сумы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J]. УБ., 2016.

d. Ц Одбаатар, Б Даваацэрэн, М Барс, М Нямбат, Б Амгаланбат. 2017 онд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т явуулса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урьдчилсан тайлан [J]. УБ., 2017.

［4］ Ч Амартүвшин, О Батзориг. Өмнөговь аймгийн Ханбогд сумын нутаг Булан тойромд хийсэн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J]. ШУА-ийн ТАХГБСХ.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10.

［5］ Ц Төрбат. Сяньбийн үеийн булш. Монголын эртний булш оршуулга [J]. УБ., 2016 он, тал 182-185.

［6］ Н Батболд, Д Батсүх, Н Баярхүү. Монгол-Солонгосын хамтарсан “Соёлын өвийг судалж хамгаалах” төслийн 2017 оны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нгийн тайлан [J]. Түүх,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хүрээлэн, УБ., 2017.

［7］ Ц Одбаатар, Б Даваацэрэн, М Нямбат, М Барс, Г Энхбаяр.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мтарсан “Айрагийн гозгор дахь 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археоло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 төслийн 2018 оны хээр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ажлын тайлан [J]. УБ., 2018.

［8］ Б Даваацэрэн, З Батсайхан. Умард хүннүгийн хоёр оршуулгын газар [J]. Nomadic studies. УБ., 2011 он, тал 54-60.

［9］ 魏坚.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蒙古文翻译版）［M］. 乌兰巴托，2016：图 14，173，174.

［10］ 同［9］：图 34，12～86.

［11］ （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魏书·乌丸鲜卑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Airgiin Ovoo Cemetery

Odbaatar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led in the Airgiin Ovoo cemetery in Orkhon Province, Central and Northern Mongolia. A total of 16 tombs were excavated in this cemetery from 2014 to 2018.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unearthed relics, funeral customs and carbon 14 dating data, it i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hat the cemetery is related to the Xianbei people in the early 1st to 4th centuries A. 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veale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Airgiin

Ovoo cemetery and the tombs of the Xianbei period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At the same time, parallels can be drawn with the Hunnu tombs excavated in Mongolia and their unearthed relics. According to the surface architecture of the tombs, the cave tombs with "convex" shape and inclined tomb paths are noble tombs, and the round stone circle tombs are civilian tomb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types of tombs retain som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nnu tombs.

Keywords: Mongolia; Orhun Province; Hunnu-Xianbei Tomb; Inner Mongolia; Xianbei Tomb; Noble Tomb; Niche Tomb with Tomb Path; Niche Earth Pit; Niche Earth Pit Tomb

唐刘日用墓志考释

王伯轩

（北京市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博物馆部，北京，102100）

内容摘要：唐代刘日用墓志在2003年发现于延庆南菜园地区。经过研究发现，除墓主人生平信息外，该墓志还保存了关于北郡和儒价州的信息，可以弥补唐代延庆建置的若干空白，并为揭示唐代幽州北部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本文即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的梳理研究。

关键词：唐代；墓志；北郡；儒价州

一、刘日用墓志出土概况

唐刘日用墓志，2003年于延庆南菜园地区施工时出土，现藏于延庆区文物管理所。该志无盖，墨书砖质，长34、宽32、总厚11厘米，上部及右上部大面积残损。志文正书兼行，现存约17行，每行字数不等，共计400余字，字迹工整，文辞讲究。志面可见阴刻罫线，但志文并未依线书写；书写方向纵向为自上而下，横向为从左至右，形制特殊，异于通常。从内容上看，该志主要记载墓主人刘日用的籍贯、世系、官封和生平事略，以及“安史之乱”时期，在刘日用被黜并卒殁平卢后，季弟刘日政善事兄长，迁柩返乡的孝悌之举。该志关于北郡和儒价州的记载，为探究唐代幽州北部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录文并标点如下（图一）。



图一　唐刘日用残志

大唐故云麾大将军赏紫金鱼袋上柱国刘公墓誌铭并序」

公讳日用，字文涛，彭城人也，晋刘繇之后。地望秀逸，累叶斑贵。荣阶叠颖，英」名盖世。齐之汉祖，历代称贤。枝芬花芳，气含萼跗。宠继不绝，徽猷绝伦。」祖讳本随，唐州刺史。挺特贞肃，规方字文。三德称贤，五袴流詠。父章，皇荆州罗含」府折冲都尉，赐紫金鱼袋。总戎幕府，威振辕门。仁勇不施，风猷自化。公即刺史」之孙、都尉之子。天生特秀，卓尔不群。武略宏才，出于人表。累斑朝命，历授云麾」将军。御蒐龙轩，玉阶警肃。香街複道，清跸严防。承光泽而无休；含瑞气」而自液。苍蝇点白，黜在平卢。属襄乱未宁，流窜罪叙。久沉远塞，疴□□□。」疾弊相□，卒于平卢之私第也，享年六十三。呜呼！梁木其坏，哲人其萎。□□」锦树，蚌□□□。威德□在，英灵何归！有令季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平州刺史、卢」龙军使、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日政孝义资身，忠贞守政。爰收鹡鸰，」柩将□□。□□□□□□，乡闾悲切原隰。以今月十九日迁厝于北郡城南三里。」

（上残）压雄坟，岗岭清部，当封马鬣，则以龟兆协□□」

（上残）白日故蕴猷书之表质，刊石为铭，用旌」

（上残）英名振地，义烈闻天，心括沧海，志□□□。」

（上残）自然。」

永□二年五月日。」

二、刘日用世系

墓主人刘日用，字文涛，地望彭城（今江苏徐州），史籍未有此人传记。志谓刘公是“晋刘繇之后”，据史书记载，晋惠帝即位后，贾后矫诏杀害了重臣卫瓘，“太保主簿刘繇等冒难收瓘而葬之”，事后“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直诉上言为瓘昭雪[1]。是时，正值“八王之乱”初期，刘繇官任太保主簿，该职为太保幕僚之长。刘公祖上或为此人。

以彭城为地望的刘氏宗族久负盛名[2]。若按彭城刘氏出于居巢侯刘般说[3]，则刘般之后系太尉刘恺，恺之后系司空刘茂[4]。两晋时，名臣刘隗为彭城人，其子刘绥为驸马都尉。隗伯父刘讷官任司隶校尉，与子刘畴均为名士[5]。诚如墓志所言，“地望秀逸，累叶斑贵，荣阶叠颖，英名盖世”。所谓“齐之汉祖，历代称贤”，“汉祖”指汉高祖刘邦。能与之相齐者，当指南朝宋武帝刘裕，亦为彭城人。依此而论，彭城诸刘在汉晋以至南北朝时期不乏高门厚望，为地位显赫之族，志与史合。

志谓“祖讳本随，唐州刺史”，可知刘公祖父刘本随，任唐州刺史。唐州，隋淮安郡。武德四年（621 年）改为显州，置总管，五年又分置唐州，七年改为都督府。贞观

元年（627 年）罢都督府，九年改显州为唐州。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淮安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唐州。天祐三年（906 年）朱全忠徙治泌阳，改名泌州。按“唐州，上”[6]；“上州，刺史一人，从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7]，可知唐州刺史从三品。《唐刺史考全编》卷 191《山南东道 · 唐州》所考刺史未列刘本随，据志可补。

志谓“父章，皇荆州罗含府折冲都尉”，可知刘公父亲刘章官任折冲都尉。荆州即江陵府。江陵府，隋南郡。武德四年改为荆州。天宝元年改为江陵郡。乾元元年复为荆州。上元元年（760 年）改为江陵府[8]。罗含府，唐折冲府名。“含”字漫漶不清，按张沛《唐折冲府汇考》，江陵府下有罗含府，补该字[9]。折冲都尉，唐代折冲府长官名。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掌领五校之属以备宿卫、以从师役，总其戎具资粮、差点教习之法令”，“总判府事”[10]。

因此，志文称刘日用乃“刺史之孙、都尉之子”。

志谓“有令季……日政孝义资身，忠贞守政。爰收鹡鸰……”。“令季”应是撰者对刘公季弟的敬称。这与唐代诗人郑谷为李郎中及其兄弟所作诗篇的题目《为户部李郎中与令季端公寓止渠州江寺偶作寄献》用法相同。“鹡鸰”，鸟类的一属。《诗 · 小雅 · 常棣》载，“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即鹡鸰，后以“鹡鸰”比喻兄弟。“鸰”字漫漶不清，据意补。那么，按上述人物关系可知，刘公有一季弟刘日政。虽然刘日用、刘日政名俱含“日”，但是恐非同胞兄弟。例如，唐代名臣崔日知、崔日用兄弟，按“日用从父兄日知”[11]，可知其二人为从父兄弟关系，即共祖不共父的堂兄弟。至于刘日用、刘日政二人是否确为从兄弟关系，因志未及，姑且存疑。

志文记载刘日政官职为“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平州刺史、卢龙军使、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其中，“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下文另述。平州，隋北平郡。武德二年改为平州。天宝元年改为北平郡。乾元元年复为平州。按“平州，下”[12]，可知平州刺史为正四品下。卢龙军，“卢”字漫漶不清，按“（平州）有卢龙军，天宝二载置”[13]补。云麾将军，武散官名，从三品。“麾”字因志残损，按残笔补。右武卫大将军，武职事官名。按《唐六典》载，“左右武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14]，其职掌同左右卫，负责宫禁宿卫。“武”字因志残损，按残笔补。上述除云麾将军外，均为刘日政职事官职。

三、墓志纪年

志载刘日用享年六十三岁，志文仅见两处纪年内容。其中，“以今月十九日迁厝”指出刘公被迁厝的具体日期。“今月”，按志末“永□二年五月日”可知为五月，即五月十九日为迁厝日期。

由于砖志残损，造成志末纪年阙字。关于“永□二年”，唐代带“永”字的年号共

有 6 个，其始末如下。永徽（650 ~ 655 年）、永隆（680 ~ 681 年）、永淳（682 ~ 683 年）、永昌（689 年）、永泰（765 ~ 766 年）、永贞（805 年）。其中，年号永昌、永贞一年即止，应排除。志谓刘公“卒于平卢之私第”，说明刘公卒殁之时已有平卢之号。平卢置于开元七年（719 年），治营州，上元二年（761 年）南迁淄青地区。那么，开元之前的永字年号皆可排除，仅余永泰（765 年正月 ~ 766 年十一月）年号，补阙“泰”字。因此，唐永泰二年（766 年）五月十九日是刘公迁厝的具体纪年。

虽然志文中再无详细纪年信息，不能明确说明刘公卒年的具体时间，但是志文中出现这样一段描述，刘公“黜在平卢。属襄乱未宁，流窜罪叙……卒于平卢之私第也”。从事件发生顺序看，说明刘公卒殁前，有一场战乱还未平息，而且这场战乱发生于平卢置镇后。从遣词用句看，“襄”通“攘”，“襄乱”指扫除战乱，表明这是一场规模很大，影响颇深的社会动荡，而非一般的盗寇侵扰之举。那么，这场战乱当指“安史之乱”（755 ~ 763 年）无疑。乱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15]。

综合上述分析，刘公卒殁时间大体是在“安史之乱”末期至永泰二年迁厝以前。那么刘公生年可能为公元 700 年前后，其生平则主要经历玄宗至肃宗时期（712 ~ 762 年）。

四、刘日用生平

按父刘章为折冲都尉，可知刘日用是出身行伍。刘公“武略宏才，出于人表”，因之受到朝廷重用，以至“累斑朝命，历授云麾将军”，倍受嘉奖。“云麾（大）将军”是刘公生平最高级的武散官名号，品级为从三品。除此之外，志中涉及刘公品级、散位、职守或勋级的相关信息十分有限，仅包括“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等内容。“赐紫金鱼袋”，紫指紫衣；金鱼袋指盛纳鱼符的袋子，一般佩于腰右。唐代散官为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袍服并佩金鱼袋，与“云麾将军”品级吻合。“上柱国”为勋官名号，因战功而授。唐代勋级分十二等，最高等级是上柱国，其品级为正二品。

从上述内容可以发现，志文没有说明刘公的职事官职及品级。“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16] 由此可知，刘公生前必定担当过职事官职，只是志文没有记载而已。

志谓：“御薨龙轩，玉阶警肃。香街複道，清跸严防。”这段志文上承“历授云麾将军”，下启刘公“黜在平卢”，“属襄乱未宁”。若按上文纪年分析，笔者认为，该志文反映的历史事件可能发生于玄、肃二宗辞世至代宗即位之际。由于志文记述过于简略，难以详加考证，故只得略作推测，拙见如下。

首先，“御”常用于与帝王相关；“薨”指死亡或杀害；“龙轩”则指帝王车驾，此处或可引申为宫殿。虽然根据“凡丧，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

称死”[17]等记载，“薨”一般用于诸侯或三品以上官员去世。但是在墓志中，口俗、笔俗等脱离制度的实际用词现象比比皆是，不一定完全遵照以不同身份地位界定“死亡”表述方式的规定。正如罗维明在《中古墓志词语研究》中指出的，除帝、后外，墓志中亦存在以“崩”泛指死亡的若干例子[18]。因此，相对而言，该志文所谓的“薨”者，也很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员。

其次，“玉阶”指朝廷；“香街”指繁华街道，“複道”亦作“复道”，此处应指水陆两路；“清跸严防”则指为帝王车驾清道止行，严密防范。那么，该志文则主要记述了“薨”者去世后，朝廷内部以至城市街道、水陆交通都被严密地戒备防控。倘若进一步揣度“御”“龙轩”“清跸”等词语含义，以及朝廷内外均采取戒严防备等相关描述，不难看出“薨”者的身份地位极为特殊，甚至非公卿所能比拟，因此笔者推测“薨”者为某位帝王。

按前文分析，在刘公生平中去世的帝王主要有 3 位，即睿宗、玄宗和肃宗。睿宗去世于开元四年（716 年），与志不符，故排除。宝应元年（762 年）四月，玄宗先逝于神龙殿。同月，肃宗哀悸病危，继而长逝。综上所述，笔者推测这段志文可能指玄宗或肃宗去世。是时，宦官掌权，皇后干政，朝中甚为混乱。最终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害了皇后张氏、越王李係等人，并拥立太子李豫为代宗。

另外，这段志文虽然记述简略，但很有逻辑性，颇有身临其境之感。笔者推测刘日政可能亲历其中，按右武卫大将军“职掌如左右卫。其异者……跸称长唱警，持钹（钑）队应跸，为左右厢仪仗。……正殿前，则以诸队次立于骁卫下；在嘉德门内，外（则）以挟门队坐于东、西廊”[19]。说明除掌管宫禁宿卫，还要负责警戒清道、两厢仪仗、正殿及嘉德门值班等守卫任务，与志文“玉阶警肃”“清跸严防”相符。

志谓“苍蝇点白，黜在平卢”，“蝇”字残损，按残笔补。前半句源出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代白头吟》：“食苗实硕鼠，点白信苍蝇”。“苍蝇”比喻进谗言的小人；“点白”有玷污清白之意。“黜”为降职或罢免。该句意指刘公遭人谗害而被贬黜平卢，又上承“御薨”事件，或暗含刘公被黜与该事件有关联。此时作为黜官的刘公人生境遇陡然暗淡，无论降职或是罢免，终究大势已去。这或许正是志文未提刘公职官的原因之一。

志谓“属襄（攘）乱未宁，流窜罪叙”，前文已考。代宗即位初，“安史之乱”尚未结束，朝廷亦深陷割据泥淖。又谓“久沉远塞，疴□□□。疾弊相□，卒于平卢之私第也，享年六十三”。“卒”“卢”二字残损，按残笔补。这段志文表明刘日用被黜平卢期间不仅身染疾病而且心情陈郁，以致去世。

自“呜呼”始为悼念之辞。志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按《礼记·檀弓》载“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指孔子自喻其死为栋梁损坏，此处则是将刘公卒殁喻为圣贤辞世。“萎”字漫漶不清，据文意补。然“威德□在，英灵何归”一句，阙字疑“尚”。此句除感喟英雄与世长辞之外，亦犹言刘公客死平卢异乡，魂无可归之情势。

志谓“日政孝义资身，忠贞守政。爰收鹡鸰，柩将□□”，所谓“孝义”指行孝重义；“资身”指资养自身或立身；“守政”则指防务或泛指治理政务。前句称赞了刘日政的人品与官品，同时说明了刘公客死他乡后又被归葬故土的原因，即是刘日政“善事兄长”的守孝之举。“爰收鹡鸰”表明刘日政在平卢已经“收领”了兄长的遗骨。“柩将□□”，阙字残破严重，不能直接辨认。然推敲句意，“柩”是这半句的主语，那么，“柩将”如何？“将”字在此应是一个副词，其后缺少一个目的性的动词和作为宾语的名词。故按残笔，阙字考为“安故”，“柩将安故”表明了兄长的灵柩将安葬于故乡。

志谓“□□□□□□，乡闾悲切原隰”，与“以今月十九日迁厝于北郡城南三里”是两句内容不同的志文。首先，因为“□□□□□□，乡闾悲切原隰”是承接上句“柩将安故”而说的，虽然这句话的阙字内容无从考证，但是余下的文字可以表明灵柩被运回故乡之时，原野上的乡闾都被感动。那么按照墓志撰写的结构特点推断，阙字很有可能描写了族亲的悲切之情。后一句则是指迁柩之后，具体的迁厝时间与地点，与前文内容不同。其次，曾任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的刘日政从平卢迁兄长之柩回乡安葬的事件应被认作是恪守孝悌之道的高尚行为。这不但能够吻合上文对刘日政“孝义资身”的评价，而且这个举动必将对百姓造成很大的感染和触动，相对“迁厝”而言，迁柩则显得更具德行。乡闾之悲切，则是对前句的说明。因此，两句分开为宜。依照上述分析，刘公能够“迁厝于北郡”与季弟刘日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柩将安故”，这个“故”字也指出北郡是刘公的家乡。

五、北郡及儒价州

墓志记载刘日政曾任“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刘日用亦“迁厝于北郡城南三里”。据《大唐六典·尚书工部·屯田郎中》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河北道幽州五十五屯，清夷一十五屯，北郡六屯，威武一十五屯……”[20]，可知北郡（城）应位于河北道北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唐代北郡城遗址，但是根据刘日用墓的发现位置及志文推断，北郡城应位于墓地之北三里，其地约相当于今天延庆城区的西南部。北郡既是刘日政早期官任的履职之地，又是刘公迁厝的目的地。北郡使，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太子宾客国君（希仙）墓志铭并序》载“（希仙）祖守乙，金紫光禄大夫、太常卿、北郡守捉使、上柱国”[21]，可知北郡曾置守捉使。守捉使，武官名。唐制，军队戍守之地大者为军，小者为守捉。天宝以前各置使，隶属于都督或节度使。“至德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22]故按刘日政曾兼任儒价州刺史论，此处的“北郡使”可能是北郡防御使的省称。

儒价州，史书无载。2007年，唐逯运墓志出土于延庆南菜园地区。志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墓主人逯运“寄葬儒价州城东南一里坎上”。根据志文记载与墓葬

实际位置，推知唐代延庆地区曾有儒价州建置，州城亦应位于今天延庆城区的西南部。

据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以下简称《露布》）载，乌承恩曾以北郡长上折冲兼任儒州都督[23]。儒州，见于《括地志·序略》贞观十三年（639年）《大簿》358州之内，属陇右道。两唐书《地理志》列入关内道党项羁縻州。按北郡在幽州北部，乌承恩兼任之州亦应不出于此。然《括地志》及两唐书所载儒州与北郡相距甚远，应与此无关。按《露布》所记战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24]，而逯运墓志刊刻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此期间，儒州之名或有易称，疑乌氏兼任之儒州应指儒价州[25]。据史籍记载，乌承恩是开元中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之子，乌承玼族兄。开元中，承恩、承玼为平卢先锋。至德中，承恩任信都太守（冀州刺史），后为史思明所害[26]。据《新唐书·裴宽传》载："天宝初，（宽）由陈留太守拜范阳节度使。时北平军使乌承恩，虏酋也，与中人通，数冒贿，宽以法绳治。"[27]这里特别提到除北平军使外，乌承恩的另一个身份是虏酋，即蕃族首领。依此而论，《露布》所记"儒（价）州"则很可能是在幽州北部设立的由乌氏掌管的羁縻州。

六、"刘日政（正）"考辨

刘日政作为刘公季弟，本应置于"刘日用世系"一节加以考释。但是，一方面由于史料或记"刘日政""刘日正"，或书"刘日贞""刘白正"，存在人名区分不清的现象。记载尚有出入，则恐有混淆之误。另一方面，由于史志浩繁，亦存在同时期的人物同名，生平却大相径庭的现象。同时，刘日用墓志关于刘日政官职及履职地点的记载，对揭示唐代延庆地区的建置问题作用突出。故另择一节对史籍所见的刘日政（正）进行分析考证，以澄清人物生平事略，实属必要。

（一）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三年

据《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以下简称《颂》）载，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东巡封禅。"洎銮舆反旆，旌别淑慝，监顿使刘日政、劝农使卢怡并奏公理行第一，议者以为当矣。"[28]《裴仆射齐州遗爱碑》（以下简称《碑》）也有相似记载："（开元十三年）大驾还都，分遣中丞蒋钦绪、御史刘日政、宋询等巡按，皆嘉公之能，奏课第一。"[29]所谓"公"者，皆指裴耀卿，时任济州刺史。"齐州"为"济州"之误[30]。

这两段材料均有记载的刘日政，其官职分别为监顿使和御史。监顿使，唐史未言其职掌。按"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裴耀卿因"躬自条理，科配得所"，"称为知顿之最"[31]，可知"知顿"指为帝王安排食宿事务。那么，监顿使则应为监管"知顿"事务的使官无疑。御史，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按监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32]。这与材料中的"巡

按”“监顿”职责关系密切，故此处“御史”应是监察御史的省称。据此可知，在帝王出巡期间，“监顿”实际上是监察御史所领的一项特殊任务。由此判断，这两段材料所记刘日政均指同人。

不仅如此，史籍对“监察御史”还做出了进一步说明，“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33]，可知御史以下尚有判官、支使以为佐职。同时，《通典》等文献的相关记载也值得进一步考证。

“(开元)九年(721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遂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宋询……刘白正……等，皆知名士。”[34]又据《唐会要》载：“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奏劝农判官数人……大理评事宋珣……洛阳县尉刘日贞。”[35]按上引史料内容、人物基本相合。《唐会要》记“宋珣”，应为“宋询”之误。《通典》记“刘白正”、《唐会要》记“刘日贞”，有误笔之嫌，但与孙、王所作《颂》《碑》记“刘日政”均同人。

据上述材料可知，宋询、刘日政是监察御史宇文融在开元九年为括户而奏置的劝农判官。此二人也正是王维《碑》中所记的，开元十三年巡按济州的“御史”。《通典》明确指出了判官刘日政等人是以“摄御史”的身份“分往天下”。“摄”指暂行代理。黄进华《宇文融括户的组织体制新探》一文中对“判官出使制”做出分析，指出这些判官亦曾“假‘御史’衔，奉旨出使各道”[36]。因此，所谓“御史刘日政”，准确地讲，应是判官摄御史刘日政。

上文所引《唐会要》材料还指出，刘日政在出任判官前，即开元九年，时任洛阳县尉。但是，史籍对刘日政官职的记载再次出现了分歧。据《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一年(723年)五月，命……雒阳主簿刘日正……等摄监察御史分巡诸道”[37]。按雒阳即洛阳县，为唐代赤县(京县)。刘日正即刘日政，系同人。主簿、县尉，虽职掌不同，但均系县令佐吏，并与县令、县丞共同构成“一令三佐”县级行政体制。“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主簿二人，从七(八)品上。尉六人，从八品下。”[38]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唐会要》载“开元九年”，是宇文融奏置判官的时间。而《册府元龟》所载“开元十一年”，是诸上判官正式巡按的时间。由于主簿品级略高于县尉，因此或可如是理解，即开元九年，刘日政时任洛阳县尉，被宇文融物色为奏置判官的人选。期间，刘日政又升迁为洛阳主簿，并于开元十三年，以判官摄御史身份正式受命巡道。上述材料揭示出开元九年至十三年，刘日政的迁官过程和大致生平。但尚不足以据此分辨其与刘日用墓志中的刘公季弟刘日政是否为同一人。因此，还需进一步考证。

(二)开元十三年至开元二十年

唐御史台精舍碑包括“侍御史并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监察御史并

□□□”等题名，或见崔希逸、卢怡、何千里、刘日正、乔梦松、班景倩、库狄履温、宋询等人。同时，这些人或见于《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文献，皆为开元初年宇文融括户奏置的判官。按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2，记“刘日正（见郎官吏中、勋中，考外有刘日政，又监察）”，“刘日政（见殿中）”。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卷3、7、10记“刘日政”。则《通典》记“刘白正”，《唐会要》记“刘日贞”，确为误笔。刘日政，或作“刘日正”（疑因“正”通“政”），均同人。为便宜行文，下文以“刘日政”记。另外，陈尚君指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考外题名第六行记“刘日政”，为开元十八年（730年）知贡举者[39]。

以上官职所列较多，略作说明。吏中、勋中、考外、监察依次为吏部郎中、司勋郎中、考功员外郎、监察御史的简称或省称。在唐代“三省六部”体制中，尚书都省。尚书省辖吏部，下设四司，各以郎中主其政。吏部郎中，二人，从五品上。“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及“小选”。司勋郎中，一人，从五品上。与勋外共“掌邦国官人之勋级”。考功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掌天下贡举之职”，并与考中共“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40]。御史台为监察机构，以御史大夫为主官，御史中丞副之。所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依次分属台院、殿院和察院。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掌殿廷供奉之仪式。”[41]监察御史，前文已述，不赘。由此可知，刘日政曾官历尚书省、御史台下诸多要职。

高适《信安王幕府诗并序》，序作：“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总戎大举，时考工郎中王公、司勋郎中刘公、主客郎中魏公、侍御史李公、监察御史崔公，咸在幕府，诗以颂美数公，见于词凡三十韵。”[42]按信安王指李祎。司勋郎中刘公，未详其名，岑仲勉疑其或为刘日政[43]。由于史料不足，此条姑且存疑。

据此，上述材料可以作为开元十三年后，刘日政官迁及履职情况部分的补充，特别是开元十八年，刘日政官任考功员外郎，并主持了当年的贡举选士。由于上述官职均为朝中要职，与县尉、主簿等县官地位有别。因此，这些官迁经历的上限应为开元十三年后。其时，刘日政、宋询等人深得朝廷器用，自巡道以来，相继委以重任，以至官职累迁，活跃于朝中职事。正如《通典》指出的那样，“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44]。至于下限，则再需引证分析。

（三）开元二十二年至开元二十四年

据《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沔）宅陋室铭记》载，“（崔）公之澄清中外也，以……丞尉……刘日正……，并以清白吏疏而荐之。二十二年，置十道采访使，公所举六人在焉。”[45]按该篇系大历十一年（776年），颜真卿为崔沔故居遗址所撰。丞尉即县丞、县尉合称。据文意可知，刘日政曾于开元中经崔沔举荐升迁。

据《册府元龟》载，开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命……润州刺史刘日正为江南道采访使……梁州刺史宋询为山南西道采访使、宣州刺史班景倩为江南道采访使。”[46]润州刺史、宣州刺史同时出任江南道采访使，盖因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分为东西两道，故所言不误。据《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载，“故江东采访使润州刺史刘日正”[47]。按该篇碑铭系唐代散文家李华为径山大师玄素所撰，作于天宝十一年（752年）。江东指江南东道。又据《大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霞光）墓志铭并序》载，“刘日正廉问江介，复奏（李）为判官”[48]。按江介即江左，指长江以东地区。廉问，察访查问。廉，通覝。廉问江介即指任江南东道采访使。开元二十四年正月，“敕诸道采访使……宋询、刘日正……各赐一子官，赏其巡察之劳也”[49]。按宋询、班景倩等人见于开元初判官之列，又见于御史台精舍碑题名记，与刘日正再次同为采访使。则刘日正、刘日政系同人。

上述材料表明，开元二十二年，刘日政任润州刺史[50]。开元二十三年，其又升任江南东道采访使。在此期间，刘日政“以课最奏闻，清白奉公，始终无替，则彰善瘅恶，公为状首”[51]。开元二十四年，虽任职不详，但其一子被赐官。同时，上文关于刘日政入朝职事的经历下限应为开元二十二年以前。各种征引文献虽对“刘日政”其名各有所记，但均指同人。同时，这些文献也基本勾勒出开元九年至二十四年，刘日政的生平及履职情况。除此之外，还需对刘日政的生年进行定位。另外，关于开元年间采访使设置具体时间是否为二十二年的问题，非本文议论重点，故不作稽评。

（四）生 年 判 定

据《元和姓纂》载：“（刘）审理工部尚书、彭城公，生易从，濮州刺史。易从生升、正。升中书舍人，正给事中。正生颢、颙。颙殿中侍御史，生识。”[52]按“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晸”，《元和姓纂（附四校记）》考[53]，均同人。又据《大唐故同州司士参军先府君（崔混之）墓志铭并序》载，“……御史中丞卢公怡、给事中刘公日正……，滈以高义，惠然相宾，悉有忘言之契”[54]。按“给事中刘公日正”，又为其证，均同人。给事中，为门下省要职，“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55]。据此可知，给事中刘日政与中书舍人刘升皆为刘易从之子，刘审理之孙。

据刘升墓志载，“（升）享年五十有五，开元十八年六月廿九日毙于京兆修行里私第，假殡于西京”[56]。由此可知，刘升生于675年，即唐高宗上元二年。其父刘易从，于永昌中（689年）被酷吏诬构而遇害[57]，此时刘升年仅14岁。作为刘升的同胞兄弟，刘日政的生年虽不详知，但可以肯定，其生年一定是在其父刘易从去世前，即永昌年以前。

（五）“刘日政”辨证

第一，经过对各类征引文献的考察和推导发现，史籍所见刘日政（正）（以下称前

者）与墓志记“季弟”刘日政（以下称后者）生年不同，成为区别二者的最关键因素。前者生于永昌年（689年）以前。而通过分析刘日用墓志发现，刘日用卒于“安史之乱”（755～763年）末期（或乱后）至永泰二年（766年）之间，享年63岁，则其生年为700～703年。由于后者为刘公季弟，则其生年更在刘公之后。因此，前者生年略早。第二，二者世系、地位、官历等均未见重合。世系及地位方面，前者系刘易从之子，刘审理之孙，并与刘升为同胞兄弟。而墓志记刘日用为刘章之子，刘本随之孙，与后者或为从兄关系。虽然前后二者均系彭城刘氏，但是暂未发现二者世系重合之处，而且前者世系官职及地位水平要远高于后者。官历方面，据前文述，前者历任赤县佐吏，御史台、尚书省及门下省职事，刺史、采访使等。而后者任“北郡使兼儒价州刺史、平州刺史、卢龙军使”等，二者官历亦无重合之处。第三，综合关于前者的姓名记载，其名“刘日政”，或作“刘日正”。别记“刘白正”“刘日贞”者，盖为史书之误。这与后者姓名亦有一定区别。综上所述，史籍所见刘日政（正），与墓志记刘日政各有所指。

七、结　　语

综上考述，刘日用墓志具有丰富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同时也存在较多疑问。在价值方面，从目前延庆地区已发现唐代墓志的具体纪年来看，该志撰写时间与“安史之乱”年代最近，部分志文内容涉及特殊历史时期或其临近阶段，纪年意义较为突出。墓主人及其于唐代世系均不见史载，特别是唐州刺史刘本随、儒价州刺史刘日政可以据志补充唐代刺史名目。刘日政与刘日用相较，其职官不仅更为详具，而且为考察唐中期延庆地区建置情况提供基本依据。诸上建置资料进一步表明，这一时期延庆地区行政与军事建置并举，出现了以北郡为关键词的长上折冲、守捉使、防御使等军事官职和官员，和以儒价州为关键词的都督、刺史等行政官职和官员。通过墓志资料中关于葬地和城池的方位、距离记载，可以在地理上进一步明确北郡城、儒价州城的位置，即其地在今天延庆城区的西南部。这方墓志也为进一步揭示唐中后期延庆地区的行政和军事建置提供了有力依据。

注　　释

[1]（唐）房玄龄等．晋书·列传第六·卫瓘［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55～1061．

[2] 彭城刘氏，按《元和姓纂》载出于汉高弟楚元王交；唐代刘知几谓，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元王。至于究竟源出于谁，不做稽评。唯该族出于汉室，史无异论。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刘子玄［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21．

[4] 刘般、刘恺、刘茂并见《后汉书·刘般传》．（宋）范晔．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九·刘般［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1303～1310．

[5] 刘隗、刘绥、刘讷、刘畴并见《晋书·刘隗传》.（唐）房玄龄等．晋书·列传第三十九·刘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35～1842．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志第十九·地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44．
[7] （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三十·三府督护县官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733～735．
[8] 同［6］：1551，1552．
[9] 张沛．唐折冲府汇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218．
[10] a．（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二五·诸卫府［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645，656．
b．《旧唐书》职官志记载略同。（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05，1906．
[1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四十六·崔日用［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31．
[1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志第二十九·地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21．
[13] 同［12］．
[14] 同［10］a：621．
[15]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6：7066．
[1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志第二十二·职官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5．
[17]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94．
[18] 罗维明．中古墓志词语研究·崩［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28．
[19] （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二五·诸卫府［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612，613．
[20] （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七·尚书工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238．
[21]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7辑·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太子宾客国君（希仙）墓志铭并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399．
[22]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23．
[23]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五二·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68～3571．
[24] 《露布》对战事发生时间没有确切记载。按唐李永定墓志记“（开元）二十一载，节度使薛楚玉差公领马步大人”与《露布》记“经略军副使左卫率府右朗将李永定……领马步五千”基本相符，是知战事发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李永定墓志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073·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4～636．
[25] 该《露布》所记地方参战将领，除韩仙松外，均任职于河北道折冲府或军、镇．同时，亦唯

有韩仙松、乌承恩二人职任州刺史或都督，其中，韩仙松为归州刺史。按归州（巴东郡）属山南东道，与幽州相去甚远，疑与此无关。同时，《唐刺史考全编》“归州”条下刺史亦未录韩仙松。因此，笔者怀疑韩仙松所任“归州”是指侨置幽州境内的羁縻州，即归义州或归顺州。倘若此说成立，则《露布》作者樊衡可能省略了羁縻州全称，而简称归义州或归顺州为“归州”，儒价州为“儒州”。依此而论，“儒州”和“儒价州”也可能不存在易称现象，而是樊衡记述时的省略，姑且存疑。

[26] a.（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上·史思明［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76～5383.

b.（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一·乌承玼［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596，4597.

[27] a.（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五·裴宽［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488，4489.

b.（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列传第五十·裴宽［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130～3131. 所记略同。

[28] （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卷三一二·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170～3172.

[29] （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卷三二六·裴仆射齐州遗爱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305～3307.

[30] 郁贤皓. 唐刺史考全编·卷75·河南道·济州［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071.

[31]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裴耀卿［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080.

[32] （唐）张九龄等. 唐六典全译·卷一三·御史台［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391～392.

[33] （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志第三十八·百官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0.

[34] （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卷第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150.

[35] （宋）王溥.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M］. 北京：中华书局，1955：1562.

[36] 黄进华. 宇文融括户的组织体制新探［J］. 晋阳学刊，2007（2）：102～106.

[37] （宋）王钦若等编. 宋本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二·帝王部·使命第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350，351.

[38] （唐）张九龄等. 唐六典全译·卷三十·三府督护县官吏［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742. 按《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中的“七”应为“八”。

[39] 陈尚君.《登科考记》正补［A］. 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C］.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319.

[40] （唐）张九龄等. 唐六典全译·卷二·尚书吏部［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65～69.

［41］（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十三·御史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391，392．
［42］（唐）高适，孙钦善校注．高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8．
［43］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卷 7［M］．北京：中华书局，2004：47．
［44］（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第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50．
［45］（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三八·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26 ~ 3429．
［46］（宋）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二·帝王部·使命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52．
［47］（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二零·李华《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46 ~ 3248．
［4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099·大唐故太子舍人李府君（霞光）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600．
［49］（宋）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卷一百三十一·帝王部·延赏第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8．
［50］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 137·江南东道·润州［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853．
［5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186·唐故朝议郎平原郡长河县令卢府君（全贞）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661．
［52］（唐）林宝，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4：671．
［53］同［52］：671，672．
［54］柳金福．唐代博陵安平大房崔氏出土墓志考［A］．乾陵文化研究（第 4 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393 ~ 419．
［55］（唐）张九龄等．唐六典全译·卷八·门下省［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255．
［5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70·大唐故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刘府君（升）墓志铭并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579．
［5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七·刘德威［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78．

Study on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 of Liu Riyong

Wang Boxuan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 of Liu Riyong was discovered in the Nancaiyuan area, Yanqing District, Beijing, in 2003. After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he tomb owner, the epitaph also hol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ijun and the Rujia Prefecture, which make up for some blanks in the foundation of Tang period Yanqing. This provide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basis for revealing the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You Prefecture under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epitaph; Beijun; Rujiazhou

宣威军城碑与宣威军城考辨

常　璐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蒙古国中部前杭爱省霍格欣德尔山东北山麓发现过三座元代城址。其中最北边的城址出土一通石碑，碑额为“宣威军”，正文记载了昭勇大将军淮东左副都元帅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䚟睹扶睹儿于至元十五年十月到达此地，屯驻军队，后建造了这座城，并且引经据典，为宣扬国威将这座城命名为“宣威军城”。本文通过考释碑文内容，对照史料，确定军城的建造者、建造时间以及建造原因。忽必烈建元初期，哈喇和林附近叛乱频繁。忽必烈在至元初期派军队于和林及其附近地区屯田戍卫，加强军防，其目的是为了镇压这些叛变，维持和平。宣威军的设置最初可能与镇压早期昔里吉叛乱与防止海都叛变有关。并且通过与同时期的亦集乃路等城址对比，总结出这些城的设置均有军事目的。这些城位于哈喇和林与内地之间的要塞之上，是防止西边的海都叛乱、保护和林地区以及发展农牧业的必要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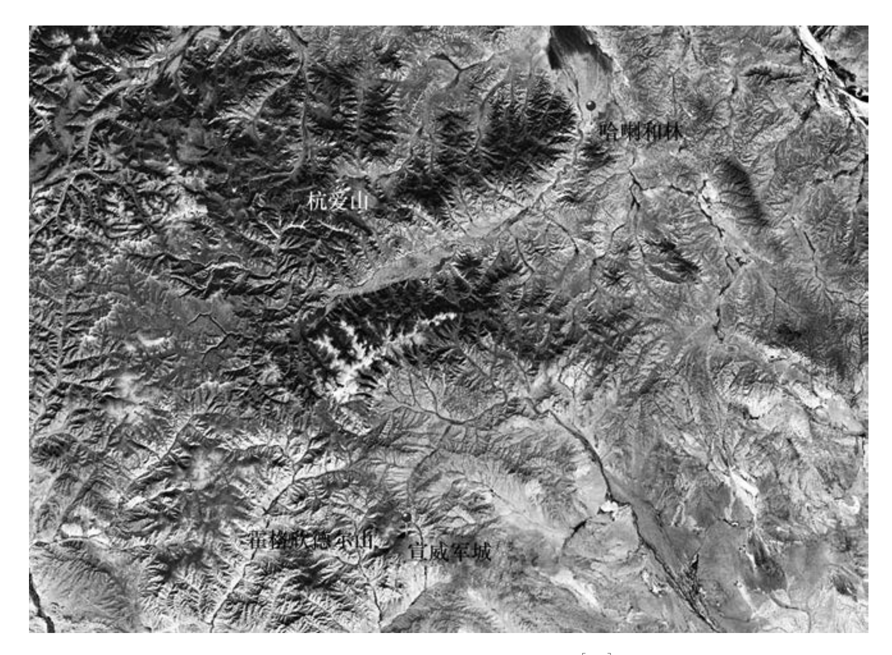
关键词：宣威军城；石碑；忽必烈；海都叛变

蒙古国中部前杭爱省海尔罕者兰苏木的霍格欣德尔山东北山麓发现过三座元代城址。其中最北边的城址出土一通石碑，上书汉文，碑额为“宣威军”，此城因此得名“宣威军城”。宣威军城碑碑文自左至右呈竖排，共20行300余字。碑文内容为了解这座城的建成时间、建造者以及建造原因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当时的历史状况。

一、发现与研究

宣威军城位于哈喇和林西南约200千米处，鄂尔浑河上游以西的地区，背靠霍格欣德尔山（图一）。城址和石碑最早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1926年在蒙古调查时发现。城址位于前杭爱省东北部的一座山东面，石碑立于城址南部。1958年蒙古学者塞日奥德扎夫（H·Ser-Odjav）将石碑收藏于乌兰巴托中央博物馆[1]。1965年，蒙古人民共

和国科学院于鄂尔浑河流域进行调查，蒙古学者普尔莱（X · Perlee）再次调查了宣威军城，并于次年发表了调查报告[2]。另一位蒙古学者韩德苏荣（Khandsüren）也发表过文章《霍格欣德尔碑文释读》来介绍宣威军城碑[3]。随后日本学者做了很多考证和研究。堀江雅明于1988年发表论文，根据蒙古学者韩德苏荣论文中的碑文副本考证了军城的建造者与建造原因，提出宣威军城的建造与忽必烈镇压元初的叛乱有关[4]。堀江雅明于1991年[5]和1994年[6]分别考察了石碑和军城址，并撰文介绍调查情况。村冈伦、松田孝一于1996～1998年在此调查过，并在《蒙古国现存碑文调查报告》中对宣威军城做专门的收录和介绍[7]。松田孝一、大泽正己著文分析了宣威军城所出的铁镞[8]。白石典之于1997年对城址进行过测量和调查，并认为其性质为军事据点[9]。



图一　宣威军城位置示意图[10]

二、宣威军城碑释读与考证

宣威军城碑碑文末行已较为模糊，通过与韩德苏荣手书碑文对比（图二、图三），释读如下。

碑额：宣威军。

正文：皇帝福荫里，昭勇大将军淮东左副都元帅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䚟扶睹儿，至元十五年四月内率领侍卫精锐亲军迤北出征。於十月内到於亦都山，创立屯所，因其山复建其城，就其水潴以为池。睹其形势险阻，虽充国之金城，仲升之玉关，亦何加於此。屯驻之久，偶因暇日就於射所，军僚参佐毕集。射毕，贾公曰："霄壤之间，有物必有其名，未有有其物而无其名者也。孔子欲治卫，必也正名。又问官名於郯子，

盖以有其物而不可无其名故耳。名之时义大矣哉。今城堑若此之壮丽，然而未有其名，於予心甚樵。”佥曰：“公言甚切，然则名何为可？”公先之曰：“当今圣上运应千龄，威加四海。兹仆與汝等，仗圣君神武之威，戮力戡乱。意以此城名曰宣威军，不亦可乎？”佥曰：“然。”□者大元至元拾伍年拾贰月有伍日。左卫亲军千户张温、阿塔海、玉钦、游进、刘禹、总管上通□□立□，百户高聚□刊。



图二　宣威军城碑[11]



图三　宣威军城碑碑文（韩德苏荣 1965 年手书）[12]

碑文记载了昭勇大将军淮东左副都元帅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艄抚睹儿于至元十五年十月到达此地，屯驻军队，后建造了这座城，并且引经据典，为宣扬国威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宣威军城”。首句“皇帝福荫里”为元代白话碑常见的开头，至顺二年易州龙兴观碑[13]、皇庆二年林州宝严寺碑[14]均如此。蔡美彪将之考释为“皇帝福荫里”，为元建国以后令旨惯用的颂词。

贾忙古艄抚睹儿为宣威军的将领，也是宣威军城的建造者，但是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贾忙古艄抚睹儿”这个人。据堀江雅明考证，贾忙古艄抚睹儿即为贾茂。“抚睹儿”即蒙语中的“拔都儿”，有“英雄”的含义。《元史·完者都传》中记：“（宗者都）入临安下扬州皆有功。江南平，入见帝，顾谓侍臣曰：‘真壮士也。’因赐名拔都儿。”[15]可见“拔都儿”一称可由皇帝赐之。《元史·世祖本纪第八》：“（至元）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枢密院臣言：‘宋边郡如嘉定、重庆、江陵、郢州、涟海等处，皆阻兵自守，宜降。’玺书招谕从之。宋知南康军叶阊以城降敕。以侍卫亲军指挥使札的失囊、加带将蒙古军二千,百家奴唐古忙兀儿将汉军万人赴蔡州；秃满带、贾忙古带复将余兵赴阙。”

贾忙古带于至元十二年参与了攻打南宋的军事活动。《秋涧集》《故金吾卫上将军景州节度使贾公行状》中记载，贾韩德“子男一十八人：曰茂，宣授金虎符，昭勇大将军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行淮东左副都元帅，府事谟勇忠，谨以良将称，善射，盖家法云”[16]。贾茂与碑文中贾忙古觪官职相符。

《金华黄先生文集》中《刘公神道碑》记载了刘国杰生平，其中有此一段：“（至元）十五年，复召至上都，俾与指挥使贾其（某），领三卫亲军一万人北征。陛辞上谕之，曰：‘朕不识贾指挥何如人，边事一付于汝。’对曰：‘陛下托臣以腹心，敢不尽忠竭力。事若有成，功归于众；或有不虞，臣自当之。’……会天大雪，人马俱苦，寒且乏食，以战车相环，穴地而处，抚其士卒无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17]有关刘国杰的事迹，《新元史・刘国杰传》中亦有记载：“（至元）十五年復领侍卫军万人，戍金山，屯田和林。十六年，判王脱脱木寇和林，国杰选轻骑袭之。脱脱木为其下所杀，余众悉降。”[18]

由此可以看出，忽必烈于至元十五年派刘国杰、贾某率侍卫亲军北征，屯田和林。虽然文献中未写明贾某是何人，但至少此将领姓贾为实。而碑文中记载的贾忙古觪为昭勇大将军淮东左副都元帅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文献中元代的贾姓将领仅有贾茂一人与此官职相符，并且贾茂“府事谟勇忠，谨以良将称，善射”，因此可以推测贾忙古觪有可能与贾茂为同一人。

贾忙古觪旁征博引，引用孔子治卫以及赵充国、班超的典故，来说明为此城命名的必要性。可以看出贾忙古觪学识渊博，熟识经典。贾茂为景州蓨县从教乡刘卿里人，理应为汉人。《新元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吴）恭祖年十八，近臣也里失班贺伯颜引见。帝一见奇之，曰：‘是儿不类汉人，赐名忙古觪。’命直宿卫。”[19]由此，“贾忙古觪”亦有可能为皇帝赐的蒙古名。

碑文末记载了立石刊字之人。根据堀江雅明的释读，出现的人名有：左卫亲军千户张温、阿塔海、玉钦、游进、刘禹、总管王通，百户高聚。村冈伦的记载则为：左卫亲军千户张温、阿塔海、郝瑾、刘继英、玉钦、游进、刘禹、总管王通，百户高聚。堀江雅明考证，原碑上的“总管上通”应为“总管王通”。但是文献中并未有名为“上通”的人。《元史・王国昌传》中有如下记载：“（王国昌）十月卒于军，子通嗣。通初袭爵，为左卫亲军千户。（至元）十二年从诸军伐宋……十四年改侍卫亲军千户。明年，通上书言：‘今南方已定，而北陲未安，请屯田于和林。’率所部自效，帝慰劳遣之。从破敌兵于金山，俘获生口及马羊牛驼不可胜计，进显武将军，赐金虎府符，升佥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从讨叛王乃颜，迁副都指挥使。”[20]因此，有可能原文即为“王通”。《新元史・张立传》记：“（张立）（至元）八年改侍卫亲军千户，寻迁左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赐金虎符。十四年春，率步卒千人转粟和林。至应昌，有叛将僭谋不轨，以骑三千蹑立……十六年，增置前后卫，进明威将军，后卫亲军都指挥使，赐双珠虎符，加昭勇大将军。长子温，以世袭为千户，加宣武将军，右卫亲军总管。父子并配虎符，乡里荣之。”[21]张立于至元十四年至十六年之间率兵为和林转运粮草，其子张温世袭为千户，

加右卫亲军总管。若碑文所记“左卫亲军千户张温”即为文献中的张温，那么，文献中的记载或许有误，张温应为“左卫亲军千户”。《元史备忘录》记：“阿塔海，世祖朝以千户从伐宋。”千户阿塔海在忽必烈时期也有军事方面的记载[22]。

贾忙古解、王通、刘国杰均于至元十五年领兵屯田和林，张温或许在此期间也随其父活动于和林附近。碑文所记其他人名文献中似无记载，已无法考证。

另外，碑文中提到的亦都山与文献中记载的益图、亦脱山、迤都山均为同一地点。《至正集·刘平章神道碑》记载：“（刘国杰）统侍卫军万人北征，慰托甚至，公顿首曰：‘臣粗习兵事，惟血可以报国，有功诸将力也，万一蹉跌臣自当之。’上为嗟叹。师次益图，大雪，环车为栅，穴地与士卒同卧起。”[23]《元史·石高山传》：“（至元）十二年冬……（石高山）进显武将军，领兵北征，屯亦脱山。十六年，命同忽都鲁领三卫军戍和林，因屯田以给军储，岁不乏用。乃颜叛，督战有功，赐三珠虎符，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守卫东宫。”明代此地似称为迤都山。张岱《石匮书》：“二十人寻以征虏前将军，率副将军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练，卒从燕王。出古北口，擒乃儿不花於迤都山，还驻开平，引兵西征宁夏。”[24]

文献中记载刘国杰与贾姓将领于至元十五年率兵北上，屯田和林，途中“会天大雪，人马俱苦，寒且乏食，以战车相环，穴地而处”“师次益图，大雪，环车为栅，穴地与士卒同卧起”。碑文中记贾忙古解于至元十五年十月内到达亦都山，“师次益图”，当时的天气也符合“会天大雪”，宣威军城内发现规整的圆形凹地，其作用有可能为“穴地而处”。

三、宣威军城考

文献中没有关于建造宣威军城的记载，这可能与其特殊的性质有关。目前发现的元代城址，已考定城名的有都城、路、州、县等级别的城址，另外，还有一些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有特殊用途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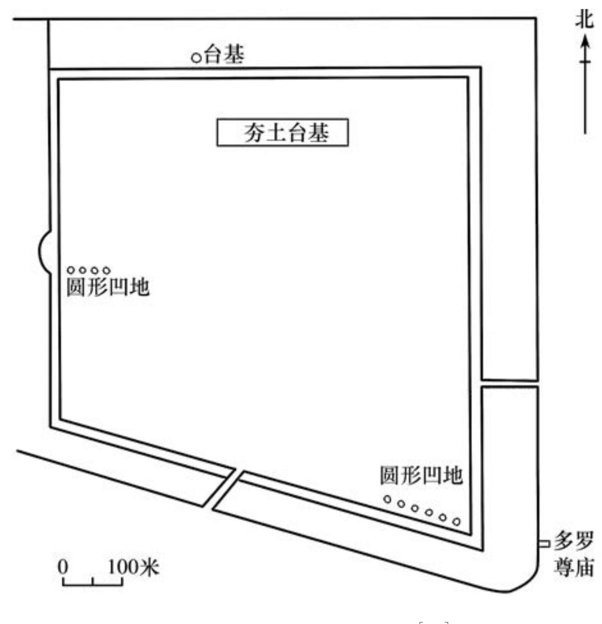
哈喇和林与上都这类都城级别的城址一般面积较大，城墙防御设施较完备，一般配置有瓮城、城壕等，可见其注重军事防御。《元史·地理志》对于元代城市级别有如下记载：“凡路，低于省一字，府与州、直隶省者亦低于省一字。其有寅慰司、廉访司，亦止低于省一字。各路录事司与路所亲领之县，与府州之隶路者，低于路一字。府与州所领之县，低于府与州一字，府领州、州又领县者，又低于县一字。路所亲领之县，若府若州，曰领县若干、府若干、州若干。府与州所领之县则曰若干县。所以别之也。”

应昌路、净州路、德宁路、集宁路与亦集乃路等均为下等路。其中，应昌路、净州路、德宁路、集宁路均下领县一，城址边长约 850 米，有瓮城、角楼等。较为特殊的是亦集乃路，下等路但无所领之县，与其余下等路城址相较，城址面积不大，东西 438、南北 347 米。但是东、西城门有瓮城，城四角有角楼，城内四角有斜坡形登城踏道，南北城墙外各 6 个马面，东西各 4 个马面。城外利用额济纳河为天然屏障，未设护城壕，城墙平地

起筑，这些特征与辽、金边堡关防城市有许多相似之处，军事防御设施完备，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25]。元朝初，忽必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屯田，甘肃行省位于西北边地，其屯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6]。亦集乃路虽为甘肃行省的下等路，其屯田开发亦受到相当的重视。《元史·地理志》《元史·兵志》《经世大典》[27]以及黑城所出土的元代文书[28]中有有关亦集乃路屯田的详细记载。除了为屯田重镇外，亦集乃路还是一个重要的站赤。元朝时期，联系岭北行省和内地共有三条站道，其中西边的站道称为纳怜道。纳怜道起止点为东胜州和和林，亦集乃路是联通和林和内地的交通枢纽[29]。忽必烈登上汗位后，窝阔台嫡孙、合失之子海都便一直有反叛之心，并且其在西北的势力不断增长。再加上和林地区的混乱局面，忽必烈在和林一带派出大量军队驻守，设立驿站，广泛屯田，《元史》中有很多与此有关的记载。这一系列的举措是为了做好镇压海都的准备。亦集乃路的设置与忽必烈的军事行动当有关系。亦集乃路城的废弃，有可能与明军、北元的激战有关。而据发掘者推测，则是由于元末丧乱，明廷无暇北顾，亦集乃路城逐渐丧失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最终导致政权瘫痪，河渠不修，迫使生民逐水草而去，留下孤城一片[30]。无论如何，亦集乃路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了军事防御重地，这体现在其军防遗迹上。又由于其军事作用的丧失，导致了未被长期使用下去而最终废弃。

路下一等为州和县。宣宁县城址规模较小，南北320、东西540米，而丰州城址面积较大，南北1107、东西1110米，貌似与其等级不相符。但丰州城自唐以来，经过金代，均有建设，沿用时期长，军事设施也较完备。此外，和林格尔小红城面积较小，李逸友认为此城为屯田城，归西京宣慰司管，不属于行政管理的州、县政权，因而《元史·地理志》上没有记载[31]。

宣威军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东西长均约800米，面积同几座下等路城址大致等同（图四）。北、东、南三面城墙为双重城墙，内外城墙间隔约1米。东墙偏南及南墙中央的部位有门道，西墙中央处有一向外的弧形遗迹，似瓮城。城中央有一夯土台基，为夯土加包砖筑成（图五）。城内多处有排列整齐的圆形凹地，推测与其军事据点的性质有关，并且城内还出土了铁镞等武器[32]（图六）。北墙偏西内外城墙之间有一处台基遗迹，有可能是一处具有瞭望、站岗等功能的塔楼建筑。东南角外墙之外，还有一座多罗尊庙，年代约为元代，可能是与此城同一时期的建筑[33]。



图四　宣威军城平面图[34]



图五　宣威军城中央夯土台基及包砖[35]



图六　宣威军城圆形凹地遗迹[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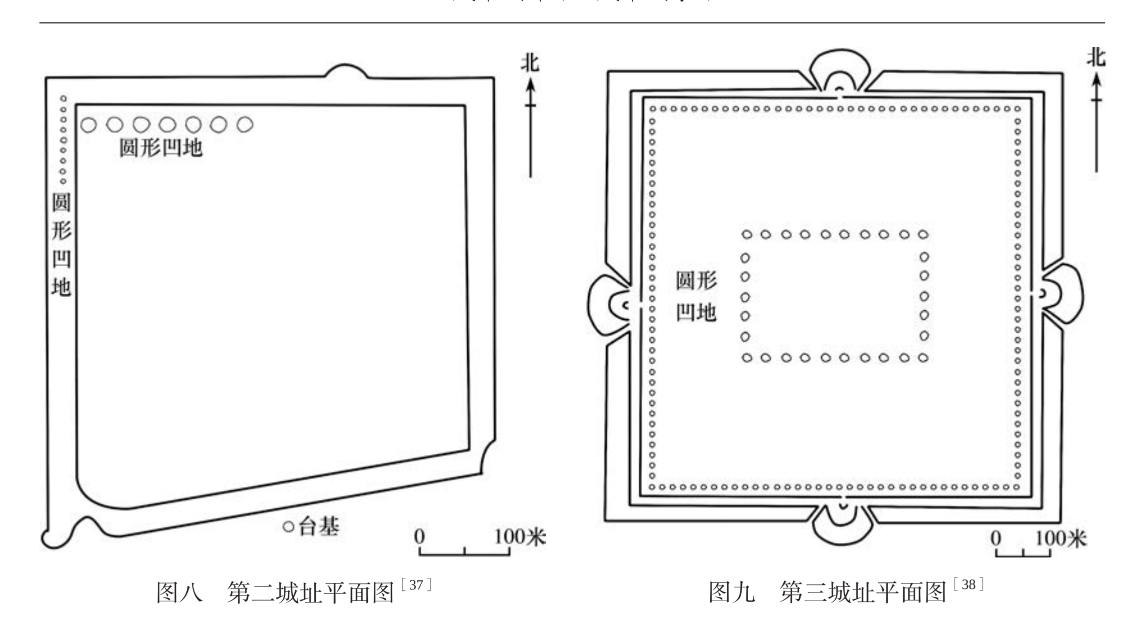
至元十二年，东道诸王昔里吉联合西道诸王海都叛变，来势凶猛。至元十四年，昔里吉叛军逼近和林，夺取了祖宗大翰耳朵。《元史·伯颜传》记载："初，海都称兵，内向诏，以右丞相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诸军于阿力麻里，备之。十四年，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胁宗主以叛。命伯颜率师讨之，与其众遇于斡鲁欢河，夹水而阵，相持终日。俟其懈，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破之。昔里吉走死。"《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至元十四年）癸卯，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击右丞相安童，诱胁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纳东道诸王，亦弗从。遂率西道诸王至和林城北。诏右丞相伯颜帅军往御之。"忽必烈不仅派那木罕、伯颜等蒙古将领征伐叛军，为了防止倒戈，还调遣了汉军、色目军。《刘平章神道碑》中记："北有警制，命公曰：'征者不力，以其族属怀顾望尔。卿号陈力，朕视卿如子，当如朕躬行也。'"刘国杰与贾忙古觧于至元十五年北征，戍守和林。至元十六年和十七年，昔里吉、脱脱木率兵侵犯和林一带。刘国杰镇守和林，击退了叛军。《刘公神道碑》："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脱脱木犯边。公曰：'彼全军而来，巢穴必虚。'乃出其不意袭击之，俘其生口畜牧万计。脱脱木以骑兵来追，至谦河溺死者过半……十九年秋七月，奉旨将所部军三千还京师。"

宣威军城位于哈喇和林之南约200千米，有可能便是当时征讨昔里吉叛军、守卫和林地区的刘国杰军建的。文献中没有记载，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这座军城本是由于北征军驻扎在此，创立屯所，守卫和林，始建造的。由于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和突发性，这种临时屯田住所或军事据点，文献未能一一记述。其二，由于其特殊用途和临时性，这座城使用时间不长，城内遗迹较少，除了城墙、圆形凹地，还出有元代石碑和多罗尊庙。征战时，局面混乱，双方军队在和林一带激战，文献对此记载不甚详细。并且可能在战争结束后，此城便遭到了弃用。因此文献里没有记载贾忙古觧命名的这座"宣威军城"，而仅有"师次益图""屯亦脱山"这样的零星记述。



图七　三座城址分布示意图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霍格欣德尔山即亦都山发现了包括宣威军城在内的三座城址，三座城由北至南依次排列，宣威军城位于最北边（图七）。位于中间的第二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东西长均约400米。也为双重城墙，外



图八　第二城址平面图[37]　　图九　第三城址平面图[38]

墙也有高台和瓮城遗迹，城内及内外墙之间有成排的圆形凹地（图八）。位于最南边的第三城址平面也为正方形，南北、东西长约 700 米，双重城墙，四面均有门道。城内分布有多处成排的圆形凹穴，并且在城中央形成了一个小正方形（图九）。由于缺乏更详细的考古发掘资料，现在还不能准确判定这三座城的关系。但是这三座城形制相同，特征相近，应当是同时期建造的。

现在可确定最北的宣威军城是至元十五年与刘国杰同来的将领贾忙古解建造的，但是刘国杰可能当时仅“师次益图，大雪，环车为栅，穴地与士卒同卧起”，不一定最终驻扎在此。石高山“（至元）十二年冬……进显武将军，领兵北征，屯亦脱山”，其屯驻之地有可能为另两座城。

元代类似宣威军城这样的军城或屯田城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地理位置重要，军防设施完备，使用时间不长（表一）。亦集乃路与宣威军城有相似之处。宣威军城也处于和林经亦集乃路至内地一线上，这条线上有多个站赤，联系紧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是防守西北海都军的重要防线。因此，亦集乃路和宣威军城的城防设施都比较完备。不同的是，亦集乃路自西夏便是黑水镇燕军司的驻地，由于其位于绿洲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元代也在此设置官署，发展农牧业生产。《元史 · 地理志》：“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至元二十三年立总管府。二十三年，亦集乃总管忽都鲁言：‘所都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计屯田九十余顷。”而宣威军城是至元十五年新建的城，其作用更多的是驻军防守，“睹其形势险阻，虽充国之金城，仲升之玉关，亦何加於此”，与耕田凿渠不同，宣威军城的驻军“就於射所，军僚参佐毕集”。但是，宣威军城同亦集乃路一样，在其军事任务完成以后便不再使用，终而遭到废弃。

表一　元代城址举例

城址	平面图	面积	军防遗迹	年代	位置	性质、等级推断
哈喇和林[39]		南北 1500、东西 1120 米	东城门有瓮城，北城墙外有城壕	窝阔台时期建	蒙古国前杭县哈拉和林苏木	岭北行省和宁路总管府，上
元上都[40]		边长 2200 米	有瓮城、城壕，加筑土墙		锡林郭勒盟	上都路
鲁王城[41]		南北 800、东西 650 米	东、西、南城门外有瓮城	至元七年（1270 年）建	赤峰克什克腾旗	应昌路，下，领县一
净州路故城[42]		边长 800 米			乌兰察布四子王旗	净州路，下，领县一
赵王城[43]		东墙 591、西墙 970、南墙 582、北墙 565 米	东、西、南城门外有瓮城，城四角有角台	至元年间建	包头达尔汗茂名联合旗	德宁路，下，领县一
集宁路故城[44]		南北 940、东西 640 米	东、西城门瓮城		乌兰察布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	集宁路，下，领县一
黑水城[45]		南北 347、东西 438 米	东、西城门有瓮城，城四角有角楼，城内四角有斜坡形蹬城踏道。南北城墙外各 6 个马面，东西各 4 个		额济纳旗	亦集乃路，下
宣宁县[46]		南北 320、东西 540 米	有瓮城、角楼		凉城县淤泥滩	县
丰州遗址[47]		南北长 1107、东西 1110 米	南门加筑有瓮城，西南角尚存角楼。四面城墙上都筑有马面，两个马面间距离约为 56 米		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	丰州，下
宣威军城[48]		南北 750、东西 750 米	双重城墙，城内有成排、规整的圆形凹地	至元十五年（1278 年）建	哈喇和林西南约 200 千米处	

四、结　　语

根据宣威军城碑与文献中相应的种种记载，可以看出宣威军城的建造与忽必烈意图镇压昔里吉、海都叛乱，保卫和林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贾忙古解扶睹儿同刘国杰一起于至元十五年到达此地，屯驻军队，建造此城。贾忙古解扶睹儿有可能为汉人贾茂，另一同来的还有千户张温、阿塔海和王通等。在后来镇压昔里吉、海都叛乱的过程中，宣威军当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与同时期的亦集乃路等城址对比，可以看出这些城的设置均带有军事目的。这些城在和林与内地之间的要塞之上，是防止漠北叛乱、保护和林地区以及发展农牧业的必要措施。在其军事作用丧失之后，这些城便遭到了废弃。

注　　释

[1]　〔日〕堀江雅明. ホクシン＝テール碑と宣威軍城址——至元15年に建設された元代モンゴリアの城寨[J]. 東洋史苑，1988.

[2]　同[1].

[3]　同[1].

[4]　同[1].

[5]　〔日〕堀江雅明. フビライ時代の石碑と城址——1991年モンゴル旅行報告[A]. 小田義久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集[C]. 1995.

[6]　〔日〕堀江雅明. 宣威軍城址再訪——1994年モンゴル旅行報告[J]. 東洋史苑，1994.

[7]　〔日〕村冈伦，松田孝一. 宣威軍城址[A]. モンゴル国現存碑文調査研究報告[R]. 1999.

[8]　[日]松田孝一，大泽正己. モンゴル宣威軍城（ホクシン＝テール）遺蹟出土の13～14世紀の鉄鏃の分析[A]. 大阪国際大学紀要国際研究論叢[C]. 2002.

[9]　〔日〕白石典之. 蒙古帝国史的考古学研究[M]. 2002.

[10]　坐标位置来自〔日〕森安孝夫，オチル[A]. モンコ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R]. 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

[11]　同[7].

[12]　同[1].

[13]　蔡美彪. 易州龙兴观碑[J]. 燕京学报，2006（20）.

[14]　蔡美彪.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　（明）宋濂. 元史·卷一三一·列传第十八[M]. 中华书局，1991.

[16]　（元）王恽. 故金吾卫上将军景州节度使贾公行状[A]. 秋涧集·卷四十七[M]. 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17] （元）黄溍．刘公神道碑［A］．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M］．元钞本．
[18]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六二·列传第五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9] 柯劭忞．新元史·卷二百三·列传第一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 （明）宋濂．元史·卷一六七·列传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1] 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六七·列传第六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 （明）王光鲁．元史备忘录［M］．清学海类编本．
[23] （清）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十八［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4] （清）张岱．石匮书·卷七十四［M］．稿本补配清本．
[25] 郭治中，李逸友．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J］．文物，1987（7）．
[26] （明）宋濂．元史·卷一百·志第三十八［M］．中华书局，1991．
[27] （元）苏天舜．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屯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8] 李逸友编．黑城出土文书——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考古报告之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29] 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薄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30] 同［25］．
[31]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
[32] 同［8］．
[33] 同［5］．
[34] 根据村冈伦、松田孝——1999年图及魏坚教授实地考察改绘，同［10］．
[35] 同［34］．
[36] 魏坚教授实地考察时拍摄．
[37] 同［34］．
[38] 同［34］．
[39]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40] 魏坚．元上都的考古学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41] 刘志一．应昌路遗址［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42] 同［39］．
[43] 同［39］．
[44] 同［39］．
[45] 同［39］．
[46] 同［39］．
[47] 同［39］．
[48] 同［5］．

Xuanwei Military City and Its Stone Stele

Chang Lu

Abstract: Three Yuan Dynasty city site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northeastern foothills of Hoge Hindell Mountain in Qiang’ang Province, Central Mongolia. Among them, the northernmost city site yielded a stone stele entitled “Xuanweijun” (Xuanwei Army), which text records that a military commander reached the place on the 15th year of the Zhiyuan era of the Yuan Dynasty (1278), and stationed his army there. He fortified the site and named it “Xuanwei Military Cit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scription and compares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determine the city’s builders’ identity, its construction time and its func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Kublai Khan, rebellions were frequent near Karakorum. Therefore Kublai sent troops to defend the fields in Karakorum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nd strengthened military defense. The purpose was to suppress rebellions and maintain pea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uanwei Army may initially be relat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rebellions. In the second par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ettings of these cities had military strategic purposes by comparison with contemporaneous city sites such as Jining City. These cities are located above the fortress between Karakorum and the inland. They ar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rebellions, provide protection from forested areas in the West and develop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Keywords: Xuanwei Military City; Stele; Kublai Khan; Haidu rebellion

理解与交流：评《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

李梅田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 本书是第二届“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讨论议（2016年，南京）的论文集，是关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最新展示。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分别从传统考古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方面对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文化遗产展开讨论，是一次地区之间、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无论通过考古实物所揭示的帕提亚至萨珊时期海上贸易网络，还是通过科技手段（如古 DNA、寄生虫残留物）提取的有关种族融合、疾病传播等信息，或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如波斯波利斯石柱、以弗所石棺、中亚壁画等）的科技分析，都极大地扩展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体现了学者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对人类文化复杂性和价值观多元性的理解与尊重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征，也是丝绸之路精神在当代的复活。

关键词：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考古与保护；人文关怀

2150 多年前，张骞凿空，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迈向那条通往西方的崎岖之路，之后又有班超、甘英、法显、宋云、玄奘、杜环……，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向西走得越来越远，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认识之路、贸易之路、交流之路逐渐形成，并且经久不衰。140 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这条始于西汉长安，途经中亚，止于罗马的贸易之路称作“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从此，“丝绸之路”成了欧亚大陆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百多年来，丝绸之路的概念逐渐扩大，出现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提法。2013 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主要旨在提升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但是也为科学和教育界拓展了新的活动空间。

21 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展了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交流。从 2014 年开始，在欧亚－太平洋地区大学联盟（Eurasia-Pacific Uninet，简称 EPU）支持下，由南京大学和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a）共同发起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讨论议，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第

一、二届分别在中国西北大学（2014 年）和南京大学（2016 年），第三届在伊朗大不里士（2018 年）。其中第二届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奥地利、伊朗等国的 52 位学者。在克里斯特教授（Gabriela Krist）和张良仁教授的精心组织下，13 篇参会论文于 2018 年由维也纳博劳出版社（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结集出版。以下对本次会议的论文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1] 予以简要介绍，以期得到更多丝绸之路研究者的关注。

一、主题：地区与学科之间的互动

与通常以欧美学者为主导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的参加者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学者和有着深厚丝绸之路学术传统的欧洲学者为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以往国际会议上少有露面的伊朗学者也积极参与了本次会议。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学者都是本土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直接参与者，研究视角自然与“他者”有所不同，他们与本地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沿线各地区学者之间的交流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是丝绸之路精神在学术界的复活。

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产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跨学科合作的趋势。研究者再也不限于历史、考古学者和美术史学者，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参与进来，使文化遗产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学科研究的领域。从提交的论文来看，本次会议很好地体现了学科之间的彼此渗透与合作，正如会议主题“考古与保护”所示，传统的人文学者和掌握现代科技的自然科学学者之间就同一主题展开了真正的学科互动。

本书收集的 13 篇论文分为三大主题：传统考古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

（1）传统考古学的研究主要从文化史视角考察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伊朗学者 Hossein Tofighian 的《伊朗鱼雷罐研究》[2] 探讨了一种形似鱼雷的陶罐。这种形似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希腊双耳细颈罐的陶器是一种容器，内壁涂以沥青，用来盛放海上贸易的酒、油、鱼和谷物等，广泛发现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沿岸的陆地和水下遗址。本文通过器物形制和出土地点建立了这种典型陶器的时空序列，以此讨论了帕提亚至萨珊时期海上贸易网络的变迁，这对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公元前 3 世纪末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向匈奴文化的转换时期，其时冒顿单于控制了南西伯利亚，阿尔泰成为匈奴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面貌到底有何变化？以往在阿尔泰地区鲜见明确的匈奴文化遗存，俄罗斯学者 Alexey A.Tishkin《匈奴帝国时期的阿尔泰》[3] 重新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阿尔泰考古遗存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认为其中的乌斯季艾迪干遗址（Ust-Edigan）可能反映了匈奴帝国在阿尔泰地区的统治，但是其文化面貌并不单纯，而是以匈奴文化为主，兼有斯基泰文化传统，也有来自萨尔马泰文化的影响，这一结论是符合当时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迁徙的

大背景的。

不同于 Tofighian 和 Tishkin 对考古遗存的具体分析，Kira Samosiuk[4]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的库车文物入手，介绍了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者的新疆考察资料。1905年动物学家米哈伊尔·别列佐夫斯基（Mikhail Berezovsky）率领的俄罗斯中亚和东亚研究会考察队，对库车县塔吉克遗址（在斯坦因记录的托格拉克勒克遗址附近）进行了考察，随行的艺术家尼古拉·别列佐夫斯基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和拍照，还绘制了一批水彩画。与奥登堡中亚考察相比，本次考察的细节和成果鲜为人知，但实际上正是这次考察促成了两年后奥登堡对库车龟兹石窟的考察。从冬宫博物馆收藏的尼古拉作品来看，塔吉克遗址佛教壁画的构图和题材与克孜尔石窟壁画非常接近，同属龟兹石窟艺术范畴。

（2）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提取信息的能力，因此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提取传统考古学和历史文献难以获得的遗存信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古代贸易之路，促进了欧亚大陆文化的交流，但也存在一些人们长期忽视的负面影响，如随着人群流动而传播的疾病。Michaela Binder 用生物考古学方法考察了丝绸之路上的瘟疫，通过分析人体骨骼形态、古 DNA、寄生虫残留物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文献记载的结论。公元2世纪时肆虐欧洲，甚至引起了罗马皇帝安东尼死亡的瘟疫，历史文献并无确切记载，但通过生物考古学分析，作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天花，在2世纪时经由安息传至罗马，3世纪时经由匈奴传到中国内地；传统文献认为，麻风病源自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但通过分子生物学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它是由地中海东岸经由伊朗传入中国的。Michaela Binder 还指出了传统的体质人类学的理论误区，认为以往的定量分析过分强调骨骼形态的遗传学原因，而低估了环境因素；实际上，环境的变化会引起食物结构的变化，并引起咀嚼和肌肉运动方式的改变，从而影响骨骼形态。另外，通过分析人体骨骼中的锶同位素和古 DNA，还可解释更多关于骨骼形态变化的非遗传学因素。随着近年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和科技手段的进步，有关人类骨骼遗存信息的提取和分析方法都得到了大幅提高，可以提供大量珍贵的另类历史信息[5]。

Martin Steskal 等[6]同样用生物考古学方法讨论了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罗马时代大都会——以弗所（Ephesos）的人口结构。以弗所曾是罗马时期繁华的重要海港，是罗马亚洲行省的省会，也是古丝绸之路西端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但是由于海岸线的变迁，今天已成为土耳其的一个内陆城市。从2008年开始，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对罗马时期的以弗所墓地做了多学科的田野考古工作，包括调查、发掘、建筑研究、地球物理、地质考古、生物人类学、遗传学研究等。本文对以弗所罗马墓地的人类骨骼进行了古 DNA 研究，并结合历史地理背景讨论了以弗所不同政局下人口的变迁。以弗所的人口来源十分复杂，来自亚洲和非洲各地的人类基因汇集于此，使之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熔炉。

贾伟明等[7]用植物考古学方法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交流。他们从公元前

三千纪的新疆萨恩萨伊墓地的出土遗物中提取了小麦淀粉残留物，通过显微镜观察和数据库比对，提出新疆小麦的种植比目前所知的小河墓地要早得多。

王铂涵和周双林[8]分析了青海省都兰县吐蕃墓地出土金箔银牌的化学成分，通过扫描电镜和 X 光衍射分析，可知金箔是一种金银合金，银牌则是银金合金，而金箔与银牌之间用一种植物胶黏结。银牌下葬时曾用丝绸织物包裹。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金箔装饰工艺传统的重要信息。

（3）石质文物和壁画是丝绸之路沿线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这两方面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论文集收录了 2 篇石质文物、3 篇壁画保护研究的论文。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都城，可谓最具代表性的波斯文化遗产。自公元前 330 年被亚历山大摧毁后，那些高大的石柱一直暴露于旷野中，面临风化和环境污染的危险。伊朗和意大利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寻求一种最为妥善的保护方案。在实施保护之前，文保学者做了大量的分析和实验。本次会议上 Alireza Askari Chaverdi 等报告了石柱修整技术的研究成果[9]。他们通过无损取样，分析岩石的岩相特征、风化方式与原因；通过 X 光衍射、扫描电镜、能量色散谱仪、X 光荧光分析等，发现灰黑色石灰岩石柱表面的白灰层并非历史的尘埃，而是有意覆盖的一层薄薄的精细层；不同时期的涂层原料是不同的，大流士时用的是石膏，薛西斯及以后用的是氟磷灰石以及方解石。氟磷灰石可能来自烧过的动物骨头，以石灰作黏合剂敷于石柱表面。这个分析结果显然是未来保护方案的重要依据，对我国的文物保护有着重要启示：在实施文物保护措施之前进行充分的基础研究是文物保护的首要原则。

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在金属、石质、丝绸文物保护上具有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Gabriela Krist 等[10]对以弗所（Ephesos）石棺园中的“亚马逊之战石棺”（190 年）进行了科学分析，讨论了气候、有机物侵蚀等对石棺机理的破坏，为石棺园中的共 20 具罗马时期石棺的保护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相比石质文物，壁画更加脆弱，保护技术也更复杂一些，参会者分别从壁画材料、黏合物、颜色衰减、剥离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Steffen Laue 等[11]研究了遭受严重破坏的撒马尔罕的 15 世纪帖木儿王朝 Ishrat Khana 陵壁画。他从损毁的墙面和壁画取样，利用偏光显微镜、X 光衍射、热分析与测量、X 光荧光分析等手段对“甘奇”（Ganch）和“昆达尔”（Kundal）两种中亚特有的壁画技术进行了结构、黏合力和聚合度的分析，既为该陵墓壁画保护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也为中亚地区同类壁画的保护提供了参照。

20 世纪初期斯坦因、伯希和、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到库车、吐鲁番做了 4 次考察，带回了大量彩绘雕塑、木质艺术品及壁画。柏林的德国国家博物馆及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长期致力于这批藏品的保护和多学科研究，曾采取多种干预方式，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石膏加固、20 世纪 60 年代的高分子聚合物和醋酸乙烯树脂加固、20 世纪 70 年代对铅颜料变色机制的研究、2000 年开始的壁画黏合物老化研究等。Ellen Egel 等[12]对不同颜料的变色机制进行了研究，用多种分析方法（光学显微镜、傅里叶

红外线光谱、拉曼显微光谱仪、扫描电镜、色散 X 射线、X 光衍射分析）观察颜料的变化过程，如红底白色的呈色机制、青金石颗粒的失色机制等，通过实验室模拟，发现以醋酸乙烯树脂等方式加固的壁画不会造成青金石颜色的改变。

Birgit Angelika Schmidt[13]以 1906 年揭取自新疆龟兹地区森木塞姆石窟、现藏德国柏林艺术博物馆的一幅壁画残片为例，讨论了将壁画从烟垢下剥离出来的方法。这项研究不但考虑了文物保护的技术，而且出于展示的需要，非常注重壁画原境的复原。为此她做了大量的文献和考古学研究，通过考察日记和同出的其他艺术品确定洞窟性质，还原壁画所在洞窟的空间布局，最后确定第 40 窟是一个用于僧人礼拜的中心柱窟，以此建立了可信的壁画空间逻辑。这种研究思路对丧失考古原境的同类文物保护与展示具有很大的示范价值。

二、理念：考古与保护中的人文关怀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从实物中提取信息、分析信息之后，实物变成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资料，获取和分析实物资料的手段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18 世纪的古物学阶段，自然科学领域的地质学和生物学被应用于地层分析和器物分类，直接促成了科学考古学的诞生。此后，考古学运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来获取资料、分析资料，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迅速运用到考古学中来，并引起考古学研究的巨大变革，如碳的同位素测年法引起了考古学测年的革命、分子生物学方法（DNA）对研究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物理和化学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常常能颠覆古代工艺研究领域的经验性认识。随着当代田野考古的精细化和专业化运用多种自然科学手段提取和分析遗存已成为考古学的新趋势。但是，无论何种自然科学技术，它们都是提取和分析遗存历史信息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历史和文化的阐释，探索实物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思想观念，考古学归根结底是一门人文学科。

在现代文化遗产观的大背景下，考古学被赋予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古人活动留下的实物遗存不再是考古学者独享的学术资源，而是与公众共享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修复和展示。多种科技手段的介入有助于更客观地还原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揭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信仰、审美、价值观等人文内核，通过展示与分享来传递历史记忆，理解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这是各个方向的文化遗产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人文关怀。

对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已成为考古学者和文化遗产保护学者的共识，这点在本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石质文物的保护，还是壁画剥离技术和颜色退化的研究，都考虑到文物的原境，也考虑到修复与展示的方式。Alireza Askari Chaverdi 等通过对波斯波利斯石柱的无损取样，获得了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石柱修整技术，为石柱的保护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还对这种技术体现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思考：为

何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其他都城如苏萨（Susa）石柱没有采取这样的修整措施？为何涂层材料从石膏变为了烧骨？虽然研究者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表明了文保研究者的人文倾向：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

Thomas Danzl[14]不但用科技手段分析了柏林收藏的新疆佛教壁画结构，而且针对壁画剥离后涂层损毁、原真性丧失等负面因素提出了重构原境的原则与方法，认为在保护之前要对壁画结构、材质和技术进行充分的科技分析，主张以实物展示与多媒体再现方式重构壁画的原境。Ellen Egel 等对 20 世纪初期欧洲考察者获得的新疆壁画保护技术进行了历史的检讨，不但为新的保护方案提出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而且十分重视壁画制作和发现时的原境，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环境复原，力争以最真实和最完整的历史原境与公众共享。

传统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技术在文化遗产研究中各具优势，也各有缺陷。过去两个学科往往各自为战，以致考古工作者无法理解文物保护技术，文物保护工作者不重视遗产本体的原境研究，丧失或曲解了遗产的很多重要历史信息，据此做出的保护方案尽失原真性和完整性。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合作的基础上，而多学科合作的基础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人文关怀，共同揭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多样性和价值观多元性。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来自传统考古学和科技保护领域，从所探讨的问题来看，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的人文理念。

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而本次会议则是连接东西方学者的桥梁。在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参与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近年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团队一直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俄罗斯、伊朗等地取得了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同时还以国际会议的形式将关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各国学者召集起来，每两年进行一次研究成果的交流，这是十分有学术意义、也彰显中国学者人文精神的盛事。我们也期待“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国际学术讨论议得到学界同仁的更多关注，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注　　释

[1] Krist G, Zhang L.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2] Tofighian H. Ancient Torpedo Jars of Iran (Persian Gulf) [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63-82.

[3] Tishkin A A. Altai During the Xiongnu Empire [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57-190.

[4] Kira S. The Material from Tadjik (Tograklik-aki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Mikhail

Berezovsky Kucha Expedition 1905-1907[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91-200.

[5] Binder M. Plagues and Peoples-a Bi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rade Routes [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3-30.

[6] Steskal M, Bjornstad Gro. Ephesos, the Metropolis of Roman Asia-a City at the Crosssroads of East and West[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23-134.

[7] Jia P W, Chau F M. Early Wheat Cultivation and Plant Use in Xinjiang Prehistory-New Evidence from Starch Analysis[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31-48.

[8] Wang B, Zhou S. A Gold-Coated Silverware Unearthed from a Tubo Dynasty Cemetery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47-156.

[9] Chaverdi A, Gallieri P, et al.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Persepolis (Iran)-the Finishing Techniques of the Stone Monuments[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95-108.

[10] Krist G, Rankl B. Conservatio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a and a Diploma Thesis in Epheso[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35-146.

[11] Laue S, Kleinmann P. Ganch as Historical Building Material and the Kundal Wall Painting Technique in the Mausoleum Ishrat Khana, Samarkand, Uzbekistan[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49-62.

[12] Egel E, Simon S, et al. ASummary on Material Research on Buddhist Mural Paintings from Northern Silk Road-Pigment Degradation and Laboratory Simulation of their Alteration Mechanisms[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109-122.

[13] Schmidt B A. Fragmentary Works of Art from the simsim Grottoes-Methods of Analyzing Consideration of Resting Soot Deposits[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95-108.

[14] Danzl T. Handling with a Taboo in the Academic Education for Conservators-Restorers-the Conservation of the Detached Wall Paintings between Museum's Exhibi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A].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2016 Postprints* [C]. Vienna: Bohlau Verlag Wien Koln Weimar, 2018: 201-212.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A Review on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Li Meitian

Abstract: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a selection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Nanjing, 2016), is an updated account on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on the Silk Road. Archaeologists and scientists from all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engaged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ultural heritages from traditional archaeolog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spectively, which is a fruitfu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regions and disciplines. Whether the Parthian to Sassanid period maritime trade network revealed through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formation about racial integration, disease transmission extract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ancient DNA, parasite residues), or the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well-known cultural heritages (such as Persepolis Stone columns, Ephesus sarcophagus, Central Asian murals, etc.), have greatly expand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humanistic concern of scholars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Silk Road.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cul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value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is conference, which is a resurre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 in contemporary times.

Keywords: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s;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Humanistic Concern

多元文化的交融

——读《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

付承章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内容摘要：齐东方先生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何家村遗宝在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例如，单点式动物装饰、周围留出空白的做法与萨珊、粟特器物关系密切，等等。这本书能够让我们通过对器物细节的观察，从中了解何家村遗宝之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远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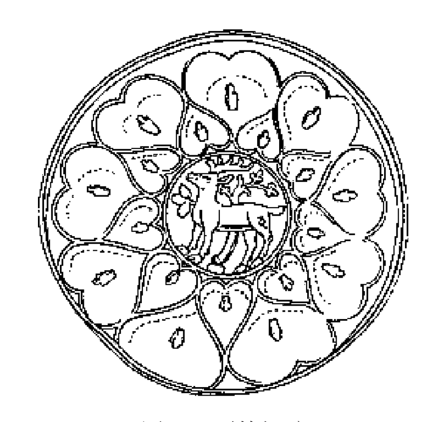
关键词：何家村；萨珊；粟特；丝绸之路

2018 年 7 月，齐东方先生的《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毫无疑问，何家村遗宝是唐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其研究价值及学术意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产生丝毫褪减。而齐先生将其冠名为“遗宝”，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这一发现在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重要性。

放眼西方世界的考古发现，同样有着“遗宝”美誉的当属 1877 年发现于塔吉克斯坦的“阿姆河遗宝”[1]，遗宝涉及雕塑人像、器皿、戒指、印章、手镯、钱币等各类遗物。其重要性之一在于希腊、波斯、斯基泰等多种文化元素在中亚地区的汇聚。关于这一点，“中亚考古之父”马尔沙克（Б.И.Маршак）先生在《粟特银器》一书中也有类似看法，他曾指出，如果一件器物上同时包含了东、西方的文化元素，其地域来源很可能是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某个地区，也就是中亚[2]。而何家村遗宝的发现表明，这种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同样体现在了中国北方地区。

以何家村出土的凤鸟纹、熊纹、双狐纹、龟纹、飞廉纹银盘为例，这几件器皿的共性在于均采用了中心饰动物纹，周围留出空白的做法。齐东方先生认为这是借鉴了西亚萨珊、中亚粟特等外来艺术手法，并用中国传统题材创作的中西融合作品。有趣的是，这种融合不光体现在题材、造型等方面，还体现在一些微妙的细部变化上。在萨珊和粟特器物中，中心处的单体动物或人物形象的外侧多装饰徽章式圆形边框（图一），也有少数不带边框的。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猞猁纹粟特银盘上，我们可以很明显

地看到猞猁纹周围有一个近圆形的边框轮廓[3]。但在何家村出土的这几件银盘上，这种徽章式圆形边框已消失不见。这可能与唐朝工匠喜欢在主题纹样的周围留出空白有关。另外，在大多数萨珊器物中，主体动物或人物多面朝右侧（图二），仅有少数呈正面或面朝左侧（观者角度），后者多可归入萨珊晚期或“后萨珊”时代，文化因素复杂多样。而粟特器物中动物或人物面朝左侧的现象要多于萨珊。这可能与中亚文化有关，因为很多中亚钱币上的人物均面朝左侧。相比之下，何家村出土的这几件银盘，上面的动物面向不一，这就更能说明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十分盛行。



图一　粟特银碗



图二　萨珊银碗

在何家村遗宝中，有一件狩猎纹高足银杯同样极具代表性。狩猎图位于杯体中部，可分两组：一组前面一人正回身向后射箭，后面一人正向前射箭，两名猎者之间有一只奔跑的野猪；另一组也是两人配合狩猎，前者转身将弓挟入怀中，后者弓上的箭刚刚射出，两名猎者之间为一只奔跑的鹿和一只中箭的鹿，还有一只逃跑的狐狸。四人均骑马，四周环绕缠枝花卉。需要指出的是，马上的猎者形象早在公元前后就已成为欧亚大陆艺术中较流行的主题之一，这一题材起源于亚述浮雕上的皇家狩猎图案，后来在伊朗、中亚、希腊、罗马、中国、韩国、印度等地的艺术作品中均有所呈现[4]。而猎物或逃跑或受伤（死亡）的情形则在萨珊国王狩猎图中更为常见，如在彼尔姆（Perm）地区发现的国王狩猎纹鎏金银盘（图三）。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形来源于猎者对胜利的渴望[5]。与萨珊狩猎图不同的是，何家村高足银杯上的猎者不止一人，且姿态多样，不像前者多只有国王一人，且姿态相对固定。这一特点似乎与粟特文化有关。与萨珊狩猎图强调皇室权威的内涵有所不同，粟特狩猎图更多的是用以指代某一场景中的特定情节或者富人的理想



图三　国王狩猎纹鎏金银盘

生活[6]，如位于史君墓石堂西壁 W3 的射猎与商队图[7]。但何家村狩猎图上的诸多细节又和粟特狩猎图略有差异。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何家村高足银杯中的狩猎图是受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另一件颇为耐人寻味的器皿当属何家村出土的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类似器皿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中也有发现。有所不同的是，何家村银碗的中心为一只海兽，四周似有一对鸳鸯伴随。而李希宗墓银碗的中心则为一朵六瓣莲花[8]。关于李希宗墓银碗的产地问题，有学者认为莲花图案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故认为其应产自中国[9]。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与旁遮普（Punjab）银碗的相似性，认为应来自西方[10]。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水波纹在罗马晚期、拜占庭、萨尔马泰、萨珊、粟特等不同风格的文化中均有出现，时空范围极广，故很难用某一种文化因素加以解释。而海兽也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外来文化的体现，文化因素十分复杂。因此，通过对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的观察，我们能够从中一窥大唐文化之多元、开放、包容。

总而言之，《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从不起眼的文物出发，科学而全面地解读了多元文化的交融现象，并对文物背后所反映出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有效的发掘与深入的探索，使我们得以了解何家村遗宝之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远意义。正如齐东方先生所言，何家村遗宝不仅闪烁着盛世大唐的光辉，还倒映出世界文化的影子。

注　释

[1] 罗世平，齐东方．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0.

[2] 〔俄〕马尔沙克著，李梅田，付承章，吴忧译．粟特银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6.

[3]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J］．考古，1978（2）：117.

[4] Marshak B I, Raspopova V I. A Hunting Scene from Panjikent [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In honor of Richard Nelson Frye: Aspects of Iranian Culture*, 1990 (4): 77.

[5] 同［4］：89.

[6] Azarpay G.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64.

[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24.

[8]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J］．考古，1977（6）：387.

[9] a. Watt J C Y, Howard A F, Marshak B I,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 [M].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3.

b．孙机．中国圣火［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46.

[10]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59.

The Multicultural Blending: A Reviewing of *Hua Wu Da Tang Chun: The Explanation of Hejiacun Treasures*

Fu Chengzhang

Abstract: The book *Hua Wu Da Tang Chun*: *The explanation of Hejiacun Treasures* by Qi Dongfang,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ejiacun Treasures to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Silk Road. For instance, the decoration of single animal leaving surrounding areas empty show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Sasanian and Sogdian objects, etc. By observing details of objects, we can learn about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Hejiacun Treasures by reading this book, especially to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eve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words: Hejiacun; Sasanian; Sogdian; Silk Road

征稿启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 15000 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 ~ 6 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 3 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 20M，请发至 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3079.31)





科学出版社互联网入口　　赛博古二维码

文物考古分社
部门：(010) 64009636
部门E-mail：arch@mail.sciencep.com

www.sciencep.com



定　价：168.00 元